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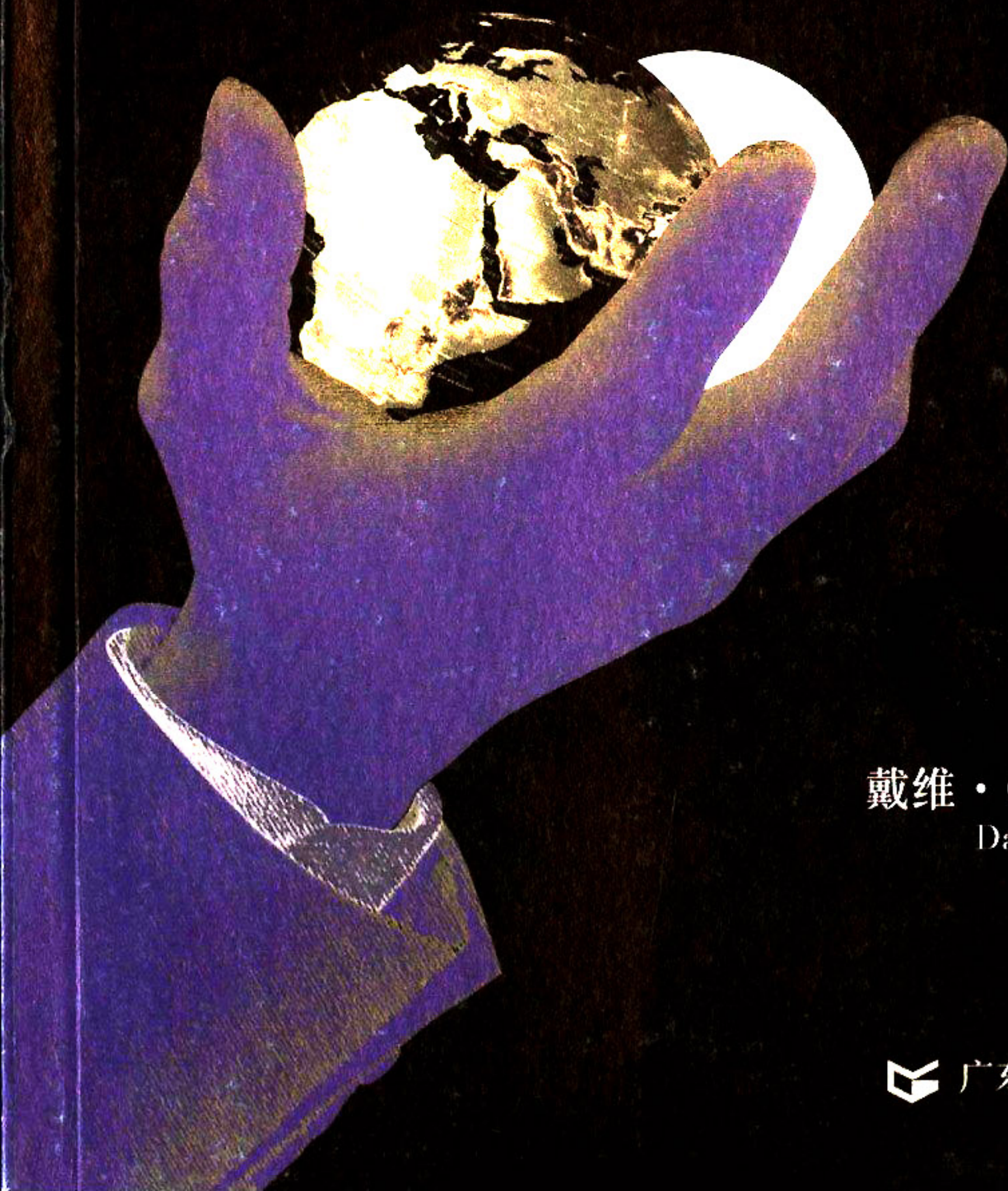
仅供个人阅读研究所用，不得用于商业或其他非法目的。切勿在他处转发！

本电子书制作者

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 Second
Edition

当公司 | 统治世界

第二版



戴维·C.科顿 著
David C. Korten

王道勇 译

江立华 审定

 广东人民出版社

无情地空诉了一个不公
出自于一个激进的理想主
充分证明摧残成人土审

丧失万分又觉得希望犹存。

我们可以为建造一个

更公正的经济秩序

而行动起来

当公司

统治世界

第二版

戴维 C. 科顿 著

David C. Korten

王道勇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当公司统治世界/〔美〕戴维·C. 科顿著;王道勇译.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3

(西方社会学前沿译丛)

ISBN 7-218-05035-2

I. 当… II. ①戴…②王… III. 经济一体化—
影响—研究—世界 IV. F11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837 号
版权登记号: 192004119

首版由〔美〕Berrett-Koehler 出版公司出版

First published by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Inc., San Francisco, CA, USA

版权所有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崔肇钰 倪腊松 黄洁华
封面设计	卢小雅+何 筠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4.375
插 页	2
字 数	336 千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5035-2/F·742
定 价	28.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83799710 (直销) 83790667 83780104 (分销)】

这是一本“必读”书——
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它并非
义左翼分子之手，而是出自自

慎思 考 的 结 果



也许我既感到

或许，

**献给那些英勇的年轻人，
1999年11月30日他们在华盛顿
西雅图的街头用自己的生命
来保卫生活和民主，为世界增
添希望之光。**

**同时，献给我的妻子法朗
兹·科顿博士，伴我走过难以言
喻的孤独旅程。**

作者简介

戴维·C. 科顿在卓越的商业、学术和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当代市民运动组织中积累了35年的宝贵经验。他是“积极未来网”（Positive Futures Network）和《Yes! 积极未来》杂志（*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的创办人和董事，兼任“人本发展论坛”（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Forum）的主席和“全球化国际论坛”（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的协办人。



科顿在斯坦福大学经济研究所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凭借在经济、组织理论和经济策略的专业知识，他早期事业专注于在低收入国家建立商业学院——从埃塞俄比亚开始——期望创立新型专业商业家阶层以消灭贫困。在越南战争服役后，他任美国空军上校，在空军指挥部的特殊空战学校和国防部长办公室任职。

之后科顿作为哈佛大学商业研究所成员，担任哈佛中级管理和MBA项目的教学达5年。期间，他也担任建在尼加拉瓜的美国管理学院的学术主任和哈佛顾问。随后，他成为哈佛国

际发展中心成员，作为福特基金资助项目的领导人，致力于加强国家计划生育项目的管理和组织。

在20世纪70年代末，科顿离开美国，搬到南亚居住长达15年之久，他开始是福特基金项目的专家，后来被聘为美国国际发展代理机构的亚洲区发展管理顾问。在此期间，他致力于引领社会官僚制度向互动支持体制转变，以加强社区调控和土地、水、森林资源管理。他出色的工作让他闻名世界。

由于对美国国际发展代理机构和其他一些大的政府援助计划无能的现实的失望和对非政府福特基金的效率的看好，科顿结束在政府援助系统工作的日子，在亚洲往后的5年里，他和亚洲非政府组织的领导人共同努力，研究地区发展落后的根源，以及建立市民社会组织力量作为在国家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变革的催化剂。

科顿认识到，在亚洲看到的贫困加深、不平等不断加剧、环境毁坏和社会分崩离析的现象，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也都在发生——包括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他进一步认定美国实际上在积极地宣扬——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加深全球危机的政策。要世界得以生存，美国必须改变。科顿在1992年回到美国，然后致力于推进这一改变。

科顿的著作在世界上成为许多学校课程要求阅读的课本。他撰写和主编了无数著作，包括有《当公司统治世界》和《后公司世界：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The Post-Corporate World: Life after Capitalism*）皆由 Kumarian 出版社和 Berretto-Koehler 出版商合作出版。《进入21世纪：自发行动和全球计划》（*Getting to the 21st Century: Voluntary Action and the Global Agenda*）由 Kumarian 出版社出版。他经常在学术期刊和杂志等出版物发表论文。他也是一位有名的国际演讲家，经常担任电台和电视的嘉宾。

前 言

丹尼·格洛弗 (Danny Glover)

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建立起一个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在经济和社会上也更公平的世界呢？所谓的可持续性，就是我们要为我们称之为家的地球——这个美丽的蓝色小星球负上责任，一切为了它的利益而行事。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的修订版中，戴维·C·科顿就现存的问题、挑战与机遇为我们进行了精彩而又富有启发性的分析。

要阐述挑战，最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过去的几年里，我担任联合国开发计划 (UNDP) 的爱心大使，因此我一直关注着艾滋病毒/艾滋病 (HIV/AIDS) 与贫穷问题，尤其是在非洲国家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在此期间，我得以有机会长期接触到与贫穷及发展相关的众多潜在问题。这也使我有机会亲身见证了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鸿沟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我所看到的这种鸿沟无所不在，它存在于家庭之间、邻里之间、国家之间。

时下主流的公众话题更多地把这些问题视为是个人事务，认为那些生活陷于困境的人们应该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自身的问题，这与为创建公平世界而进行的奋争毫无关联。这种观点使我们走向一个既可笑又绝望的死胡同。

认识戴维·科顿并拜读他的《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的第

一版，对我的思想与人生观影响很大，让我看到各地更多的人所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弄清了这些不平等的根源。只有在一种更宽泛并相互联系的环境中反观自身，我们才能完全理解这样一句话的真正内涵：个人的问题需要通过全球性的手段来应对。

此时，我们离一个很明显但又极易被忽视的真理只有一步之遥了，这个真理就是：要拯救我们自己就需要拯救我们的制度。我们必须把所有的激情与创造力都投入到制度变革的共同事业中去，从而创造出一个人能够对所有人公平的世界。

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召开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专题讨论会，同与会的许多人一样我深有感触，戴维的工作和这个场合给我们提供良机，让我们能够加深彼此的理解。在会上，我被大家所讲述的故事深深打动，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共同分享了这些有关勇气、抗争与同情的故事。

在这场日益扩大的全球性对话中，《当公司统治世界》将继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与旧版本相比，修改后的新版本在问题论述、抗争事例介绍，以及号召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这一神圣使命等方面的论述也更加强劲有力，这里所说的神圣使命就是指我们有责任通过自己的意识与共同的行动，为自己、为子女、为后代创造条件。接受这个艰巨的任务，就意味着我们——作为人类，已经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是表达和实现人类未来的有力对话。作为这一对话中的一员，我深感荣幸。

鸣 谢

从一开始，这本书就是我与众多才华横溢的同事们进行国际合作的产物，其中 Tony Quizon, Sunimal Fernando, Bishan Singh, Chandra de Fonseca, Felix Sugitharaj 和 Sixto Roxas 等人的贡献最多。1992 年 11 月，在菲律宾的巴谷 (Baguio) 地区我与他们一起呆了 10 天。本书的基本框架即源于此次共同工作所形成的集体报告。

Krishna Sondhi 与 Ian Mayo-Smith of Kumarian 出版社以前曾出版过我的很多书，这次他们同样是不停地督促我开展这项研究，并为计划的早日完成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他们委任亨利·贝瑞 (Henny Berry) 作为我的编辑与销售顾问，帮助我实现从为从事发展工作的专业读者写作，转向为更广大的从事商务工作的读者写书。他们也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合作出版体制，与 Berrett-Koehler 出版商建立了合作关系，这使本研究中又多了 Steve Piersanti, Pat Anderson 及其同事等一批富有创见的天才。

在法朗兹·科顿的帮助下，本书的核心观点得以形成。她无数次在饭桌上与我讨论问题，并以深深的爱意、奉献的精神与毫不留情的批判眼光多次审读了本书的各个章节。由 Anwar Fazal, Robert Gilman, Willis Harman, Stanley Katz 及 Donella meadows 组成的编辑顾问委员会自始至终为我提供了

大量的意见、建议和写作灵感。Michelle Beesten 与 Claudia Radel 在研究与编辑方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

此外，以下同仁提供了大量的批评反馈意见，他们分别是：Nancy Alexander, Robin Broad, John Cavanagh, Walter Coddington, Sandy Cohen, Herman Daly, Richard Douthwaite, Neva Goodwin, Jonathan Greenberg, Ross Jackson, Elizabeth Kramer, Mark Leach, Jerry Mander 以及 Marilyn Mehlmann。对本书的观点与论述有着特殊贡献的朋友与同事还有：Fatma Alloo, Gar Alperovitz, Roy Anderson, Winifred Armstrong, Patricia Bauman, Walden Bello, David Bonbright, Jeremy Brecher, Ruth Caplan, Robert Cassani, Mary Clark, Clifford Cobb, Harriet Crosby, Joëlle Danant, Joë Dominguez, Duane Elgin, Bill Ellis, Linda Elswick, Gustavo Esteva, Joyce Gillilan-Goldberg, Edward Goldsmith, Alisa Gravitz, Nathan Gray, Leanne Grossman, Richard Grossman, Ted Halstead, Wendy Harcourt, Paul Hawken, Judy Henderson, Noeleen Heyzer, Janet Hunt, Tom Keehn, Danny Kennedy, Martin Khor, Andy Kimbrell, Alicia Korten, Smitu Kothari, Sigmund Kvaloy, Kathy Lawrence, Michael Lerner, Tina Liamzon, Jerry Mander, Peter Mann, Atherton Martin, Michael McCoy, Luis Lopezllera Mendez, Victor Menotti, John Mohawk, Ward Morehouse, David Morris, Shierry Nichol森, Helena Norberg-Hodge, Michael Richards, Mark Ritchie, Neil Ritchie, James Robertson, Vicki Robin, Atila Roque, Nola Kate Seymoar, Isagani Serrano, Vandana Shiva, Michael Shuman, Greg Thompson, Sally Timpson, Edgardo Valenzuela, Steve Viederman, Paul Wachtel, Lori Wallach 和 Paul Wangoola, 新泽西音乐创作家

与合成师、环境保护运动的支持者、我的同事与朋友——杰夫·克拉克森 (Jeff Clarkson) 创作了美妙音乐, 这使我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能够保持一份轻松而又能积极思考的心情。

上述所提及的人有许多现在仍然是我的亲密同事。但 Joe Dominguez, Joyce Gillilan-Goldberg, Willis Harman, Michael McCoy, Donella Meadows 与 George Porter 已经去世。Mae-Wan Ho, Nicanor Perlas 与 Elisabet SahtourB 自从我写作《当公司统治世界》初版以来一直对我的思想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自初版以来, 对我的思考与理解有所助益的人还包括: Sherry Anderson, Mark Anielski, Rod Arakaki, Jean-Bertrand Aristide, Maude Barlow, Janine Benyus, Jeff Barber, David Balduc, Elise Boulding, Tony Clarke, John B. Cobb, Jr., Richard Conlin, Susan Davis, Kevin Danaher, Charles Derber, Ronnie Duggar, Riane Eisler, Carol Estes, Ralph Estes, Keven Fong, Barbara Gaughen, Susan George, Danny Glover, William Greider, Colin Hines, Marjorie Kelly, Satish Kumar, Sara Iarrain, Chee Yoke Ling, Joanna Macy, Rashmi Mayur, Victor Menotti, Robert Monks, Jane Anne Morris, Bill Moyer, Robert Muller, Gifford Pinchott, Libba Pinchott, Paul Ray, Anita Roddick, Gordon Roddick, Belvie Rooks, Johnathan Rowe, Klaus Schwab, John Sellers, Claude Smadja, David Solnit, Ali Starr, John Stauber, Victoria Tauli-Corpuz, Lynn twist, Jakob von Uexkull, Steve Usher, Sarah van Gelder, 以及 Verlene Wilder。

本书的两个版本均是人本发展论坛 (PCD Forum) 的一个研究计划的成果。第一版写作的经费支持由 Jenifer Altman 基金会提供给本论坛。

人本发展论坛是一个无报酬的纯自愿性组织。无论是在为

该论坛准备本书的第一版，还是这次的修订版，我都没有从论坛获取任何回报，我完全是出于对论坛的忠诚而写作本书的。若要了解有关论坛的详细情况，请登陆网站：www.pcdf.org

本书中所表达的观点仅属个人见解，并不代表论坛及其赞助者的观点。对帮助本书问世的所有人我深表谢忱。

导论：危机加剧—— 希望的事业

目前世界上对自由和民主构成最大威胁的可能就是政府与商业之间的邪恶同盟。这并不是什么新事物。过去我们将它称之为法西斯主义……民主程序的表面形式虽然被保留着，但国家权力被转向保护私人利益。

——国际金融家 乔治·索罗斯^①

过去几年里，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以及布拉格地区发生了骚乱，忽视这些骚乱将会是一个巨大错误。领导这些抗议活动的许多激进分子可能正处于政治的边缘地带。然而他们促使包括政府、主流经济学家以及公司在内的人开始反思全球化，而在此之前，人们的这种反思还大都只能在一些秘密的智囊库里进行。

——《商业周刊》，2000年11月6日^②

我之所以写作《当公司统治世界》的第一版，动力完全来自我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年轻的时候，我想投身于消除世

^① George Soros, *Open Society: Reforming Global Capitalism*, Public Affairs, 2000, xi.

^② *Global Capitalism: Special Report*, *Business Week*, November 6, 2000, 74.

界贫困现象的工作中，为此我花费了 30 年的时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做发展工作者。我看到世界正在急剧变迁——尤其是在我生活了 15 年的亚洲。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到过的许多肮脏而又偏僻的城市已经拥有了现代化的豪华机场、挤满了新式汽车的高速公路、五星级宾馆、高档生活社区，配备中央空调的超大型购物中心里陈列着技术最先进的电器和世界各地的名牌时装。

在第三个千年来临之际，这样的进步迹象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表面上看，一定会认为这种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稍加探究，我们就会发现这就像是一块华丽的电影屏幕一样，在精心构建的表面隐藏着背后的一无所有。的确，数以万计的人们生活已经很舒适，数以十万计的人现在的消费水平比以前大大提高。但在这些表面之下的现实是数以亿计的人们正在为生存而更艰难地挣扎在生死线上，他们被迫离开那些曾经让他们过着正常生活的土地，为建水库、农业庄园、林业种植园、度假胜地、高尔夫球场以及其他的大量发展计划让路。沿着资金这条线索观察，我们会发现这些开发计划的资金有许多是由世界银行（WB）和其他一些公共开发机构提供的。这些计划永远都是对富人有利而对那些穷人不利。而最常见的得益者就是跨国公司。

由于没有其他选择，一些穷人只有迁移到那些环境不稳定的偏远地带，他们竭尽所能，勉强度日——甚至是以巨大的人类与环境成本为代价。其他一些人则迁入脏乱的城市散居区域，并使城市工资水平下降，房屋租金上升。因为树木被砍伐，曾经郁郁葱葱的山坡秃露出来，曾经生机勃勃的珊瑚礁变成水底的不毛之地，天空中漂浮着浓浓的污染物。植根于强大的精神、家庭与社区价值观中的文化已经被功利主义和暴力所取代。

打破沉默，走上街头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开始敞开心扉接触这些逐渐呈现的各种人间悲剧。之前，我一直认为我所见到的那些现象仅仅是区域性的，只局限在我接触时间最长的那些亚洲国家。在认真地阅读世界其他地区的统计资料后，我惊恐地发现，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被认为是最发达的地方，都在上演着与此相似的社会与环境解体的进程。最终我领悟出一个不可不直面的真理：人类名义上是在创造新的财富，实际上正在使自身日益枯竭，将自身置于危险的境地。问题一旦清楚了，脑海中自然浮现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当公司统治世界》表述了这个疑问的答案。我们通过废除各种制度和消除国家的经济边界等手段，缔造了一个比任何国家政府都要强大的全球经济体——而它正如无人驾驶的飞机直直地向山峰撞去。1992年我离开菲律宾的马尼拉，去纽约市开始写作《当公司统治世界》时，许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美国积极关注公司全球化的人们可能还是在一个小会议里聚首。逐渐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们的过高年薪，利润创历史新高的公司随意解雇成千上万的员工，从前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整体转移到工资低廉的国家，再加上公司投机者们掀起的并购浪潮等等，这一切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在快速获利这一目标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人的生活受到影响甚至是破坏。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在1995年10月出版，这个时间是值得人们关注的。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会发现，很明显当时人

们的精神压力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关头。土著的齐亚帕斯人 (Chiapas) 已经通过 1994 年元旦发动的一个武装起义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而这天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正式生效的日子。然而, 在其他地方许多人所承受的这种压力还是隐形的, 不为人所知的, 因为还没有让它有发泄、表达的渠道。政治家们依然迷恋于公司的业绩, 公司控制着的大众传媒依然只是对自由贸易、对美国公司通过合并、裁员、把工作岗位迁至国外等增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的行为大加赞扬。每个人都不得不勉强表示自己对这类事情的关心, 以免自己被抛弃而看作为鼠目寸光的不满者。

在 1995 年 11 月的全球化国际研讨会 (IFG) 上, 一个由积极行动者新成立的全球联盟开始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关贸总协定 (GATT) 以及其他一些自由贸易协定。这个联盟在纽约市召开了首次关于公司全球化的专题讨论会。这个讨论会的特色是汇聚了该运动绝大部分消息灵通和雄辩的演讲家, 这其中包括 Vandana Shiva, Martin Khor, Sara Larrain, Maude Barlow, Helena Norberg-hodge, Jerry Mander, Lori Wallach, Jeremy Rifkin 以及其他一些人。原本估计大约有 400 人与会, 但实际上这一事件的影响之大远远地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后来不得不将讨论地点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礼堂转移到更大的河滨教堂 (Riverside Church)。在教堂中坐满了 1500 人, 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各地、加拿大及其他一些国家, 此外还有数百人被挡在了门外。我一直都是这一专题讨论会的发起成员之一, 因此有幸在这一新的历史性时刻发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中的许多人才开始意识到原来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心程度是如此之深。

随后, 全球各地的市民社会组织召开了数不清的专题讨论会、会议和学术讲座, 来讨论全球化问题。许多畅销书、文

章、新闻报道和电子邮件都在讨论着公司控制的传媒与政治党团所不愿触及或故意忽视的问题。

1999年11月30日，也即首次全球化国际研讨会召开的4年之后，大约5万名工会会员、宗教人士、环保主义者、年轻人、土著人、人权与和平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小农场主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走上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街头，来表达他们反对世界贸易组织以及它在用跨国公司统治取代民主制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二，数以千计的抗议者宣布实行非暴力抵抗，面对防暴警察的橡皮子弹、催泪瓦斯、胡椒喷射器，他们勇敢地坚持己见。他们的行动最终迫使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中断。大约有6000人至7000人参加了这一周的专题讨论会、游行示威、辩论会和学术讲座。^①

由于当天所发生的一切是以西雅图市为中心的，因此有人将之称为“西雅图之战”或“世纪大抗议”，也有人简单地称之为“’99西雅图运动”（Seattle’99），然而在西雅图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巨大冰山的一角。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走上了街头进行着同类抗议。在“’99西雅图运动”前后，印度、法国、泰国、英国、波利维亚、瑞士、巴西和其他许多国家的数百万人举行了类似的抗议。

事件的界定

辩论、对话和街头抗议的焦点在于两种完全对立的世界观之间更深层的斗争。斗争的一方是由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与最强大的政府联合推动的公司全球化的势力。这个联盟后面有巨大

^① 详见：Paul Hawken, *N30: WTO Showdown,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spring 2000, 45-53. 全文见：Janet Thomas, *The Battle in Seattle: The Story Behind and Beyond the WTO Demonstrations*, Fulcrum Publishing, 2000.

的财富在支撑着，它们有明确的计划，力图把世界各国的经济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无国界的全球经济，使世界上的巨头公司能够在没有政府干涉的情况下让货物与资金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从中获利。这一联盟以提高效率为名，力图将公共服务设施和财产私有化，希望加强对投资者与私人财产的保护。在他们的支持者看来，公司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抗逆的历史潮流，它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技术革新与经济增长机制，从而使人们的自由程度得以扩大，民主得以扩散，并创造出消除贫困与保护环境所需要的财富。

无名运动 (The Movement with No Name)

这一运动曾被用来代指不同的运动，包括公平贸易运动、反全球化运动、支持民主化运动与生活民主运动。鉴于该运动最明显的蕴含主题是生活与民主，因此我在本书用来指“争取生活民主的全球运动”或“生活民主运动”，这也是数百万印度人的生活民主运动所使用的名称。这些全球化的运动名称仍有待其发展才真正定义，因此，我不愿将这一般的名称作为统称这类全球化运动的正式用语。

斗争的另一方是由市民社会组织形成的全球性运动势力，它是由全球市民联盟新近发起的。这一联盟正将目前最重要的各种社会运动联合起来，致力于一个共同的事业。它是自发的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愿性的社会力量。它的推动力来自于人们对民主、社区、平等和全球生活网络的深沉的责任感。它是一个有着数百万领导者的运动，每个人都贡献出自己的思想与创新精神，从而形成一个整体。在其成员看来，公司

全球化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利。相反，它是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本组织、靠公司资助为生的政治家，以及全球性大企业共同策划和推动的产物。他们相信，公司的全球化将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来使少数人获利，使公司与金融寡头统治取代民主制度，通过破坏地球与社会的真正财富来使现有的财富增值，腐蚀人际间的信任与相互关爱，而这些却都是文明社会存在的重要基础。

不论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不信任，传媒公司新闻报道的权威们将西雅图示威者描述为自私自利的、信息闭塞的、不修边幅的不满现状者，认为这些人在意图关闭边境，停止贸易，使贫困者永远陷于悲惨之境。换句话说，这些权威们完全无视事实的真相，他们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美国的传媒公司生存状态是多么的可悲。

西雅图示威活动宣布了一个国际性运动的诞生——这一运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运动，它有着极为先进的分析，对经济公平有着最深沉的责任感，拥有信息最为灵通和最雄辩的组织成员，他们之所以关心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关心人类与地球上的生命。他们追求民主理想，因为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对那些影响自身生活的决定表达自己的观点。

标榜全球化的势力公开支持媒体将反全球化抗争诬为“流氓”行为，但私下里他们也对抗议者能够迟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公司的计划表示惊讶。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通过警察镇压、邀请与多方有利益关系的人（multistakeholder）进行对话以及建立合作关系等手段来镇压、遏制或推举持异议者。公众观点似乎是越来越趋向于与反对者联合起来，就连一些组织的意见也是趋向于要求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商业周刊》在其 2000 年 9 月 11 日作为封面新闻专题

“公司权力太大?”中,公布了其民意调查的结果,这一结果显示,72%的美国人认为公司的权力太大了,对美国人生活的干涉面太广。73%的人认为公司的高层领导者获得的收入过多。仅有4%的人相信,如果公司仅有为股东追求最大利益这一个目标,美国就会被治理得很好。95%的人认为,公司应该为了其员工及社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一部分利润。被调查者认为应该清楚地区分大公司与小企业。74%的人认为大公司对政府政策与政客们的影响力过大,同时有82%的人认为小企业的影响力太小了。

《商业周刊》评论道,尽管大公司带来了大量的物质服务与利润,但绝大多数人依然认为,他们应该为人类生活提供更多的东西,而公司本身似乎既不能也不愿意提供这些东西。该周刊进一步指出,公司努力培养的温和与慈爱的形象与公众实际感受到的公司形象相比,存在一种巨大的反差。在公司侵犯他们的隐私时,在公司提供的服务质量低劣时,在工作使他们精疲力竭而无力爱他人、在公司提供的工资几乎无法维生时,在公司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与人身安全漠然视之时,当公司通过选举献金的方式腐化民主制度时,公众的这种巨大的反差感觉更加深切。一个相关的评论向《商业周刊》的公司读者提出了几乎是直接抄袭抗议者口号的四个建议,“首先,退出政治领域……然后,对海外的工厂负起责任”、分散财富并关心社会问题。^①

问题并没有随着警察的镇压、刻意创造的谣言或空洞的承诺而消失。这些问题都是结构性、持续性的,只有通过彻底的变革才能加以解决。这种反抗促使人类意识到将人生目标肤浅

^① Aaron Bernstein, “Too Much Corporate Power?”,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12000, 145-158 以及相关的 *New Economy, New Social Contract*,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12000, 182.

地定为追求无意义的物质消费是人性的毁灭，意识到创建一个不仅是为了金钱而且有价值的人生是有可能的。这种觉醒的意识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继续个人之旅

尽管公司控制的传媒完全不理睬《当公司统治世界》这本书，独立的传媒和其他千万个热心的读者却坚定地接受了它。我一开始就被读者群的庞大所震惊，读者们反馈说尽管这本书的预言很糟糕，但它仍然使他们信心备至，力量陡增。一个又一个的读者告诉我，这本书让他们相信他们的所想所感的在现实社会中有着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他们说一旦理解了问题的本质，就会明白公司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人类决定的结果，而这决定是可以改变的。这让他们觉得希望大增。

《当公司统治世界》初版自发行以来，5年之内被译成了13国文字，售出了9万多册，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了经典之作。仅本书的这个标题就被数百万人视为本时代一个明确的问题，一些人甚至将这本书视为当前生活民主运动的圣经。

自1995年以来，在这一运动中有一个事实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反抗运动对于延缓破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单纯的对抗策略正日益丧失人心。公司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日益失效的断言：“没有什么选择可以替代（公司全球化）。”^①为了赢得这一运动的胜利，我们必须采取主动，清楚地描述出一个高

^① 公司自由主义是一种宣扬公司完全从规则和国界限制中解放出来、追逐利润的思想。这将在第5章详细论述。

效运作而又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因此，我的注意力日益转向更深入的探索，以寻找公司全球化的替代品。

朝向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始于1996年，当时我与沙拉·冯·格尔德（Sarah van Gelder），在华盛顿的班布里奇岛（Bainbridge）共同创办了“积极未来网络”，出版《YES！积极未来杂志》（*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此后我一直主持着版面，《YES！积极未来杂志》关注的焦点与《当公司统治世界》中的阐述很相似。它关注的是给予人们更大的透明性和带来积极的创新，从而为彻底的变革奠定基础。在网站 www.yesmagazine.org 上或打电话：1-800-937-4451 找到《YES！积极未来杂志》。

1998年，我妻子法朗兹·科顿受邀成为积极未来网络公司的执行董事。我们从纽约市——这个公司巨兽的腹地——迁往班布里奇岛这个位于西北太平洋西雅图郊区的生态园区，仅仅一年半之后，那个震惊世界的示威活动就发生了。

在班布里奇岛上，我完成了《当公司统治世界》结局《后公司世界——资本主义之后的生活》的写作。在书中我运用健康生活体系研究中得出的原则探讨了替代全球性公司经济的其他可能选择。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所提出的改革建议是限制公司权力。“后公司世界”一文谈及公开交易的、有限责任的公司是一种病态的组织形式，它必然和君主政体一样成为一种日趋消亡的制度。“后公司世界”进一步区分了资本主义与真正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及其实际内涵。

尽管《当公司统治世界》是一部有关资本主义结构与运行机制的作品，但我在该书的初版中却极少使用这个词。我们离那种由社会主义者来议论资本主义的时代太近了，而我不是社会主义者。我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拥有良性调节的市场

是分配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前提就是让所有人都直接拥有一份事关其生存的资产。这不是传统理论中的社会主义，因为这种社会主义将大量财富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集中于遥远的庞大政府官僚机构之中。它也不是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将财富的所有权与管理权集中于遥远的公司之中，这些公司形成的国际性经济规模甚至比绝大部分民族国家的经济规模都要大。极端的经济模式破坏了生活、民主与道德价值观等这些民主社会或市民社会的重要基础。

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现在正在自由地谈论着资本主义，以庆祝它在全球范围内的胜利，因此我现在也用该词来提醒大家认清资本主义的真实含义。支持者们通常把资本主义等同于财产私有，他们并没有注意到资本主义是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体系，它实际是集中化与所有权的无限制专有，而全然不管那些一无所有者的需要与权利。我们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去消除资本主义不负责任的极度集中化，同时并不排除私人财产。许多研究都在寻找替代品，来代替控制了20世纪绝大多数政治与经济话语的极端主义经济思想，上述这些主张是我的研究与其他人的区别之所在。

新版本

2000年初，Berrett-Koehler出版社的佩瑞桑提（Steve Piersanti）敦促我准备新版本的《当公司统治世界》，随后发现的状况更进一步证实了书中的基本判断：全球金融赌场中存在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公司对政治与经济控制日益加强，毁灭性的社会与环境后果越来越多。同时，日益增多的反抗运动在争取平等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为改革创新行动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佩瑞桑提出版社要求出新版本后不久，Kumarian出版

社的克里舒娜·桑迪（Krishna Sondhi）就要我为计划出版的低价版《当公司统治世界》写一个新的序。这像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如果这是一个新的版本的话，那我就要安排进行更加彻底的修订与更新，我们同时决定，新版本的出版与定价应该要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读到本书。

第二版的《当公司统治世界》即是此举的产物。除了这个序，这个版本的特色是新增加了三章，加了一个新的结语。第21篇“赚钱，更加贫困”提出了人类面临的一个更深层的经济危机，即富人的财富增加是以社会与地球的代价为基础的。第22篇“生活民主运动”列举并验证了日益增多的市民运动的本质与含义，这些本质与含义都是从本章中列举的问题中归纳出来的。第23篇“市民社会”描述了以精神与文化区分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时的关键作用。它也提出，在将来的政治与制度变化中，文化处于核心的位置。新的结语“本时代的故事”将当前民主力量与公司专制政治间的斗争放在更大的发展背景中考察，使人们对这种斗争的目的与意义有更深层的理解。

全书其他部分也做了一些修改，其中包括清除一些笨拙的措辞，厘清观点，删去不必要的技术性材料——以减轻读者的负担，亦为新的章节提供篇幅。第20章“变革的日程”放进了一些全球化国际论坛和其他一些公民社会组织为重建全球经济统治而提出的新建议。此外，除非书中特别提及的地方，第20章导言的时间顺序仍与本书初版完成时的1994—1995年保持一致。

目 录

- 前言 丹尼·格洛弗 / 1
- 鸣谢 / 1
- 导论：危机加剧——希望的事业 / 1
- 序：个人之旅 / 1
- 第一部分 宇宙飞船中的牛仔 / 18
- 一、从希望到危机 / 18
 - 二、边疆开放的终结 / 26
 - 三、增长的幻觉 / 40
- 第二部分 主权之争 / 60
- 四、公司力量在美国的上升 / 60
 - 五、公司自由主义者的进攻 / 83
 - 六、民主多元主义力量的下降 / 108
 - 七、云端守卫者的幻觉 / 126
- 第三部分 公司殖民主义 / 146
- 八、全球帝国之梦 / 146

- 九、精英达成共识 / 163
- 十、收购民主制度 / 174
- 十一、营销整个世界 / 185
- 十二、消除公共利益 / 199

第四部分 无赖的金融体制 / 218

- 十三、金钱游戏 / 218
- 十四、掠食性的金融 / 229
- 十五、公司并购 / 243
- 十六、受控制的竞争 / 254
- 十七、人类无处立足 / 275

第五部分 收回权利 / 289

- 十八、生态革命 / 289
- 十九、美好生活 / 310
- 二十、变革的日程 / 331

第六部分 公司统治到市民社会 / 356

- 二十一、挣钱，更加贫困 / 356
- 二十二、生活民主运动 / 386
- 二十三、市民社会 / 409

结 语：本时代的一个故事 / 427

译后记 / 435

序：个人之旅

我认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提出现代时代已经终结。今天，无数事实表明我们正处于一个转型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一些事物在消失，而另一些事物在痛苦中诞生。正当一些事物在消亡、衰败、耗竭的时候，另一些事物却仍旧前途不明，正从瓦砾中新生。

——捷克共和国总统 瓦茨拉夫·哈维尔^①
(Václav Havel)

过去的一些年里，我一直在菲律宾、匈牙利、新西兰、孟加拉、巴西、南非、泰国和美国等国家游历，这使我有机会与有着各种不同背景的人们接触。我发现所到之处，一般都有一种共鸣，那就是人们所依赖的制度并没有为他们服务。许多人越来越害怕会出现一种自己和子女的前途日益渺茫的未来。在美国或其他一些地方，这种恐惧正在形成一种日趋强烈的政治受挫感与疏远感，这种疏远感在当前的表现形式为投票人数的日益减少、抗税、不愿履行政治义务，等等。然而实际的问题还远不止是对大政府的反抗。

尽管政客们与传媒机构把公众的心灰意冷归咎于政府的失

^① 美国费城 1994 年 7 月 4 日引自“自由勋章”颁奖礼的讲话。

职，但实际上他们对日益严重的贫困与失业、不平等、暴力犯罪、家庭破裂和环境恶化等问题的根源几乎一无所知，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许多人认为前途很黯淡。我们的领导人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对手，并鼓吹一些毫无新意的解决方法——通过取消管制、削减税收、消除贸易堡垒、向工业提供更多的刺激与补助津贴、强迫享受福利的人去工作、雇用更多的警察、建立更多的监狱等老掉牙的口号。

一般而言，远离权力领域过着普通生活的人，反而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他们通常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他们心底的真实想法。与那些能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见解的资深人士相比，一般人内心的想法显得是非常惊世骇俗、与众不同的。人们的这些想法被迫压抑在心中，这使他们感到很孤独，也很无助。他们不断地唠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些事情真的是像我所见到的那样糟糕吗？为什么其他人不知道呢？是我太笨吗？我是被故意误导了？我能做些什么呢？别人又能做些什么呢？

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受上述这些问题的困扰。起初也有相似的孤独感，但随后我越来越意识到原来有数以百万计的人也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即使如此，每次准备向一个新的团体发表演讲时，我都很紧张，在一个充斥着经济增长、大商业和财政赤字的世界里，我害怕自己不得不说的话立即会被别人拒斥。但通常的结果是听众连绵不绝的表示赞许肯定，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想法在公开的讨论会中得到肯定时，他们感到非常高兴和安慰。把那些困难和不堪的事实拿到桌面上来讨论是采取行动的第一步。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恐慌可能会使我们止步不前，但真理却促使我们采取行动。

寻根问底

对我而言，每写出一本书都是追求新知识之旅中新的一页。也许知道我的一些相关经历可能会对阅读本书有所助益，因为正是这些经历促使我在这里以及随后的各章节中提出相关的观点。

我于1937年出生在一个保守的、中上层的白人家庭，在华盛顿州的朗维镇（Longview）长大。朗维镇是一个以木材工业为主、人口仅25000人的小镇。从前认为将来的某一天我会经管家里的音乐与电器零售生意，所以我对走出美国一点兴趣都没有。作为斯坦福大学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我关心的是怎样测试音乐才能倾向，以及如何运用心理学知识去影响顾客的购买行为。然而在1959年，即在我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当时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共和党人，所以我非常害怕共产主义的扩张，害怕它会威胁到我非常珍惜的美国生活方式。正是这种恐慌促使我选修了一门名为现代革命的课程，该课程由政治学教授罗伯特·诺斯（Robert North）讲授。在课上我认识到贫困正在诱发的大规模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推进。在那段少有的但却深刻影响了我一生的岁月里，我做了个决定。我决定献身于消除贫困这一事业，给那些还没有从中受益的人们送去现代企业管理与创业的知识。

我从斯坦福商学院获得了国际商务方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组织理论方向的博士学位。在新婚妻子法朗兹·科顿的帮助下，我们用3年时间在埃塞俄比亚建立了一个商学院，这为我提供了实习的机会。越南战争期间，我当了一名上尉在美国

空军服役，并先后在特种空战学院、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和国防部办公室做参谋。后来我应募受聘为哈佛大学商学院的教师，时间长达5年半之久。

在哈佛商学院期间，我有3年时间是在设在尼加拉瓜的中美洲管理学院（INCAE）做哈佛顾问。这个商学院是应中美洲和安第斯（Andean）地区的各国企业精英家庭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回到波士顿后，我又在商学院教了两年书，然后转到哈佛国际发展学院和公共健康学院。1978年伊始，我与妻子成为福特基金会在菲律宾的工作人员，此后的14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东南亚。期间法朗兹继续留在基金会里，而我有8年时间去了当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发展管理方面的高级顾问，该署主管美国官方的海外援助计划。

我说出这些细节是想证明一下我的保守传统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我的故事更有趣的地方是我逐渐意识到的结论：保守党人甚至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支持的传统性发展策略，对于正在加速推进的、重大的全球人类危机而言，反而是实际上的主要诱发原因，而不是它的解决方法。

我向这种觉醒迈出的第一步是选修了现代革命这门课程。此后在1961年的夏天，我身处印度尼西亚不发达的现实中，开始接触到那些在绝望和贫困中挣扎的人们，感受他们的不屈不挠、他们的精神基础以及他们的慷慨大方。这是我此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人类生活体验。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中美洲管理学院工作期间，为了教变革管理这门课，我写了许多哈佛商学院式的管理案例。这些案例以拉丁美洲的经验为基础，描述了许多政府、企业和自愿性组织为提高城乡贫民的生活水平而做出的努力。许多案例中都包含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信息：外部强加的所谓“发展”，严重地破坏了人们的人际关系与社区生活，给那些被美名曰“受惠者”的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与

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人们找到了自身发展的自由与自信时，他们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能，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我开始对那些支持各式各样自主领导的、草根式的变革式发展计划着迷。

在中美洲管理学院与哈佛工作的期间，我与妻子都参与了提高计划生育管理水平的工作。这使我们成为开创此举的带头人，其中包括那些在有限资源基础下仍力争自我生存的贫困人们。

当我们离开哈佛，成为福特基金会在马尼拉的工作人员时，法朗兹接管了菲律宾国家水利委员会（NIA）的一项拨款。这项拨款的目的是增强水利委员会援助那些农民拥有并管理小型灌溉系统。这一计划使水利委员会长期与福特基金会之间进行合作，并最终使这个水利委员会的职能发生变化：从以工程和建设为中心，直接向农民发出指令的组织，转变成为一个与农民组织建立合作关系并鼓励大规模地方性自治的组织。

我们可以发现，当发展的举措真正以人为中心时，民众及其社区的自觉能动性会产生巨大力量。但我们首先关注的却是，外国资助项目对这种能动性普遍地进行压制——即使有些资助项目是想鼓励这些能动性。我们也认识到，人们是在小心地、有策略地运用着这些资金，以减弱中央公共政府机构浓厚的官僚作风，加强本地民众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力度。美国国际开发署邀请我协助将这个案例的经验教训运用于在亚洲的项目。我关注这个问题8年，最后却得出结论，就是美国国际开发署太大了，太官僚化了，它无法成为一种帮助其他发展机构减少官僚化有效的催化剂。

这些经历使我深信，真正的发展并不能仅靠外国的资金援助。发展还是要依靠人们操控并且高效地利用他们本地的真正资源——土地、水、劳动力、技术和人们的创造力与动力——

从而满足自身的需要。然而大多数发展干预行为都把地方资源的控制权转交给更大的、更集中化的机构，而这些机构并不直接对当地人负责，对当地人需求的反应也不敏感。经这些中央机构流转的资金数额越大，人们对这些机构的依赖性就越强，对自己的生活与资源的操控能力也就越弱，控制中央权力的人与在当地社区内为自己谋求生存之道的人之间的鸿沟也就越大。

我发现，那些能够促进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的事物与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事物之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的存在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不是以经济增长与金钱为中心而是以人为中心，将人既视为目标，又视为实现目标的手段，那么发展会成为什么样子呢？1984年，我主编了一本《以人为本的发展》（*People Centered Development*）论文集，由 Kumarian 出版社出版发行。1986年我又主编了另一本由库玛里亚恩出版社出版的文集《社区管理》，这本书里强调了把资源的控制权放在人民手中的重要性。

开发机构及其项目正日益操控着原定受益者的资源，面对这些机构及其项目的全面进攻，这些原定的受益者为了自身的尊严与生活质量奋起反抗，看到这类事例越多，主流的发展思想离我就越疏远。1988年，我离开了美国国际开发署，但还留在东南亚地区。

对官方开发机构的希望破灭之后，我投身于非政府组织（NGOs）领域，很快我就发现，我的新同事们也正在对发展的本质与过程提出类似的疑问。在非政府组织领域出现的日益活跃的对话中，我成了集体观点的一个总结人和记录人，这也是我的一个紧张的个人学习时期，1990年我的一本书《走向21世纪：自愿行动与全球议程》就是我这一时期的成果。这本书强调了贫困的加深、环境的破坏、社会的解体这三个人类

危机。它把危机产生的根源追溯到那种视人类自身仅作为手段，而视增长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它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的主导性制度是在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变革的领导必须是自愿性的市民行动。

提出这一观点后，我重整了自己的信念，与许多同事一起建立了人本发展论坛。这是一个全球性的市民网络，它的工作就是明确表述并推动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未来，重新界定与这一未来相适应的发展实践。这个论坛着重考察了在剥夺人民与夺取地方社区权力的过程中，国家的与全球性的组织与制度所扮演的角色，这些组织制度使当地人民与社区无法以一种负责的、可持续性的手段来满足自身的需求。这就解释了可能会被有些人认为相互矛盾的观点：尽管我强调有必要给地方增加权能，但我的注意力却大部分集中于全球性制度的转型。我是主张通过改变全球来使地方增权的提倡者之一。

1992年11月，我去菲律宾旅游胜地——山城巴谷（Baguio）与亚洲的几位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见面。我们一起对亚洲的发展实践及其对非政府组织的意义进行了为期10天的反思。我们关心的是，亚洲的经济成功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表面现象，在充满活力的竞争经济背后的现实是日益的贫困和地区社会经济基础日益遭到破坏。我们认为需要一种理论，使之能够为我们提供指导和解释，揭示出危机更深层的原因。没有一个理论指导，我们就像飞行员没有飞行罗盘一样。一天深夜，在一家中式小旅馆里我们的讨论开始形成两个基本共识：首先，我们不需要一个替代性的发展理论作指导，相反，我们需要一种可持续社会能够同时适用于南方或北方相似的理论。其次，该理论必须超越经济学上的那种毫无意义的条框来解释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发展会越来越偏离自然发展的进程。

在随后几天的讨论里，我们的思路逐渐清晰起来。机械宇

宙论的西方科学观在哲学上或概念上与我们自身内在的精神本性日益远离。日常生活中，制度与市场金钱价值观的日益结合强化了这种远离。金钱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是占主导地位，任何意义上的精神纽带存在的空间就越小，而这种精神纽带却是人类社会及其与自然形成和谐关系的基础。对精神满足的追求日益被对金钱的追求所取代，这种对金钱的狂热是纯消耗性的、自我毁灭性的——而金钱却是一种有用的，但却是没有内在价值的人工产物。

从我们的分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为了重新与地球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性的关系，我们必须打破对金钱世界的幻想，重新恢复我们生活的精神意义，把我们的经济制度植根于地方与社区，使之与人类、与生活完美结合。因此，我们认为，从最完整意义上讲，一个社会如果是以生活为中心的，那么它的发展策略必将是以人为本为中心的。在这种社会中，经济仅仅是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而不是人类存在的目的。由于我们的领导人沉迷于他们自己操控的奖励制度与神话，所以在这个制度与价值体系重建的创造过程中，领导权必须交由市民社会来掌握。

上述观点从许多方面看都很平凡，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重新发现了古人已有的智慧。我们发现，精神本性与经济生活之中存在着深层的紧张状态，而健康的社会与经济活动的基础就是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平衡状态与发展趋势之中。我们承认一直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市民社会是很重要的，但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不过我们对那些看待祸害当代社会危机的不同观点及其之间关系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即以此为基石，它实现了我向亚洲非政府组织的同事们作出的承诺，即帮助他们向发达国家传达他们的关注点与经验教训。

回 家

1992年夏，就在巴谷地区集会之前不久，我与法朗兹离开东南亚回到美国。我们在给朋友与同事的圣诞贺信中宣布了自己的决定，并做了以下的解释：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们就来到这些遥远的地方，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认为这些地方是发展问题的病灶之所在，而研究发展问题是我们在上大学时就立志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在开始从事这一事业时，我们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分享美国成功的经验教训——以使“他们”能够更像“我们”。

30年前我们所理解的发展，就跟现在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布什政府和世界上大多数强大的经济机构积极倡导的一样，它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它们还没有在“不发达的世界”里发现穷人各种问题的根源。但这些根源却在那些确定全球标准的国度里被发现，这其中就包括奢侈的挥霍与对全球政策的控制，而这些做法正导致我们的世界走向社会与生态的自我毁灭。

现在我与法朗兹年纪又长了30岁了，应该成为不惑的智者了，我们开始认识到美国的“成功”可能是世界上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实际上，这个结论的最终证据可以从美国本身找到。

我们以有利的身份在亚洲吃惊地看到，美国一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倡导和推行美国式的政策，已经在它自己国内催生了一个第三世界：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依靠外债生存、教育系统的腐败、幼稚道德观上扬、经济依赖于出口

初级产品——其中包括最后仅剩的原始森林——不分青红皂白地倾倒入有毒废物，以及家庭与社区的解体。

当我们一直远赴国外时，国内的权力集团巩固了其对国家财富的控制地位，不愿再承担其对不幸的邻国的责任。工会正在日益衰落，因为美国的工人正在拼命工作以保持自己的职位，为此他们不惜与大公司谈判削减工资，从而与墨西哥、孟加拉国和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更加绝望的失业工人们争夺工作岗位。而这些大公司可能是徒有美国公司之名，却以不对任何国家负责任为荣。

我们认为，这些年在海外生活的主要收获是我们所受的教育。现在是我们回到国内，担负起我们的责任，从地理源头上正视这些社会问题的时候了。纽约这个经济权力的主要中心之一，正在显现一个第三世界城市的所有特质——包括无家可归的流浪者群体、富有名人们的糜烂生活、无能的政府和无缘由的暴行——这种选择似乎是很正确的。因此，我们正带着这30年来学到的对这些问题产生原因的认识，走向这个经济怪物的心脏地带。

我们曾经为别人解决在他们中间发现的问题，方法是让他们向我们看齐。美国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世界推到一个自我毁灭的进程之中，我们这次回国就是要帮助我们的同胞更好地认识这一点。只有当我们准备好担负起改变自身的责任时，其他人才能够完全回收那些本属于他们但被我们占用的社会与环境空间，才能恢复他们能力，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公正、民主与可持续发展的、合作的世界里满足自身的需要。

揭示命题

由于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与对价值观的基本考问密不可分，因而我觉得有必要去揭示用来交流的潜在的政治和精神价值

观。在政治价值观方面，我对创造一个巨大的机构并将权力无限制地集中在该机构中的做法持不信任态度，在这方面，我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保守主义者。我也仍然相信市场与私有制的重要性。然而，与目前的许多其他保守主义者不同的是，我现在对大公司和大政府都不感兴趣。我也不相信占有财富就表示在政治上就应该有特权。

与自由主义者一样，我同情仍在受压迫的人们，追求平等，关心环境，相信政府的存在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以及私有财产限制。但是，我相信，大政府就像大公司一样是不负责任的，是社会价值观的破坏者。事实上，我对任何集中了大量权力而又不受责任约束的组织机构都不太信任。我相信任何个体都对整体生活负有责任，都应该为了整个生活而考虑。总之，我与那些正寻找一条比意识形态的方法更实用的新路子的人，那些不轻易让自己受保守自由主义政治抉择范畴约束的人并肩作战。

我是在大学里第一次接触经济学的，那时我选它作为我本科专业的主修科目。很快我就发现，它很死板，很乏味，与现实脱节。因此我转而研究人类行为与组织机构。从那时开始我就认识到，经济系统是现代社会里组织化行为的主要系统，对它进行研究最好是将它视为一种行为系统。

尽管本书对公司制度及其企业运行系统抱有一种苛刻的批判态度，但我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反对企业的人。一个有效的工业与商业体制是人类福利的必备条件。当我还是一个工商管理硕士（MBA）学生的时候，我相信跨国公司可以为贫困与人类的冲突问题提供一个解决的答案。然而，后来我才清楚，那些培育了跨国公司、使之成长并占统治地位的体制性力量正是当前各种困境存在的关键。我现在相信，为了避免日积月累的悲剧发生，我们现在就必须从根本上改革企业的基本

体制，把权力重新交给小型的、地方性的企业。

在精神价值方面，我是在基督新教信仰中长大的，但我在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的教义里都发现了智慧。我认为每个人都能够达到内心的精神睿智。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同一个物种，我们的全体得救必须要远离现代科学制度、市场甚至是宗教，靠自身的智慧来实现。通过这种再发现，我们可以在市场与社区、科学与宗教、金钱与灵魂之间保持创造性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是健康的人类社会得以产生并维持下去的关键。

我希望这个序言可以帮助你理解本书，让你就像是在与一个值得珍惜的朋友进行积极对话一样。读这本书时，你实际上是在与许多朋友们进行着交流，他们对书中所表述的观点与分析的形成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果你还没有参与有关问题的对话，我希望本书能够激发你与同事、朋友进行交流的积极性。不过，我希望读者们不要直接和我联系，或者要我个别指导或和我讨论书中提到的问题，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与物力去一一回复，尽管我非常想这样做。

如果你是在大公司供职的人士之一，我想劝你在阅读本书时，要跳出你在公司里所承担的角色。你应该从一个公民、一个关心孩子未来的家长的角度来读本书，这可能有助于你更容易、更轻松地倾听和客观地评价本书的根本观点，有助于你考虑是否接受书中的邀请参与改革这一制度的运动。

请抱着积极的、批判的态度来阅读以下的内容。带着你自己的观点和洞察力去容忍、去提问、去提出挑战。思考一下你期望的生活的内涵。与你的朋友商讨，告诉他们你赞同书中的哪些地方，不赞同哪些地方，你从哪些地方得出了什么新的看法，还发现书中哪些地方不完善。把你朋友们的观点结合起来，一起来探究新的途径。把对话推进到一个新的层面，然后付诸行动。

尽管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我们前进的总方向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但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必须达到的具体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找到一条方向明确的道路，那么我们似乎是在徒劳地努力。借用记载关于梅勒斯·霍顿（Myles Horton）与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这两位当代最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之间对话的书的名称，我们把视线投向地平线以外的目的地，然后“我们摸着石头过河”（We make the road by walking.）。

论点

我们之所以无法与制度体系保持一致性，部分原因就在于：电视把政治演讲压缩到最低的程度；学术机构让知识分子埋头于狭窄的、专门的学科之中，结果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于用片断式的、零碎的方法来处理复杂的问题。然而，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几乎每个生活的方面都以某种方式与其他方面相联系。当我们局限于用片断式的方法去解决复杂的系统性问题时，我们的方法不当就是很正常的事了。如果人类想要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走出来并生存下去，就必须培养出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够开展系统全面的思考与行动。

系统性的思考方式要求我们对简单化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要有怀疑精神，愿意去寻找传统话语中忽视的问题与事件之间的联系，有勇气去钻研那些存在于直接经验与专长之外的主旨问题。本书采用了全系统式的观点，内容涉猎的领域广泛，要素众多。为了帮助大家记住这一点，这里总结了一个整体的观点。我不是要求你们在表面层次上接受这些观点，而是希望你们能持一个开放的态度，找机会去检验每个观点下暗含的推理及证据。我相信大家将会借此锻炼自己具批判性的独立判断能力。最后建立起大家自己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可能与我的体

系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但请牢记，我们都是一个创造性行动的参与者，理解这些复杂问题时，无论在个人性或集体性的研究过程中，没有人能够宣称他可以垄断真理。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境况：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正经历着日益加速的社会与环境解体——这种解体以贫困、失业、不平等、暴力犯罪、家庭破裂与环境的恶化等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问题部分原因应归之于1950年以来经济产量增长五倍这一事实。因为这种经济增长使人类对生态系统的索求超过了地球的承受极限。人们把无休止的追求经济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组织原则，这样就使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以及维系人类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加速崩溃；同时，富人与穷人之间对资源的竞争正在日益加剧——这种竞争总是以穷人的失败而告终。

政府似乎完全无力应对这种局面，公众的受挫感正在转变成愤怒。然而，出现这种形势并不仅仅是由于政府官僚政治的失败。它是一个统治危机，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背后的意识形态、政治和技术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受追求短期经济收益这一迫切需要的驱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在将权力从负责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手中转移到少数公司与金融机构手中。这使大量的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极少数的精英人物手中，在日益减少的自然财富储备中，这些人所占的绝对份额仍在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地增长——这样就使他们确信这一体制运行得非常良好。

承担了系统功能失调成本的那些人是被剥夺了决策权，而对造成自己不幸的原因仍然糊涂的人，因为公司控制的大众传媒一直站在掌权者的角度不断向受众宣扬解释引起危机的所谓原因。世界上最大的公司所控制的活跃的宣传机器不断地让我们确信，消费主义是通向幸福的大道，政府对市场的控制是我

们不幸的缘由，公司的全球化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也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恩赐。实际上，所有这些神话都是在做宣传，在为放荡的贪婪与虚伪辩护。我们认为，人类制度的全球性变革是由一部分精英人物控制的，它是一个复杂的、动力充足的、有意识地进行选择的结果。这些精英人物所拥有的金钱足以使他们可以生活在一个远离他人的梦幻世界里。

这些力量把曾一度为我们服务的公司与金融机构转变成一个市场专制统治的工具，这种市场专制像癌症一样肆虐全球，控制了这颗地球上越来越多的生存空间，摧毁人们的生计来源，取代了人类本身，使民主制度无法实行，并以无休止地贪婪攫取金钱为生。当我们的经济制度与地方相脱离，并对我们的民主制度产生更大的控制力的时候，即使是全球最强大的公司也会成为全球金融体系的俘虏。这种金融体系使货币与真正的财富脱离，使生产投资和回报完全分离开来。最大的赢家是公司侵入者，他们夺取了经营良好的公司的短期投资资产。还有一个就是投机商，他们利用市场的波动，从那些从事生产劳动与投资的人那里抽取隐蔽的税款。

由于有创造更多的短期回报的压力，世界上最大的那些公司都在压缩公司规模，裁减员工和减少公司职能，但是他们的权力却并没有缩小。通过合并、收购以及策略性的联合等手段，他们加强了对市场和技术的控制，他们正在强迫分包商和地方社区为了获得跨国公司控制的工作职位而竞争，这使得后者降低要求的标准与条件。由于相关的市场力量的作用，我们对那些破坏环境与社会的技术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这些技术让我们牺牲自己的身体、社会、环境和心理上的健康，为跨国公司谋利。

问题并不在于企业或各个地区的市场，而在于存在着一个完全腐化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一体系正如旋涡一样不受我们的

控制。这一体系的动力非常强劲而桀骜不驯，不管公司管理者的道德价值观与信念多么坚定，他们都越来越难以控制这一体系，让它为公共利益服务。

由于迫切需要增加财富，这一体系把人员视为低效率的源头，并正在把他们从系统中的各个层面排挤出去。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减少了对人的体力的依赖一样，信息革命减少了对我们的视力、听力及脑力的依赖。第一次工业革命应对随之而来的失业人口的对策是对更弱小的民族进行殖民统治，把本国多余的人口作为移民迁到人口相对稀少的土地上去。在殖民地国家里生活着的人民倒退到依靠传统的社会结构来维持生活。随着世界上绝大部分地理疆域都被瓜分完毕，社会性经济（social economies）由于赤裸裸的入侵而大为衰退，因此现在已经几乎没有所谓的安全阀门了。现在剩余人口的结局就是成为饥饿和暴力的受害者，成为无家可归的乞丐和福利机构的收容者，或者成为难民营的成员。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目前的进程向前走，那么我们将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与环境的加速解体。

我们的应对方法之一就是收回我们此前交给财富制度的权力，重建能培育文化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从而为社会、智力与精神上的巨大的进步提供大量的新机遇。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已经行动起来，要求收回这一权力并重建他们的社区，治愈这个星球。这些创新举措被融进了一个全球性的联盟之中，这一联盟是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的基础，而这种政治潮流就是人们对生命和谐的觉醒。

《当公司统治世界》勾勒了一个推进上述努力的市民的议程，这个议程包括将公司赶出政治领域，形成一个地方化的经济，以增加社区在跨国公司体系中的权力。哥白尼革命（Copernican Revolution）宣布科学与工业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崇

尚物质主义的时代走到自身极限的时候，我们已经处在一个生态时代的入口，这个时代是由生态革命引领而来的，而这个生态革命的基础是更全面地看待自然界的物质与精神。这一革命号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收回自己的政治权力，重新发掘我们创造社会制度的精神力量，使我们有能力和希望去享受最完整意义上的快乐生活。

第一部分 宇宙飞船中的牛仔

一、从希望到危机

那些赞美技术的人会说技术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在日益提高，这意味着会有更快的速度、更多的选择、更多的闲暇，以及更多的奢侈品。但在这些好处中，没有一样是与人类的快乐、幸福、安全，或者地球上生命的持续有关。

——杰瑞·蒙德^①

20 世纪的后半叶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值得关注的时期。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解开了无数的物质、太空和生物的秘密。我们利用数字、技术和复杂的组织几乎完全地操控了这个星球，并已经走出地球迈上月球，奔向宇宙太空。单是在 50 年前，在我这一代人的生活中，许多今天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必备物，在当时看来都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甚至是无法想象的。这些东西包括喷气式飞机、全球的空中商务旅行、计算机、微波炉、打印机、复印机、传真机、电视、电熨斗、空

^① Jerry Mander, *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 Sierra Club Books, 1991, 26.

调、高速公路、购物中心、城郊社区、避孕药、人造器官和化学杀虫剂——这里只是列举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还产生了首批有重要影响的全球管治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西欧从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大陆变成了一个和平与繁荣的政治与经济联合体。东西方超级大国之间的抗衡、核军备竞争的黑色恐慌都已经像一个遥远的历史回忆，被商业贸易、财政援助和科学与文化交流的急流冲得荡然无存。在此前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国家，民主政治制度得到迅速发展。我们征服了天花和小儿麻痹症等许多曾经肆虐一时的疾病，在过去的30年里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寿命提高了1/3多，使他们的婴儿与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一半多。^①

在20世纪后半叶，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要使经济增长与贸易额扩大，这两者我们都完成得非常成功。全球的经济产值从1950年的6.4万亿美元增长到1995年的35.5万亿美元（按1997年美元价），增长了5.5倍。平均下来，这就意味着，在过去的4个十年里的每个十年中，我们所增加的全球总产值超过从第一个穴居人制造出石斧到20世纪中期以来所有产值的总和。同一个时期，全球贸易出口产量从4000亿美元迅速上升至5万亿美元（按1997年美元价）——增长了11.5倍，是整个经济产量的两倍多。^② 10亿多人正过着物质丰裕的生活。

这些仅仅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真正开

^①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

^② Lester R. Brown, Michael Renner, and Brian Halwell (eds.), *Vital Signs 1999*,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65 & 69.

始有知识、有技术、有组织能力去实现大胆的目标，其中包括消除贫困、战争和疾病。新的千年将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社会不再为基本的生存和安全操心，而致力于促进社会的、智力的和精神的新进展。

三重人类危机

领导人与制度曾许诺让我们拥有一个黄金时代，但他们并没有兑现诺言。他们用一些令人称奇的小把戏来哄骗我们，这些利用新技术的小把戏中有：带个人电视的飞机座位；在海滩晒太阳时能连接上互联网的信息高速公路。但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绝大多数东西——一个稳定的谋生手段，一套还算不错的住房，能吃上卫生、没有受到污染的食物，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教育与医疗保健，一个清洁的、有生机的环境——却在过去的每一天里，正日益远离世界的绝大多数人。

相信自己会有一个稳定的经济前景的人越来越少。他们曾经拥有的家庭、社区组织和保障制度正在瓦解。满足我们物质需求的自然环境正处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对我们主要组织的信任正在日益消失，我们发现，全世界有思想的人们都有一种日益增长的深层怀疑，觉得一定是有什么事情搞错了。这种怀疑正在世界各个地区蔓延，这表明，我们这些组织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失败的。

即使是在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里，高失业率、公司裁员、实际工资的下降、没有福利保障的兼职工作与临时工作的增加、工会的衰落等，都在使人们日益形成一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并使中产阶级趋于萎缩。有工作的人们发现他们工作时间在延长，要做好几份兼职工作，实际收入却在减少。许多年轻人——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的年轻人——几乎没有什么希望找到一份工作，哪怕是只能够满足他们基本需求的工作都找不

到，更不用说经济上的安全感了。许多高学历的、有技术的人发现适合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在减少，他们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正在急剧下降。这些现象的出现正好挫败了那种认为简单地提高教育与工作培训就能消灭失业的可笑想法。

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对土地与自然资源的争夺日益激烈，那些以小规模的耕作、捕鱼和其他以资源为生计的人们会发现他们的资源正被征用去为少数人谋利，而他们却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为生存而挣扎。经济上的弱势群体会发现他们生活的社区正成为废物倾倒地或者是成为污染的大烟囱。

小生产者——农场主与手工生产者——曾经是贫穷却稳定的社会的支柱，现在他们正在逐渐消失，成为分散化家庭及离乡别井的没有地产的流动工人。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大街小巷里，数以十万计的小孩子以乞讨、偷窃、吃丢弃的腐烂食物、卖淫和做临时工等方式维生，他们其中有许多人是无家可归的。据估计，仅在泰国、斯里兰卡和菲律宾就有 50 万名童妓。^① 数百万人从国内和家乡迁移出来寻找机遇与谋生手段。除了大约 2500 万至 3000 万人作为合法工人在国外工作外，估计另有 2000 万至 4000 万的人是没有合法权利、几乎不享受基本保障的非法流动工人和经济难民。有些人，尤其是妇女的人身受到限制，在性、身体和心理方面受到残暴的虐待。^②

世界正日益把人分化成两类：其中一类人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另一类人却生活在毫无人道的贫困、受奴役和经济没保障的状态之中。高层的公司管理人员、投资银行家，金融投机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31.

②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The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Penguin Books, 1993.

商、运动员和名人们的年收入数以百万美元计，而同时全世界大约有 12 亿人正绝望地生活在每天收入低于 1 美元的境况之中。我们不用亲自到非洲的某个遥远的角落去感受这种不平等的存在。我的房子处于纽约市中心的一个街区，在这里我每天都能看到这种不平等的存在。铮亮的加长式豪华轿车里有吧台和电视，留着雅致发型的主人坐着这种车光顾时髦且昂贵的大酒店，而无家可归的乞丐却蜷缩在人行道上裹着薄薄的毯子来御寒。

我们随处可见到这些社会压力的证据：犯罪率、滥用药物、离婚、青少年自杀和家庭暴力数量在上升；政治、经济和环境难民在增加；甚至有组织武装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全世界的暴力犯罪率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着。^①

对于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梦想——尤其是对有色人种而言——仅仅是拥有一个家庭和长大成人，看来这也遥遥无期。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孩子在单亲家庭中长大，平均每天有 10 万个孩子带着枪去上学，每天有 40 个学生受伤或被杀害。在城市里，甚至是小镇上都很少有人真正感到他们的人身和财产是安全的。私人保镖及安全系统已经成为全世界一个主要的工业增长点。

在发展中国家，据估计约有 1/3 的妻子被丈夫打过。世界上每 2000 个妇女中就有一个是已知的强奸案的受害者。在印度每年就有多达 9000 名妇女因为嫁妆问题而死亡。^②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从那时开始的“和平时代”至今，已经有 2000 多万人死于军事冲突。1989 年至 1992 年间发生的 82 次军事冲突中仅有 3 个是发生在国家之间的。其

^① Gene Stephens, *The Global Crime Wave*, *The Futurist*, July-August 1994, 22-28.

^②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31.

他的战争都是士兵们在残杀自己的同胞。20 世纪初叶，90% 的伤亡人员是军事人员，而在 20 世纪结束之际，90% 的伤亡是平民。^①

国际战争数量的增加是世界上难民数量增长速度惊人的一个主要原因。1960 年联合国列出的国际难民数是 140 万，到 1992 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 1820 万。据预测大约另有 2400 万人被迫在自己的国家内部流迁。^②

从环境上看，尽管我们在部分地区减少环境污染与净化河流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更深层的现实却是生态危机在日益增大。人们不再对一度存在的核屠杀感到恐慌，而对由于臭氧层变薄而暴露在可能致命的紫外线照射下感到惊恐。年轻的一代人关心的是，由于气候改变而带来的极地冰川冰雪融化，会淹没大量的沿海地区，会把肥沃的农耕地区变成沙漠，这样他们会不会成为环境难民。即使在目前的人口规模上，每晚都还是有近 10 亿人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为我们提供食物的耕地正在以高于自然再生能力的速度被侵占。世界上的高产渔场因为过度开发正在一个接着一个地衰败。水资源的短缺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不仅表现为暂时性的干旱，而且表现为水资源的消耗和河流的负担超过了再生能力。我们曾听说过有些社区由于森林与渔业资源已被耗尽而遭到抛弃，也听说过与我们很相像的那些人也发觉，他们和孩子们所吃的食物、所喝的水，以及他们生活与玩耍的土地含有化学和放射性污染物。

在我们等待技术上的奇迹来应对这些明显限制了经济持续发展的各种因素的同时，自 1999 年始，每年全球要增加约 7700 万人口，人类大家庭中的每个新成员都渴望能够安心地、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47.

②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State of the World's Refugees*.

顺利地分享这个星球上正日益减少的恩赐物。1950年我进入中学，这一年世界上的人口是25亿。到1999年10月12日，官方统计世界人口是60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近90亿。但要记住的是，人口学家仅仅是在现行生育率的假设基础上使用数学模型来制定他们的预测方案的。而这一方案并没有考虑地球的承受力问题。考虑到目前的人口规模对环境与社会所产生的压力，如果我们不主动限制我们的人口数量，那么饥荒、疾病与社会崩溃将会代替我们来限制。

总而言之，这些制度体系失败的表现构成了一个包括贫困程度的加深、社会解体和环境破坏在内的三重全球危机。大多数的危机有着一种共同的重要特征：要解决它们就必须采取地方性行动——一户一户的，一个社区一个社区的。只有当地方性资源控制在地方手中的时候，这种行动才能实施。世界上大多数人的迫切需要尚未得到满足，其中包括对食物安全的要求，缺乏足够的住房、衣服、医疗卫生服务和教育——这是真正的剥削。几乎毫无例外的是，每个国家都具备满足上述所需的各种基本资源与能力。本地人通常倾向于优先考虑上述需求。然而，如果控制权旁落，那么被优先考虑的要求就会各种各样了。

不幸的是，在我们现代社会中，控制权很少会留在本地人手中。通常的情况是，它或者被中央政府机构掌握，或者是控制在那些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应对当地需求的遥远的公司手中。其结果就是人们对主要组织产生了一种信任危机。

机构合法性的丧失

公众意见方面的民意测验显示，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着一一种日益增强的人身不安全感，存在着对主要组织的信任丧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的公众态度，因为世界上许多人有关成

功、民主和高技术消费主义的观念都是从这个国家得到的。民意测验显示，大部分美国人的真正梦想并不是像公共传媒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要跑车、精美时装、鱼子酱、大屏幕电视、乡郊房产。更确切地说，他们所要的是一个像样的和安全的生活——这是美国的制度所无力提供的。1994年，美国人最大的一个担心就是失业。^① 只有51%的非管理阶层的雇员认为他们的工作是无忧的——与10年前的75%相比这一比率下降了。在管理阶层中也存在着相似的工作安全感比率的下降。^② 55%的美国成年人不再相信一个人可以通过努力工作、遵纪守法就能够使自己及其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③ 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长期的发展趋势却是不稳定性与不安全性的与日俱增。

路易斯·哈里斯（Louis Harris）民意测验公司每年测量美国20个主要机构的信任指数，这一指数已经从1966年的100下降到1994年的39。在名单中回答表示较大信任的排在最后的分别是美国国会（8%）、政府的执行机构（12%）、新闻媒体（13%）、大公司（19%）。同时，路易斯·哈里斯“疏远指数”（Alienation Index）从1969年较低的29上升到1993年的65，这一指数反映了人们对经济不平等和无权的感受，和对有权者的鄙视程度。凯特林基金会（The Kettering Foundation）的一份报告揭示了选民们的心情：“美国人……认为目前的政治体制是不向公众开放的，是由一个专业的政治阶层

① *Harris Poll*, January 3, 1994.

② “The New Deal: What Companies and Employees Owe One Another,” *Fortune*, June 13, 1994, 44-52.

③ 统计为美国劳动部秘书 Robert Reich 在民主党领导委员会 1994 年 11 月 22 日在首都华盛顿的一次发言中引述的。其中没有大学学历的比例是 68%。

运作、由金钱而不是选票掌控的体制。”^① 国际性的民意测验也显示，其他发达国家也正面临着类似的局面。^②

民众对主要组织及其领导者的信任已经下降到很低的程度，这使他们的合法性产生危机——这也有很好的理由。在“黄金时代”伊始，这些组织只为一小部分的幸运者服务。对许多人而言，在实现曾经似乎能够实现希望方面，是一种灾难性的破灭。

二、边疆开放的终结

如果目前的人口增长预测是准确的，而地球上人类的活动模式仍保持不变，那么科学和技术既无法阻止无可避免的环境退化，也无法阻止世界上许多地方持续的贫困化。

——伦敦皇家协会和美国国家科学协会^③

全球性经济不能靠其本身发展摆脱贫困与环境退化

① 见 Kettering Foundation, *Citizens and Politics: A View from Main Street America* (Dayton, Ohio: Kettering Foundation, 1991), iii-iv, 引用的 Stephen Craig, *The Malevolent Leaders: Popular Discontent in America*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3), 83.

② Seymour Lipset and William Schneider, *The Confidence Gap: Business, Labor and Government in the Public Mi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410 Elizabeth Hann Hastings and Philip K. Hastings (eds.), *Index to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1992—1993*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94).

③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nd the U. 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opulation Growth, Resource Consumption, and a Sustainable World, Authors, 1992* 中的 Lester R. Brown, “A New Era Unfolds” *State of the World 1993*, W. W. Norton, 1993, 3.

……随着经济亚系统的生长，它把更大规模的生态系统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它会把生态系统100%地纳入其系统。

——哈尔曼·戴利^①

究竟是怎么了？为什么本应该在我们掌控之中的梦想会变成一场噩梦呢？1986年肯尼斯·保丁（Kenneth Boulding）在其著名的评论“即将来临的太空船地球的经济”（Economics of The Coming Spaceship Earth）中戏剧性地将问题最根本的性质清楚地描述出来。保丁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事实上，我们是居住在一个有着精确平衡的生活供养系统的太空船之中，而我们的行动却像是生活在辽阔的边疆地区的牛仔一样没有约束。

牛仔与宇航员

牛仔与宇航员的生活差异巨大。早期的边疆地区例如美国西部的牛仔，生活在人烟稀少的辽阔地带，有着似乎取之不尽的物质资源。除了那些土著人认为自己在这片千百年来祖先们一直生活着的土地拥有权力之外，任何东西都可以随便拿，随便用，随意抛弃，让大地去吸收，让大风去吹散。似乎没有什么东西限制愿望的实现。如果当中有人推断说，一个人的所得必将导致另一个人的失去，那么他的观点无人会问津，甚至会被别人嘲笑为目光短浅。在个人收益最终也将会成为社区收益这样的前提下，社会希望每个人都争着去寻找财富。

宇航员的生活场所是在太空中翱翔的宇宙飞船，飞船中有

^① Herman E. Daly, "Sustainable Growth: An Impossibility Theorem", *Development*, No. 3/4 (1990), 45.

船员和一套宝贵的、有限的资源提供系统。任何东西都必须保持平衡，能够回收再利用。什么东西都不能浪费。衡量福利的方法不是船员们消耗有限的飞船储备的速度有多快，而是船员们保持他们的身体与精神健康的效率有多高，使用共用的资源储备与生活供养系统的效率有多高。扔掉的东西就永远不会再得到了。没有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堆积起来会污染生活舱。为了整体的利益，成员组成一个团队，每个人都发挥自己的作用。除非所有人的基本需求都已经得到了满足而且已经为未来进行了充足的储备，否则没人会想着不必要的消费。

保丁的分析说明了一个基本的真理。现代社会正是在一个宇宙飞船式的（有限资源的）世界里运行着牛仔式的（不受限制的）经济。我们仍然把自然的恩赐物和废物处理服务看作是可以免费取用的；我们将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作为经济强劲和平衡发展的尊荣。就像我们猜测古埃及人是通过金字塔的规模来衡量自身一样，未来的文明可能会回顾我们这个时代，并推断说我们是通过垃圾场的规模大小来衡量进步的。像牛仔一样生活在一艘太空飞船中会带来以下悲惨的结局：

- 它将使生活供养系统负担过重，导致系统的崩溃和系统最终所能承受人类活动的的能力下降。

- 它使较强大的与较弱小的成员之间为了争夺日益减少的生活必需品与生活设施展开激烈竞争。一些成员能够挥霍消费，而另一些人被剥夺了基本的生计。社会的紧张状态将会上升，统治结构的合法性基础将会被侵蚀——这就为社会崩溃和暴力创造了重要的潜在条件。

为了讨论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认同一个基本的现实：我们已经从一个边疆开放式的世界走向宇宙飞船式的世界。我们的

生活依赖于自然世界的维生系统，世界现在已经饱和了。我们必须进行自我调节，从而适应以生活为中心的宇宙飞船式的经济原则。就我们目前的进程而言，我们在掠夺地球的同时，也在撕裂作为人类文明基础的非市场关系的结构。这是我们误解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关系的一个直接后果。

从边疆开放到全球饱和

与自然系统的巨大再生能力相比，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期里，人类经济活动的所有需求都显得无足轻重。我们根本不用重视资源有限的问题。当工业化使各国的需求超出其国内的自然资源极限时，它们就简单地在国外弄到自己所需的资源，方法通常是将非工业化国家开拓为殖民地，从这些国家掠夺资源。尽管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对殖民地人民来说有时是灾难性的，但殖民者却很少注意到这种做法给地球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副作用。

因此，欧洲的工业化是在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殖民地的支持下进行的。对美国而言，相同的需求是通过开拓西部边疆、牺牲居住于当地的土著印第安人的利益来满足的，是通过扩张它的经济疆域，把拉丁美洲、菲律宾囊括在内来实现的。较晚期的殖民者日本则以援助、外资投资和贸易等多种方式的结合来获取其东南亚邻国的资源。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韩国和台湾地区，同泰国和马来西亚一样，也是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向外索求的。

由于世界上只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实现了工业化，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建定居点、贸易和传统的殖民化等方式来利用环境边疆（environment frontier）。同样地，边疆的领土可以作为社会安全阀把剩余人口从工业化社会中吸纳过来。在1850年至1914年期间，英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不佳（平均人口为3200

万),就促使900多万人迁往国外,主要是去了美国。^①

对开放边疆进行殖民的时代现在已处于最后阶段。绝大多数容易开发利用的边疆地区都已经被利用了,对那些剩下的遥远地区如伊朗杰阿(Iran Jaya)、印度支那(Indochina)、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西伯利亚(Siberia)和巴西亚玛逊河(Amazon)地区,人们正在进行激烈的争夺。

与我们当前的置疑有关的是,应该注意到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期英国的人口外迁暗含着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对于正在对外殖民的国家而言,殖民主义有利于国内的人民——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现在这种局面变得更加模糊,殖民主义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公司殖民主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它的好处由有钱阶层而不是一般的平民获得。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最近进行了一项关于英国殖民的研究,研究表明,尽管富有的投资者从对殖民地的投资中获利了,但中产阶级所得到的却是纳税单,维持帝国运转所需的庞大军事机构需要这些税收来支撑。该研究认为,“我们最好是把帝国主义视为一种转移机制,它将中产阶级的收入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②经济全球化是同一个帝国主义的现代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一样的。

由于人口增长以及自1950年以来经济规模增长了5倍多,因此经济系统对生态环境的需求已经占据了地球所有可利用的环境空间,已经到了人类生存的底线。这把我们带到人类进化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上,在仅仅一个历史的瞬间,我们就从生活

^① Lan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s cited in Richard Douthwaite, *The Growth Illusion* (Tulsa, Okla.: Council Oak Books, 1993), 46.

^② Davis and Huttenback,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as cited in Douthwaite, 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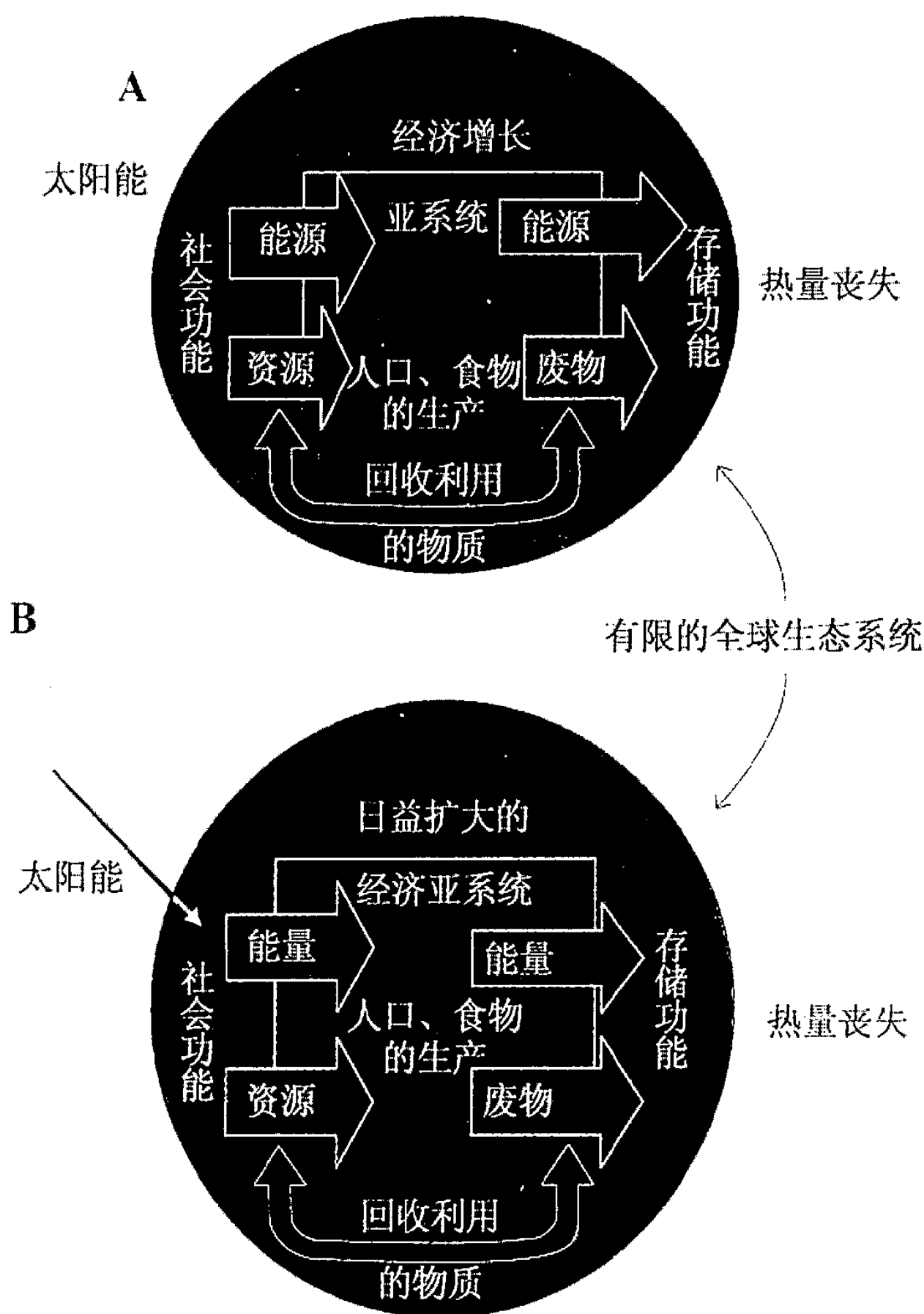
在一个边界开放的世界变成生活在一个饱和的世界里（见图 2.1）。我们现在可以要么选择自我调节以适应现实，要么就选择破坏我们的生存环境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

我们面临的并有可能超越的第一个环境制约是可再生资源和环境吸纳能力的不足——这些制约被生态学家称之为“渗透（sink）功能”。我们受这些因素制约的证据随处可见。酸雨仅在欧洲就毁坏了 3100 万英亩森林。在全球范围内，沙漠每年侵蚀 600 万英亩肥沃的土地。赤道地区的森林覆盖面积减少了 1100 万英亩，由于氧化和侵蚀作用净损失了 260 亿吨的土壤，由于灌溉工程带来的盐碱化，150 万英亩的良田被废弃。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从 1984 年开始就一直在下降。北美洲的臭氧层在 1980 年至 1990 年间厚度减少了 5%，可能全球各地都是如此。在过去的 100 年内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的含量上升了 2%。^①

现在已经有大量文献和众多的讨论评估一些数据资料，研究我们是否已经超过某一特定限度，或者在近几年内将会超过

^① 本统计据自 William E. Rees and Mathis Wackernagel, "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 Measuring the Natural Capital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Economy," in A-M Jansson, M. Hammer, C. Folke, and R. Costanza (eds.),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 The Ecological Economics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4), 380. 1 公顷等于 2.47 英亩。有关人类活动超越了生态极限的论文文件，请参阅 Robert Goodland, Herman E. Daly, and Salah El Serafy (eds.),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Lifestyle: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2), 3-22. 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and Jorgen Randers, *Beyond the Limits* (Post Mills, Vt.: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1992); Gerald O. Barney, *Global 2000 Revisited* (Arlington, Va.: Millennium Institute, 1993); and Sandra Postel, "Carrying Capacity: Earth's Bottom Line," in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4*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3-21.

图 2.1 走向饱和世界



资料来源：Robert Goodland, Herman E. Daly, and Salah El Serafy,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Lifestyle: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 C. : Island Press, 1992, 5.

这些限度。精确评估的重要性远远不及让人们共同认识到一个基本的真理：除了根据世界已经饱和这一现实来重建我们的经济制度之外，我们已经别无选择了。

有些国家的消费量超出了自身环境的供给能力，而这些国

家正在控制着国际经济的规则制定过程。他们调整规则以使他们有能力通过进口来弥补自身的环境赤字——它们通常都不会仔细考虑这样做对出口国意味着什么。

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在这些国家 1/5 多的耕地种植出口农作物，如香蕉、咖啡和食糖等。在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出口牲畜的大牧场已经取代了雨林和野生动物保护区。而处于生产线终端的消费者，日本 70% 的谷物、小麦和大麦，95% 的大豆和 50% 以上的木材都来自于进口。这些木材正从婆罗洲的雨林中迅速消失……（在荷兰）饲养着数以百万计的猪和牛，从而为欧洲消费者提供高脂肪的肉类与牛奶。喂饱这些猪和牛的食物中有砍伐马来西亚森林的棕榈树仁做成的饼，有砍伐泰国森林而得的木薯和来自巴西南部广泛使用高剂量农药种植的大豆。^①

南方国家的土地被用来生产出口食物，这些土地就无法为本国的穷人生产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农产品。被出口导向型农业排挤出去的农民进入已经过度拥挤的城市，或者是迁到那些更贫瘠、产量更低的地区去，这些地区很快就不堪重负。南方国家用出口的商品从北方国家^②换回来的粮食通常主要用作饲料，为高收入的城市消费者生产肉类。而穷人却受重大损失。

北方国家的消费者是看不到这些运作机制的。如果他们真的提起相关的问题，他们会认为这种安排能为南方国家的穷人们提供必要的工作岗位和收入，让这些人能够以比自己种植作

① Alan Durning, *How Much Is Enough?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56.

② 国际上习惯把发达国家称为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称为南方国家。

物更便宜的价格来满足自身的食物需求。从表面上看这一理论似乎合情合理，但实际上，在这种食物型农业向贸易型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受益者就是控制了全球商品交易的跨国农产品贸易公司。

富裕的国家会在自身资源无法满足需求时进口资源，与此相似，当他们的废物处理能力不足以处理自己所有的垃圾时，他们会将废物出口。实际上，废物处置行为更清晰地揭示了权力与环保费用分配之间的关系。污染环境的工厂和废物处置场所所在的位置相当一致，都是在贫穷和少数民族居住区的附近或者就在其社区里面，因此我们可以用它们作为测量政治权力地理分布的替代性地标。

富人们通常把后果与损害联系在一起，把穷人不得不生活在悲惨的环境中作为一个证据，来证明与富人相比，穷人的环境责任感要差得多。这些观点使人们忽视了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绝大多数的环境压力是由人类消费行为直接导致的，毫无疑问，富人的消费量远远大于穷人。第二，的确，穷人生活在垃圾堆、污染工厂区以及荒山秃岭附近的几率远远高于富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垃圾场的垃圾是穷人堆满的，或者说他们就是森林或工厂里生产产品的主要消费者。这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住在一个更清洁干净的环境中。它仅仅说明，富人有政治和经济实力来确保污染物和垃圾倾倒在除自己所处之地外的其他地方，能够确保自己的附近地区保持着悦目的公共草地，而污染工厂却在其他地方。而当然穷人没有这种能力和权力。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收入不平等带来的后果，而不是两个阶层在环境意识与关怀方面的差异。只有通过权力的平等化才能改善这一问题。

经济全球化大大扩大了富国的机会，使它们可以通过出口废物和将污染工厂迁至国外的方式将自身的环境负担转移给穷

国。在日本公司中这种情况尤其常见，邻近的南亚国家是其主要的出口国，而这一数字是很惊人的：日本已经把本国的铝冶炼能力从120万吨下降到14万吨，现在90%的铝是从国外进口的。

这里涉及的人道条件是一项对菲律宾冶炼与精炼联合公司(PASAR)进行个案研究的过程中提出来的。该公司在菲律宾的勒特(Leyte)省经营着一家由日本资助和建造的冶铜工厂，生产出的高品质铜阴极产品(copper cathodes)，用船运至日本销售。该工厂占地400英亩，由菲律宾政府以几乎是白送的低价从当地人手中征用过来。工厂排出来的毒气和废水中的硼、砷、重金属和硫磺化合物的含量很高，污染了当地的水资源，使渔业与稻米产量下降，森林遭到破坏，使当地人的上呼吸道感染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当地人为该公司牺牲了家庭、生活和身体的健康，他们现在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就是依赖于该公司的临时兼职或合同工，这些工作通常都是工厂里最危险、最肮脏的。

该公司生意很兴隆。地方的经济也增长了。日本人不用付出环境污染的代价就获得了铜的供应。当地的穷人——该项目的所谓受益者——却失去了谋生手段，身体受到了伤害。菲律宾政府正在偿还日本所提供的、用来资助建设该工厂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的外国援助贷款。而日本人却正在为自己国内环境的净化和对菲律宾穷人的慷慨援助而竞相庆贺。^①

这个案例除了它所记录的事实之外，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数以千计的类似故事正在评说着公司全球化的现实后果。《经济学家》杂志是全球化的热情鼓吹者，它争辩说，批评有

^① “Aid for Profit: Japanese DDA in Leyte,” *Kabalikat*, September 1990: 8-10.

毒物质倾倒行为将会使穷人们失去他们急需的经济机遇。^①

开放性的贸易体制有时也倡导要为那些几乎没有受惠的人们提供环境赤字的补偿，但实际上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他们已经几乎没有什么额外的环境资源可以提供给那些环境资源过多的人了，只会使环境赤字徒增。此外，开放性的贸易体制有利于让富人们把不良后果转移到自己看不到的地方。这些后果离人们的视线越远，掌权者们就越容易忽视它和将它合理化。

消费、人口和公平

我们已经进行过无数次的争论：富国的代表谴责穷国的人口增长并拒绝讨论过度消费和不平等问题，而穷国的代表也拒绝讨论人口增长问题。在一个饱和的世界里，消费、人口与平等三者紧密相连，必须以全面系统的手段来应对。下面的三个研究显示了这种联系的存在。

第一个研究是由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城市规划学家威廉姆·瑞斯（William Rees）进行的。瑞斯估计，在一个高收入的国家里，每个人平均需要 4—6 英亩的土地来维持消费水平。这其中包括使用可再生资源维持目前的能源消费水平所需的土地。1990 年，据估计世界上所有进行生态生产的可利用土地面积（能够产生生物的土地）人均仅有 1.7 公顷。^② 瑞斯预计，以荷兰的人口为例，它的消耗相当于其境内的生态生产土地提供能力的 14 倍。^③ 荷兰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不足，一部分以减少自己的自

^① “Pollution and the Poor,”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1992, 16-17.

^② Rees and Wackernagel, “Ecological Footprints,” 382.

^③ Rees and Wackernagel, “Ecological Footprints,” 374.

然资源储备来掩盖，一部分通过国际贸易以征用低收入国家的资源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在这些工业化国家中，人均资源消费量最高的是美国和加拿大。但是，因为欧洲与日本人口密度较高，所以事实上他们的生活所需可能更远远超过其生态供应能力。

第二个是由荷兰地球之友组织（Friends of Earth Netherland）进行的一项有关荷兰土地的研究，从而把第一个研究的分析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该研究提出质问：假如（a）到2010年地球上所有人消费的自然资源水平保持不变；（b）全球的自然资源的消费水平是可持续的。那么到2010年每个荷兰人平均每年消费的自然资源与废物吸纳设施服务的水平是多少呢？结论很清楚，研究者发现，在几乎每一个消费领域里，一个普通的荷兰人的消费量都远远超过他所能及的，因此他们就剥夺穷国的人们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能力以满足自身需求。^①

美国地球之友组织（Friends of Earth USA）利用荷兰人的估计对美国的国土进行了研究，它得出的结论也很相似。^②例如，目前美国每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是19.5吨，在荷兰这一数字是12吨。如果要实现减缓全球变暖趋势这一目标，那么到2010年世界上使用矿物燃料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水平应减少到每年人均4吨。如果把实现这一目标的任务由每个人来均摊，那么到2010年每个人每天消费的碳化燃料则不能超过一升。“（用这些燃料）荷兰人可以选择每天驾车走24公里

① Manus Van Brakel and Maria Buitenkamp, *Sustainable Netherlands: A Perspective for Changing Northern Lifestyles* (Amsterdam: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2).

② Alex Hittle, *The Dutch Challenge: A Look at How the United States' Consumption Must Change to Achieve Global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 C.: Friends of the Earth, 1994).

(15.5 英里)，或者是坐公共汽车 50 公里（31 英里），或坐 65 公里的火车（40 英里），或是坐 10 公里的飞机（6.2 英里）。一个人从阿姆斯特丹乘飞机去里约热内卢需要积攒 20 年的燃料才够去一次。”^①

对那些仅选择步行作为出行方式的人来说，上述的日均燃料标准似乎有些奢侈。然而，对那些习惯于把大量时间花在汽车、飞机、公共汽车和火车上的人来说，这样的标准事实上是严峻的。我们应更清醒认识的是，我们规定每人每天消费一升燃料并不仅仅是直接用于个人旅行的，还应包括用于生产、运输和销售消费品的燃料消耗——这些负担是我们加诸于环境的，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或者很容易忽视它。

第三个研究由康乃尔大学教授戴维·皮蒙特（David Pimentel）和他的同事们共同完成，并提交到了美国科学促进委员会（AAAS）的年会。这一研究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而且注意到了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把人口因素视为一个变量。例如，该研究考虑到虽然我们可以开发更多的土地，但这需要更多的水资源；我们可以从太阳那里取得能源，但只有通过使用更多的土地才能得到；每一公顷农业用地的产出量可以提高，但前提是必须增加能源投入。

康乃尔大学的研究者们也考虑到，虽然我们现在仍然在开发新的土地，但由于严重的退化，现在每年都有 1000 万公顷适宜耕种的高产土地遭废弃。要维持目前的食物消费水平就必须找另外的土地来填补不足。另外，在采取措施减少现有的营养不良人口之前，我们每年必须另外新增 500 万公顷的土地投入生产，用来养活全球每年净增长的人口。此类新增土地绝大

^① Van Brake and Buitenkamp, *Sustainable Netherlands*, 6.

多数是通过毁林开荒的方式获得的。^①

康乃尔大学的研究小组认定，如果以目前欧洲人均每年的消费标准计算，如果地球上每个人的人均消费水平都与他们相同的话，那么地球只能养活 10 亿到 20 亿人。为了强调其中的折衷方案，他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是希望有 100 亿到 150 亿的人处于贫困与营养不良的境地呢，还是希望全世界只有 10 亿到 20 亿人，但都生活在资源充足的高质量的环境中呢？”^②

这三个研究所进行的计算充其量只是一个初步的概算，这些研究建立在存在着矛盾的假设基础之上，使用的数据既片面且不可靠。然而，它们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们引起人们关注饱和世界里的消费、人口和公平之间无法逃避的关系。首先，如果地球上可持续性的自然产出能够被地球上现有的所有人平等地分享，那么所有人的需求就都能得到满足。其次，即使我们对新科技的潜力持最乐观的假设，要让地球上所有人的消费水平都接近北美、欧洲和日本的水平，实际上也是无法做到的。最后，世界上的人口每翻一番，每个人所分享的在地球上可再生性产出份额就会减半。

如果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能容纳全人类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应该不再相信经济增长是人类进步的基础这个神话，并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结束过度的消费、剥夺、人口增长和不平等——这些问题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

^① David Pimentel, Rebecca Harman, Matthew Pacenza, Jason Percarsky, and Marcia Pimentel, "Natural Resources and an Optimal Human Populatio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 15, no. 5 (1994): 352.

^② Pimentel et al., "Natural Resources," 364.

三、增长的幻觉

谈到贫困，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一个选择，而是一种必须。

——世界银行前任副总裁 马哈布卜·尤·哈库^①

经济增长为环境保护目标得以最大程度上实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国际商会^②

现代政治文明中最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可能就是，要满足包括缓减贫困、保护环境在内最重要的人类需求，关键就在于经济的增长。任何人只要他敢说经济增长应设定环境方面的限制规定，那么他就有可能被视为是反贫困的恶毒诅咒者而遭到排挤。因此大多数环境学家都只是简单地呼吁“另一种方式的增长”，但这另一种方式到底是什么方式他们其实也不是很清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和他的出色的同事罗菲·胡廷（Roefie Hueting）指出，根据我们

① Mahbub ul Haq，联合国发展计划中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的特别顾问。该文引自1994年4月他在墨西哥城举办的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全球会议上的一次演讲。

②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The Business Charter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is: ICC, 1990), 引用于 Paul Ekins "Sustainability First," In Paul Ekins and Manfred Max-Neef, *Real-Life Economics: Understanding Wealth Cre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415.

目前的思考模式，要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增加就业人数；另一种是提高就业者的劳动生产率——每个工人的产出价值。从历史上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源泉。大约70%的生产力的增长是由30%左右的经济活动所提供的。这些经济活动包括石油、石油化工和冶金工业，使用化肥的集约型农业，公用事业，道路建设与运输，以及采矿业——尤其是那些正在使天然资源迅速减少、产生大量最有毒废物并消耗了很大比例的不可再生资源储备的工业。^①

此外，为满足需要而给环境带来重大负担的产业往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很大的贡献。^② 例如，驾车走1英里比骑自行车走1英里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要大；开空调的贡献比开窗户的贡献要大；通过生产流程来包装的食品所做的贡献要比装在可回收性容器里批发出售的天然食品的贡献要大。可以说，国内生产总值是一种衡量经济系统中货币流动速率的技术手段，它也可以用来衡量我们将资源变成废物的速度。

我们也许把大量的力气花费在一个不现实的目标上，这个目标就是让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无限制地增长，而且不会产生更多的废物。我们何不把力气集中在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以及与地球建立平衡的关系上呢？这些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只要我们不再相信增长是使生活更美好的必由之路。

① Jan Tinbergen and Roefie Hueting, "GNP and Market Prices: Wrong Signal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Success That Mask Environmental Destruction," in Robert Goodland, Herman E. Daly, and Salah El Serafy (eds.),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Lifestyle: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2), 52-62.

② Tinbergen and Hueting: "GNP and Market Prices;" 52-62.

一个觉醒的经济学家

1954年，英国财政部大臣布特尔（R. A. Butler）在保守党的一次会议上做了一个演讲。他指出，如果英国经济能够以3%的比率持续增长的话，那么到1980年英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将会翻一番，从而使所有人的富裕程度是他们父辈们在他们这一年龄时的两倍。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演说是英国人生活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国家追求的目标总是要设定具体的指标，如每年建30万套房子或者建立每个国民健康服务系统。此后，主要的目标转变成促进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左派与右派之间抛弃了关于如何分配经济收入这块蛋糕的争论。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做大这块蛋糕。

1989年，爱尔兰经济学家理查德·杜斯怀特（Richard Douthwaite）试图证明英国人均收入翻一番所带来的好处是什么。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只有在当我试图去辨认它们（好处）是什么时，尤其是在这种尝试实行了三分之一一个世纪之后，几乎所有的社会指标都在日益恶化时，问题才开始浮现出来。慢性疾病患者的数量在上升，犯罪率上升了8倍，失业率飙升，更多的婚姻以离婚而告终。我几乎是疯狂地在寻找弥补这些失败的收益，我觉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失败应当归咎于经济增长本身。

……最后，我放弃了。证据是压倒一切的：对经济增长不假思索的追求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与环境灾难。几乎所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形成的多余资源都被用来维持系统本身的运作，而这一系统的运行效率却日趋下降。新增的财富被浪费在生产集运架和起皱的纸皮箱、不可收

回的瓶子和易拉罐等这些小东西上，用在建造飞机场、超级油轮和重型卡车、高速公路、立交桥和多层停车场上。在过去的33年间，它使银行、保险、股票交易、税款征收和会计等部门的雇员从493000人增至2475000人。它促使300多万人成为“失业预备军”。没剩下多少人从事更有益的建设，因为以上这些行业已经无处不在了。^①

对于自1950年以来全球经济规模增长了5倍多这一现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相似的检验。经济增长的支持者坚称，经济增长是消灭贫困、稳定人口规模、保护环境和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然而就在同一时期，生活在绝对贫困状态中的人口数量与总人口数量保持了同步增长：两者都翻了一番。流向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份额比率与流向最穷的20%的人的份额比率相比也翻了一番。几乎在所有地方，社会与环境解体的警报都在刺耳地响着。尽管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必然产生这些问题，但它的确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增长的限制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类确实取得了巨大进步。技术的提高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的福利大为增加。但同时，正如本章详细描述的那样，当我们现在界定和测量时，几乎找不到证据来证明，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人类福利水平自动增加这一假设。正如英国经济学家保尔·伊金斯（Paul Ekins）所指出的，可以推断，某一特定的经济增长实例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一件好事：

^① Richard Douthwaite, "The Growth Illusion," in Jonathan Greenberg and William Kistler (eds.), *Buying America Back* (Tulsa, Okla.: Council Oak Books, 1992), 92-96.

- 显示增长的出现是建立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从其本质上看应该是有价值的和有益的；
- 说明这些商品与服务已经广泛地分配在整个社会之中；
- 证实这些好处超过了经济增长给社会其他部分带来的许多有害影响。^①

我们使用的国内生产总值测量法没有进行这样的区分。事实上，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作为经济增长而显示出来的一个主要部分其实是下述几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 从家庭与社区式的非货币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向货币经济（money economy）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资本的下降；
- 以远高于资源再生能力的速度耗尽了自然资源如森林、渔业、石油和矿业资源等的储备；
- 把我们用来抵抗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结果、保护自身的费用计入收入之中。例如，废物处置，净化有毒垃圾堆和石油泄漏，为由于环境的原因所产生的疾病的受害者提供医疗照顾，为砍伐森林等人为所致的洪灾发生后的重建工作，和为控制污染器械的生产提供援助，等等。

标准的财政统计会从收入中减去资产折旧的补偿费用。但

^① Paul Ekins (ed.), *The Living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86), 8.

计算经济增长的经济统计制度并没有为社会和自然资本的损耗进行类似的调整。事实上，即使许多经济增长的费用很明显地是减少了人们的福利，经济统计也把它们计算成经济增长的收益。这样结果就显得有些荒谬了。例如清除阿拉斯加海岸埃克森·瓦尔迪兹（Exxon Valdez）号油轮所泄漏的原油的费用，修复恐怖分子炸毁的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所需的费用，都被计算为是对经济产量的纯贡献。按照这种歪曲的逻辑来推理，则那些对人类和环境而言是悲剧的灾难也是有利的。

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ey）和小约翰·科布（John Cobb Jr.）在他们合著的《为了共同的利益》（*For the Common Good*）一书中，为美国重建了一个从1960年到1986年间的国民收入账目，他们仅仅把那些增加的人类福利并根据计算在其中。这样所得出的结果才是真正的经济福利的指标，而不是经济产出的简单合并。这些指标显示，平均而言，个人的福利在1969年达到顶峰，然后处于一个保持平稳的时期，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下降。但是，从1969年到1986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上升了35%，矿物燃料消费量大约增长了17%，这种增长所带来的主要后果就是，为了维持质量日益下降的生活，我们现在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①

对我们来说，经济蛋糕如何分配比其绝对规模的大小更重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显示，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有高速的经济产出才能满足国民的基本需求。事实上，有些仅有相对适中的经济产出的国家在这方面比那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很高的国家要做得好。尽管沙特阿拉伯王国（Saudi Arabia）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斯里兰卡要高15倍，但它的国民识字

^① Herman E. Daley and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401-55.

率却低于后者。巴西的人均收入水平是牙买加的2倍，但是它的儿童死亡率却是后者的4倍。^①

当然，某一最低水平的经济产出对满足基本需求是十分重要的。这一必需的水平对一些贫穷的国家而言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然而，对世界上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满足主要取决于生产产品的分配，而不是人均收入的绝对量多少。如果优先考虑的是给人们提供良好的食物、住房、穿着、洁净水、医疗卫生保健、基本的交通工具、教育以及美好生活所需的其他基本条件，那么绝大多数国家目前已有的生产水平都有能力这样做，并且可以减轻人们的受剥削程度。在许多情况下，所要做的不过是把目前投入在军事方面的资源拿出来重新进行分配。

决定身体健康与长寿的最重要因素可能就是干净的水和较好的卫生设施。印度喀拉拉（Kerala）邦这类地方的经验证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一般的情况下，上述的必需品也可以得到满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高收入国家，正在经受着癌症、呼吸道疾病发病率的上升、压力加大、心血管功能失调和新生儿先天缺陷的增加以及精子数量的下降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所有上述现象与经济增长的副产品——空气和水的污染、化学添加剂、食物中的农药残余、噪音以及接触电磁辐射的几率上升等是密切相关的。^②

与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是郊区化、更加依赖于汽车代步，以及更频繁地通过电视来娱乐，这三者都减少了人们之间的正常联系与交往。而在过去，人们经常在路边相遇，举办家庭与社区联欢会，聚集在当地的小商店或咖啡厅里，这些交往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Douthwaite, *The Growth Illusion*, 96-119.

是城市和乡村生活的一个正常的构成部分。

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为幸运的少数人带来了现代化的机场、电视、高速公路，以及带空调的购物中心里的先进电器与品牌时装，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却很少得到提高。因为这种经济增长要求经济向出口导向型方向转变，以换回外汇给富人们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此，穷人们的土地被占用，用来种植出口的农作物。这些原来的土地耕种者现在正住在城市的贫民窟里，在生产出口产品的血汗工厂（sweatshop）里工作，靠低廉的工资来维持生存。家庭破裂，社会结构紧张至崩溃的边缘，犯罪成为地方“流行病”。从经济增长中受益的人还需要更多的外汇来进口武器装备以保护自己，抵抗愤怒的被排斥者。

增长与穷人

要求停止经济增长的任何提议都会引来一片反对声，因为反对者们认为这样做会使穷人永远处于被剥夺的境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坚持认为穷人的福利依赖于经济增长观点的人主要是专业的发展工作者、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公司首脑和其他一些不愁吃穿的人。当穷人们谈及自身时，更多的是关注保障他们赖以生存的 Land 和水资源。他们寻找着能够维生的体面工作。他们需要医疗保健和为孩子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在一个所有东西都由有钱人掌握的社会里，他们也会说：“我们需要钱。”他们很少会说“我们需要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是富人们之间的一个游戏。

经济规模快速扩张时期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紧缩时期的经济下滑给穷人们带来的通常都是剥夺。原因很简单：促进经济扩张的政策一般都以劳动者为代价，把收入与财富转移给有产阶层。尽管经济增长并不必然会引发贫困，但以经济增长为名

义所提出的政策却常常会导致贫困。^① 例如，人们认为下述政策带来的后果是典型地与经济增长相关的：

- 掌握经济权力的人常常通过正日益耗尽的自然资源来获取经济利润，但代价是人们的生存基础遭到破坏。

- 从社会（非货币）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变使工人阶级对货币的依赖程度上升，并因而使他们对拥有财产、提供专业性服务和控制工作岗位的人的依赖程度也在增加。

- 农业用地、森林和渔业的控制权从那些生产生活物品的人手中转移到拥有私产者手中。后者的目标是为利润而投资，以增加规划中的经济产量，重新分配那些财产，把其所有权转给资本占有者阶层，扩大低成本劳动力的“蓄水池”，使工人的工资水平趋于下降。

很多世纪以来，菲律宾本古特（Benguet）省的土著伊哥洛特人（Igorot）（“居住在山里的人”）一直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上的优质金矿中，进行着小规模的“凹穴采矿”。男人们在山上挖着圆形的洞穴，妇女与孩子们把含金的岩石砸成玉米粒大小的矿块。^② 现在他们的土地已经被本古特公司的巨大敞口矿井所占据。在这个公司里，菲律宾的富人们、菲律宾政府和美国投资者占有接近相等的股份，生产的黄金出口国外。许多推土机、起重机和卡车把山体切出深深的切口，把树木和肥沃的土壤除掉，把大堆的岩石废料倒在河里。当地人告诉来访者，由于水资源遭到破坏，他们再也无法种植水稻和香蕉了，而且还必须到山的另一面取水饮用和洗澡。甚至连当地人的采

^① Douthwaite, *The Growth Illusion*, 33-50.

^② Robin Broad and John Cavanagh, *Plundering Paradise*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24-31.

矿场受到威胁，也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权利。^①

矿业公司并不是像伊哥洛特人那样用水把黄金从岩石中分离出来，他们使用的是包括氰化物在内的有毒化学物质，并让这些化学物质沿河流向下游地区，使水里含毒，毒死饮用河水的家畜。受此影响的河流下游的帕那丝南省，由于矿渣覆盖了大量的灌溉土地，种水稻的农民的产量急剧下降，据估计每年他们会因此减少 250 万比索的收入，故而大批的人口迁离本地。在更下游的地区，海湾地区的捕鱼人说由于矿渣覆盖了珊瑚礁，他们的捕获量显著下降。但是开矿有利于经济的增长。本古特公司和其他参与其中的大矿业公司每年总计赚取 11 亿比索的利润——一个巨大的财富从穷人手中转移给了富人。^②在矿业公司存在的地方，无数的类似故事正在上演。

木材公司在进入穷人居住区后，常常不顾当地人的利益，把他们的森林变成了荒山秃岭，使当地人遭受同样的命运。正如菲律宾南部布科第努省（Bukidnon）山菲南多地区偏远农村的一位年轻的农村妇女所说的：“没有树就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就没有生命。”一个老人埋怨说，在伐木卡车来他们村子之前，“我们这里鱼很多，玉米和水稻产量也很高”。人们开始描述他们的河流已经变样了，泥沙多了，变窄了。在季风季节里，河水现在已经开始溢出堤岸，浸泡了此前不受洪水威胁的邻近区域。曾经在干旱季节提供水源的小河现在已经找不到了；雨季时山体滑坡的现象也更为常见了。此前老鼠在森林里觅食并由森林里的天敌抑制着数量，但现在它们晚上就在农民的田地里肆虐。曾经一度兴旺的村落，现在却有 4/5 的孩子有

^① Broad and Cavanagh, *Plundering Paradise*, 24-31.

^② Eduardo A. Morato, "Far More Destructive Non-Events amidst Us", *Manila Chronicle*, June 18, 1991.

某种程度上的营养不良。^①

上述破坏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名义下进行的，而且经常得到公共资金的大力支持。每产出一吨的矿渣，一个普通的菲律宾矿业公司就会赚 96.73 比索，交纳 0.5 比索的税。在美国，政府以每公顷 12 美元或更低的价钱将联邦土地的采矿权出让。矿工能够享受 5% 至 22% 的税收减免作为“损耗基金”，来补偿他们因为矿产资源的耗竭而带来的损失。在日本，政府为国内的矿产勘探与开发提供贷款、补助金和税收的激励。^②日本公司在南方国家采矿和伐木所需的基础设施一般都是由日本外援计划提供贷款来建设，这些贷款将由受援国用公共资金来偿付。

在高收入国家，当工业提供就业机会的能力下降时，经济学家们就求助于服务业来挽回颓势。但很少提及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服务业方面的扩展是对以家庭与社区为基础的社会经济进行殖民化的结果。这些社会经济曾经高效地雇用了近一半的成年男性人口和几乎所有的女性，满足家庭各个方面的基本需要，承担了维护健康关爱的社区所需的数不尽的睦邻功能。事实上，在这时期里社会性经济使男性与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生产与再生产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人们的一些基本需求如食物、房子、衣服、照料孩子、医疗保健、照顾老人、处理家务、教育等都得到了满足。社会性经济天生就是地方性的、非工资化的、非货币化的和非市场化的。它们主要是依赖爱而不是依赖金钱来运行的。

当诸如照料孩子、医疗保健、食物、娱乐休闲和人身安全

① Broad and Cavanagh, *Plundering Paradise*, 61-72.

② See John Young, "Mining the Earth," in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2*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111.

等等的生产与再生产活动从社会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表现出来的是经济产量的增加，并因而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尽管这种转变并没有提高我们所享受的服务质量。这种转变也提高了对经济新增功能的要求，尽管这些新功能实际上是经济发展效率低下的源头，但它们仍然被视为是经济产量的增长因素。设想当家庭和社区成员都相互直接地在一起为对方工作，那么就不会有征税者、不会有经理人员、政府调节人员、会计师、律师、股票经纪人、银行家、广告客户经理、营销学专家、股东或货物运输商等，这些人把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的产出集中起来，占为己有。这样，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全部价值就会在家庭与社区内部进行分配，在那些真正生产价值的人中间分配。^① 其结果就是资源效率极高地满足了人们的真正需求。

许多人发现市场经济所需的附加费用已经变得非常之高，即使家里有两个赚工资的人，而且工作时间非常长，也无法完全满足基本的需求，而在过去这些需求是可以得到很好满足的。父母——通常是单身的、贫穷的母亲——除了做一个养家糊口的人和晚上的监护人外，已经几乎没有什么时间、精力和（外来的）激励（去做其他的事了）。现代的城市家庭已经越来越像一个睡觉与看电视的地方。有时间参与大量社区活动和社区服务的人越来越少了，而正是这些活动曾经使邻里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建立在长期共享和合作基础上的严密的人际关系结构是社会经济曾经极力维持的，现在它已经分崩离析了。这使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都有很常见的后果：剥夺、抑郁、离婚、青少年怀孕、暴力、酗酒、滥用毒品、犯罪和自

^① Edgar Cahn and Jonathan Rowe, *Time Dollars* (Emmaus, Pa.: Rodale Press, 1992).

杀等的几率都在上升。^①

由于这种转变给妇女提供了新的机会，因此她们把它视为妇女平等的一个胜利。然而，就在妇女进入工作领域的同时，并没有人提倡要建立一种新的伴侣关系，从而使男人们更全面地参与家庭与社区生活。这样，结果通常就是妇女负担更重了。这给家庭关系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使社区只能依靠支薪的专业工作人员做那些曾经能由邻里互助完成的事情。许多孩子只能在赢利性的日托所里，或是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在家里和街道上长大成人。许多妇女发现，当她们开始工作并准备扩大选择范围时，她们的手脚被那些没完没了的无报酬家庭杂活束缚住了。

高收入专业人员的产生与新机遇的出现带来了经济增长，对此经济学家们表示欢迎，认为这能够带来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安全服务等行业的发展，从而使我们可以应对随之而来的家庭与社区瓦解的局面。但是社会的纯消耗——尤其是商品经济没有给穷人们提供足够机遇的损失——被忽略了。

穷人们从他们赖以生土的土地上迁移出去是一个很漫长的历史过程。其结局周而复始，都是对强者而言的经济增长和对弱者而言的剥夺。经济学家预测，从1750年到1950年间，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增加了一倍，但人民大众的生活质量却在持续地下降。1750年之前，去英国乡村旅行的人几乎找不到什么被剥夺的痕迹。对大部分地区来说，人们都有充足的食物、住房和衣服，乡村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绝大部分的耕作是在公共土地上进行的，农户们有权去耕种小块而又分散的条状土地。即使那些没有这种权力的人也可以依靠公共土地获

^① Clarence Shubert, "Creating People-Friendly Cities," *PCD Forum Column* no. 72, April 5, 1994.

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些公共用地为他们的牲畜和兔子提供了放牧的场所，为他们提供柴火。一些勤劳的人还通过交易、租赁和购买等方式成功地赢得了许多财富，这使他们与其他人日益区分出来——这个过程常被称之为圈地运动（enclosure），但这是一个缓慢的、充满阻力的过程。

当时，土地的受益者以制定法规的形式把圈地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命令，从而加速这一进程。随着圈地运动的发展，穷人们日益与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土地分离。因为没有什么其他的谋生途径，所以他们被迫去为大农场主打工。接踵而至的剩余劳动力浪潮使工资水平下降，使大土地所有者的利润上升。土地税的引进迫使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卖掉自己拥有的土地。其结果是土地持有权日益聚集、合并，以及劳动力持续不断地从乡村流向城市，为工业革命的工厂提供工人——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妇女和儿童——他们愿意接受工厂里的工作，这些工作的条件“比监狱里还要恶劣……19世纪早期英国工厂里条件之差是十分惊人的，甚至可能比美国种植园里的奴隶的条件还要差”^①。

与“经济扩张”早期的经历相比，一般的英国人条件在1914年之后得到了改善，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这种改善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所有年份。但是这一期间英国的国民收入并没有出现全面的增长局面。正如沃斯怀特（Wouthwaite）所阐明的那样，这些战争使我们可以从政治上控制资本主义的力量。政府对高收入阶层征收重税，对工资加以控制。尽管这使工资的增长幅度低于通货膨胀的速度，但它使更多的人就业，而且他们的工

^① 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5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58), 659-660.

作很稳定。其结果就是绝大部分工薪家庭的实际购买力得到提高。此外，当政府同意增加工资时，它经常让每个人都能得到份额相等的绝对数量增长，这样，非技术工人新增工资同原工资相比的增长比率要高于技术工人的比率，于是整体的结果就是向平等迈出了重大的一步。^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每周工作时间从 54 小时减少到每周 46 小时或 48 小时，目的是为了吸纳退伍军人的洪流，使失业率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使工资上升。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由 1911 年就建立起来的国民就业保障计划来提供保护。通过对高收入征收重税，英国有计划地将收入从较富有的纳税者手中转移到那些最需要的人的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给穷人们带来相似的后果。利润不仅来自于战争发展所带来的产量的提高，而且也是劳动力的高需求、工资差别的模糊、政府对利润的控制和执行一个很先进的税收体系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在急剧拉大。由于实行战时的定量配给制度，使居民不得不进行储蓄，这就给战后留下了一个压抑爆发式的（pent-up）需求，使经济向和平时期模式的转变更加容易。

美国的经历也很相似。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切需要促使政府采取政治行动来执行各项措施，把收入进行一次重大的再分配，并导致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的诞生，这可以被视为美国经济实力与繁荣的标志。

一直到 70 年代之前，这种相对平等和共享经济繁荣的结构都或多或少地保持着它的完整性。20 世纪 70 年代，在东亚的经济竞争、就业动荡、通货膨胀和反叛的青年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保守主义势力开始重新抬头。保守势力对工会、社会安

^① Douthwaite, *The Growth Illusion*, 50-56.

全网、市场规则和贸易壁垒全力进行政治攻击，从而使背后经济利益相同的各种传统势力重新联合起来。在七八十年代，工资水平处于贫困线之下的美国工人的比率急剧上升，在就业机会与收入方面，社会越来越趋向两极分化。

有人主张以做大经济总量这块蛋糕的方式来应对贫困，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一个人能否生存主要取决于他的相对收入而不是绝对收入。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在为占据有限的环境空间而互相竞争，赢家总是那些最有钱的人。

正如我们从上面看到的，经济增长常常使富人收入增长的速度比穷人快。即使收入增长的比率相同，结果也是不同的——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绝对收入差距鸿沟将会继续扩大。这是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例如，布伦特兰夫人（Brundtland）领导的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建议，全球各国一致将本国人均收入年增长的3%拿出来，用来应对全球的贫困问题与环境问题。这一建议一落实就变成在第一年里的年人均收入（按美元计算）“美国增长633美元，埃塞俄比亚增长3.60美元，孟加拉国增长5.40美元，尼日利亚增长7.50美元，中国增长10.80美元，印度增长10.50美元。十年之后，埃塞俄比亚的人均年收入将增长41美元——还不够填贫困人口的牙缝，而这十年间美国的相应增长是7257美元。”^① 美国人均购买力的增长量已经是埃塞俄比亚的177倍。

如果不同时进行再分配的话，经济蛋糕的日益增大给富人们带来的利益远远大于给穷人们带来的，它使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拉大，进一步巩固了前者对后者的权力优势。在一个资源

^① Robert Goodland, Herman E. Daly, and Salah El Serafy (eds.), *Population, Technology, and Lifestyle: The Transition to Sustainability*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1992), xv.

稀缺的世界里，富人与穷人若要为日益耗竭的资源进行你死我活的争夺的话，那么这种权力优势将会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对于鼓吹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贫困问题的人而言，如果他们真正关心贫困者的境况，那么他们应该支持的是能够直接提高贫困者满足基本需求的能力的方法——而不是减免富人的税收。

发展名义下的增长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使一个国家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就必须让农民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而使农业得以现代化，城市劳动力的储备得以形成。与英国的圈地运动过程相类似的事情非常之多。哥斯达黎加就给我们提供了它在当代运行的一个尤为突出的例子。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减少其外债为名义，重构哥斯达黎加的经济政策之前，哥斯达黎加是一个以稳定、和平、繁荣等而著称的南方国家。它的小农经济基础十分强大，几乎没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那种大土地所有制的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强加给该国的政策使经济刺激的重点发生了转变，使之从为哥斯达黎加人生产食物的小农经济，转向以出口为目的的大土地经营。其结果是，数以千计的小农被迫离开家乡，他们的土地被合并进大农场以及以出口为目的的农业庄园，哥斯达黎加人的贫富差距跟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越来越接近。犯罪率和离婚率在增长，这使警察与公共安全方面的公共支出迅速上涨。该国现在依靠进口来满足其基本的食物需求，进行结构调整时想要减少的外债现在又增加了一倍。像这些政策一样不可理喻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把哥斯达黎加视为结构调整成功的范例，因为该国经济得到了增

长，也有能力偿还正在日益增加的债务利息了。^①

在巴西，为了把为国内消费服务的小土地所有制农业转变成出口导向的资本密集型生产，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有2840万人被迫背井离乡——这一数字比阿根廷全国人口总数还要大。^②在印度，大规模的开发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使2000万人被迫迁移。^③1989年，世界银行项目的实施使150万人迁出本地。这些项目预计还会使另外150万人迁移出去。世界银行的工作人员无法证明，在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中迁移的人都得到了重新安置，而且生活水平能够与迁移之前的生活水平相当。^④亚洲非政府组织发起组织了一次有关亚洲发展的会议，会议讨论了环境与贫困问题的根源，揭示了亚洲发展经验的另一面，这在世界银行和商业杂志的报道中都没有涉及：

在泰国，上千万的农民被赶出自己生息的土地，给种植商用树木的农场让位。地下水被抽干了，出口导向的养虾场不断地在砍伐林木。在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森林里，为了让政府承认原著居民对祖传土地的占有权，原著民们正在斗争着。在菲律宾，由于基本农田转变成了工业

① Alicia Korten, "Cultivating Disaster: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Costa Rican Agriculture."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ly/August 1993, 20-22.

② Bruce Rich, *Mortgaging the Earth: The World Bank, Environmental Impoverishment, and the Crisis of Developme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155.

③ Clarence Maloney, "Environmental and Project Displacement of Population in India. Part I: Development and Deracination," *University Field Staff International Report*, no. 14 (Indianapolis, Ind.: University Field Staff International, 1990-91), 1.

④ Rich, *Mortgaging the Earth*, 156.

庄园和其他的非农业用途，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正受到全面的破坏——即使国家必须花费宝贵的外汇去进口大米。农业化学药剂和有毒的工业废料，包括那些在国际援助的幌子下由外国公司和机构带到当地的，在继续危害着我们。水坝和地热项目赶走了人们，破坏了农业和森林用地，从而满足出口导向的工业对能源的需求。贫民区的居民正在被赶走，给那些为别人利益而建造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腾出空间。为国外市场服务的公司通常采取破坏性的渔业捕捞行为，这些行为使以捕鱼为生的人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并危及我们海洋的再生能力。^①

在泰国曼谷（Bangkok）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中，为实施公路和其他城市发展计划需要搬迁大约 30 万人。抵制搬迁的低收入家庭，水源和电源会被切断。若再继续抵制，那么他们的房子可能就会被人纵火烧毁或是被推土机推平。^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使 100 万墨西哥人被迫从他们的农场中迁移出去。事实已经证明，与它实现消灭低收入国家人民被剥夺状况的承诺相比，经济增长机制在制造开发性贫民方面的效率要高得多。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为所有人赢得可持续性的人类福利，那么我们必须揭穿由充满幻想的预言家们植根于我们的文化中的经济增长神话，不再为增长问题而烦恼，优先考虑下面两个方向，进而从根本上重建经济关系：

① *Southeast Asia Regional Consultation on People's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vol. 2, *National & Regional Reports* (Manila: Asian NGO Coalition, 1991), 1-2.

② Walter Hook, "Paving over Bangkok: Development Bank-Funded Highways Will Displace Tens of Thousands," *Sustainable Transport*, no. 2 (September 1993): 7.

1. 使人类对环境的利用与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保持平衡；

2. 在分配可利用的自然资源时优先考虑保证所有人都有机会充分满足他们的身体需要，促进他们自身能够在社会、文化、智力和精神方面全面发展。

这种转变完成的障碍之一就是，在制度性的议程之后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利益联盟，它会把我们引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当社会制度将经济增长作为公共政策的组织原则时，这些公司利益集团就会从中获利。

第二部分 主权之争

四、公司力量在美国的上升

公司执照正在成为人们的一种负担，在这种负担之下，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在悲惨的境遇中呻吟。

——伊塞亚·托马斯，1823

今天的公司是一个人造产物，它隐藏了其所有者和经营者，同时保持了公司的权利和存在形式。无论是否是人为创造的，公司的法律权利比人们还要多——而且这种权利是政府用军事力量来加以保护的。

——理查德·格鲁斯曼与弗兰克·亚当姆斯^①

公司的利益与人民的财产紧密交织，这一事实可能会让我们看不清公司作为有着自身权利的机构的重要性。从积极的角

^① Richard L. Grossman and Frank T.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Citizenship and the Charter of Incorporation* (Cambridge, Mass.: Charter, Ink., 1993), 6.

度看，公司执照（corporate charter）是一个社会性的发明，它最初产生的目的是聚集财政资源为公共目标服务。从消极的角度看，它允许一个或更多的人在密切地关注私人事务的同时对大规模的经济和政治资源产生影响，而且使他们不用为由此而产生的公共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单个的公司有一种发展趋势是很少为人们所认识的，这就是在规模与势力增长时，公司自身的制度议程与根植于其本性与结构的迫切需求会紧密相连，有时甚至连公司的拥有者与经营者都无法完全控制公司的这种需求。这些制度议程关注的焦点是提高公司自身的利润，保证自身不受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它们的产生是市场竞争、金融市场的需求和个人努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身处其中的个人是以升职与加薪为自己的目标的。

大公司通常以力量联合来提高自身在政治与经济事务中的话语分量。在美国，150多年以来，大公司一直在参与统治规则与制度的重构工作，使之符合自身的利益。有些读者会因为我将这些公司拟人化而感到不快，但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公司一产生，它的生存就会超越于人类的意图之外。

公司是以支配性的统治制度的面貌出现在地球上的。其中最大的一些公司差不多已经扩展到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它们在规模与权力上比绝大多数政府都要大。日益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人类的利益在决定着国家与国际机构的政策议程。

殖民掠夺的工具

现代公司是15世纪和16世纪英格兰与荷兰的大商业公司的继承者，回顾这一事实是很有用的。这些大商业公司是承担有限责任、共同持股的，王室授予它们执照，使它们有权以一

个真正国家的身份来处理在外国地域上的大量事务。

譬如，1602年，荷兰王室给东印度联合公司颁发了执照，授权该公司垄断经营从南部非洲顶端的好望角到南美洲顶端的麦哲伦（Magellan）海峡之间的所有荷兰的贸易。这个执照给予该公司包括签约与结盟、拥有武装力量、占有领土和建筑城堡等在内的这些君主式的权力。因此该公司击败了英国舰队，赶走葡萄牙人之后在东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确立了其统治地位。在该公司统治的早期，它制定了一种贷款制度，使借款的种田人最终失去其土地的所有权，这样它就攫取了东印度尼西亚的大片土地。它禁止在非荷兰人控制的土地上种植丁香。当地人无法在岛上剩下的贫瘠土地上收获足够的粮食，所以他们不得不从该公司那里买高价的大米，这最终导致了地方经济的衰败，使人们陷于贫困的境地。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主要工具，直到1784年之前，印度就像是它的一项私有财产那样被该公司统治着。该公司直到1858年之前一直都在英国政府的监控下管理着印度，1858年之后英国政府直接对印度进行统治。^①

在19世纪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繁荣的贸易体系：从中国进口茶叶，同时把鸦片作为报酬非法地运进中国。由于鸦片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作为应对策略，中国没收了英国商人储存在中国境内仓库里的鸦片。这就导致了1839—1942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英国在这场战争中赢得了胜利。作为战利品，英国强加给中国一个条约，该条

^① 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5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58.), 467 and "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 199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D Edition).

约规定中国向英国提供巨额赔偿，英国有权在中国的五个口岸通商，在中国犯罪的英国人要在英国的法庭里受审。^① 这个条约是现代强权的北方国家强加给南方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先驱之一。

英国王室的公司在北美的殖民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伦敦公司成立于殖民地弗吉尼亚，曾有一段时间它把该殖民地作为公司的财产进行控制。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控制着新英格兰地区的贸易权与殖民权。为确保英国对北美哈得孙河流域毛皮贸易的控制，英国成立了哈得孙河湾公司，该公司在英国对现今加拿大一带的地区进行殖民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司的执照代表了王室的许可，在公司对损失承担责任方面，它允许投资者仅以他（她）在公司里的投资额为责任限度——普通的公民是没有这种权利的。每个特定的执照都为每个特定的公司规定了特定的权利与义务，其中这包括在分配公司利润时必须向王室倾斜，以作为对王室授予特权的一种回报。这些执照是由于王室的恩典而被授予的，因此王室随时都有权收回。通常的结果就是，在公司—政府的关系史中，从授予执照那天起公司利益集团就不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扩大公司的权力，减少公司的义务。

控制海湾公司

美国历史的很大一部分是人民为了统治权而与公司进行长期的持续性斗争史。尽管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有许多类似的斗争，但美国的经历却有着尤其重要的价值，因为在塑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制度方面，美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

^① “The Opium Wars”; 1998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CD Edition).

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美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时，它所扮演的这种全球性角色的重要性就变得更加明显，也更加肯定了。即使与日本和欧洲相比，美国的经济实力有所下降，但它仍然在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机构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如我们在下面的章节中将要谈到的，公司的利益在美国确定自己在上述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中的国家利益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美国的公司权力发展史不仅仅在美国国内具有重要意义。美国诞生于革命之中，这一革命既反对英国国王滥用权力，也反对王室用来控制殖民地经济的特权公司。^①

在17世纪和18世纪，英国国会是由富有的地主、商人和工厂主组成的，它制定了许多法规，其意图就是保护和扩大公司的私人垄断权利。例如，其中有一套法规就规定所有英国殖民地从欧洲或亚洲进口货物都必须途经英国。类似地，所有殖民地出口的规定产品首先都必须运到英国。海运法规规定所有进出殖民地的船运货物必须由英国人或殖民地船员控制的英国及殖民地的船只运送。此外，尽管殖民地居民拥有原材料，但他们不得自行生产便帽、礼帽、毛织品和铁器等。这些原材料被从殖民地运到英国去加工，加工完成的产品再运回殖民地出售。^②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严厉地谴责了这些行为。斯密看待公司，就像他看政府一样，他把公司看做是遏制有益的市场竞争力的工具。他对公司的谴责毫不留情。他在自己经典性

① Douglas Dowd, *U. 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ince 1776: Of, by, and for Which People?*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3), 10.

② Leo Huberman, *We, the People: The Drama of America*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0), 50-52.

论文里 12 次提及它们，但没有一次说到它们有什么好品质。他的经典名言就是：“同业组合以及大部分组合规则的设立，在于通过限制自由竞争，以阻止价格这样的下降，从而，阻止工资及利润的下降——自由竞争势必引起价格这样的下降”^①。

值得一提的是，《国富论》的出版和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时间相同，都是在 1776 年。这两者都是革命性的宣言，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对那种夺取不应得的利润和禁止地方性企业的市场残酷统治提出了挑战。斯密与北美殖民地的人民都对国家和公司权利抱着深深的怀疑态度。美国宪法创立了政府分权机制，通过精心设计，建立了一个控制和均衡系统来限制联邦权力的滥用。宪法没有提及公司，这显示宪法的起草者们并没有预见到或者并没有打算让公司在这个新国度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年轻的美利坚联邦共和国里，几乎没有人认为公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无可避免会出现的。国内的许多方面都符合斯密的理想状态，尽管当时商店、合作社和劳动者自有企业很普遍，但家庭农场和小商号却是经济的主流。当时有一个很流行观念，那就是认为要保持投资和生产的地方化和民主化，这种观点与现状是相当一致的。^②

有执照的公司处在市民和政府的严密监管之下。发给公司执照的权力留给了每个州的政府，而不是集中在联邦中央政府手中，这样做是为了尽可能地把控制权保持在市民的手中。执照中的许多条款以及许多相关的法规，限制使用公司手段聚集

①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123. 见邓大力、王亚南译，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商务印书馆 1972 年版，第 117 页。下面引文均按该译本。——译者注。

②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3.

过多的个人权力。^①早期的执照规定了一定的使用年限，如果过期没有更换，公司便会被责令解散。一般而言，执照对公司的借款、土地所有权，有时甚至是利润都进行了限制。公司成员有责任以个人的负担能力来偿付他们作为该公司成员时公司所欠下的债务。大投资者与小投资者的投票决策权相同，董事们相互勾结是非法的。此外，一个公司只能从事执照明确规定的商业行为。执照中通常都包括可撤回的条款。州的立法者保留着撤回执照的权力，任何一个公司若被他们裁定为没有为公共利益服务，那么它的执照就会被收回，立法者密切关注着公司的事务。到1800年时，各州颁发的执照合起来大约只有200个。

19世纪时，在市民是否有权通过州政府撤销或修改公司执照这一问题上，公司与市民社会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立法斗争。在前半个世纪里，州的立法者修改、撤销或者简单地不给颁发新执照的行为十分常见。然而在1819年，当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者试图撤销在美国独立前由乔治三世国王颁发给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执照时，州的这种权利受到了公司的攻击。最高法院否决了撤消执照的决定，理由是该执照上没有规定保留或者撤回条款。

愤怒的市民把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视为是对州的主权的一个攻击，他们坚决要求在公司财产权和个人的财产权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他们认为公司不是天生就存在的，它是由州的法律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授权建立的。因此公司是公众的，而不是私人的。故而公众和选举产生的州立法者完全有法律权力来任意修改或取消他们的执照。公众的强烈抗议使各州监督公司事

^①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3.

务的法律权力得到极大的加强。^①

直到 1855 年，在 Dodge v. Woolsey 案中，最高法院确认，宪法并没有授予给公司什么不可剥夺的权利，裁定说，各州的人民没有：

让渡他们个人人身方面的权利，这一权利来源于他们的代表所进行的立法……社会上各阶层的联合……是在公司精神的契约下进行的……它毫无疑问是希望对人民的主权加以限制的……但是宪法的制定者们在脑海中没有建构这种联合的愿望。^②

内战的破坏

美国内战（1861—1865 年）是公司权力的一个转折点。激烈的反征兵暴动震撼了所有城市，使政治制度处于混乱之中。由于公司从军事采购合同中获得了巨额利润，所以事实上公司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这种动乱和失控的政治腐败来购买法规，这些法规规定给予公司大量拨款和土地来扩建西部铁路系统。利润越多，新兴的工业家阶层就越能够加强他们对政府的控制力度，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③ 由于看到了日益显现出来的这一切，亚伯拉罕·林肯总统在临终前说道：

公司已经被推崇备至了……高层腐败的时期将会来

^①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11-12.

^② 参见 Edwin Merrick Dodd, *American Business Corporations Until 18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130, as cited in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13.

^③ Harvey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83), 84.

临，金钱权力集团将试图通过影响人民的成见来延长自己的统治……直到财富集中到一部分人手中…和共和国灭亡。^①

美国由于内战而分裂、对立；由于林肯总统被刺以及随后的酒场英雄尤利塞斯·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当选总统，政府的力量遭到了削弱。国家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数百万美国人在随后出现的经济萧条中失业。1876年进行的总统选举一片乌烟瘴气，因为它是由秘密谈判暗中操纵安排的。^② 腐败和黑箱交易比比皆是。由公司操纵进行谈判的最终胜出者——总统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B. Hayes）后来抱怨说：“现在政府不再是民治、民有、民享的了，而是公司治理、公司所有、公司享有的政府了。”^③ 马修·约瑟夫森（Matthew Josephson）在他的名著《强盗贵族》（*The Robber Barons*）一书中写道，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立法大厅变成了一个拍卖场，在这里争论着的是选票的价格，维持程序的法律制定出来并被卖出去”^④。

这时是诸如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詹姆斯·梅隆（James Mellon）、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菲利浦·阿莫若（Philip Armour）以及杰·古尔德（Jay Gound）这些人的时代。他们利用这种混乱状态用钱来购买关税、银行、铁路和公用土地等

① 参见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89-90.

②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90.

③ 参见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291.

④ 参见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92-93.

方面的立法，使财富生出（begot）财富，使自身更加富有。^① 市民团体继续在州一级政府进行斗争，要求保持公司责任义务、反对公司滥用权力。法院和州立法机关继续在撤回公司的执照。^②

然而，公司逐渐地在关键性的州立法机关中获得了绝对的控制权，这就使得他们可以真正去改写那些压制着他们的创造力的法律。新泽西州和特拉华州的立法者率先取消了市民干预公司事务的权力。它们限定了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应承担的责任范围，给公司颁发永久性的执照。公司很快就有权以任何方式在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领域内从事经营活动。^③

传统的法院系统一直在响应公司的律师们的呼吁和争论，它坚定地要求铲除谨慎的市民体制（citizenry）精心地加之于公司权力之上的约束。法院系统一步一步地建立起新的判例，使保护公司和公司的财产成为宪法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这些判例不通过陪审团来决定有无过错，不用陪审团来评估公司所造成的损失的损害程度，收回各州监督公司的价格及利润比率的权力。法官开始趋于同情公司的利益，裁定工人对自身在工作中受到的伤害负有责任，限定了公司对其可能造成的伤害的赔偿责任范围，宣布工资和工时法是违宪的。他们把共同的福利理解为总产量的最大化，而不管生产了什么或是谁受到了伤害。^④ 这些措施与每一个工业部门都关系密切，在 1888 年至 1908 年期间，这些工业部门里发生的事故导致 70 多万美国工人死亡——大约每天有 100 人丧生。^⑤

①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08.

②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21.

③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21.

④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18-20.

⑤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10.

1886年，公司主权的支持者取得了一个巨大的胜利。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在圣他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Santa Clara County v.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一案中宣布，私人公司是美国宪法保护下的一个自然人——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尽管宪法没有提及公司。随后的法院判决把它解释为公司有权受到权利法案的全面保护，这包括自由言论权和其他的宪法给予个人的保护。^①

因此公司开始要求拥有个人所享有的全部权利，而同时却不用承担作为一名市民应当承担的许多责任和义务。就像保罗·豪肯（Paul Hawken）所说的那样，在可以像单个的市民那样享有言论自由权后，公司所得到的“恰恰就是权利法案想要阻止的东西：对公共思想和言论的控制”^②。公司随后就宣称它们应该和任何个人一样，有权就他们自己的利益对政府施加影响。这种宣称使得市民们开始与拥有巨大的财政与沟通资源的公司相对抗，这是对宪法的一种嘲讽，因为宪法宣称要让所有市民在政治上讨论重大问题时有着同等的发言权。

在这一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的过度发展引发了暴力和社会的不稳定，卡尔·马克思认为这种过度的资本主义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当时的工作条件之差是骇人听闻的，工人的工资都难以维持生存。到处都是童工。根据一项估计，1890年美国的1250万家庭中有110万家庭的年平均生活费只有380美元，因此他们不得不招纳寄宿者来谋生。^③与工人的工业破坏活动一样，有组织的和零散的罢工也很普遍。雇主们使用包括私人安全部队和联邦及各州军队在内的各种手段尽力去破坏罢

① Grossman and Adams, *Taking Care of Business*, 18-20.

② Paul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108.

③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10.

工活动。暴力引发了更多的暴力，许多工人死于这一时期的工业冲突之中。

上述这些状况为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提供了推动力。1897—1904年间，工会成员从44.7万上升至207.3万。^①工会为日益兴旺的社会主义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运动正在美国生根发芽，它要求对生产方式、自然资源和专利进行社会化和民主化的控制。这是一个公开进行阶级斗争的时期，许多热情的新成员加入了日益扩大的无产者群体之中，准备为这一事业而奋斗、牺牲。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阶级界线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他们与较保守的工联主义者争夺着领导权，因为后者更愿意以行业和工业为界线来组织劳动者。^②

这些运动使各个种族团体联合起来。自豪感及其文化的出现开始把黑人联合在一起。妇女们组织了她们自己的工会，领导罢工行动，并在社会主义和民粹主义（populist）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③1920年，一项宪法修正案规定女性开始有投票权。

最后，自由市场的工业在爆炸式扩张时期的鲜明特征就是混乱和暴乱，但这种混乱和暴乱的环境无论是对资本家还是对工人而言，都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实力最强大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战正在使他们的利润减少。资本家中间存在着相当大的恐慌，他们害怕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公众运动力量的壮大，因为它们都威胁要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从而取消资本家们享有的特权。

① Melvyn Dubofsky,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1865-1920* (Arlington Heights, Ill.: Harlan Davidson, 1975), 87.

②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10-118; Dubofsky,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29-71.

③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10-118.

这为（资本家们之间的）团结和妥协提供了舞台，它改变了公司寡头们之间的社会性和制度性关系。资本家们把个人财团联合起来，从而加强他们的权力，限制互相之间的竞争。此前，摩根、洛克菲勒这对积年的冤家在1901年就已经开始了力量聚集，它们联合了112名董事，以新泽西北方保险公司的名义聚集了222亿的资产。这一巨大的资产数额是美国南部13个州所有可估价财产数额的两倍。其结果就是：

美国经济的核心部分，银行业、钢铁业和铁路业、城市运输业、通讯业、海上商业、保险业、电汽公用事业、橡胶业、造纸业、制糖业以及其他各种工业基础设施的支柱就都处在一个屋檐之下了。^①

最终，绝大多数资本家都认识到，只要提供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和工作条件，他们就能够减弱社会主义的感染力，同时可以赢得更多工人的忠诚，激发他们的主动性。还有一种方法也能取得相同的好处，那就是调整结构，转变组织松散的、以手工为基础的生产过程，使之更多地利用工业机械化和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这意味着生产过程的结构化、制度化程度将会更高，也就要求工人更加稳定和遵守纪律。

在与许多温和派劳工组织合作的过程中，大公司看到了好处。因为这些组织与他们协商共同决定某一个工业行业的统一工资及其标准，并根据一致同意的规则来迫使工人们遵守工厂的纪律。这些安排并没有从根本上挑战资本家的权力或市场体制，但它却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②

①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08.

② Dubofsky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72-108.

这些改革是在一个冲突频繁的环境中进行的。此前倾向于支持公司的法院系统一直在做出对劳工不利的裁决，这促使劳工运动越来越政治化，最终导致人们要求把劳动力的发展进行立法提上日程，导致劳工运动与民主党结成了联盟。在地方、州及联邦等各层次进行的法律改革开始建立新的社会标准，重塑劳动关系的架构。《卡莱顿反托拉斯法》的颁布对劳工运动尤为重要，该法规禁止法院对正在罢工的工人发布禁令。^①

即使如此，在风云激荡的20世纪里，在一个很少进行调节干预的国家经济中，用公司的垄断来繁荣经济的做法还是被允许的。通过借贷来发展的股票市场似乎成了财富无限增长的制造机器。由于相信自由市场和大公司的权力正处于巅峰状态，所以总统赫伯特·胡佛热情洋溢地宣称：“在上帝的护佑下，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贫困在这个国度里消失这一天的到来。”欧文·费希尔可能是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就宣称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国家已经建立在一个永恒繁荣的高地之上。^②

很明显，一般的美国家庭吃得更好、穿得更漂亮了，比历史上任何一个一般家庭过的都更舒适。^③但这种现实掩盖了另一个现实，那就是存在着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美国。^④在这其中，仅仅1%的家庭控制了社会财富的59%。1929年10月，在费希尔宣布商业已经结束的仅仅几个月之后，已经严重受损的财政系统开始崩溃。财政赢利几乎一夜之间从人间蒸发了。凯恩斯主义在繁荣的轨迹基础上建立了全球经济系统，以此为

①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24; Dubofsky,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77-80.

② Dowd, *U. S. Capitalist Development since 1776*, 157.

③ Robert L. Heilbroner, *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249-250.

④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46-147.

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政府、公司和劳动力之间建立新型社会关系的催化剂。

多元主义力量的上升和复兴

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时，20年代企业的过度膨胀、经济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农民、工人、老年人、黑人、妇女及其他人的生活困难在美国境内激起了一股政治和文化激进主义的浪潮。罗斯福害怕如果不采取大的行动，这种激进主义可能会颠覆整个政府系统。因而他推行了一个史诗般的社会和法规改革来挽救这一系统。国会通过了他的《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这是其中的关键措施之一，该法规要求政府在经济复苏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为仅靠市场力量似乎无法应对这些危机。

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宣告《全国工业复兴法》无效，并裁决各州不能设立最低工资标准。该裁定是一个多世纪以来最高法院将企业和公司权利置于市民或人类权利这一传统模式的延续。最高法院对《全国工业复兴法》和最低工资的否决使狂怒的罗斯福更加激进，他决定对美国的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他开始摧毁公司垄断，加强商业和银行法规建设，推进立法为工人的权利提供更加强有力的保护。公共就业计划开始启动，社会安全网开始实施。

罗斯福以报复行动对最高法院发起了攻击，他用他新选定任命的成员来增加国会成员的数量。虽然他试图向国会“塞人”的企图没有实现，不过他的行为对法官们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大部分法官开始更加支持进步的革新。最后，罗斯福由于长期当政，所以他任命的法官占据了最高法院9个法官席位中的7个，这就使得最高法院趋向于自由主义的方向。直到20世纪70年代共和党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当政后，他才开始重

建最高法院早期的那种倾向于支持公司的形象。^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府在处理经济事务中扮演一个更加集权化、在政治上更为人所接受的角色。政府把控制重点放在消费、调节工业产量和决定怎样分配国内资源以支持战争等方面。一个极其复杂的税收制度的联合体系开始实施，为战争提供支持。高工资水平下的充分就业和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为工人们提供了财政资助，这使财富分配发生了巨大变化，使之向较平等化的方向转变。在1929年，美国有2万名百万富翁，有两名亿万富翁。到1944年，仅有1.3万名百万富翁，没有亿万富翁。美国最上层的0.5%家庭在全部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从1929年的高达32.4%下降到1949年的19.3%。^②对于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和那些从工人阶级上升到中产阶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多元主义(pluralism)思想一直盛行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美国文化反叛时期。新的一代，花季少年，对生活模式、军事—工业联合体、外国军队干涉、环境开发和妇女的权利和作用、平等和贫困等的基本假设明确地提出了挑战。美国公司的价值和利益明显受到威胁，其存在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动摇了。最大的威胁可能就是年轻人脱离了消费文化。这一代人的反叛性更明显地表现在反对过度富裕方面，而不是表现在反对贫困和剥削方面。新一代的美国人拒斥实利主义，这在某种意义上意味了对体制的一种更根本性的威胁，它比上一代的饥饿工人寻求生存工资和安全的工作条件的威胁还要大。

消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和环保主义者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名字已经家喻

^① Wasserman, *America Born & Reborn*, 146-47.

^② Kevin Phillips, *The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0), 241-42.

户晓。自由民主党人牢牢地控制了国会，并正在通过一些重要的法规来扩大政府管理的范围，从而加强环境保护和产品与工人的安全。政府也正在积极地创立反托拉斯判例来打破垄断、保持市场的竞争性。

在国外，美国公司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攻击。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日本和亚洲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与地区（NICs）——韩国、新加坡和台湾、香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由于各国政府积极支持本国工业，采取保护主义和限制外国投资等政策，所以美国公司无法全面进入南方国家，包括那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市场。美国公司认为这些南方国家强加给自己的政策使自己处于不公平的劣势地位。而在国内，政府对公司和投资者的收益征收高额的税收，并严格执行环境与劳工标准，这就使得美国公司在国际竞争中受到双重的束缚。美国公司喊叫着这些行动都是违反规则的，并且要求建立“一个公平的游戏领域”^①。

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历史时期，正如第三部分将要证明的，公司集团开始集中力量来保护它们的利益。1980年罗纳德·里根当选总统，这导致公司极其成功地进行了一次集体努力，把社会经济改革的时钟向后倒拨，而这些社会经济改革曾造就广泛的繁荣，使美国成为世界各国羡慕的对象。里根政府努力塑造的是一种更倾向于维护公司利益的全球经济。

菲律宾经济学家沃登·贝隆（Walden Bello）在其极具洞察力的著作《黑暗的胜利》中，向我们描述在里根政府的议程中南方国家的发展前景：

^① 38. Walden Bello, with Shea Cunningham and Bill Rau, *Dark Victory: The United States,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Global Poverty* (Oakland, Calif.: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evelopment Policy, 1994), 4-5.

华盛顿极具意识形态色彩的共和党政权……放弃了“容纳自由主义”这一重要的对外战略和对内的暂时妥协的新协定（New Deal *modus vivendi*）。除了击败共产主义，里根主义还有其他三个战略关注点。第一个是要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中重新让南方国家臣服。其次是摆平日本和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或“其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挑战。第三是废除新协定在大资本家、劳动力和大政府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因为华盛顿和华尔街都把它看成是美国与日本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进行竞争时的最大障碍。^①

1982年的债务危机给美国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它们看清了风头正劲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带来的威胁。美国控制下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议，应该以南方国家允许外资进入本国的方式，来重建债务负担过重的南方国家的经济。这些国际机构将结构调整政策强加给南方国家，使南方国家的政府在经济生活方面支持国内企业家的力度下降。这些调整政策取消了从北方国家进口的障碍、减少了外资投资的限制性规定，使南方国家的经济与北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经济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要施加相似的影响还有一个可供选择的武器，那就是贸易政策。^②

美国公司动员了所有的政治资源，争取重新控制政治议程和法院系统。政治议程的一个重心就是国内改革，其意图就是通过改革使政府“从公司的背后离开”，大量削减对富人们的

① Bello, *Dark Victory*, 3.

② Bello, *Dark Victory*, 5.

税收，取消对公司合并和并购的限制。环境和劳工标准的实施力度也在下降，美国政府站在极其野心的公司的一边。为了提高美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削弱工会的力量、减少工人们的工资和福利、压缩公司的劳动力规模，以及将生产线转移到国外以便从廉价的劳动力和宽松的制度环境中获利，等等。

当上述措施在美国国内实施之后，失业问题开始凸显出来，工会成员减少了而且它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下降。工资开始下降，最贫困的家庭的收入也在减少。一部分幸运的受益人获得了相当大的实惠。大投资者、高层管理人员、娱乐界人士、明星运动员和股东们的收入在急速增加。美国的亿万富翁人数从1978年的1名增加到1994年的120名。^① 没有制度约束的储蓄和借贷业在滥发贷款，这给美国的纳税人留下一张账单，要消除这种混乱状态需要6000亿美元。对一般市民来说这是个艰难的时代，但贪婪的人却有了一个活跃的舞台。

当里根的这些创新措施在国外推行时，受到了其他发达国家里的相似的保守主义复兴力量的支持，在其他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中都出现了与南方负债国家相同的模式。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程度在扩大。失业率上升到警戒水平以上，许多30多年以来在一直稳步改善的社会指标，现在停滞不前了，或者在某些方面开始下降。许多负债的南方国家欠的外债更多了。世界上的亿万富翁却从1987年的145名猛增至1994年的358名。^②

里根政府信誓旦旦地说要阻止美国的衰落。政府一系列战略性政策的失误在短期内确实是加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促进

^① 1978年的数据来自Phillips, *Politics of Rich and Poor*, 239. 1994年有关世界亿万富翁的调查数据来自*Forbes*, July 18, 1994, 135.

^② *Forbes*, July 18, 1994, 135.

了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的角度看却是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第一，在军事上的大量财政赤字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际负债国。最大的债主是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对手日本。第二，里根政府不让政府在经济计划和优先调整中发挥任何作用，这就等于是把美国经济的未来完全交给了美国的公司，而后者却由于资本市场的压力而将其关注点放在短期的利润回报之上。第三，里根政府允许公司实行它们的反劳工策略，这使美国最重要的资源——人力资源在竞争的国际市场上白白浪费。^① 然而，总的看来，对那些最大的公司及其高层管理者与公司财产的持有者来说，这一战略是实施得很好的——它是以这个星球和世界上绝大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这一切并不是一个事前曾正式密谋过的结局。大多数国家政策的改变并不是由那些公司和政治精英人物来决定的，他们只知道坐在会议室里勾勒宏伟计划来加强个人权力。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头脑，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利益冲突。正如贝隆所说的：

通常出现的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过程，在这其中意识形态在政策与利益之间进行着调整。一个意识形态是一个信仰系统——由一系列的理论、信念和与外部有些关联的神话构成——该系统力图把某一社会领域的利益整合进社会的总体利益之中。例如，在市场意识形态中，摆脱国家约束的自由市场力量据说目标就不仅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它也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通过诸如大学、公司、教会或政党这些社会机构的传播，一种意识形态被大批人群国际化了，尤其是被那些自

^① Bello, *Dark Victory*, 5-6.

身的绝大多数利益都得以表达的社会团体成员所国际化。因此，一种意识形态中充满了许多个人和团体的行动，但只有在某种条件一致的时候，它才成为一股重要的力量……市场意识形态只有满足下述条件才能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力量：即在保守主义的中产阶级力量日益增强这一社会基础上，有一个政治精英集团支持它上升到国家权力的层面，与此同时，由于国际经济竞争环境的改变，公司集团也正在放弃对其有利的自由凯恩斯主义。^①

一个治理问题

有关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言论成了政治演讲中的一个持久话题：自由市场的进步就是民主的进步。自由市场的支持者让我们相信，对于政治表达而言，没有规则的自由市场是一个比投票决定更为有效、更为灵敏的机制，因为与漠不关心的政客和低效的官僚机构相比，企业对人民偏好的满足更为有效、更为敏感。道理很简单：在市场中，人民通过消费直接而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偏爱。相比而言政治选举人的一人一票制是一种迟钝的表达选择意愿的手段。因此，在准确阐释公共利益方面，市场是最有效、最民主化的方法。

对政府的不信任程度在不断上升，这是一个日益明确的信号，它包含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市场和政治都是与统治、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紧密相关的。这也是一个误导性的信号，它掩盖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事实：在一个政治民主体制中，每人都有一票。但在市场中一美元是一票，你有多少钱你就有多少选票。没钱就没有选票。市场在其本质上是偏向

^① Bello, *Dark Victory*, 3-4.

于有钱人的。

同样重要的是，市场对规模庞大的公司也很偏爱，这些公司比任何一个最富有的个人所支配的财富都要多。当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全球化的时候，治理的权力就日益从国家政府手中转移到跨国公司手中。这些公司的利益与更广泛的人类利益之间的差别日益拉大，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第三、第四部分论述。

即使是最贪婪、最残忍的人在金钱需求之外也还是有着其他需求和价值观的个体。我们需要呼吸空气、需要喝水、需要吃食物。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有家庭。我们几乎每个人都会从诸如自然风景或新生婴儿身上发现美的灵感。我们的身体是血肉之躯，真实的血液在我们的血管中流淌。

在精心构筑的公共形象以及健康而有道德感的众多雇员的背后，公司的主体是一个法律文件，即它的公司章程，而金钱是它的血液。公司在本质上是一个目标唯一的奇特实体：它再生产出钱来养育和复制自身。个体在公司中并非是必不可少的，公司只对一种事物，即对金融市场效忠，而这个金融市场甚至是比公司本身还要彻底的金钱的产物。

问题的深层根源存在于公司运转着的组织与规则之中。作为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公司的奇迹在于它能够将数十万人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组织之中，并强迫他们按照可能与自身本意相背的公司目标来行事。而那些反对者或者没有按要求做的人会被开除，被其他更加顺从的人取代。^①

正如华盛顿新闻记者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在《谁将告诉人民》（*Who Will Tell the People*）一书所写的

^① 有关公司自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请参阅 Jerry Mander, “Corporations as Machines,” chap. 7 in *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Books, 1991).

那样：

（公司的）……巨大财政资源，它们利益的多样化、天才专家团体——所有这些及其他的一些资源现在都在急切地关注着统治策略。这一新的制度现实是当前民主制度崩溃的关键之所在。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满足社会的集体需求。它们听命于等级制的管理层，而不是社会的集体需求。^①

人类社会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治理权是应该仅保留在富人手中还是应该让所有人分享？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同的而且甚至更不妙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它的含义已经为人们完全了解——那就是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中，应该把富人与穷人联合在一起吗？决策权是应该不管经济背景如何而让所有人来掌握呢，还是应该由那些作为非自然人的公司来掌握呢？

在这一关键性的历史时刻，人类在恢复生活的目标和协调方面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我们必须决定，统治权是掌握在活生生的人的手中，还是掌握在被不同章程驱使的公司实体手中。为了重新控制我们自己的未来，并在人类社会与地球之间形成平衡状态，我们必须收回那些我们已经交给人造实体（artificial entities）的权力。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要抛弃那种让公司不承担人类责任的意识形态幻觉及其政策。

^① William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331.

五、公司自由主义者的进攻

如果说经济学家有一个信条的话，那么可以肯定它包括这样一种信仰，即“我支持比较优势原则”和“我主张自由贸易”。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 保罗·克鲁格曼^①

现在的体制是由通用公司和爱克森公司等控制着的，它与美国历史早期的那种以土地私有的农场主和小企业主为基础的体制之间有着显著的差别——在普通人的现实生活经历方面——这种差别是非常之大的，甚至比私有官僚机构的美国体制与公共官僚机构的社会主义体制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加尔·阿尔佩罗维茨^②

在追求经济增长方面，全世界都近乎宗教狂热似的信奉着自由市场的思想。财富是其价值唯一的测量方式，自由市场思想的实行政策正在到处加深着社会和环境的解体。经济学专业是它的传道牧师。它拥护那种贬低人类精神的价值观。它假设存在着一个与现实相脱离的虚构世界。它是以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难解决为代价，重构了我们的治理制度。然而如果有人对它的原则进行质疑，那他就会被视为异端，会

^① “Is Free Trade Posse?” *Economic Perspectives* 1, no. 2 (1987): 131.

^② Gar Alperovitz, “Building a Living Democracy,” *Sojourners*, July 1990. 16.

引发绝大多数商业、政府和学术机构对他专业性的责难，给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损失。用澳大利亚社会学家米切尔·普塞（Michael Pusey）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已经把经济学缩小成为“一个抵御睿智的反思和公民责任的意识形态保护伞”^①。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研究中都渗透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成分。

贪欲的神圣化

任何一个精通当代经济学论文著作的人所用的措辞都与自由市场思想所拥护的信条很相似：

- 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应该由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衡量，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

- 自由市场如果不受政府的限制，那么它就总能使资源最有效、最理想地进行社会分配。

- 在消除世界各地的货币和商品流动的障碍之后，经济全球化得以实现，它激发了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创造了工作岗位、降低了消费品的价格，扩大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并最终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

- 私有化把财富和职能从政府部门转移到私有部门，它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价格，提高了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反馈的敏感度。

-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为推进贸易发展而提供必要的

^① Michael Pusey, “Reclaiming the Middle Ground... Froth New Right ‘Economic Rationalism,’” in Stephen King and Peter Lloyd (eds.), *Economic Rationalism: Dead End or Way Forward?* (New South Wales: Allen & Unwin, 1993), 18.

基础设施，维持公共秩序，保护财产权以及监督契约的实施。

上述这些信条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一系列明确的根本性假设基础之上推演出来的，这些假设包括：

- 人类是自私自利的，这种自我利益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利润的追求。
- 一种行为若能够给个人或公司带来最大程度的经济回报，那么它也会产生最大的人类福利。
- 对个人而言，竞争行为是比合作行为更为合理的选择，它将最终为社会创造出更大的福利。
- 经济产生的市场价值总和是衡量人类在福利方面的改善和进步的最佳手段。

如果用更激烈的言词来表达的话，这些思想原则是假定：

- 人性本贪。
- 所谓人类，其含义的最好表达就是有索取驱动力。
- 对欲望和需求的不断追求会导致社会产出的最大化。
- 通过对上述价值观的鼓励、尊重和奖赏，人类社会的利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

许多有关市场的远见卓识已经开始被揉进一种极端主义的意识之中。这种意识把人类的本性更基本的方面提升到一个不言自明的理想层次。虽然这种意识玷辱了最根本的人类价值和理想，但它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坚信不疑的各种价值观、制

度和流行文化之中。在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形成方面，这种普遍深入的思想意识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使大多数人的公共财富日益减少，造成了对大政府的广泛不信任，因为在创建平民主义的政治选举制度的议程方面，大政府所采取的行动最终很明显地导致了非平民主义的结果。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想的支持者宣称，不可逆转的历史性力量正在推进他们的事业发展，从而希望终结各种争论。他们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中，把资源分配的决定权交给大公司是必然的趋势。我们最好是去学习如何适应这一新的游戏规则。他们警告说那些止步不前、不愿参与其中的人将会被扫地出门；只有那些顺从的人才会获得回报。

他们立场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通过他们在两种经济模式中所进行的选择表现出来。这两种经济模式就是没有任何政府限制的、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模式和一个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的、国家控制的、国家做出一切经济决定的经济模式。他们不支持中间立场，譬如，那种在民主决策制度框架里运行的市场。

相类似地他们把整个世界分成两个群体：一种是在公众监视下消除了所有经济边界、让商品和货币顺利流通的“自由”商人；另一种是那些在其国家周围建立堡垒、断绝与别人的所有贸易和交换的保护主义者。在无视历史和逻辑推理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不承认有中间立场，譬如，不承认政府有可能通过建立恰当的规则从而保证跨境交易的公正性，并且可以平衡双方的共同利益。

在它各种各样的外表之下，这种思想意识有许多不同的名字——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或是自由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市场资本主义或市场自由主义。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米

切尔·普塞的著作《堪培拉的经济理性主义》(Economic Rationalism in Canberra)使经济理性主义一词流行起来,并备受公众的讨论。^①拉丁美洲一般使用的是新自由主义一词。然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思想并没有一个广泛认同的名称。没有名称,就是它没有被争议,暗含的假设也就是仍然没有得到检验的。

不过,对持这种思想观点的人更形象的标识是称其为公司自由主义者。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称呼自己,他们所鼓吹的“自由”市场、“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并不是自由贸易、自由市场或自由的人。实际上他们是在他们的利益底线之上,让跨国公司自由地规划和组织世界上的经济事务,而不用考虑给公众所带来的后果。

公司自由主义者联盟

主要由三种人共同组成了这个强有力的政治联盟,他们以一种类似于宗教改革运动的教条式狂热,来推进公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议程。

新古典经济学家 大多数主流的经济学家是与经济理性主义的新古典学派联系在一起的。理性主义被定义为“一种知识完全来自纯粹的推理,没有感性参与的原则”^②。这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原则,它所建构的经济模型直接从第一个原则中推导出来,没有考虑现实世界的情况。这种理性主义的承诺使经济学成为唯一一个真正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

^① Michael Pusey, *Economic Rationalism in Canberra: A Nation-Building State Changes Its Mind* (Sydn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s. v. "Rationalism".

使它的结论经常与常识和观察到的实际状况不相符。该专业的绝大部分人把两个基本原则作为他们根本的信仰。一个是个体完全受自身利益的驱动。另一个是个人的选择建立在对自身利益无限追求的基础之上，它将会导致整个社会产出的最大化。就是绝大多数没有接受过经济学高级培训的人看来，这两个原则都很明显是错误的。

主流经济学家也把公司与个人同等看待，假定公司自由的最大化与真正的个人自由最大化是一回事——这就忽视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公司章程是一个聚集大量权威、权力的工具，给公司的自由越多就意味着必然要减少绝大多数人的自由。通过这种伎俩的歪曲，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为公司自由主义披上“知识”（intellectual）合法性的外衣。作为回报，公司利益集团向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让他们成为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的群体。

财产权利的拥护者 财产权利的热心拥护者有些时候被称之为“市场自由主义者”，人们一般把他们描述成献身于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自由主义者。而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却是反抗各种强制性制度的入侵，以保护个人的自由。市场自由主义最关心的是保护财产权利，使之不用承担公共责任。这种高度精英主义式的思想观念实际上是想按照人们所拥有的财产比例来分配权利。罗杰·皮隆（Roger Pilon）是华盛顿特区公司自由主义者思想卡托（Cato）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根据他的观点，市场自由主义者相信“权利和财富是纠缠在一起，无法分离的……从广义上来理解……财富是我们所有自然权利的基础。运用这些权利，并且与其他人的权利不冲突，这样我们就可以以任何一种方式来追求幸福”。在运用这些权利的过程中，个人通过契约机制自愿地与其他人组成团体。在市场自由主义者眼中，与财产权利相关的唯一责任就是尊重其他人的同一权

利，遵守法律，严守合约。那些没有财产的人就没有市场自由主义要去尊重的权利。

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样，市场自由主义者在个人与公司之间没有做出区分。公司被假定有与个人一样的权利，可以任意使用其财产来满足自身的利益。市场自由主义者把它的道德合法性模式给予了公司自由主义。作为回应，公司利益集团对那些市场自由主义的主要支持者如卡托研究所，进行财政资助，让它们拥有政治影响力，这与他们给予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是一样的。

公司和公司阶层的成员 公司和公司阶层的成员——如公司经理、律师、顾问、公关专家、金融经纪人和财产的投资者——构成了公司自由主义联盟的第三个支柱。有些人走向公司自由主义纯粹是因为经济上的利益或者是为工资而这么做，其余则是因为信仰这种思想。尽管在公司阶层里几乎没有人与学术理论与道德哲学中的细枝末叶有什么重大的利益瓜葛，但他们却发现自己与这些人有着天然的事业，因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学术上的和伦理上的范例，可以使公司摆脱政府控制之手，使公司不用为自身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承担责任。此外，对于那些使他们的权力合法化的人，他们可以随意支配各种经济资源来慷慨地进行回报。

经济理论、道德哲学和精英人物的政治利益这三者相互结合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然而，在很多方面该联盟连向其成员提供的服务都很少，因为它的腐蚀性影响并没有对广大的社会封闭。这就使新古典经济学家将经济学的诚实性和它的社会效用大大地削弱了。这些经济学家们把经济学简单地看成一个灌输意识形态的系统，它破坏了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并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社会。自由主义者在从事其事业时也面临着相似的情境。公司侵犯了真正个体的财产权，它运用自身日益增加

的权力来遏制社会上所有个体的自由，当然最富有阶层是例外。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已经违背了他们自身对个人自由的承诺。该联盟在保护公司逃避公共责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功，制造出一个连公司阶层成员也无法控制的怪物，并且还在制造出一个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传给后代的世界。

现代的公司日益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就是与为其服务的成员也是分离的。正如许多高层管理人员心知肚明的那样，任何一个公司阶层成员无论他在公司里多么有权势，他都是可以被牺牲掉的。当公司获得独立的制度性权力并且越来越与人民和地方相分离时，人民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之间的差距就日益扩大。这种差距就像是外星人侵入地球一样，他们打算殖民这个星球，把我们赶回重做农奴，然后消灭掉那些他们不需要的人。

对斯密和李嘉图的背叛

公司自由主义者通常对亚当·斯密表示敬意，把他当作他们知识上的庇护神，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即使只是随意翻阅过其史诗般的巨著《国富论》的人都很清楚地知道，斯密是强烈反对公司自由主义者的绝大多数观点和政治立场的。例如，公司自由主义者强烈地反对对公司规模或权力的任何限制。相反，斯密是反对任何形式的经济集中化的，理由是它曲解了市场的天然能力，市场能够自主地确定一个价格，从而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提供一个相当公平的回报；市场能够产生一个买方与卖方都很满意的结果；市场能够最理想地分配社会资源。

通过贸易协定，公司自由主义者强迫政府为公司的知识产权提供绝对的保护。斯密强烈反对商业秘密，认为它与市场原

则是相违背的。^① 他将会强有力地反对政府执行个人或公司的请求，这些请求包括要求独占救生药物或设施，要求管理任何市场能够承担的事务，等等。

公司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市场能够将无限制的贪欲转变成最理想的社会产出。如果有人要把这种思想归功于斯密，他将会勃然大怒。因为他讨论的是那些小农场主和工匠为了自身和家人的生存而为其产品寻求一个最好的价钱。这是自利，而不是贪欲。贪欲是指一个收入很高的公司管理者解雇了1万名雇员，然后会因为自己为公司节省了这么多钱而奖励自己几百万美元。贪欲是公司自由主义者构建的经济系统所鼓励并给以回报的。

对于公司和政府，斯密都非常不喜欢。他认为，政府是一个通过征税来资助精英人物、通过干涉市场来帮助公司垄断的工具。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市民政府，尽管成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财产的安全，但实际上它成立的真正目的是保护富人对抗穷人，或者说是保护那些有某些财产的人反对那些什么财产都没有的人”^②。斯密并没有建议说，政府不应该为了保护公共利益或为了保护穷人和大自然免受富人的侵害，而插手建立和加强最低的社会、健康、工人安全和环境的标准。由于在他那个年代里政府主要是君主政体的，所以他可能还没有遇到这种问题。

与自由市场意识相比，市场经济理论为一个市场规定了许多基本的条件，使之能够确立一个有效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价格。这些条件满足得越少，市场系统的社会效率就变得越低。最基本原则的条件就是市场必须是竞争性的。我回想起我在上

^①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1776;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7), 60-61.

^②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674.

经济学基础这一课程时教授给我们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生产小麦的小农场主把麦子卖给小型的食品加工商，这是最为完美的市场竞争想法。今天，四个大公司——康家贸易公司（Conagra）、ADM 食品公司、嘉吉公司（Cargill）、贝氏堡公司（Pillsbury）——加工了美国境内 60% 的面粉，其中的两家——康家贸易公司、嘉吉公司——就控制了粮食出口量的 50%。^①

在现实世界中，如果市场中没有政府的调控机制，那么竞争的胜利者将会得到更大的经济份额。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运用得到的这种经济权力来排挤或收购弱者，从而控制更大份额的市场。在其他一些情况下，“竞争者们”通过卡特尔或战略性结盟联合在一起，它们把市场价格定在效率最理想的水平之上，从而使其收益大增。单个市场竞争者的联合程度越高、规模越大，新进入市场的竞争者和那些小型的独立公司生存的难度就越大，市场上的政治独裁性越高、竞争越少，最大的公司所能运用的政治权力就越大，这种政治权力是指能够要求政府做出让步，使他们能够把自身的成本转嫁给整个社会。

考虑到这种现实，可能有人希望自称继承了斯密传统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站出来说话，去要求限制合并和并购，打破公司的垄断恢复市场的竞争。但通常的情况是，这些经济学家们的主张正好相反——为了在当今的全球市场中“竞争”，公司必须合并进更大的联合体中。换句话说，他们的理论假定，小公司是支持那些对大公司有利的政策的。

市场理论也说明，对于一个资源高效配置的市场而言，每

^① A. V. Krebs, *The Corporate Reapers: The Book of Agribusiness* (Washington, D. C.: Essential Books, 1992) 和一张信息表, "American's New Centrally Planned' Food Economy," 由 A. V. Kerbs 准备并由 Prairie Fire Rural Action, Des Moines, Iowa 发行。

件产品的全部费用都必须出自生产者，必须囊括在销售价格之中。经济学家称之为费用内部化。把产品的某些费用外部化于非交易双方的第三者身上是一种公司补助的形式，它鼓励以其他人的损失为代价进行产品的过度生产和消费。譬如，当一个木材生产公司被准许可以以近乎白送的价格砍光政府土地上的树木时，它的木材生产成本就下降了，这样就会因此鼓励他们对本材的浪费使用，削弱了他们进行回收再利用的积极性。该公司从中获利了，消费者也买到了便宜货，但在没有征得公众同意的情况下，公众被迫要承担许多相关的费用，这包括水土流失、天然栖息地和娱乐场所的消失、全球变暖和未来的木材产量下降，等等。

当一家化工厂倾倒没有经过充分处理的废料时，其结果也是类似的。它会因此给社会带来空气、水、土壤污染的费用成本，其表现形式是健康费用、先天性残疾、身心紊乱、工作天数的减少、必须买瓶装水饮用和清除污染的费用。如果要求这些化工产品的使用者来支付生产和使用该产品的所有费用，那么我们环境中的化工污染就会大大减少，食物和水将会更加干净，癌症和先天性残疾的发生率将会下降，我们将会看到更多的青蛙。如果汽车生产和行驶的全部费用都加在消费者身上，那么我们将会从中受益，城市扩张、交通堵塞、占用良田修路、污染、全球变暖和有限的石油储备耗尽等现象将会大大缓解。

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它解释了为什么说成本内部化是市场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但是在市场的名义下，公司自由主义者正在积极地鼓吹要取消政府管理，指出要为消费者节省私人成本，而不顾给更广大的社会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实际上，公司自由主义者正在以国际竞争为名义，敦促国家和社会提高对市场扭曲的补助——包括资源赠送、低工资的劳动

力、宽松的环境政策和税收减免——从而吸引住流动公司（foot loose corporations）的工作岗位。一个没有法规管束的市场将会总是鼓励成本的外部化，因为随后的公共支出将成为私人的所得。最终，与维护市场原则相比，公司自由主义者似乎对提高公司的利润更感兴趣。

公司越大，市场越“自由”，公司就越有能力去强迫其他人承担其费用，并因此提高其收益。有些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偷窃。经济学家称其为“规模经济”。

生态经济学家纳凡·古德温（Neva Goodwin）是达夫斯（Tufts）大学全球发展和环境研究所的所长，他是成本内部化的倡导者，他坦言：“权力与成本外部化有很大的关联，如果你不能使用权力去将你的成本外部化——把成本转嫁给其他人，那么有权又有有什么用呢？”^①

公司自由主义者不停地向我们描述，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理论为基础的贸易交换有着各种好处。但他们没有提及的是，斯密他们的贸易理论所预测的利益好处的前提假设是，个人要直接参与地方或国家资产的管理。事实上，这个条件也是斯密在《国富论》里所做出的著名论断的基础，这个论断就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将会把对自我利益的追求转化成一种公共利益。应该注意到的是，在整本 1000 页的《国富论》中，斯密只在下述内容中提及了这只著名的无形之手：

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

^① Neva Goodwin, “Externalities and Economic Power,” 在 “Is It the Economy or the Politics-Stupid?” Enviromental Grantmakers 协会秋季会议上的发言。Bretton Woods, New Hampshire, October 13-15, 1994, 2.

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①

斯密假定部分企业家有在国内投资的天然偏好，因为他们可以对之进行严密的控制。当然这是远在飞机、电话、传真机和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事了。因为在本地投资可以为本地提供就业岗位，使用本地资源产生本地产品给本地人消费，企业家们的天生偏好可以增加本地经济的活力。因为企业和企业的所有者都是本地的，所以他们更愿意遵守本地的标准。即使是完全站在公司的逻辑基础上，斯密也是反对公司所有权的缺失的：

不过，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而私人合伙公司的伙员，则纯是为自己打算。所以，要想股份公司董事们监视钱财用途，像私人合伙公司伙员那样用意周到，那是很难做到的。有如富家管事一样，他们往往设想，善意小节，殊非主人的光荣，一切小的计算，因此就抛之不顾了。这样，疏忽和浪费，常为股份业务经营上多少难免的弊端。^②

斯密相信，有效的市场是由所有者经营的小规模企业构成

① 见邓大力、王亚南译，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译者注。

② 见邓大力、王亚南译，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册，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译者注。

的，这些企业位于所有者居住的社区之内。这样，企业主与社区通常就会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与企业和社区的未来利益攸关。在一个全球化的公司经济中，游资在国家之间迅速流动，社会的财富被信托给那些对任何社会和国家都缺乏忠诚性的大公司，经营管理权通过一层层的投资机构和控股公司从公司的真正所有者那里剥离出去。

当我们看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时，我们会发现类似的相左之处。比较优势是公司自由主义者经常诉诸的证据，他们用这一理论来证明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会推进公共产品发展。这一理论最初是由李嘉图在 1817 年明确地加以阐明的，它严密地论证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两国之间的贸易对两国的人民均有利。在其他条件中，有三个条件对这种结果的产生极其重要：不允许资本跨越边界从一个高工资的国家流向一个低工资的国家；相互贸易的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必须保持平衡；每个国家都是充分就业的。

当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之后，每个国家的投资都将会向那些由于天赋的不同而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活动集中化。如李嘉图所举的例子，由于气候不同，在葡萄牙制造葡萄酒、在英格兰制造毛纺织品的效率就要高些。在双边进行公开贸易的情况下，倒霉的英格兰酒商如果发现自己无力与进口的葡萄牙酒进行竞争，那么他会暗地里把自己的葡萄种植园转用来做放养绵羊的牧场。他会用酿酒厂里原来的工人来经营毛纺织品加工厂。

在李嘉图时代，绝大部分进行交易的国内制成商品是由国内的厂商生产的。如今，商品一般是由在不同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而成的。是跨国公司而不是国内经济成为产品的调剂单位。其结果就是 1990 年全球 33000 亿美元的国际商

品和服务贸易总额中有近 1/3 是在单个公司的内部进行交易的。^① 比重越来越大的国际贸易是企业内部性质的，这意味着国家之间正在交换着相同的商品——如美国和日本之间就相互卖汽车给对方——这使我们对其中涉及的天然比较优势进行讨论就比较困难，使得在随后估计费用和收益时用不到这一贸易理论。

在追求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公司自由主义者积极倡议要消除对工厂跨境转移的限制。提倡货币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把贸易平衡贬低为是与此毫不相干的，视失业为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的阀门——在上述每种情况中，虽然上面所说的贸易理论是他们用来支持他们事业的依据，但他们都对这一贸易理论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熟视无睹。实际上，公司自由主义者所提倡的“贸易协定”不是关于贸易的；而是关于经济联合的。如果在其他方面都相互独立的话，那么比较优势理论是可以用来平衡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的，但是当国家经济之间结合在一起时，运用的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水平下降理论。

当资本只能在贸易伙伴国的范围内流动时，它一定会流动到其母国中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去。当经济结合在一起后，资本会流向任何能够给它的成本外部化提供最大机会的地方，这种成本外部化是通过现金补助、关税减免、低标准的报酬和劳动条件和宽松的环境标准等方式来实现的。收入因而从工人手中转移到了投资者的手中，成本从投资者那里转嫁到社

^① United Nations Centre for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UNCTC), E/C. I/O/1993/2, March 3, 1993, 8; as reported by John Cavanagh in a May 1, 1993, memo.

会上。^① 公司自由主义者似乎有一个共同的习惯，那就是他们有一套理论只应用于那种他们想要拆除的世界中，他们就运用这套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经济学家纳凡·古德温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通过缩小他们的领域边界的方式将绝大多数政治和制度现实排除在外，然后将这种受到歪曲的、滥用的经济理论引进来。她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特征就是从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中减去卡尔·马克思的政治和制度分析的内容：

亚当·斯密的经典政治经济学是比今天在大学里讲授的经济学范围更广、更人性化的学科……在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谈论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经济权力都完全是禁地；因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相似地，阶级的概念也是不允许加以讨论的。^②

斯密既敏锐地意识到权力和阶级问题，也意识到竞争性市场的动力机制。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把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全面观点分成两半：一派拿着有利于财产所有者的那些部分，另一派拿着有利于劳动力的卖方的那些分析内容。两者都大规模地推行了极端主义的社会实验，但都只体现了社会中的一部分景象（vision），而且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① 此部分讨论由 Herman E. Daly 和 John B. Cobb Jr. 详细论及，参见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209-235.

^② Goodwin, "Externalities and Economic Power", 2.

经济学的煽动者

1994年12月1日晚，美国参议院在该届任期即将结束的一次会议上以76票对24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关贸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回合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成立了世界贸易组织。熟悉该协定以及了解它对工作、环境和民主威胁的人，其反对的声音日益高涨和普遍，但为了回报为它们提供财政支持的公司赞助者，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组成广泛的联盟，支持通过了否决这些反对声音的措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副总统阿尔伯特·戈尔（Al Gore）对该协定提供了立场鲜明的强力支持，这使得他们与劳动力及环境保护者这些支持他们的主要选民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

C-SPAN是一个有线电视新闻频道，它在投票之后立即举行了一个电话会议。《商业周刊》的贸易编辑道格·哈伯瑞奇特（Doug Harbrecht）是在线嘉宾。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打电话进来表达他们对那些政客们的愤怒，这些政客投票支持了这个有利于富人的利益而不顾公共意愿的协定。哈伯瑞奇特评论说，这个新的关贸总协定从经济学上看是完美无缺的，但在政治学上却是极其糟糕的。哈伯瑞奇特和他的许多同事一样，把自由市场思想与理想的经济学混为一谈了。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所推进的全球经济联合与市场经济的绝大多数基本原则是相违背的，它产生了一个自我毁灭式的经济系统，并以人类社会的巨大成本为代价。这完全不能被视为是在实施“完美无缺”的经济学。

如果经济联合所要求的条件与有效的市场活动所需的条件相矛盾的话，那么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又将怎样来提倡经济联合呢？答案的一个重要部分就在于他们有着传奇般的远离现实的假设能力。在一个真假难辨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能力的

流传，这是一个关于3个科学家——一个物理学家、一个化学家和一个经济学家——在一个荒岛上被困的故事。他们在船的残骸中打捞出一罐豆子，但不幸的是，他们没有办法把它打开。他们一致认为凭他们3个人这么高的科学智慧，他们一定能完成这么简单的任务。物理学家指着附近的一颗棕榈树说，她准备爬上这棵树，把罐头扔下来，正好扔在石头的角上把它砸开。化学家指出，这样的话豆子会洒了一地，他建议使用盐水来产生一种化学反应，氧化掉罐头的顶部。这时经济学家说话了，“你们俩都把简单的问题搞得太复杂了。首先，我们要假定有一个开罐头的起子”。就像这个经济学家那样，当现实世界与支持他们偏爱的政策选择所需的条件不相符时，经济理性主义者更愿意假定现实世界支持他们的建议，从而解决了两者间的冲突。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就是，人类的经济是植根于并依赖于自然环境的。我们回到1798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指出，环境的限制将使人口增长成为未来人类社会的一大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家通过采用一种分析式的模型来应对这种不利条件。该模型假定经济是由家庭与公司之间的循环流动所构成的，这种循环运动是孤立的、自足的，在内部进行着价值(劳动力、资本和商品)的交换，它与环境没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通过建立一种模型假定环境根本不存在，从而回避了环境的限制这一问题。然后，他们从这一模型中得出结论说，经济并不依赖于环境，对于质疑一个有限的星球是否有无限增长的可能性的人，他们用带讽刺意味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这一称呼来打发。

相信可以实现无限增长正是公司自由主义思想学说的基础。因为接受物质有限这一现实就等于是认为必须限制贪欲和索求，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公平和丰裕。那将要求对经济优先这

一重心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由关注增长改为关注公平。

新古典经济学家喜欢通过选择他们的假设来迎合他们的结论，这一倾向在计算机模拟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他们使用这种模拟来证明降低贸易壁垒能够带来经济收益。在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公众讨论中，该协定的支持者积极利用计算机模拟所得出的结果，该模拟就是有名的一般均衡模式（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他们用这一结果来证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将为所有的成员国：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带来大量的新工作岗位。^①

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坦福（James Stanford）对用来构成这些模型的假设进行了检验。他发现从古典贸易理论中得出的所有假设都与现实的经济状况完全不符。为了说明这种相互矛盾之处，他对下面一个假设进行了讨论，这个讨论是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汽车工人和一个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模型设计者之间展开的。这名工人向该模型的建构者提出了他的担忧：

如果北美自由贸易组织被批准成立了，那么福特公司肯定会把它的“金牛座系列”轿车（Taurus）制造工厂迁到墨西哥去，因为在那里它可以用我的工资的1/10去雇用一个没有独立工会的工人，然后把汽车通过进口运回美国。由于国内在本领域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已经萎缩，所以我看不到自己有什么希望能找到一个与现在收入相当的工作。

这位经济模型的设计者似乎对此很吃惊，他安慰这位工人

^① James Stanford, "Continental Economic Integration: Modelling the Impact on Labo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 Social Science* 526 (March 1993): 92-110.

说，他是贸易问题方面的专家，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

不要担心，我已经建构了一个计算机模拟，它显示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将给美国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所以你将从这个贸易协定中获得真正的收益。它是这样运作的。在我的模型中，假定资本是“不流动”的。因此，福特公司无法把它的工厂迁到墨西哥。它也不愿意迁出工厂，因为我假定美国和墨西哥这两个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是相同的，在我的模型中“美国人是对本国的产品有明显的偏好的，即使它价格贵些也是这样”。

我的模型同样也假定美国是“充分就业”的，规定任何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都能够被美国出口的商品所均衡，所以新的出口行业将会在这里产生，从而代替了任何被墨西哥进口所排挤的产业。因为你在福特公司的收入处于中等水平之上，所以很明显你是一个颇有价值的技术工人。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你当然将就能很快在这些新兴的出口行业中找到工作，而且工资可能比你目前的还要高呢。所以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对你而言是个好消息。

如果一个工人面对着这样的解释，他肯定会断定，这个经济模型是从一个遥远的星球刚来到地球，对地球上的事情一无所知。尽管这个讨论是假设的，但这位经济学家所说的这些假设却不是虚构的。这些假设中的每一个都被纳入一个或多个经济模型之中，贸易专家就使用这种模型来证明美国将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中得到就业岗位。在比较这些模型和它产生的结果之后，斯坦福发现，在不现实的假设与令人满意的工作职位设计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假设的现实性越少，设计的结果就越乐观。模型越贴近现实，它的预测至少会给合作的一方带

来或者消极或者微不足道的经济后果。^①

把这些模型与事例强行放在一起的人并没有提及这些暗含的假设。这些错误的表述是非常丑恶和顽固的，以致人们开始怀疑它是否是故意在误导公众。譬如，在关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讨论中，支持新自由贸易观的《纽约时报》无耻地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做法，它把一本贸易经济学方面的入门书放在了它的首页。这本书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a textbook explanation），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支持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合法性方面处于主导性的地位。然而这本书没有提到比较优势理论所暗含的假设，更没有提及这些假设与现实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我和其他一些人在寄给《纽约时报》编辑的信中指出了这一遗漏，但却没有被刊登出来。

参与这种歪曲行动的人为有缺陷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合法性，而这些经济政策将使我们中间最贪婪的人比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更具优势。

不公正的道德辩护

市场自由主义的道德哲学家们也进行了类似的歪曲，他们忽略了财产权和公民权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他们是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与市场的自由与财产权利之间画上了等号。市场的自由就是那些有钱人的自由。当权利是一种财产而不是人的一项职能时，只有那些有财产的人才拥有权利。

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每个人在法律面前权利平等，在政治事务中有相同的发言权——一人一票。只有在金钱和财产公平分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公正地把市场看作是权利和偏见

^① James Stanford, "Free Trade and the Imaginary Worlds of Economic Modelers," *PCD Forum Column* no. 45, April 5, 1993.

的仲裁人。尽管市场能够在不完全公平的情况下进行高效率的分配，但 358 名亿万富翁享受着净价值总计达 7600 亿美元的财产——等于世界上最穷的 25 亿人的所有净财产之和——市场既是不公平的，效率也是不高的，作为一种民主制度，它已经丧失了所有存在的合法性。^①

《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华尔街日报》和《经济学家》等这类出版物——他们都是公司自由主义的热情讴歌者——很少称赞那种通过自身来发展经济，从而消除贫困或扩大公平程度的行为。相反，它们经常评价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们创造出来的经济实绩，评价那些无情地解雇了数以千计的雇员的经理们的能力，评价那些一年挣得多少百万美元的成功者，评价那些权力遍及全球并有能力主宰全球市场的成功公司。

举一个例子，1993 年 7 月 5 日《福布斯》杂志的封面故事就在鼓吹，认为自由市场在“满足世界上最新的亿万富翁”的旗帜下取得了突出成就：

随着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国家主义经济幻想的日益破灭，私人的、个人的创造力得以释放，并被用来改善自己的命运。财富很自然地就随之而来了。近十年以来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成为自由企业的两个巨大源头。因此，在我们的排行榜中最大的新增亿万富翁群体即酝酿产生于这两个地区，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两年之内拉丁美洲就新增了 11 名亿万富翁，华人中新增的人数比拉丁美洲还要

^① 数据来自 Richard J. Barnet, “Stateless Corporations: Lord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 Nation*, December 19, 1994, 754.

多7个。^①

《商业周刊》的观点更加平民主义化，它在1993年11月29日出的这一期杂志中刊登了一个题为“一分钟一个百万富翁”的特别报道。其中有一些报道是关于自由市场在亚洲实现的情况的：

对绝大多数上一代的亚洲人来说，财富意味着移民到美国——或者是卖自然资源给日本。但现在，东亚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创造着自己的财富。据估计到1996年，除日本之外，财富在数百万以上的亚洲人的数量将会翻一番，达到80万人……十年之内东亚各国的购买力将会超过日本。由于每年新增5500亿美元的储蓄，亚洲将会成为全球流动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在亚洲”，暹罗商业银行的执行总裁欧兰·查普瓦特（Olarn Chaipravat）说，“到处都是钱。”……从奔驰轿车、摩托罗拉手机到富达互惠基金（Fidelity Mutual Funds），任何公司都可以在亚洲找到新的市场……要找到最近的相似例子，你必须把美国历史倒回一百年，那时美国还没有强大的工会、没有社会保障和反托拉斯法。^②

这样的故事并不是仅仅在赞美追求贪欲的行为，它们也正在错误地把它提升到虔诚的使命这一高度。不要忘记，尽管一部分亚洲人已经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很少的一部分亚洲人已经

① “Meet the World’s Newest Billionaires,” *Forbes*, July 5, 1993, 87.

② “A Millionaire a Minute,” *Business Week*, November 29, 1993, 100-102.

进入过度消费阶层，但仍有 6.75 亿的亚洲人正处于贫困状态之中，他们的悲惨生活境况并没有得到缓解。《商业周刊》在其 1994 年的特刊《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中证实，市场经济其实是一个阶级问题，公司自由主义者很清楚自己正在为哪个阶级的利益服务：

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剧痛很清楚地表明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让绝大多数国家只有一种选择——加入……市场经济行列……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将近 150 年之后，极权主义兴起半个多世纪之后，资产阶级赢得了胜利。^①

看上去公司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如何帮助富人们挣钱，而不是满足人类的需求。即使是新古典经济学常被引用的“价值中立的客观性”的主张也是支持上述这种偏向的，因为“价值中立”是建立在一个仍有疑问的假设基础之上的，这个假设就是一个决定。如果它仅仅是建立在经济回报基础之上的，那么它就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应该提醒的是，这样的计算几乎总是对那些有钱人有利，他们所得的回报是以穷人的代价为基础来计算的。这种情景在莱温斯·斯美尔斯（Lawrence Summers）（克林顿政府最后的一任美国财政部长）的工作回忆录中被极其罕见地明确显示出来，这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记载了他在做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的情况。斯美尔斯认为，从经济上看，富国在穷国国内处理他们的有毒废料是最有效的手段，因为与富人相比，穷人的生命周期相对而言要短些，挣

^① “21st Century Capitalism,” *Business Week*, 1994 特刊, 13&16.

钱的潜能也要低些。^①《经济学家》杂志随后对斯美尔斯的回忆录进行了评论，它说富裕的国家有道德责任把污染物出口给贫穷国家，因为这将给贫穷国家的人们提供经济机会，若不这样的话他们什么机会都没有。^②

在一个更加歪曲的道德逻辑下，公司自由主义者也认为，富人具有道德义务去多多地消费。在国际事务中这种观念就被理解为呼吁富国要增加对穷国所出口商品的消费量——对于占用众多全球资源去帮助最没有需求的人去进行更多消费，这是一个合理的理由。^③但有一种可能性没有被考虑到，那就是低收入国家的人们可以利用自己丰富的资源去生产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如果公司自由主义者严格地坚守市场原则和人类权利，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出台政策来提供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市场能够为了公众的利益而以一种民主化的模式运转。他们就应该要求结束公司的福利，打破公司的垄断，对财产所有权进行公平的分配，把社会和环境成本国际化，实行地方性的所有制，为劳动人民提供一个生存所需的工资，提供固定不变的资本和一个先进的税收系统。对于市场理论所主张的公共利益最大化所需的条件，公司自由主义并不能提供，因为它真正关心

① Lawrence Summers,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备忘录(内部), 5. 相关备忘录摘录自 *The Economist*, February 8, 1992, 62. Summers, 是经济激进主义者, 对于公众的广泛谴责他则表示自己的言论只不过是在该声名狼藉的备忘录中插入的讽刺插曲, 而并不是真正的决议。

② “Pollution and the Poor,” *The Economist*, February 15, 1992, 16-17.

③ 号召有钱国家消费由贫穷国家进口的产品一向是世界银行发展报告里面的内容。例见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3.

的是私人的利益，而不是公众的利益。

数以百万计的思想深邃而又卓智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大政府，相信诚实和努力工作，有着深深的宗教价值观。他们正在全力以赴帮助一些家庭和社区，因为后者被公司控制的大众传媒不断重复的错误信息和歪曲的知识与道德逻辑所蒙蔽。他们正在争取开启一个与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完全相反的政治议程。在主流的公司、学术机构、政治领域和政府机构中工作的人们发现，他们的文化和报酬系统与公司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他们不敢说出相反意见，因为他们害怕这将危及他们的工作和事业。由于公司给予我们的幻觉和误导正在让我们处于一个自我毁灭的文化幻境之中，因此我们必须掀起它们的面纱，开始经济体制的重建工作，为人类和整个地球服务。

六、民主多元主义力量的下降

在一个全新的经济思想背景下，一种文明由于无法重新证明自身的合法性而处于自我毁灭的境地，任何看到这一毁灭过程的人都会感到莫名的震惊。

——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①

(Sir James Goldsmith)

从结果角度来看，人们很容易就会发现私有化的核心既不是经济效率，也不是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水平，而只

^① “Free Trade, up to a Point,” *Times* (London), March 5, 1994, 18.

是很简单地把财富从公众的口袋里——它本能够将财富进行再分配，减少社会不平等程度——转移到私人的手中。

——苏珊·乔治^①

公司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们对1989年苏联的解体欢呼雀跃，把它视为是自由市场的一大胜利，视之为一个推进他们事业的指令。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人类解放的漫长之路正走向它最终的终结点：一个普同的、全球消费的社会。他把这称之为历史的终结。^②

西方的政府和公司很快就敦促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开放他们的边界，私有化他们的经济，并接受西方成功的经验。西方的专家队伍开始帮助上述和其他一些“转型国家”制定法律，为西方公司进入这些国家做好准备。

与此同时，西方工业化国家借助关贸总协定（GATT）加大了它建立全球统一的经济体系的努力，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世界贸易组织（WTO），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欧洲共同市场（Maastricht^③）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形式建立地区性的市场。由于急于取悦强大的公司利益集团，但同时又缺乏其他切实可行的思想，因此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把经济全球化既作为他的工作计划，又作为他的外交政策。

苏东体系的社会主义悲惨地失败了。然而，把西方的经济和政治胜利归功于被解放出来的市场，或者把苏联（USSR）

① Susan George, Conference on Economic Sovereignty in a Globalising World, Bangkok, 24-26 March 1999, www.millennium-round.Org/.

②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Avon Books, 1992).

③ 马斯特里希特：荷兰东南端一城市，靠近比利时边界。——译者注。

解体的原因归咎于激进的国家 (activist state), 都是不太准确的说法。与公司自由主义者那种夸张的观点相反, 西方国家并没有在后“二战”时代借助那些拒斥市场的国家而达到繁荣。相反, 它通过拒斥支持民主多元主义的左派和右派的极端主义思想而达到繁荣的状态: 这就是在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力量之间形成一个实用的、制度均衡的治理体系。

由于经济萧条和战争的迫切需要,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出现了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进行合作的局面, 他们在一个比内战以来任何时期都要更健康、更具活力、更富创造性的平衡状态中工作着。收入的相对平均分配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工业的积极扩张。美国当然是与苏东社会迥然不同的, 但是两者都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我们可以更准确地称它们是多元主义。美国随时准备应对苏联的挑战, 最后它成为冷战的胜利者。导致胜利的原因不是美国的“自由”市场而是美国的民主多元主义和平等的现实。

尽管具体细节不同, 但西方民主国家都盛行相似的民主多元主义模式。有些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倾向于偏爱公有制和国有化工业的管理模式, 但它们都是处于一个多元主义框架之内, 在这个框架内市场和政府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相比较而言, 苏联所提出的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太过于倾向国家主义了, 它完全拒斥市场和私有财产权。这种意识形态排除了市民的基本公共监督角色地位。仅仅剩下一个霸权的、不负责任的国家。由于缺乏多元主义的平衡机制以及由市民及市场承担的责任, 苏联的经济既对公众的需求反应不敏感, 在资源使用上效率又很低下。苏联人民后来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是一个激进的国家所带来的, 而是除国家之外拒斥一切这样一种极端主义思想所带来的后果。

西方国家正走在一条相似的极端主义思想的道路之上: 不

同之处是我们是那些独立的、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俘虏，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不负责任的国家的俘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司自由主义者越是把我们拖向他们思想中理想化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对人民和这个星球的真正需求就越不敏感。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失败的原因其实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失败的原因是一样的：

- 两者都导致经济权力集中在不负责任的中央集权制度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经济中该制度是国家，在资本主义中是超国家的公司。

- 两者都在发展经济的名义下产生了一个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经济体系。

- 两者都依赖于无能的巨型制度，这种制度腐蚀了政府、市场和社会高效运行所需要的社会资本。

- 两者都用一种狭隘的经济学眼光来看待人类的需求，这样它们就很少有这样一种意识，即与地球和生活社区保持着一种精神联系，而这对于维护社会的道德结构是极其重要的。

只有在社会拥有一种可以抵御国家与市场权力的日益集中和滥用，抵抗自然、社会和道德资本的腐蚀的机制下，经济系统才能够生存下去。民主多元主义不是根除治理问题的万能药，但在我们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它是我们所能够找到的最佳选择方案。

维护市场的竞争性

尽管公司经常抱怨政府对它的事务干涉太多，但绝大多数要求市场自由化的人都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现实：市场经济的高

效运转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种需要在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在实践中也得到了验证。哈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不遗余力地对公司自由主义的“为了共同的利益”这一观点进行了批评，他们列出了市场高效运转所依赖的但却无法自己提供的一些条件。^①

公平竞争 就其本性而言，竞争必然会产生赢家和输家。胜利的一方随着自身的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失败者将会消失。胜利者的规模越庞大，新来者立足就越困难，市场就会变得越垄断。即使是孩子在家玩“大富翁”游戏时，垄断也在起着作用。随着游戏的进展，处于垄断地位的玩家获得了以此互借得到租金的财产。游戏中那些早先得到财产的人将会最终使不幸的玩家破产。当所有的玩家都破产了只剩下一个人时，游戏就正式结束。精明的玩家知道，如果谁来迟了，并在其他人已经得到最初的财产之后才加入游戏，那他是没有机会去赢得胜利的。当一个玩家已经得到可观的财产时，绝大部分玩家都会退出不玩了，因为几乎不可能会有一个聪明的或幸运的后加入的玩家能够出奇制胜。利益会被一直保留到财富重新进行分配，到一个新的游戏开始之时。

真实世界中的垄断与这个游戏非常相似，除非更大的玩家有其他的优势，他能够运用自己的财力去影响立法者，使立法者改写游戏规则，给他们更多的优势。一般而言，结果必然就是走向垄断，只有通过政府行动，由政治上觉醒的市民意识来支持，有规律地打破经济权力的集中，才能限制这样的垄断。

道德资本 尽管市场理论假定个人是自利的，现实世界的

^① 以下观点引自 Herman E. Daly 和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49-60.

市场也经常奖赏那些贪婪的、不诚实的和不道德的行为，但一个高效率的市场日复一日的互动所依赖的是信任。在一个市场中，如果其中的竞争参与者完全是受贪欲以及不择手段地获得短期竞争优势的渴求来驱动的话——这个市场里没有信任、同情和个人的诚信——那么这个市场就不仅仅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生意场了。它也将变得效率极其低下，需要过多的成本来请律师、雇保镖和买其他的安全防卫设施。没有一个道德基础，社会和市场经济都无法高效运转。

公共物品 对公共物品而言，向它提供大量的投资和服务是极其重要的——例如在基础科学研究、公共安全和司法、公共教育、道路建设和国防等方面的投资——这些公共物品是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因为这些物品一旦生产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免费地利用它们。连绝大多数的公司自由主义者都承认，政府在提供这些物品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实际的实施工作可以由私人承包单位来做，但费用却是由政府的税收来支付。

按全部费用定价 当卖方和买方承担了全部产品的生产、购买和消费成本时，市场才能对资源进行最优的配置。在一个没有规则约束的市场里，全部成本内部化的情况如果说有的话，那也是极少数的例外，因为竞争的压力使竞争的一方必须——有可能就随时将成本外部化，一个成功地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外部化的生产者将会获得更多的利润，吸引更多的投资并因此能够提供更低的商品价格，从而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一个公司若发现减少废物的产生和给工人一个相当公平的工资能够给自身带来内在的经济利益，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实际情况是，在市场操作的过程中，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东西能够保证公司在没有政府干预时，会将自身的社会与环境成本内部化。

公平分配 在市场体系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倾向，那就是资本所有者的财富和收入趋于上升，而出卖劳动力的人的收入却

停滞不前或者是趋于下降，这种情景在经济扩张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一个经济权力分配不公的市场里，市场会将资源用于为有钱人生产奢侈品，而剥夺了没钱的人所需的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也是社会效率低下的。市场的效率和制度的合法性是靠政府的干预来维持的，因为政府在不断地恢复被市场力量无情地破坏公平。

生态的可持续性 当人类经济占据了所有的生态空间时，为了物种的生存，我们必须限制经济亚系统的规模，使之与自然界保持平衡。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必须控制在自然环境吸纳水平之下，渔业产量必须控制在可持续捕捞的限度内。不幸的是，没有规则约束的市场对这样的限制视而不见。政府必须划定界限并向市场传递恰当的相关信号。就是人们提出的环境问题的“市场解决方法”，如交易性的污染许可制度，也要依靠政府来建立标准、颁发许可证和监督执行状况。

只有当政府和市民社会有权采取行动来维护上述六个高效率市场必备的条件时，市场才能带来社会最优化的结果。一个脱离政府约束的市场在其本质上是不可能持续地发展的，因为它破坏了自身发展所需的制度、社会和环境的基础。

全球化的腐蚀性影响

市场机制对现代社会是很重要的。然而由于市场要供应公共物品，所以公司必须承认和接受政府与市民社会在市场中的角色，即使这样做会减少公司的利润、限制公司行动的自由和使某些消费品的价格上涨但也必须接受，因为政府与市民社会提供了在经济和社会两方面高效率的市場所需要的条件。公司回报给社会的包括能够提供一个得以谋生的工资、保护工人与社会健康以及安全的良好工作条件，一个洁净的环境，经济上的稳定性，工作保障和强有力而且安全的家庭与社区。

就像公司存在效率低下的情况一样，政府也存在着效率低下的情况。对纳税人和公司而言，减少他们因为效率低下而带来的成本都是很有必要的。确保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不会影响中等收入者满足自身基本需求的能力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即使是政府插手公共利益使我们本不需要的消费品成本更高，使公司的超额利润下降，使公司享受的自由比人类少，我们也“不应该”对此表示忧虑。

为了扮演好与市场相关的一些重要角色，政府必须对其境内的经济享有管辖权。它必须能够为国内经济创立规则，而且不用向外国政府和公司证明自己的这些规则不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障碍。政府必须能够估计税收状况，并对公司在自身职权范围内管理的那些事务进行调节，而且不会屈从于公司的威胁，这些威胁包括因为利润下降而控告政府、对关键性核技术进行保密和将工作岗位移至外国的工厂等。为了维持这种管辖权，经济边界必须与政治边界保持一致。如果不这样的话，政府将会变得很无能，民主制就只剩下一个空壳。当经济是全球化而政治是国家化的时候，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就超出了公共责任的控制范围，政府对不恰当的经济影响（的抵抗力）更加脆弱，公民权就缩减了，它就成为消费者可以在公司所提供的自认为最能盈利的商品中进行选择。

国内经济偏爱地方性的公司——这些公司能够以外国生产者和流动投资者无法提供的方式为社区服务——这种经济并不一定要排斥进口商品和外部的投资者。只要社区发现这些外来者能够带来好处，它们就肯定都是很受欢迎的。但是人们既有权利也有必要通过规则来控制自身的经济生活，这些规则都是他们自己的企业、他们自己民主选举的政府为他们创建的。如果他们希望经济的发展范围被限制在国内，从而为地方性投资提供便利，从道义上说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在后“二战”

时代，西方国家的经济繁荣就曾受益于这种策略，其结果就是使国内广大人民普遍从经济发展成果中受益。

瑞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研究案例，通过它我们可以发现，在20世纪中叶民主多元主义能够实现的目标是什么，发现最终导致它失败的机制何在，这些机制都是由小公司和金融精英支持的。

瑞典的案例

瑞典在西方国家里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成功地在—一个强大的民主多元主义框架下糅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元素，从而赢得了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公平。瑞典的经验为我们观察多元主义的运行机制以及全球化的后果提供了一个具有启迪性的视角。

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瑞典的工业化时间要比英国晚一百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瑞典还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国家。在农村，许多人还是以农耕为生，由于土地贫瘠、气候恶劣，他们的生活很贫穷。一部分人死于饥荒或者是移民国外。更多的人甚至到了本世纪仍过着为大地产所有者劳作的农奴似的生活。人们普遍不认识字。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仍然很普遍的一种现象就是：一个家庭住在一个只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厨房（与其他家庭共用一个卫生间）的公寓里。甚至就连瑞典王室的住宅与他的大多数欧洲亲戚们相比也要差好多。^①

瑞典在现代所取得的成功是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杰作，该党铸成并维持了国内的团结局面，并在1932年到1976年长

^① 源自 Marilyn Mehimann 的个人观点，Swedish Institute for Social Inventions, March 3, 1994.

达44年内执掌着政权。^① 社会民主党人在瑞典建立了完美的社会福利制度。它们实行的工资政策使工人们进入中产阶级并使工资的公平程度达到很高水平——包括男女工资也更加公平——比西方其他国家都要公平。^② 社会民主党人优先考虑的是确保充分就业。为了鼓励瑞典的跨国公司如富豪（Volvo）公司、伊莱克斯（Electrolux）公司、萨伯（Saab）公司、爱立信（Ericsson）公司把它们的业务集中在国内，政府建立了一个现实可行的税收制度，对国内创造的利润征收的税率大大低于在国外创造的。^③

在瑞典，主要的工业公司和组织化的劳动力之间形成了一个联盟，它是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基础，它们支持由国家工会和雇用组织之间对工人工资和劳动条件进行集中的、和平的协商。这种联盟给劳动力群体和大资本所有者都带来了重要的好处。

然而，这种制度安排却存在着最终导致本身不稳定的结构性缺陷。其中之一就是这个税收制度是以牺牲小企业和家庭企业为代价来资助正在膨胀和投资的大企业的。尽管工资政策强化了劳工阶级内部的平等，但劳工阶级和资本拥有者之间的差距却大大拉开了。而且这种差距被视为是为了保证企业家维护联盟状态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最终，它所导致的必将是联盟的瓦解。^④

1973—1974年间，第一波的石油价格上涨局面出现，随之而来的经济下滑带来了财政危机，引发了人们对高税收制度

① Kenneth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What Happened to the Swedish Model?" *Monthly Review*, March 1993, 14-24.

② David Vail,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A Reply to Kenneth Hermele," *Monthly Review*, October 1993, 24-31.

③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④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的普遍抵制。就在这同一时期，瑞典打开了其经济疆界，开始在国际经济中扮演一个越来越积极的角色。这就给束缚于地方性劳动力上的资本松了绑，弱化了国内的劳工运动。

在全球化的早期阶段，瑞典公司的向外扩张为国内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联盟双方的目标并没有太多的冲突之处。但是一旦瑞典的跨国公司从全球角度而不是国家角度来界定其利益时，蓝领工人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联盟就开始瓦解了。此时，瑞典受过高等教育的白领工人的人数超过了蓝领工人，年轻的一代认为福利国家是其理所当然要享受的，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瑞典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基础。^①

政府支持瑞典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这就与国内需要新的工作岗位和工资增长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到了一个无法承受的程度。1976年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败给了一个由三党联合执政的集权式政府。

当1982年社会民主党人重掌政权时，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经过改组的政党了，它力图使瑞典企业家在国内投资中获得足够的盈利，从而让他们保持“对瑞典的信心”。这个词是富豪公司总裁格伦哈姆（P. G. Gyllenhammar）发明的。保持对瑞典的信心就意味着相对于工资而言，要把国民生产总值中更大的份额作为公司的利润，以使瑞典的企业家们觉得在国内投资是值得的。当欧洲其他地方的失业率上升到8%~9%，甚至更高时，这种选择被视为保持充分就业必须付出的代价，从而被政府所采纳。^②

此后的政策把公司的利润提高到了一个此前不敢想象的水平。由于口袋里有这么多钱而生产性投资领域又无法全部吸

^① Vail,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②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纳，所以瑞典的投资者们就转而走向投机，把不动产、艺术品、邮票和其他投机商品的价格抬高。为了阻止这种价格的盘旋上升局面，政府放松了金融控制，使多余的资金流向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流出的速度非常之快，它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不动产价格创出了历史新高。当投机的泡沫越来越大时，投机行为所带来的快速收益把瑞典国内越来越多的生产性投资资金吸纳进去。当瑞典的不动产泡沫最终破灭时，瑞典银行由于无法收回贷款而损失 180 亿美元。这个账单由国家来买单，并转嫁给了国内的纳税人。^①

这一期间，在拆除社会民主党人所建构的“瑞典模式”方面，瑞典的主流企业家发挥了重要作用。瑞典的雇主联盟抵制作为该模式基石之一的集体工资谈判，并与保守党结成了联盟。它也资助了智囊库，使这些智囊机构支持公司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在斥责社会民主党国家是富于侵略性的、无能的同时，它们开展一个重大的公关活动来赞美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② 这些措施都弱化了国家的政治机器及其制定长期政策的能力。

1983 年，富豪公司总裁格伦哈姆组建了欧洲企业家圆桌会议，从而涉足拆除“瑞典模式”的领域。这个会议由包括菲亚特（Fiat）公司、雀巢（Nestle）公司、飞利浦（Philips）公司、奥利维蒂（Olivetti）公司、雷诺（Renault）公司、西门子（Siemens）公司在内的欧洲主要跨国公司的领导人组成。其目标是为国家制定长期的政策，并作为促使这些政策得以实施的国际游说者。^③

到 1992 年年底，瑞典 2% 的最富的家庭掌握着斯德哥尔

①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② Vail,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③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摩股票交易所 62% 的股票价值，掌握着全国财富的 23%。在 1978—1988 年间，当一般的瑞典家庭变得更贫穷时，最富的 450 个家庭的财富数量却翻了一番。^① 社会民主党人首次在选举投票失利时，瑞典的失业率为 3%，^② 到 1992 年，尽管另有 7% 的劳动力参加了反周期的再培训计划（Countercyclical Retraining Program）和公共就业计划，瑞典的失业率仍上升到 5%，预计将会达到 7%。

从一开始，瑞典模式就埋藏了毁灭自身的种子。它培育了一个强大的经济精英群体，他们与作为社会主流的中产阶级之间有着巨大的利益差别。它在瑞典人中间培养出一种福利满足的心理。它没有成功地向年轻一代灌输一种意识，那就是民主需要通过市民经常性的警觉和政治上的积极参与来不断争取的。它的繁荣是建立在对国内的木材、铁矿和水电能等自然资源不可持续地开发利用基础之上的。

当精英群体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后，他们能够要求增加自身对社会资源的需求，而不用相应地增加他们对生产的贡献。经济边界开放之后，那些依靠工资生存的人日益受到资本拥有者的控制。为了保证国内的工作岗位数量，政府做了很多努力，它向经济精英阶层做出的让步越多，后者让公共政策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能力就越强，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压力也就越大。在本书第三部分所分析的美国的类似经历也是一个很典型的实例。

瑞典的经历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民主多元主义无法保证自己永远能够抑制极端的不平等。

① Hermele, “The End of the Middle Road.”

② Vail,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wedish Social Democracy.”

对创造性平衡的需求

社会主义确立了国家政权的霸权地位。资本主义使金融市场和公司处于霸权地位。一个健全社会建立的基础是三个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部门之间均衡地相互作用，这三个部门就是市民部门、政府部门和经济部门。这三个部门都是人类的造物，每个具体的个体都会参与到这三者之中去，但我们需要对三者扮演的角色及其合法的权力来源进行明确地区分，这样才能看到整体的完整性。

市民部门^① 由于与其他两个部门相比市民部门的正式制度化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它为个人提供了从内在精神联系意识到生活与社会的行动最大限度的创新自由。市民部门的独特作用就在于产生、维护和更新意义的内涵及文化认同的象征体系，后者是一个健康社会保持完整性和凝聚性的基础。一个活跃的市民部门是社会的良知之所在，是文化生命力及其更新的动力源泉，是政府和经济机构滥用权力时的一个制衡工具。

政府部门 政府是一个市民部门自由地而又极不情愿地将权力交给的部门，这一部门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运用强制性的权力，包括罚没财产和剥夺一个人的人身自由甚至是生命。通过运用这种权力，政府履行了一些重要的职能，譬如，维护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征税和重新分配资源来保持公平及满足其他公众的需要，等等。政府独特的能力在于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生产财富。它的权力必须由一个活跃的市民社会不断地进行监督。

^① 这段关于社会生活的3个部门或领域的讨论是基于 Nicanor Perlas 在 *Shaping Globalization: Civil Society, Cultural Power and Threfolding* 的新版本的修订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Center for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1999)。

经济部门 经济部门的特点在于它能够产生商品和服务。市场经济能够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反应。然而，对社会中大部分人来说，市场是一个有问题的制度设置。它无法阻止许多行为，包括从买卖枪支、毒品和烟草制品到贩卖儿童、制造环境污染、危害工人健康等这些肆无忌惮的行为，它无法保证商品标志是正确无误的。它无法维护公共街道，无法为贫穷的孩子提供教育，或者要求物品的回收再利用。它也无法区分哪些是高效的生产商品带来的利润，哪些是通过运用垄断性权力、将成本外部化、侵吞公共财产资源或者人为地要求生产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商品等方式，而获得的不正当利润。在每一种情况下都需要有一个民主选举的政府来划定边界，确定哪些行为是能够为社会所接受的。

民主多元主义融合了市场、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力量，从而在一些经常相互冲突的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这些需求包括基本的秩序和公平、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产生、权力的责任感、对人类自由的保护和制度不断的革新。这种平衡在“受调控”的市场而不是“自由”市场里，在贸易政策上得以表现出来。这种贸易政策使各国的国家经济在一个规则框架内相互联系在一起，这一框架维持了国内的竞争，支持那些雇用本地工人、遵守本地标准、交纳地方税并在强大的民主统治制度下运行的国内企业。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把市民部门视为最重要的部门是恰当的，因为它是有关公民权、个人意志表达和民主参与的领域。同时，一个社会的健康与否有赖于所有上述三个部门的活力。没有政府机构和经济，社会将会是无法无天的，是贫困的。因为政府是公民建立和维护这三个部门所需规则的制定与执行主体，因此把它视为第二部门也是恰当的。经济部门的功能是满足由人们来界定的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是由人们通过购

买行为、工作选择和参与政府决策民主地确定规则和优先权等形式界定的。因此，经济部门是完全服从于市民部门和政府部门的，认为它是第三部门是恰当的。

遵守不同的游戏规则

与流行的说法不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运行所遵守的规则是不同的，带来的结果也不一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设计的目的是关注少数人对生产手段的控制及其对大多数人的排斥。资本主义经济的特色是关注于垄断权力、金融投机、产权缺失、调控、公共补助、成本的外部化和巨型公司的主要经济计划等方面。

与此相反，正如斯密所设想并由市场理论所描述的那样，市场经济制度的目的是促进自我组织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人们参与了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交换，为他们自己及其家庭带来了一个丰裕而又满足的生活。对于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而言，它的特征是以人为本的企业、诚实地挣钱、植根于地方的所有权和一个民主选择规则的框架，这些规则的目标就是维持市场运行高效所需的条件——包括公平和成本内部化。它是民主制度和多元主义社会的天然支持者。

公开贸易、有限责任的公司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选择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允许对权力无限制的关注，而承担的公共责任或法律义务却在最小限度之内。真正的股东，也就是真正的所有者，在公司事务中几乎不承担任何角色，除了他们投资的价值之外，他们不承担任何个人义务。董事和高级职员不承担由于过失或职权行为而产生的金融债务，这是因为有限公司有着庞大的法律资源和公司偿还债务的保险政策。同一种犯罪行为若是个人所为，那么他可能会受到严厉的监禁惩罚，但对公司的惩罚却仅仅是罚款——这些罚款与公司的财产相比可能是微不

足道的，可能比它的违法所得的还要少。^①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因为公司的非法行为而被起诉的情况是非常罕见的。因此，威廉·多格（William M. Dugger）认为自己有理由将公司称之为“有组织地不负责任”。^②

公司不像人类，人类最终都将会走向坟墓并获得最终的平等，公司却能够无限制地生长和繁殖自身，“活着”并积聚无穷的权力。最终这种权力将会发展到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程度，公司就会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它运用自身的权力来“创造自己的文化，用职业的透镜使公司文化聚焦于利润、规模和权力”^③。那些为公司利益服务的人将会得到优厚的回报，从他们的职位中获得大量的个人权力。但说到底他也只是一个取悦公司制度、为该制度服务的雇员而已。

大公司为了自身利益积聚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其数量几乎没有有什么个人的政治资源能够与之相匹敌。公司可能没有投票权，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不利之处，它们有能力从公司的工人、供应商、买家、消费者和公众那里动员成千上万的选票，能够在政治献金中投入上百万的美金。

公司运用自己的技巧控制了市场，击败那些认为市场应该为公众利益服务的理论和运行机制。公开贸易、有限责任的公司可能是资本主义所偏爱的制度，但它并不是一个市场制度。相反，它是站在反市场的立场上的，因为它不停地在破坏具有高度社会效率的市场所需要的各种重要条件。

因此，市民们与早期美国居民一样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公司是完全正常的。早期的美国居民很精明，他们仅在公司为明

① William M.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12-15.

②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15.

③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15.

确的公众利益服务时才授予公司执照，为公司的运行提供清楚明了的制度规则，让公司对自身行为负完全责任，禁止让它们以任何形式参与政治活动。

公司的所有者与经营者拥有公民所享有的所有权利——他们有公民那样的资格——去参与制定公共目标和政策。然而公司不是人。它们不熟悉人的生活方式，无法觉察人类社会复杂的非物质性需要，在人们界定公共利益以及为公司行为设立标准的政治议程中，公司无法承担适当的角色。

公司的执照代表了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它是政府所授予的，是为对公司履行相应的义务提供回报而强加在人民意愿之上的。现在是由那些作为选民的人们——而不是作为虚拟个人的公司——来界定这些特权和义务。通过痛苦的经历我们认识到，民主制度的延续依然有赖于对这一原则的牢牢坚持。

民主多元主义面临着一个自相矛盾的局面。在变革时期，社会需要用一种只有在民主多元主义条件下才会有方式，来动员公民的所有创造潜力。然而在这种压力重重的时期，民主多元主义似乎是最不正确的，也最容易受思想煽动者简单的口号影响。民主多元主义不是为我们提供了方向，而是号召人们用一种为所有人利益服务的眼光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它所提供的不是确定性，它培育了各种各样的表面上似乎矛盾的观点。这些是它的弱点，也是它的优点之所在。民主多元主义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每个公民都尽其所能，提出——在家庭、社区和国家方面——动态变迁的复杂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无数变幻莫测的需求。渐渐地，通过分散和紊乱的社会学习过程，从无数变革中吸取的教训开始融入地方的、国家的以及最终的世界性制度和政策的变革之中。

民主多元主义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在这个框架里，人们

可以把他们的所有创造力都发挥出来，寻求革新的方法，从而解决共同面临的问题，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新社会，使这个社会对正日益呈现出来的生态革命所提出的挑战能够做出积极反应。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创造力。

七、云端守卫者的幻觉

在这个问题丛生的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极为显著。那些获得回报的人与那些承担成本的人之间是完全分离的。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统治方式。

——斯波克（Spock）《星际迷航记》的“云端守卫者”

由于信息技术已经很发达，所以我可以带着一台手提（laptop）电脑和蜂窝电话坐在佛罗里达家里的海滩边，通过我在俄亥俄的制造公司里四处安装的摄像机的监控，就可以保证我的雇员都在工作，而且做得很好。

——对美国公共电台公司所有人的采访，1994-8-31

“云端守卫者”（Cloud Minders）是公众喜爱的科幻电视连续剧《星际迷航记》（StarTrek）的第74集，故事发生在阿达那（Ardana）星球之上。首先它回溯至1969年2月28日，描述了在一个星球上统治者住在一个名叫斯彻特斯（Stratos）的美丽而和平的城市里，这个城市悬浮在荒凉的星球表面上空，统治者们都毕生致力于艺术。在他们下方的星球地表上居住着的是楚格尔特斯（Troglytes）人，这些人却在一个悲惨而充满暴力的星球的矿山中劳作，他们挣得的星际流通货币用来从其他星球进口奢侈品，供住在斯彻特斯城里的统治者消

费。在这个现代寓言中，整个星球都被统治者控制，他们成功地把自己与那些在星球地表产生奢侈品的人们及地区分离并隔绝开来。

这一集的《星际迷航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真的很像我们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真正富有而且有权力的人是在高层办公大楼里的行政套房工作；乘豪华轿车和直升机去开会；坐喷气式飞机从云端跨越大洲，品尝着由殷勤的乘务人员提供的最好的葡萄酒；生活在有警卫的房屋里，附近都是富有的人，住宅带着艺术气息，周围美女如云，生活环境安全而舒适。就像疏远了楚格尔特斯人生活的斯彻特斯城的居民一样，他们与我们这个星球的平民大众的生活是隔离开来的。他们也生活在一个梦幻的世界里，他们抽干了世界上的资源，但他们与真实世界相隔非常遥远，所以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或者其他人是怎么活着的。

魔幻市场

我们可以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的年度聚会为例，来看看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是如何处于自我孤立状态的。下面是记者葛瑞姆·汉卡克（Graham Hancock）对其中一次会议的报道：

我来（华盛顿特区）完全是为了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同举办的年会，在动员并向贫困国家提供资金方面，这两个组织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在一个星期会议期间，这两个组织为代表们在700个社交场合安排的费用总计约1000万美元……瑞格威尔斯（Ridgewells）公司宴请的一次正式宴会就平均每人消费了200美元。客人们先吃蟹肉蛋糕、鱼子酱、薄荷甜酒、

烟熏鲑鱼、小份的惠灵顿牛排。鱼类方面的菜肴是裹着玉黍蜀并带有柑橘冰糕的龙虾。主菜是带酸橙汁的鸭子，供应填满小胡萝卜的菊芋。还有棕榈核的色拉，以及有果酒装饰着的洋苏叶奶酪蛋奶酥。甜点是一个德国巧克力芜菁，上面涂满了山莓，冰淇淋软夹心巧克力糖和热气腾腾的咖啡……华盛顿特区的豪华轿车服务公司的生意也日益兴隆。^①

就在这个为客人们提供了价值 1000 万美元的豪华膳食和社交费用的会议上，前美国国会议员、新任世界银行行长康纳伯（Barber Conable）向与会的 1 万名女士先生们发表了下述“高谈阔论”：

我们的体制在资源和经验上是强劲而有力的，但是如果不用最无权势群体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如果我们不理解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那么我们的工作将一无所获。我们在这里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力量、他们的潜能、他们的志向……全球反贫困的共同行动是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共同目标。因此让我们再次尽我们所能，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②

如果代表们真的是努力用最无权势者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那么他们可能会大倒胃口。例如，下面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电视台的罗曼德·维勒（Raymond Wheeler）

① Graham Hancock, *Lords of Poverty*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1989), 38-40.

② 这是康纳伯 1986 年 9 月 30 日在华盛顿召开的世界银行及国际金融公司的官员会议上的讲话，引自 Hancock, 38.

对亚拉巴马附近一个佃农的孩子进行的简单采访：

“你上学前吃早餐吗？”

“有时吃，先生。有时早上我会有豌豆吃。”

“你到学校后，吃饭吗？”

“不吃，先生。”

“那里什么吃的都没有？”

“有啊，先生。”

“那你为什么不吃？”

“因为我付不起 35 美分的饭钱。”

“其他人吃午餐时你干什么呢？”

“我就坐在一边。”（他的声音提高了）

“看到其他孩子在吃饭，你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羞耻。”（哭了）^①

与鼓励代表们用穷人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相反，这次会议的组织者们非常小心地避开了贫困这个幽灵。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经济理性主义和自由市场、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的主要支持者。多年以来它们一直称赞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是成功的样板。因此，当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理事们于 1991 年 10 月在泰国的曼谷集会时，他们很自然地就把泰国的自由市场、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视为自己近期胜利的一个榜样，并把这次会议视为是对这一胜利的庆祝。

为给与会代表们一种印象，即泰国已经完全成为新兴工业

^① As reported in Nancy Scheper-Hughes, “The Madness of Hunger,” *Why*, no. 14 (Fall 1993): 11.

化国家中的一员，泰国政府调动了一切力量。为了确保给他们留下自己期望中的印象，在曼谷市中心，一座闪闪发亮的新综合会议楼匆匆忙忙地完工了，以赶上举办这次会议。200 户家庭被赶走以便加宽代表们出入会场所经过的马路。^① 附近自行建筑的居民住宅被推平，以免让与会代表看到曼谷贫困的一面。学校和政府机关暂时关门以缓解交通堵塞的状况，并有利于空气的清洁，使与会代表们出行的不便减少到最低程度，使他们坐在有空调的汽车里不再有难以呼吸的苦恼，在高雅的鸡尾酒聚会和官方宴会的沿途，一些必要的地方都被遮掩起来，以避免代表们看到曼谷贫民窟的尴尬。会说英语的工程师、医生和律师被选去充当会议代表们的司机；护士和教师在会议餐厅里做服务员，以保证能够听懂代表们的任何指令，使来访贵宾们的所有需求都得到满足。

这种弄虚作假的手段只能部分地掩盖真实状况。曼谷这个曾经美丽过的城市，已经被“成功”的发展所带来的后果毁坏。在闪闪发光的购物中心、高高耸立的办公大楼和豪华的大酒店之间，充斥着的是大量的污秽和邋遢之物。每年曼谷有 30 万辆交通工具加入长期的交通堵塞队伍之中，它使通行速度降低至平均每小时 10 公里（约合 6 英里）以下。曼谷一年中有 200 多天的空气标准高于世界卫生组织所规定的安全线，而且废气的排放量仍以每年 14% 的速度在增长。^②

对那些生活在幻觉之中的全球掌权者而言，在泰国召开的这次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会议是一个很恰当的讽喻。这种幻觉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这些人在飞地里建造了一个隔离的奢侈生活领域，部分是通过譬如公

^① Walter Hook, "Paving over Bangkok," *Sustainable Transport*, no. 2 (September 1993): 7.

^② Hook, "Paving over Bangkok," 6.

司自由主义这些自我辩护的信仰系统来实现的，部分是通过商业杂志报纸和大量的经济研究人员、顾问对财富和富人们的奉承来实现的。最重要的是，它是由经济系统的功能错乱所造成的，因为这一经济系统慷慨地把大量的回报给予做出决策的掌权者，却把可怕的负担交给了其他人。

巨大的分裂

世界上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过于悬殊，而且还在日益拉大。199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用一个香槟酒杯的图形描述了世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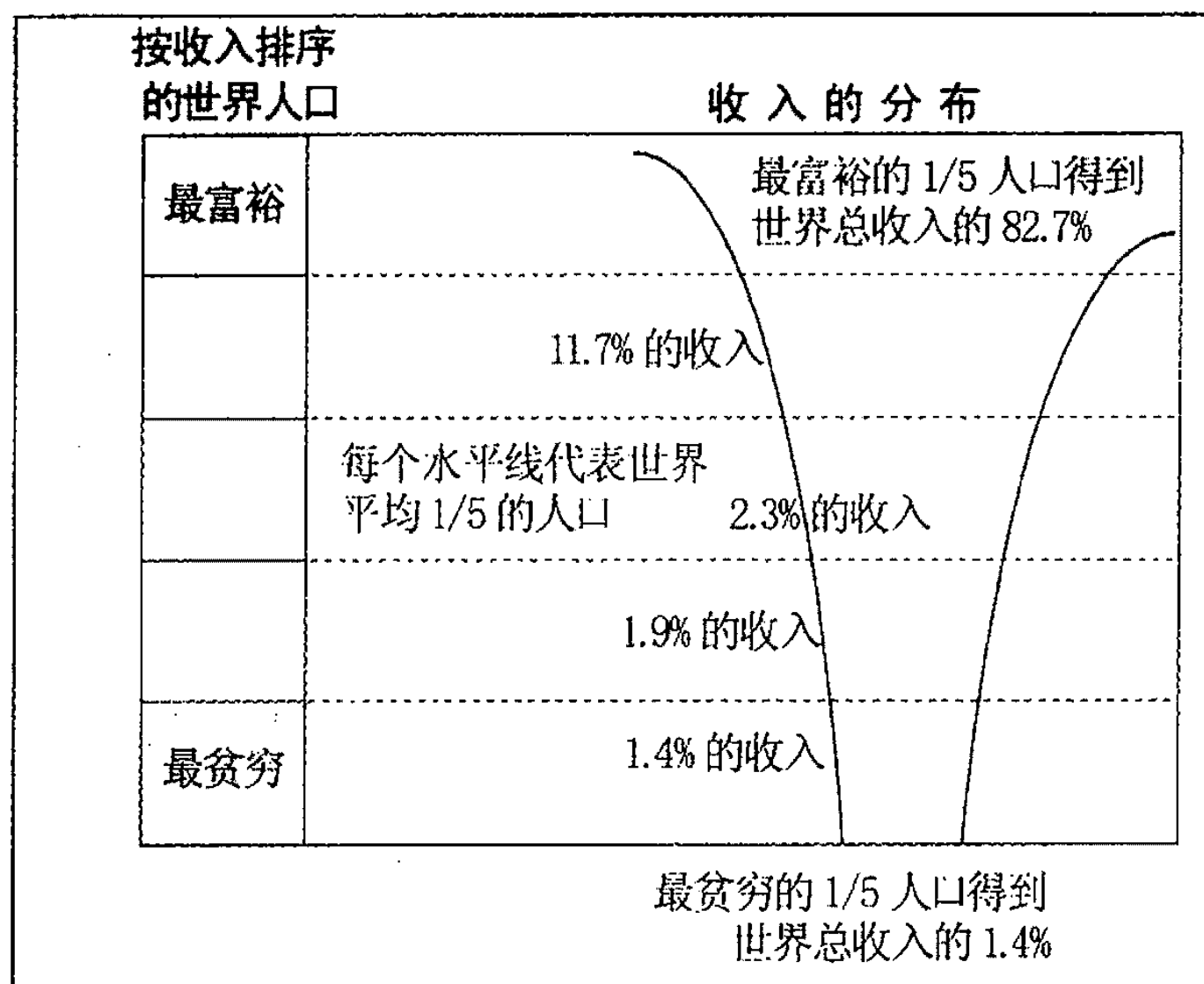
如图7-1所示，世界上20%居住在最富裕国家里的人占有世界82.7%的收入；只有1.4%的收入为20%的居住在最贫穷国家里的人所占有。1950年，就在承诺开始实现发展议程的全球化之时，世界上20%生活在最富裕国家里的人的人均收入大约是20%生活中最贫穷国家里的人的30倍。到1990年，这一比率已经翻了一番，上升到了60倍。

在国家层次进行平均，这些数字就反应了国家之间的悬殊差距，以及隐含着的各国人们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例如，所有的美国人，包括美国的那些无家可归者、乡村里的穷人和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在内，都处于世界上最高的收入范围之内。如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以个人收入的层次而不是国家层次来估计全球收入分配的话，那么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收入是最低的20%的人的150倍。

即使是这些数字，也掩盖了极端不平等的现实，当对收入最高的20%的人再进行细分时，这种极度的不平等就会暴露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图 7-1 走向丰裕世界



资料来源：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出来。虽然我们无法得到全球的数据，但美国的数据说明了这一点。1989年美国收入最高的20%的家庭年平均收入是109424美元。^①然而，那些处于80%~90%这一层次的家庭平均年收入相对而言却少多了，只有65900美元。那些处在最高的1%层次的家庭平均年收入是559795美元——作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总收入比处在最底层40%的所有美国家庭的收入还要高。^②

然而，对诸如臭名远扬的米切尔·密尔金（Michael Milken）这样的华尔街投资经纪人来说，这还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① 美国的数据是根据家庭计算的，因而不与UNDP的个人数据进行直接对比。

^② Gar Alperovitz, "Building a Living Democracy," *Sojourners*, July 1990, 13.

密尔金通过销售那些（贬值的）垃圾债券一年之内挣了 5 亿美金。对美国主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s）和收入最高的那些名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1992 年，美国连锁医院公司（Hospital Corporation of America）首席执行官小托马斯·F·福里斯特（Thomas F. Frist, Jr.），以年收入 1.27 亿美元位居高收入的美国首席执行官之首，这一收入是世界上最贫穷的 20% 人口的年人均收入平均 163 美元的 78 万倍。据《商业周刊》的调查，在 1992 年，1000 个最大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年人均收入是 380 万美元——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42%。此外，高收入的首席执行官的收入与其雇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扩大。^① 1960 年，一个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年平均收入是一个普遍工人的 40 倍。到 1992 年，他（《商业周刊》中的 1000 个顶级首席执行官中只有两个是女性）的收入达到了后者的 157 倍。^②

然而，与那些自己投资赢利的人相比，首席执行官们的财富就小巫见大巫了。《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美国 400 富豪”排行榜在 1982 年到 1993 年间总计增加了 920 亿美元的净收入，这使他们的总财富达到 3280 亿美元^③——比 1991 年生活在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和尼泊尔的 10 亿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④

由于急于向其富有的读者们保证他们的好运并不是以他人

① “Executive Pay: The Party Ain't over Yet.” *Business Week*, April 16, 1993, 56-64.

② “Executive Pay.”

③ “The Forbes Four Hundred.” *Forbes*, October 18, 1993, 110-11.

④ 虽然净资产价值不能与国民生产总值（它是收入的测度标准）直接比较，但能反映出数量大小的顺序。GNP 数据自 John W. Wright. *The Universal Almanac*, 1994 (Kansas City, Mo.: Andrews and McMeel, 1993).

的损失为代价的，《福布斯》杂志在它的美国富翁排行榜的前言部分作了下述声明：

啊哈，再分配主义者是对的。富人们变得更富有了。这也对也不对。富人是真的变得更富有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也上升了。正如我们用道琼斯指数来衡量股票那样，进入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排行榜的标准也像股票一样在水涨船高。股票市场的巨大升值——这恰好给超级富豪带来了财富——也会给美国每一位退休金享有者和股民带来财富……

不要为富人们哭泣。但也不要傻傻地认为富人们之所以变得更富有了，是因为他们抢走了其他人的财富。^①

是的，在股票市场收入的得利者中确实有一些孀妇和退休金享有者。但是，《福布斯》（一个为斯彻特斯城居民拥有并为其服务的出版物）所声明的“平等得到了维持”只是一个证据，它证明了斯彻特斯城居民确实是与世人隔离的，并且相信他们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富豪所拥有的股票份额并没有增加，但除了养老基金拥有的股票之外，美国家庭拥有的股票财富中有83.1%的是由10%富有的美国家庭拥有的。此外，37.4%股票财富是由0.5%的最富有家庭所拥有的。^②

从1977年到1989年间，美国收入最高的1%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了78%，而处于最底层的20%的家庭的收入却下降

① “The Forbes Four Hundred,” 111.

② Lawrence Mishel and Jared Bernstein,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1992—1993*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3) 256.

10.4%。^① 因此我们中间最穷的人不仅变得相对贫困化了，而且也是绝对地贫困化了。这些数据没有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尽管那些在1989年就业者的工作时间比1977年还要长，尽管更多的妇女进入了工作领域，使更多的家庭有两个人在全职地工作着，但收入的绝对下降还是发生了。对于60%的美国下层中的许多家庭而言，工作的时间更长，多了一个额外的挣钱的人都无法弥补工资的下降。

《福布斯》杂志的编辑和斯彻特斯城的居民们都易于忽视的一个简单事实就是，每次一个大公司宣布裁减数千人的工作岗位时，斯彻特斯城的家庭就都变得更加富有了，而那些失去工作的工人却变得更贫穷了。这就是正在进行着的一个过程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就是把财富和经济权力从真正生产财富的人那里转移到已经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手中，后者的逻辑是不管他们自己是否需要，是否为此做出了生产贡献，他们都有权利看到自己的财富数量在无限地增长。

那些陶醉于啜饮香槟酒的人真的能够理解绝大部分人的全部现实吗？后者只分享树形收入图中茎干部分的少量渣滓。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的财富丰裕是贫困者处于困境的原因，那么有人能够承担这可怕的道德责任吗？因此，人们有充分的理由和动力通过坚持聊以自慰的斯彻特斯式文化幻觉，从而避免自己面对这样的道德冲突。

一个有差别的世界

福布斯1993年度“美国400富豪”排行榜的开篇文章讨论到，在今天的经济中，富人们之间已经结束了相互争斗的历

^① Mishel and Bernstein, *The State of Working America*, 46; 据自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数据, 1991. 数据单位为1992年的美元。

史。仅仅在一年的时间里，一个一公斤的罐装鱼子酱价格就上涨了 28%，达到 1408 美元。一架配置了全部西科尔斯基 (Sikorsky) S-780 型直升机价格上涨了 8%，达到 700 万美元。在纽约，一个标准酒店住房价格上涨了 15%，达到每晚 750 美元。^①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长期以来一直是美国外交圈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玩家，他每天早上都照例领着他的狗艾米拉散步，一名警卫跟随其后，负责处理狗排泄污物的清除工作。当基辛格外出休假时，艾米拉就由豪华轿车送到皮泊 (Peeper) 太太在马里兰乡下的养狗场，它在那里有一个专门的私人住宅。^② 电视台曾抢拍到乔治·布什 (George Bush) 的一个镜头，当时他正惊奇地盯着杂货店里的结账扫描器，并意识到他是美国最后一个买东西时在结账程序中碰到这种加法的人，许多看电视的美国人都被逗乐了。

亚历山大·特罗特曼 (Alexander Trotman) 在 1993 年担任福特汽车公司的主席、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当时他必须负责每年生产 300 多万台车，然而他自己连一辆汽车都没有，也没有从经销商那里买过一辆。福特公司按照汽车行业的惯例给它的所有高层主管都配备了新车——以保证他们一直都有车况良好的汽车，不用去与汽车经销商们交涉，不用忙于汽车的注册、保险、维修和维护。^③

1989 年，孤星 (Lone Star) 公司亏损了 2.71 亿美元。公

^① James M. Clash, "Reversal of Fortunes," *Forbes*, October 18, 1993, 105-106.

^② Eric Konigsberg, "No, Hassles: The Ultimate Perk of the Ruling Class Is Freedom from Pesky Details," *Utne Reader*, September/October 1993, 76.

^③ James Bennet, "New Ford Chief Hasn't Bought One. Lately." *New York Times*, October 7, 1993, D-1, D-5.

司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斯图沃特（James E. Stewart）下令裁员，他卖掉了公司价值4亿美元的资产，削减给股东的红利，要他的经理们坐二等飞机舱位，但是他自己依然花费了290万美元，继续坐公司的喷气式飞机往返于他在佛罗里达的家里和位于康涅狄格州斯坦福的公司总部之间。作为纳贝斯克（RJR Nabisc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斯·约翰逊（F. Ross Johnson）在亚特兰大为公司的10架飞机和26名公司的飞行员修建了富丽堂皇的飞机库。在这附近他修建了一幢三层的贵宾休闲室，内设红木墙壁、意大利大理石地板和一个带着日本式花园的中庭。^① 国际金融家艾尔温·伯斯卡（Ivan Boesky）有一个有名的习惯，那就是在有艺人表演节目的会员制餐馆的菜单上每次点8种菜，每样品尝一点，然后才决定到底吃哪样。^②

1991年6月，我参加了在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市召开的全球教育美国论坛的年会。与会的辉瑞（Pfizer）有限责任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帕拉特（Ed Pratt）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的公司出售药品和医药器材，每年全球销售额达到70亿美元。由于对全球教育做出了贡献他得到了一个奖，他与在座的数百位美国教育者分享了他对全球教育的看法。他对大家说，在新的全球化经济中，对年轻的美国人的教育应集中在给予他们最大的竞争能力。在他看来，已经没有时间来做什么不必要的装饰了——例如学习外语。他说，在他为辉瑞公司全球营销作环球旅行时发现，所到之处他们所需要的人都已经说英语了。所以他建议说，应该把其他国家孩子学习英语的课堂时间用来教授美国学生科学知识和经济学知识。

^① “CEO Disease: Egotism Can Breed Corporate Disaster-and the Malyd Is Spreading,” *Business week*, April 1, 1991, 52-60.

^② Konigsberg, “No Hassles,” 76.

大的鞋类生产公司耐克 (Nike) 公司认为自身是一个“网络化企业”。意思是它在管理、设计、销售和宣传方面雇用了8000人，把生产过程交给独立的承包单位，这些承包单位另行又雇用了大约7.5万名工人。大多数这种耗费资源的生产是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受雇的当地女孩和年轻妇女的工资是每小时15美分，耗费大约5.6美元的生产成本就能生产出一双耐克鞋，但卖到美国和欧洲时的价格却是73美元到135美元。工人们就住在工厂的宿舍里，工厂经常强制性地延长工作时间，如果有罢工的话，厂家会叫来军队摆平它。据报道，1992年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 (Michael Jordan) 为耐克鞋做广告获得2000万美元的报酬，这个数字比制造这些鞋的印度尼西亚工厂所发的工人工资总额还要多。^①

当被问及耐克公司的制鞋工厂的生活条件如何时，耐克在印度尼西亚的总经理给予了一个很典型的斯彻特斯式的回答。尽管他知道耐克在印度尼西亚的6个鞋厂里存在着劳工问题，但他却对具体详情不得而知。而且他说，“我不需要知道这些。这些不在我们的调查管辖范围之内”^②。

耐克公司的情况是经济体系扭曲的一个突出代表，这个经济体系把报酬从进行真正生产价值的人手中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中，而后者的基本功能就是制造出一种销售幻觉，从而说服消费者们高价购买自己并不需要的产品。通常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像这位耐克公司的经理不愿与印度尼西亚的工人们接触一样，许多经理们都不太愿意与精英圈子之外的许多人交流。

① Richard J. Barne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325-329.

② Barnet and Cavanagh, *Global Dreams*, 325-29. See also Cynthia Enloe, "Globetrotting Sneaker," *Ms.*, March/April 1995, 10-15.

说 1993 年度经理人年薪的最大赢家 (package sweep-stake) 是精通这种幻想的能手迈克尔·伊斯诺 (Michael Eisner) 是很恰当的, 伊斯诺是致力于制造幻想世界的华尔特·迪斯尼公司的主席。他该年度获得的经理人薪酬是 20310 万美元, 相当于该公司本年度 29980 万美元生产利润的 68%——这一年薪肯定足以为他自己制造出一些幻想来。^①

这是一个全球经济秩序的创造者所生活着的世界, 它高处云端。对他们及其公司来说, 地方性市场的局限性太大了。财富与权力都不够用。他们必须不断地开拓新的领域, 建立新的王国, 占领新的市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 那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日常生活相隔太遥远了, 他们根本没有为厘清公共利益做好准备。

南—北关系的再界定

巨大的财富和信奉虚幻世界的现象不仅仅在“富裕的”国度里存在。1993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有 88 名亿万富翁来自中低收入国家, 而此前一年这一数字为 62 名。墨西哥以 24 名亿万富翁名列榜首, 1992 年该国有 13 人人选。^②

以东南亚国家的标准来衡量, 菲律宾是一个经济较贫穷的国度。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 730 美元。据估计, 有 60% 的菲律宾人的收入水平无法维持自身及其家人最低标准的健康饮食。福布斯 1992 年的排行榜中列有 2 名菲律宾亿万富翁, 1993 年这一数字上升至 5 名。

从 1988 年到 1992 年间, 我在一座 11 层的高层建筑一间

^① “Eisner Pay Is 68% of Profit,”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94, 48.

^② “The World’s Wealthiest People,” *Forbes*, July 5, 1993, 66-111 and “The Billionaires,” *Forbes*, July 18, 1994, 134-219.

办公室里工作，这座大厦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商业与金融中心马卡提（Nakati）。从我办公室的窗口远眺，可以看到3个马尼拉的五星级宾馆和许多高层的银行大楼。在这期间，我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一架或多架直升机从大厦的楼顶接送马尼拉的商业精英人物。在他们下面的是，汽车困在马尼拉有名的交通堵塞之中，上下班的无车一族在浓重的柴油机烟味中等待着公共汽车。在马尼拉的另一边，数以千计不幸的菲律宾人用废料在斯莫克山（Smokey Mountain）的山顶搭建起自己的小棚屋，这座山的山顶是一个冒着烟的垃圾倾倒场。他们就靠在这个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场捡瓶子、塑料和其他能卖钱的东西来维持生计。

每年都有数十万菲律宾人出国，他们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人。许多妇女去日本做“女招待”或在中东做家政服务员。她们经常是在像奴隶一般的条件下工作，是性别剥削的对象。菲律宾政府把这些在海外的工人视为挣得外汇的一个重要渠道，并用这些外汇偿还320亿美元的外债，购买进口商品，使国内装有空调系统的豪华超级购物中心里装满高档的电器和时装，虽然这些钱还有其他的用途。

在早些年，当经济还是限制在国境之内或者甚至是在个别地区时，富人与穷人一样都住在国内或同一个小镇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国家和社区利益。不管他们之间的冲突有多大，他们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企业家和为他提供工人的教育系统、与企业所需的交通运输物质基础设施及其他公共设施有着利害关系。无论他们多么吝啬，他们都愿意交税去帮助提供基本的社会和物质基础设施。

近些年来，美国的人口现状之一就是人们越来越按收入的多少来分别居住在不同的地区。上层收入的阶层一直在向富裕的郊区社区聚集，这种社区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管辖区。在这

里，他们只与自己社区内的富裕阶层成员分享各种设施。因此他们可以资助修建很好的学校和其他公共设施，而不用交额外的税去为低收入的家庭修建类似的设施。低收入的家庭也类似地聚居在同一个低收入的辖区内，这一辖区比富裕者聚居区更需要社会服务，但他们却没有税收去资助修建。^①

20世纪80年代，联邦政府将投资社会服务设施的责任更多地转交给了地方辖区，使美国的这种政治辖区分离所带来的后果更加恶化。1978年，当联邦向地方进行财政转移达到顶峰时，几乎有27%的州和地方的投资来自于联邦的拨款。到1988年，联邦的投资已下降到17%。这些只是里根政府瓦解收入再分配机制计划的一部分，这种再分配机制是美国民主多元主义时代由上几届政府付诸实施的。罗伯特·莱斯（Robert Reich）称这种情况是少数特权阶层与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离。其结果就是富人与穷人之间所享受的教育和公共服务设施之间的裂口越来越大；阶层分裂日益加深，这种情况通常由于种族界线而加剧，富人越来越把自己孤立于自己幻想的世界之中。^②

在我所去过的许多国家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最典型的贫富差距较大的例子。它的富人们都居住于远离地方乡土的飞地里。该国3个现代城市——卡拉奇、拉合尔和伊斯兰堡——的特点就是在贫穷的和封建制的农村中有由五星级酒店、现代购物中心和豪华住宅区组成的飞地，这些农村是由地方的封建地主们所统治的，他们从生意兴隆的毒品贸易和军火交易中获利，并且组建了私人武装，而且随时准备杀掉胆敢进入他们领土的中央政府官员。巴基斯坦乡村地区的健康和教育指标非常

^① Robert B.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275.

^② 大量有关美国这一趋向的文献可参见 Reich, 268-281.

之低，足以与最贫穷的非洲国家相比拟。

我去过巴基斯坦两次，每次我都是以该国一些最成功商人的客人这一身份去的。这些商人游历广，在美国和英国的大学里受过最好的教育，他们的言行举止都带着自信，风度优雅，有那种大都市里贵族典型的好客意识，他们把自己的财富和地位处理的恰到好处。我的那些东道主们经常去世界各地巡视他们散布在各处的商业利益，他们在全球的商业精英面前游刃有余，在纽约或伦敦就像是在卡拉奇、拉合尔和伊斯兰堡的家里一样。

然而，尤其突出的是，与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的了解及其利益状况相比，他们对本国国内自己居住的城市之外所发生的一切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好像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就是一个不屑一顾或不值一提的不重要的外国一样。他们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国家利益的意识。当时我没有认识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一个不发达的失常现象，更是一个全球社会和经济趋势的边缘化趋势——全球的金融大亨们正在云端上组建成一个无国界的社区。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世界各国可以划分为富裕的国家和贫穷的国家。当经济全球化推进的时候，我们发现贫穷国家中有那种财富迅速增长的孤岛，富裕的国家有日益扩大的贫困海洋。现在用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区分来认识这个世界的现实状况更有意义了，但这个南—北关系不再是地理意义上的南北关系了，而是阶级意义上的了。

一个自我毁灭的系统

全球经济系统正在奖赏公司及其管理者，让他们获得巨大的利润并让他们从许多行为中受益，这些行为包括把生产合同交给工资标准很低的血汗工厂、砍光原始森林、引进技术以节

省劳动力并代替数以万计的雇员、倾倒有毒废物，以及促成一个政治议程把公司利益放在人类利益之上，等等。这一经济系统保护着采取上述行动的人，使他们不用为自己的决定承担成本，这些成本由系统中较弱小的成员来承担——被取代的工人失去了工作，替补的工人工资低至难以养家糊口的水平，森林中居民的房屋被毁坏，穷人们住处附近都是有毒的垃圾堆，分散于各地的纳税人为这张账单付费。这种得利与成本之间的相分离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一系统正在告诉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决策者们，他们的决策正在创造新的利润。但实际上，他们只是在以人类和地球为代价，把更多的在地球中可利用的财富转变成他们自己的财富。

系统论理论家们力图理解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的运行机制。他们会说这一经济系统正在对决策者们做出积极的反应，给他们的决策以回报。但这种回报的基础是系统的动态平衡遭到破坏，系统游离到人们的控制范围之外，并最终引发系统的崩溃。系统的稳定依靠的是积极的反馈信息，因为这将矫正变幻莫测的行为，使系统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之中。

斯密的市场经济这一概念有其睿智之处，那就是，尽管他从来没有运用系统理论家的控制论术语，但是他最早认识到了人类复杂的自我调节系统的基本原则。他很含蓄地运用这些原则，并建构了一个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的理想模式，这一模式可以将社会资源有效地进行配置，并在没有任何强大的中央统治者干涉的情况下生产出人们最需要的那些东西。这是一个杰出的学术成就，对那些迷恋于精美理论的知识分子，对那些完全不信任强大的统治者的平民主义者——对在其中为贪欲找到道德辩护的有产精英阶层来说，这一理论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幸的是，作为斯密理论继承者的经济理性主义者却用一

种更狭隘、更机械性的眼光来看待经济系统。他们将市场自由奉为一种意识形态，而不顾斯密所关注的、维持市场自我调节平衡所需要的那些条件。意识形态主义者是很差劲的系统设计者，因为他们倾向于提供简单的药方，而不是去创造一个平衡的自我调节系统。

当其后的社会压力上升、系统失败的迹象日益显露出来后，政治联盟之间的现存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政治煽动者和机会主义者们正利用公众日益增加的不确定感和恐惧感筑起自己的领土。在美国，他们攻击大政府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时要求削减税收，压缩政府规模，重新恢复家庭价值观和个人的责任感，取消对自然资源开发的限制，增加防务经费，对犯罪采取更严厉的立场，废除政府调控和实行自由贸易。保守主义者们承诺要保护普通百姓免受大政府之害，就像他们所做出的这种表面姿态一样，他们同时也在向那些不信任大政府的自食其力者们表演着；向那些经济负担过重且希望减轻税收的人表演着；向那些害怕环境限制、在资源型工业里就业的人表演着；向那些急于获得更大的自由来将自身成本外部化，并因此使收益增加的公司利益集团表演着。这些用来吸引各种选民的建议很多都是自相矛盾的。几乎没有什么建议能够起到恢复家庭、社区和自力更生等价值观的作用。恰恰相反，他们给予世界上最大的一些公司更多的自由，让它们可以占据更多的市场和资源，使已富阶层获得更大的收益，他们进一步把税收负担从最有能力支付的人那里转嫁到最没有能力支付的人身上，并扩大国家的警务部门的权力，消除随之出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公司自由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和煽动者把公司的财力和权势与平民主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并提出了一个议程，这一议程最终将导致公司的利益凌驾于人类利益之上。只要公司自由主

义者把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解释为纳税方——消费方之间、大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与家庭价值的保守主义者之间为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而进行斗争的结果，那么这个抵触之处就不会暴露出来。在这种假象之下，他们攻击为穷人服务的各种社会项目，要求为富人们提供税收减免，给公司以更大的自由。通过这些方式，他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然而，结局还是将更多的权力和财富转交给了大规模的和处于中心地位的集团——公司世界里的那些云端守卫者——并且以牺牲小型的和地方性的集团为代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选民将票投给保守主义的理由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将权力归还给小规模、地方性的集团。

在进行政治讨论时，必须对使用的术语重新界定内涵，使之明确地关注现实问题：处于中心地位的大型集团与地方性的小型集团之间的争夺——也就是公司和普通百姓之间的争夺。现在政治联盟进行再联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当真正的平民主义者意识到他们的敌人不仅仅是大政府而且还有对地方、人民或人类利益不忠诚的巨型公司时，这种再联合才会真正的实现。

经济全球化是正在建构的新公司殖民主义帝国的基石。公司自由主义者告诉我们说，推进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对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的一种响应，我们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只有去适应它，去学着与我们的邻国进行竞争。这是一个很虚伪的说法，它掩盖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云端的守卫者们正努力通过有组织、有目的并且有大量资助的行动来瓦解国家经济，建构起全球市场的制度体系。在第三部分，我将检视他们的幻想前景，以及他们是怎样付诸实施的。

第三部分 公司殖民主义

八、全球帝国之梦

世界各国经济的结合程度更加密切了。但这种结合趋势并不等同于已经完全实现结合在一起的目标了。只有当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时，当政府能够不管企业是哪个国家的而对它们一视同仁时，完全结合的局面才会出现。

——《经济学家》^①

在人类历史上，跨国公司的控制者们首次能够利用他们的组织机构、技术、金钱和思想意识进行一次具有可行性的尝试，他们把全世界视为一个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实体，并对之进行经营……他们实质上所追寻的是希望能够超越国家权力，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对国家权力进行

^①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Everybody’s Favorite Monsters,”
The Economist, March 27, 1993, 7.

改造。

——理查德·伯内特与罗纳德·穆勒^①

过去的20多年里人类历史上发生了最为迅猛、最为彻底的制度变革。这是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变革，变革目标是为适应这个贸易无国界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变革的推动力量是梦想统治全球的巨型公司帝国、唯公司之命是从的政府、全球性的一元主义消费文化，以及对公司自由主义思想的一致。这种公司殖民主义观点的实现将会引起几乎是全方位的经济、社会 and 环境的破坏，为了与之对抗，我们就必须认清它的内涵，掌握它进行传播的方法。

观点

新经济秩序方面最受人关注、表述最为清楚的构想是由索尼公司的创建人及董事长盛田昭夫（Akio Morita）提出来的。1993年6月份的《亚特兰大周刊》发表了盛田昭夫的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是写给正准备参加在东京召开七国首脑会议的各国首脑。在信中他呼吁这些国家去寻求：

降低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之间——包括贸易、投资、法律等方面在内——的所有经济壁垒，从而开始创建新经济秩序的核心，其中包括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贸易体系，这一体系中应该有超越国界之上的统一规则和程序。^②

^① Richard J. Barnett and Ronald E. Muller, *Global Reach: The Power o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4), 13, 15-16, as cited in Howard M. Wachtel, *The Money Mandarins: The Making of a Supra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0), 6.

^② Akio Morita, "Toward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3, 88.

盛田昭夫进一步对此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目前包括地方文化和其他地方认同的象征体系在内的各种地方性利益，让位给自由市场体系所带来的更大利益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他想象中的世界里：

日本生产大米的农民不能封闭他们的市场，日本的家族集团也不能把外国的供应商排除在他们的生产系统之外，或者不让外国商品放在零售货架上。但是美国也不能用明显不公平的诸如单边关税这类措施来应对。欧洲也不应建立单边的裁决规则来认定哪些汽车是“欧洲生产”的，哪些不是。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应该创造一种环境氛围，使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和人员能够在北美、欧洲和日本之间真正实现自由和无约束的流动。^①

在这样一个世界秩序中，超国家性的裁决小组将会对任何有关限制外国进入的申诉进行调查并加以解决，该小组将会“使用明确的补救措施来帮助外国人进入那些不够公平或不够开放的地区”。^② 由于接受和认同公司“共同进行研究和开发，进行联合制造，或者形成各种利益群体与联盟”的需要，政府通过反托拉斯法来确保市场的竞争性的努力成果将会付之一炬，跨国公司把它们的商品和资本自由地转移到世界上任何可能带来最大回报的地区。与此同时，政府会通过调节汇率来降低这种转移决策过程中由于通货波动而带来的决策风险。^③

① Morita, "Toward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92-93.

② Morita, "Toward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93.

③ Morita, "Toward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94-95.

其中的内在含意是很明显的。地方百姓是通过他们的政府来采取行动的，他们已经没有权力来控制经济为地方利益服务了。政府也转而去满足跨国公司的需要了。盛田昭夫的观点与美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乔治·贝尔（George Ball）遥相呼应，贝尔在1967年曾对国际商会英国委员会说到：

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太过于狭窄，它限制了对现代商业范围和活动范围进行的界定……一般而言，那些有着全球视角的公司都希望世界能够给商品和其他生产要素转移提供最大程度的自由。^①

1991年7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壳牌国际石油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德安·朱利叶斯（DeAnne Julius）的研究成果，在它的官方新闻出版物中强调，确保资本能够像商品一样地自由流动的贸易协定是极其重要的。为此，它提出了三个原则：

- 外国公司可以通过商品进口，以及建立一个地方生产设施等方式，完全自主地决定自己是否参与一个地方性的市场。
- 在一国之中，外国公司应该与本国公司享用同等的权利，遵守同一种法律规范。
- 某国法律允许国内公司所采取的合法行动，外国公

^① “Cosmocorp: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Stateless,” *Columbia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67), as quoted in Jeff Frieden.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Economics and Politics in the 1970s,” in Holly Sklar (ed.), *Trilateralism: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and Elite Planning for World Manage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63-64.

司也可以采取。

卡拉·希尔斯 (Carla Hills) 是布什政府的贸易代表, 她承诺表示要实现上述目标: “我们希望公司在海外进行投资时能够不再被要求寻找当地的合作者, 或受出口配额的制约, 不再被要求使用本地的东西, 或者是必须符合其他数十项限制性措施的规定。”^① 这是公司圈内人士的广泛共识。1990年《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对公司高层管理者进行了一个国际性的调查, 结果显示, 来自24个国家的大约12000名的调查对象大多数都认为国家之间应该进行自由贸易, 应该把对国内企业进行的保护限制在最小范围内。对于那种认为商业应该为本国作出承诺而设备资源不能外流的观点, 大多数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并不认同。^②

公司帝国的建构者们正在迅速地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1965年到1992年间, 国家间贸易占世界经济产量比重从不足9%上升到将近19%。^③ 总体来看, 贸易的增长速度大约是经济产量增长速度的两倍。1983年到1990年间, 国际外国投资的增长比经济产量的增长速度快4倍, 比世界贸易增长速度快3倍, 这让《经济学家》杂志相信国际投资是“20世纪80年

① *GATT—The Environment and the Third World, an Overview* (Berkeley, Calif.: Environmental News Network, 1992), 3, as cited in Paul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101.

② Rosabeth Moss Kanter, “Transcending Business Boundaries: 12000 World Managers View Chang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991, 151-65.

③ 由 Lester R. Brown, Hal Kane and Ed Ayres 所著的 *Vital Signs 1993: The Trends That Are Shaping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中的全球贸易和输出表推算出来。

代以来发展最为迅猛的”^① 领域。由于国际贸易的 70% 是由世界上最大的 500 家公司控制的^②，所有的多国投资中，1% 的国外投资方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③ 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发展其实是以一些跨国公司加强对全球经济的控制速度来衡量的。

超越国家利益的公司

宣称公司的发展超越国家利益，已经成为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们的骄傲和行动原则。这种思想的典型是国家提款机公司 (National Cash Register, NCR) 的首席执行官查尔斯·埃斯利 (Charles Exley) 的言论。他自豪地对《纽约时报》说：“NCR 公司不是美国公司。它是一个世界公司，它只是碰巧把总部设在美国而已。”^④ IBM 世界贸易公司前高级执行副总裁迈克尔·阿姆斯特朗 (C. Michael Armstrong) 认为，“IBM 公司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褪去美国标记”^⑤。

上述这些言论并不是仅仅摆摆姿态而已。IBM 公司日本分公司就雇用了 18000 名日本工人，成为日本最主要的电脑出口公司，包括向美国出口电脑。^⑥ 1993 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达成一项协议，规定通用公司在美国每年

①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7.

② “The Power of the Transnationals,” *The Ecologist* 22, no. 4 (July/August 1992): 159.

③ United Nations,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3), 19, 22.

④ 引自 Gerald Epstein, “Mortgaging America,” *World Policy Journal* 8, no. 1 (Winter 1990-91): 29.

⑤ *Business Week*, May 14, 1990, 99.

⑥ Robert B. Reich, “Who Is U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January-February 1990, 54.

生产 20000 辆标上丰田牌的汽车，并在日本市场上出售。^①

事实上，一件产品的部件来源于哪个国家这个问题已经变得极其复杂，我们甚至已不可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了。其中我们不太注意的一件事就是，即使是那些生产产品的公司也不太清楚，或者说不太关心他们产品的部件有多少比例是源自本国的。《商业周刊》在 1990 年的一期封面故事中说到：

尽管没有什么公司能够完全不受其母国的约束，但公司正走向“无国界”却是一个明确无误的事实。欧洲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正在主宰着这一走向，他们正在学习怎样把多样化的认同感和多样化的忠诚感结合起来……无论在什么地方运作，这些世界性公司都能有一种变色龙似的技能，使自己与当地入相类似。同时，正如优利（Unisys）公司董事长迈克尔·布鲁门索尔（W. Michael Blumenthal）所说的，它们能够“不受国界限制地在全球各地”转移它们的设施和实验室。^②

换句话说，在日常运作的过程中，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间的联合仅仅是它们的底线——而不管公司母国的国家或地方利益如何。

在从国家性公司向国际性公司转变的过程中，许多公司宣称自己是“多国化”，这意味着它们有着多国的身份认同，在某个国家保持着相对独立自主的生产和销售设施在地方扎根，在各个地区都能扮演一个本地好市民的角色。全球化的运作可

^① Andrew Pollack, "G. M. to Make Toyota Cars for Sale in Japan,"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1993. D-1.

^② "The Stateless Corporation," *Business Week*, May 14, 1990, 98.

能会把它们相互联系在一起，但它们同时也都与自己在其间运转的、单个的地方性经济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公司在某种程度上真的会以一个地方市民的身份来开展活动。

当结构性调整计划和自由贸易协定使国家经济边界越来越形同虚设时，绝大部分国际化运营的公司都在有意识地进行国际化。这其中一般都有以全球联合的供应商网络为中心进行运营。譬如，如果奥的斯（Otis）电梯公司要生产一种先进的电梯系统，它会把设计发动机驱动器的合同交给日本，把电梯门的生产合同交给法国，把电力系统的生产合同交给德国，把小型的传动装置部件的生产合同交给西班牙。而系统的组装则是在美国进行。^① 其目的是消除国别的考虑，充分发挥中央集权式的全球采购。^②

当强调自身的地方性身份符合公司的目的时，跨国公司都会强调自己的这种身份，但这种地方性承诺只是暂时性的。只有需要请求它的“母国政府”为它们提供特殊的税收减免、补助津贴，或需要政府代表它们进行相关的全球市场和投资利益谈判时，跨国公司才会披起国旗，表示自己在加强“国家的”竞争力方面具有重大的责任感。

《经济学家》杂志建议说，如果有人能够在完全全球化的经济中拥有产品或生产过程的控制权力，那么这些人最佳的博弈策略就是什么都不生产。相反，它们应该简单地授权给那些操作者们，这种授权所带来的收益将与他们自己从事生产所得

① “The Stateless Corporation,” 99-102.

② Michael E. McGrath and Richard W. Hoole, “Manufacturing’s New Economies of Sca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May-June 1992. 94-102.

的回报相等。^① 在其他的领域中，那些垄断了技术专利权的人并不必自己直接进行生产——他们所做的就是回收利润。这与亚当·斯密的理想相差千里，在斯密的理想化竞争性市场经济中，回报利润是给予那些小生产者们的。

单一性市场的保护程度越高，全球性公司就越需要采取多国化的经营模式，在每种环境中都进行地方化的生产，从而使自己进入该市场，并融入地方性经济体系之中。当地区市场向全球经济开放时，公司就有可能利用各个地区在工资、市场潜力、雇佣标准、税收、环境法规、地方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差异来获取高额利润。这就意味着公司在安排其运营过程时，会在成本最低的地方进行生产，而在市场最广的地方进行销售，然后把得到的利润转移至税率最低的地区。由于公司具有这种把生产从一国转向另一国的能力，所以它使任何地区进行讨价还价的余地都大大减少，权力的天平开始从地区民众的利益向全球公司利益倾斜。

一个公司在各地之间转移其资本、商品、技术和人员以获取利润的能力越强，各地通过吸纳公司的社会、环境和其他生产成本来资助投资者的压力就越大。市场越大越公开，那些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能够敏捷地利用各地间差异的公司获利的几率就越大——与植根于特定的社区并遵守地方性规则的小公司相比，这些大公司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也就越大。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最近进行了一项多国企业(MNEs)研究，该研究认为：

因为许多多国企业是跨越国界的，所以它们很少关心国家目标实现，它们更关心的是追求企业内部的目标——

^①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8.

主要是增长、利润、专利技术、策略性的结盟、投资回报和市场权力……美国经济（或其他国家的经济）就无法保持竞争性，除非在美国从事销售和经营的多国企业也对它的研究和技术基础、就业、制造能力和资本资源等都做出贡献。

所有国家的利益应该都是相当直截了当的——工作性质、生活标准的提高、技术和工业的发展，确保工人和消费者的权利，国内和全世界高质量的环境……与国家的利益相比较而言，多国企业的利益更加因地而异，随机而定。^①

总体而言，日本公司就比美国公司更加倾向于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导向，美国公司是为狭隘、有限的公司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典范。欧洲的公司则处于两者之间。然而，总的趋势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走向公司的多国主义。

为消费主义服务的政府

大前研一（Kenichi Ohmae）是日本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McKinsey & Company Japan）的执行董事，他是另一位受人尊敬的支持新经济秩序的大师（guru）。在他那本被广为传颂的《无国界世界》一书中，大前研一告诫各国政府说，它们坚持自己的国家经济管理者这一传统角色是没有用的，因为国家经济已经不复存在了。例如，当政府想利用传统的利率和货币供应手段来激励并不存在的国家经济的时候，其他国家通过刺激出口需求增长就可以很好地完成这一职能。如果政府通过提

^①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U. S. Congress, *Multinationals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Playing by Different Rule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3), 1-4, 10.

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外国的资金就会涌进国内，使这一政策变得毫无意义。^①

全球化也使政府的许多政治职能逐渐消失。进行全球化运作的公司无一例外并且也是毫不费力地摆脱了各种政府控制，这些控制都是建立在那种陈旧的国家经济与对外政策的假设之上的。例如，为了规避日本汽车进入台湾、韩国和以色列的限制性规定，本田汽车公司在美国俄亥俄州的制造厂就会用船把汽车海运至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日本向美国产商开放了新通信设施方面的竞标权后，加拿大北方通信有限公司就把它的一些生产设施迁移到美国，这样它就可以以一家美国公司的身份来赢得日本的订单。1986年1月，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出对利比亚进行经济制裁的命令，随后布朗-鲁特公司（Brown & Root）这家休斯敦工程承包公司就从利比亚人工大运河工程中抽回了大约1亿美元的合同，并把资金转至其英国的子公司。^②

在大前研一看来，政府官僚机构比较恰当的反应就是承认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性——接受政府已过时的这一现实，让出道来，让商品和货币随着市场力量而自由流动：

多国公司是满足全世界消费者需求的真正的服务者……政府的角色已经从保护人民和自然资源基础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转向保护人民从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好、最便宜的商品和服务中进行最大范围的选择，如果政府对这种转变的认识很慢——也就是说，政府还是像以往重商主义

① Kenichi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Power and Strategy in the Interlinked Economy*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0), xii.

② “U. S. Companies Use Affiliates Abroad to Skirt Sanction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1993, A-1, D-3.

者那样进行思考并采取行动的话——那么它们将会吓退投资者，使本国人民处于贫窘之境。更为糟糕的结局可能是，政府的这些行动将会使其国民孤立于正在出现的世界经济之外，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的经济会持续盘旋式下滑，希望破灭，工业停滞不前……正如近期在东欧国家所显示的那样，人民——作为消费者和市民——再也无法容忍政府继续承担这种古老的角色。^①

大前研一建议政府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公司中去，从而使消费者们不必为一件商品在哪里生产而放心。为了支持他的观点，他指出，一般而言生产成本仅是最终售价的 1/4；一件商品的价格上升越来越取决于销售和维护过程。“诸如分配、仓储、财务、零售、系统结合和服务等活动，都是商业体系中的合理组成部分，它们所形成的工作岗位甚至比简单生产过程中的工作岗位还要多。”^②事实上，大前研一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把在别处生产的商品集中起来进行销售和消费，这样就能够满足该国人民对工作岗位的需求。

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大前研一的观点作为本国经济的组织原则。除了石油之外，美国国内市场上有 30% 的商品是由外国提供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这一数字是 15%。^③与此同时，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债务国，同时伴随着的是失业率的上升与工资水平的下降。

如果人们仅仅是一个消费者，那么大前研一的观点可能是有价值的。但人们实际上还有其他角色和价值观，这样他们

①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x-xi.

② Ohmae, *The Borderless World*, 19.

③ “Exports Will Fly High, but so Will Imports,” *Fortune*, July 25, 1994, 64.

很自然地就想知道一些事情，譬如一件商品它是在哪里生产的，地方经济事务是由什么样的规则来控制的，等等。人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是大相径庭的。

社区利益与公司利益

全球化的经济已经创造出一种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中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就跟公司之间的竞争一样。南卡罗莱纳州的摩尔县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赢得了其中一个竞争的胜利，它以税收减免、宽松的环境法规和顺从的劳动力等优势条件，从美国东北部工会化的工业地区吸引了大批的大生产商。普罗克特—西勒克斯公司（Proctor Silex）就是被吸引来的公司之一。后来，当该公司扩建其在当地的工厂时，摩尔县发行了550万美元的市政债券来资助扩建该工厂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而周围的居民都没有自来水和其他的基本公共服务。后来在1990年，该公司认为墨西哥能够提供更加有利的竞争条件，于是它再次进行了搬迁，而给摩尔县留下的是800名失业工人、整桶被掩埋的有毒废料，以及该县为资助该公司建立公共设施所欠下的公共债务。^①

美国人不用跨越国界，只要去与墨西哥的边界上就能体验全球的竞争性意味着什么。“出口加工区”（Maquiladoras）是墨西哥在与美国接壤的边界地区，集中了许多工厂的自由贸易区。这个贸易区就像一个强大的吸铁石，吸引着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福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GTE西尔伐尼亚公司（GTE Sylvania）、RCA公司、西屋公司（Westinghouse）和霍尼韦尔公司（Honeywell）在内的众多美国公司。这些公司

^① Andrew Cohen, "The Downside of 'Development,'" *The Nation*, November 4, 1991, 544-546.

都在寻找成本低的地区作为美国市场的生产基地。^① 这个贸易区的规模增长是极具爆炸性的。1980年，该“出口加工区”有620家工厂，雇用了119550名员工，到1992年，工厂增至2200家，雇用的员工超过了50万人。许多工厂都有最现代化的高生产力设备和技术。尽管在现代化工厂中工作的墨西哥工人的生产率与美国工人相差无几，但他们在“出口加工区”工厂的每小时平均工资仅为1.64美元，而同类的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每小时16.17美元。

为了满足跨国公司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墨西哥政府不让工人有组织独立的工会的权利，并使工人的工资增长水平远远低于生产率提高的水平。1992年夏，在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工厂工作的1400多名墨西哥工人拒绝接受由政府控制的工会谈判签订的合同。该公司把这些工人全都解雇了，法院也支持这种解雇行为。1987年，在墨西哥工人长达两个月的漫长罢工期间，福特汽车公司撕毁了它所签订的工会合同，解雇了3400名工人，并把工资水平下降了45%。当工人聚集在工会反对派周围时，由官方控制的工会雇佣了枪手，胡乱地向工厂里的工人开枪扫射。

环境法规执行力度较弱是另一个吸引力。美国审计总署（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的一个调查组向国会报告说，它所调查的所有6个新近在墨西哥开业的美国工厂都没有必需的

^① 此讨论基于 William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378-387; Richard Rothstein, "Continental Drift: NAFTA and Its Aftershocks," *The American Prospect*, no. 12 (Winter 1993): 68-84; Ross Perot and Pat Choate, *Save Your Job, Save Our Country* (New York: Hyperion, 1993), 45-47; 以及 Richard L. Barnett and John Cavanagh, "Creating a Level Playing Field," *Technology Review*, May/June 1994, 23-29.

环境许可证，但它们都在开工生产。其他的研究也有证据表明在“出口加工区”存在着大量的倾倒有毒物质现象，这些有毒物污染了河流、地下水和土壤，严重危及工人们身体健康，使在该地区工作的年轻妇女生畸形婴儿的比例增加。

因为投资者们不用为其工厂交纳财产税，因此公共基本设施——道路、水源、住房和污水处理线——是严重不足的。工人们所住的棚户区绵延数英里长，住宅是由废弃的材料做成的，没有排水系统；绝大部分住宅没有自来水可供使用。工人们一般都用丢弃的桶来储水——桶上的标记显示，这些桶曾是用来装有毒化学物质的。

墨西哥华瑞兹（Juarez）地区的北部国境大学（the Colegio de la Frontera Norte）教授瓦德斯·威拉瓦（Valdes-Villalva）认为：

我们开始看到，在工厂工作的人中 14 岁的孩子人数在增加。由于工作强度很大，他们经常会筋疲力尽。如果工人们在这里工作三至四年了，那么他们的工作效能将会丧失。他们的视力将会开始出现问题。开始有过敏症和肾病，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①

在公司自由主义者的眼中，包括孩子们在内的墨西哥工人都是新经济秩序中的英雄人物——他们在全球竞争的祭坛上献出了自己的健康、生活和未来。

并不是所有的全球化公司都位于墨西哥。1993 年，南卡罗莱纳州再次被商业出版物赞扬它的积极努力，赢得了国际投资者们的青睐。该州的得意之作是成功地竞争到宝马汽车公司

① 引自 Greider 的访谈，383。

在当地建新厂。此前宝马汽车公司已花了3年时间在10个国家的250多个地方进行评估，最后才决定将它价值4亿美元的设备投资于南卡罗莱纳州。按《商业周刊》的说法，该公司的高层是被该州宜人的气候、常年不关门的高尔夫球场和大量价格适宜的大厦所吸引。他们也喜欢该地区廉价的劳动力、较低的税收和弱小的工会力量。当宝马汽车公司暗示它对一个已经有大量中产阶级住宅的方圆1000英亩的地区很中意时，该州立即斥资3660万美元买下这140户家庭的地产权，然后把这块地皮以每年1美元的价格出租给宝马汽车公司。该州也承担了为新工厂招收、挑选和培训工人的任务，从非公开途径另行出资280万美元把新雇用的技术人员送到德国进行培训。在未来超过30年，南卡罗莱纳州的纳税人将要为这些或那些对宝马汽车公司的资助措施支付1.3亿美元。^①

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例子，它揭示了纳税人是如何去补助大型全球化公司的生产费用的。1957年，美国的公司缴纳的财产税占地方财产税总额的45%。到1987年，它们所占的份额下降至仅16%左右。^② 为民主党领导层会议提供咨询的进步政策研究所（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 of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nference）1994年度报告指出，在此前的5年中有总计达1110亿美元的不合理资助和税收利益流向了美国的公司。^③ 总的趋势很明显，那就是最大的公司正在支付较少的税收，却得到了更多的资助。

全球性竞争市场正在运行，它迫使各个地区来承担公司私

① “The Boom Belt: There’s No Speed Limit on Growth along the South’s I-85,” *Business Week*, September 27, 1993, 98-104.

② Robert Reich, *The Work of Nations*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281.

③ Reported by Robert Reich in a presentation to 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nference televised on C-Span, November 29, 1994.

人成本，从而提高了公司的私人利润。全球性竞争这一游戏正在被人操纵。它使公司与地方民众进行竞争，并总是以民众的失败而告终。

财经读物和全球化的设计者们的一篇严肃论文认为，全球化梦想者的理想世界具有以下特征之一：

- 由巨型的全球化公司来掌控和管理世界上的财富、技术和市场；
- 共同的消费文化使分享物质满足感的所有人联合在一起；
- 在工人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良性的竞争，为投资者提供最为有利的服务；
- 公司可以在不考虑国家和地方后果的前提下，仅以利益为目标自由地采取行动；
- 个人和公司之间的关系完全由市场来界定；
- 不存在要对地方和社区忠诚这一问题。

充斥着所谓轻而易举的无穷繁荣，使全球化经济显得很有吸引力。然而，在它虚假的外表之下我们发现一个现代的幻术，如同一个麦迪逊大街技艺高超的形象塑造家所编的甜言蜜语（Siren Song）一样，诱使社会弱化社区从而解放市场，牺牲人民的生活来创造财富，破坏生活从而提高那些不必要的并且通常是无法满足的消费。与公司自由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事实相反，我们认为，这种向我们招手的诱人歌曲并不是由超越人类影响力之外的、无情的历史力量所带来的，它们是斯彻特斯城（Stratos）居民酝酿已久的声音，这是居民们在高居云端之上，从一个绝大多数人都无法逾越的鸿沟的另一边向我们发出的呐喊声。

九、精英达成共识

我们必须发现新大陆，并从中很便利地获得原材料，同时能够从殖民地的原居民那里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力。这些殖民地也必须能成为我们工厂生产的剩余产品的倾销基地。

——罗得西亚地区的“开创者”
切西尔·罗德斯 (Cecil Rhodes)^①

世界上较贫穷的地区需要有强劲的经济增长，从而确保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足以维持目前的就业水平，并使西方国家能够应对自身紧张的社会问题。

——费利克斯·罗哈廷^②

理解公司全球化的议程是如何被设计出来的，明白它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在公众视线之外实施的，对我们是有帮助的。这一议程并不是由少数精英通过秘密商议形成一个总体计划，从而掌控整个世界的。它更像是一个网络或共同的文化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之外，个人和群体间形成联合并得到发展。虽然从实际过程来看，其结果看起来好像是有预谋似的，但是这整个过程确实不包含什么阴谋。

曾经有三个主要的论坛为支持建构经济全球化的共识而服

^① 引自“Development as Enclosure,” *The Ecologist* 22, no. 4 (1992): 131-47.

^② Felix Rohatyn, “World Capital: The Need and the Risk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4, 1994, 48.

务，这三个论坛就是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比尔德堡会议（The Bilderberg）和“三边委员会”（注：即日美欧委员会，Trilateral Commission）。在这一章中，我们对这三者都进行简单的考察。虽然它们并不是对这一过程很重要的仅有的组织，但它们都极其有效地使政府、企业、传媒和学术界的关键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达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必须把最强有力的机构与经济全球化的议程联系在一起。

美国霸权的观点

在回顾当前的经济全球化的驱动力时，我们可以把它的根源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经济萧条带给人们的创伤。美国的决策精英们最关心的是，保证不能让相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至于怎样实现这个目标，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种观点要求对美国经济进行重大改革，包括政府对市场的强烈干预。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了不进行经济改革而能保持完全就业，就应该确保美国的国内经济能够与外国市场充分地联系在一起，并从后者获得原材料。到目前为止，后一观点是在权力圈层中较为流行的选择方案，这其中也包括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相联系的一小群对外政策制定者。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是美国公司与外交政策制定掌权人物的集会场所，它自称是一个论坛，向相反的观点开放——是领袖和思想的孵化器。它围绕着其成员参加的会议和研究计划来开展工作——成员里经常会有一些世界知名人物或外交政策思想家——他们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着坦诚的和不记录的讨论。相似地，协会也把它那本颇具影响力的《外交事务》杂志定性为进

行重要外交政策问题公开讨论的一个论坛。^①

从历史角度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足两周的1939年9月12日起，这个协会与我们这里关心的问题开始联系在一起。就是在这一天，该协会的执行董事华尔特·马洛瑞（Walter Mallory）和《外交事务》杂志的编辑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Hamilton Armstrong）在华盛顿与该协会的成员副国务卿乔治·米瑟史密斯（George Messersmith）会面。他们列出一大串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长远蓝图，由该协会与国务院密切合作来实施。由外交政策专家组成的战争与和平研究小组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提供秘密的专家建议。^②在做纽约州州长的时候，罗斯福就住在该协会总部的隔壁，他与该协会的关系一直很密切。那时，国务院还没有资金和人力去从事这些研究，因此它的领导人接受了协会的建议。到战争结束时，这种合作已经向政府提供了682项秘密备忘录，研究的资助资金部分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③

该计划的制定者预测，战败的德国和日本以及饱受战火摧毁的欧洲将会在战后把美国推向无可争议的经济统治地位。他们相信，经济体系对贸易和外国投资开放程度越高，美国就越容易控制一切。按这个思路，由国务院和外交关系协会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一些计划，着重强调要为开放的全球经济

① Leonard Silk and Mark Silk,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183-190.

② 有关这些事件的讨论请参阅 Laurence H. Shoup and William Minter, "Shaping a New World Orde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lueprint for World Hegemony," in Holly Sklar (ed.), *Trilateralism: 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 and Elite Planning for world Management*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135-156.

③ Silk and Silk, *The American Establishment*, 197-198.

创建一个制度框架。^①

1941年4月，协会的经济与金融研究小组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备忘录，在关于如何实现战时的宣传意图、塑造美国参战目的的公众形象方面，提出了以下建议：

如果我们把战争的目标说得似乎只是关心盎格鲁美利坚帝国主义，那么它就没有让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觉得也有一点好处，这与反纳粹的诺言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这些目标也会增强美国和英国国内最保守势力的顽固抵制。因此，应该强调其他人的利益，这些人不仅应该只包括欧洲人，也应包括亚洲人、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这样就会产生更好的宣传效果。^②

E-B34号备忘录是该协会在1941年7月24日提交给总统和国务院的，它概述了“重要区域”（Grand Area）这一概念。这种重要区域是指世界上那些美国必须在经济和军事上加以控制的地区，从而保证其工业所需的原料获得处于“压力最小”的状态。^③美国所需要的重要区域大多数是除德国之外的大部分世界。它所特指的地区包括西半球、大英联合王国、英联邦帝国的其他地区、荷兰东印度地区、中国和日本。该备忘录中所概述了在最大范围内的可行核心区域促进经济融合的计划，然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向外扩展，将其他地域也囊括进核心地区。

① Shoup and Minter, "Shaping a New World Order," 137-156.

② Memorandum E-B32, April 17, 1941,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r-Peace Studies, NUL, 引自 Shoup and Minter, 145-146.

③ From Memorandum E-B34, July 24, 1941, 引自 Shoup and Minter, 141.

该备忘录还呼吁，为了稳定通货并方便对落后和不发达地区进行资本投资，必须建立全球性的金融制度。^① 这一建议和其他建议一起由哈里·怀特（Harry White）提交给美国财政部，继而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负责保持通货的稳定性和流动性，为贸易提供便利；又成立了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一般称之为世界银行，来帮助对“落后和不发达”地区进行投资，并推动它们发展。^②

之后，美国采取了许多有利于经济全球化的创新举措，这些举措有两个基本的前提：第一，为了维持现存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美国必须有能力获得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资源和市场，从而能够产生足够的出口剩余来保证国内的充分就业；第二，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把美国的经济模式推广出去，整个世界就会处于共同繁荣与和平之中。显然，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前提存在着矛盾之处。如果说要维持一个美国模式的经济繁荣就必须要有对世界上绝大多数资源和市场进行控制的能力，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可能再去模仿美国的经验。另一个没有被人注意的矛盾之处是，用国际开发资金来资助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商品输出的同时，却只有在低收入国家与已经扩大贷款的发达国家进行贸易且产生盈余的时候，它们才可能偿还债务。

即使当时有人提出上述问题，由于战争形势的紧迫和当权者为自身利益考虑，也会很快就被置之不理。此外，恰如美国外交政策制订者们所预料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就立即被推到了全世界的领头羊位置。美国的外交决策精英们被美国在世界上新建立的权力和责任迷惑了，有点傲慢可能

① Shoup and Minter, "Shaping a New World Order," 141.

② Bruce Rich, *Mortgaging the Earth*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49-56.

是不可避免的了。

北大西洋联盟

欧洲从战火中复兴并决定组织欧洲政治经济共同体，再加上西方世界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峙，所有这一切都促使早期的美国霸权思想的膨胀。美国提出建立一个北大西洋共同体的构想，以便自己掌握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系统的领导权。很明显，这就需要有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使北大西洋国家的政策能够相互协调。正式的机制有 1949 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约联盟（NATO）和 1961 年成立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相比之下，比尔德堡组织就不太有名气了，它是以荷兰乌斯特比克的比尔德堡饭店来命名的一个权力很大的非官方组织，没有声明固定的组织成员。1954 年 5 月北美和欧洲的领导人首次在这个饭店聚会。随后召开的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 Meeting）以及领导人之间建立起来的关系，在推进欧洲联盟的进程和在大西洋国家领导人之间达成共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该组织的参与者包括国家领导人、其他主要政治家、大企业家、金融家和各类学者、贸易联盟者、外交家，以及对该组织持赞同观点的传媒界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一位比尔德堡组织的内部人士认为，“现在大西洋两岸几乎所有政府的重要人物都至少参加过其中的一次会议”^②。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一般派他的白宫国内政策负责人、外交关系协会前理事和财务总监加布里尔·哈古（Gabriel Hague）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加比尔德堡会议。肯尼迪总统在

① Thompson, "Bilderberg and the West," 157.

② Statement by John Pomain (Joseph Retinger 的秘书, Bilderberg 的创始人及首位永久秘书), 引自 Thompson, 169.

他的国务院中所任命的高级官职几乎都有比尔德堡的背景——包括国务卿迪安·拉斯克 (Dean Rusk)、副国务卿乔治·W·贝尔 (George W. Ball)、乔治·麦基 (George McGhee)、华尔特·罗斯托 (Walter Rostow)、麦克乔治·庞蒂 (McGeorge Bundy) 和亚瑟·迪安 (Arthur Dean), 等等。^①

约瑟夫·瑞廷格 (Joseph Retinger) 是比尔德堡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在 1960 年逝世前他一直担任该组织的秘书长一职, 作为欧洲联合的一个主要支持者, 他解释说比尔德堡会议提供了一个场所, 让人们就官方论坛所无法讨论的问题进行自由探讨:

即使与会者是一名政府官员, 是一位政党领导人, 是一个国际组织或商业机构的官员, 他所说的一切并不代表他所在的政府、党派或组织的意见……比尔德堡组织并不制定政策。它的目标是减少观点上的分歧, 化解冲突并促进相互间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意见不一致, 那么就通过倾听和考虑各种不同的观点来就主要的问题寻找一个共同的答案。组织并不考虑采取直接的行动, 其目的是让处于要职的人们注意到比尔德堡组织的新发现。^②

三边主义

随后, 日本成为西方国家圈子里新出现的第三股经济力量, 这促使人们考虑组成一个三边联盟, 把北美 (美国和加拿大)、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这种思想成为比尔德堡会议上频繁出现的话题。人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论坛把日

^① Thompson, "Bilderberg and the West," 177.

^② 引自 Thompson, "Bilderberg and the West," 177-178.

本包括进去，这个论坛应该有比比尔德堡组织更为正式的组织结构。

1973年，三边委员会由美国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与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两人创建，后者在1977年之前一直担任该委员会的顾问和协调人，后来他成为吉米·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① 三边委员会对自身作如下描述：

委员会的成员大约有325名杰出的公民，他们都是这三个地区掌握着领导权的人物。三边委员会每三年一度的会议首次于1973年召开，它最直接的目的是在政府之间出现大量矛盾的时候，能够将三个地区的最高层次的非官方的组织召集到一起，一起应对三方的共同问题。从更深层次的意义来说，其中包含着一种意思就是，美国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那样处于唯我独尊的领导地位了。为了成功应对未来的挑战，国际体系需要一种分权式的领导制度——尤其是需要日本和欧洲参与领导。委员会的工作时刻都体现着这些意图。^②

比尔德堡组织以其秘密性而著称，与此相反，三边委员会则是一个透明度很高的组织，它很乐意通过黄页上可查到的公开电话把它的成员名单和出版物目录分发给任何索取者，它的出版物是公开发行销售的。比尔德堡组织包括了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其他的高级政府官员和王室成员等，而三边委员会却要求其成员在担任政府高级官职时必须任期内退出该委

① Sklar, *Trilateralism*.

② 描述材料由 Trilateral Commission 提供。

员会。^①

三边委员会成员所形成的集体力量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它包括了世界上5个非银行的最大跨国公司中的4个〔伊藤忠公司 (ITOCHU)、住友公司 (Sumitomo)、三菱公司 (Mitsubishi) 和三井公司 (Mitsui & Co.)〕, 包括了世界上6个最大的国际银行中的5个〔住友银行 (Sumitomo Bank)、富士银行 (Fuji Bank)、樱花银行 (Sakura)、三和银行 (Sanwa) 和三菱银行 (Mitsubishi Bank)〕, 包括主要传媒机构的领袖〔日本时报公司 (Japan Times Ltd.)、杜邦公司 (Le Poit)、时代镜报公司 (Times Mirror Co.)、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Co.)、有线新闻网 (Cable News Network/CNN) 和时代华纳公司 (Time Wane)〕。

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都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前美国参议院发言人托马斯·弗里 (Thomas Foley) 也是其成员之一。卡特政府的许多要员既是比尔德堡组织的成员, 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人中有副总统蒙代尔 (Mondale)、国务卿万斯 (State Vance)、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 (Brzezinski) 和财政部长布鲁门索尔 (Blumenthal)。在克林顿政府中身居要职的前三边委员会成员有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内务部部长布鲁斯·巴氏合金 (Bruce Babbitt)、房屋与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西斯奈洛斯 (Henry Cisneros)、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 (Alan Greenspan)、中央情报局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约瑟夫·奈 (Joseph Nye Jr.)、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唐娜·E·沙拉拉 (Donna E. Shalala)、副国务卿小克里福通·沃顿 (Clifton Wharton Jr.) 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彼得·塔尔诺夫 (Peter

^① Thompson, "Bilderberg and the West," 176.

Tarnoff)。^①

虽然三边委员会公布发行它自己的形势报告，但它所做的并不局限于此，它通过多种途径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索尼公司董事长盛田昭夫的三边主义观点就是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相关内容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讨论。他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是三边委员会的日方主席。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交关系协会、比尔德堡组织、三边委员会都把相互竞争的公司领袖和相互竞争的国家政治党派召集在一起，使他们可以近距离地相互商讨问题并达成共识，这一点公众都没有注意到。参与者可能会认为自己所阐述的是跨地区的、甚至是国际性的观点，但事实上它是一个封闭的、排他的议程，只限于斯彻特斯城的精英参与。参与者主要是男性，富有并来自北方工业化国家，除了三边委员会里的日本人之外都是高加索人（Caucasian）。其他人的意见是难觅踪影的。

最终达成的观点是非常狭隘的，这在三边委员会的出版物中表现得很明显。里面的文章多出自善于推理和思想深邃的专家之手，差异颇大的观点都得以表达。然而他们都毫不怀疑地接受公司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前提。经济融合以及三方内部之间的税收、制度和其他政策方面达成协调一致——其最终目标是所有国家都达成一致——被视为是追求的信仰目标。争论的中心集中在怎样实现公司自由主义，而不是是否要实现。

它们没有提及的一个事实就是，各国标准的协调一致——这意味着必然要调整标准——只有通过国际间的协商谈判才能够得以实现，而从其本性上看，这些协商必须由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秘密地进行。因此，在没有一个选举产生的国际议会的

^① 引自 Trilateral Commission 提供的最近信息表。

情况下，呼吁协调标准就是呼吁做出关于标准的决策。借此，企业就能摆脱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立法机构的掌控，转而由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官僚们来控制，并由他们代表政府进行国际协商谈判。这对便捷的暗箱操作尤为有利，尤其是当这些官僚们来自同一个精英圈——如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时，情况更是如此。例如，乔治·布什总统的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在关贸总协定谈判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就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都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这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承诺通过北美自由贸易组织和关贸总协定方面，从共和党的布什政府向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转换的过程中没有出现一点纰漏。克林顿领导推进了许多被视为是布什政府应推行的协定议程，这使他赢得了三边委员会里的同僚们的赞许，但他却严重地疏远了自己的主流选民们，这些选民曾经希望他在贸易议程中能够带有较少的公司主义者的观点。在这类关键性的问题上，选举系统向选民们提供的仅仅是幻想的选择。

由精英人物推动的这种决策行为，打破了民主制度所要防止的小部分人控制政府统治职能的目的。他们这些人控制了政策讨论，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其他可能的政治选择，从而遏止了其他假设。

公司的全球化既不是为了人类的利益，也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相结合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公理。经济实体越大，其主宰性玩家就越大，政治权力就越集中于最大的一些公司里。公司及与其结盟者的政治权力越大，人民的政治权力就越小，民主制度就越没有存在的意义。我们有另一种选择：让经济日益地方化，使经济权力分散，并给人民带来更多的民主权利。然而，建构了排他性网络与联盟的斯

彻特斯城居民不可能清楚地表述并努力实现这个替代性选择。相反，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要看到的那样，斯彻特斯城的居民们正在动员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以所有资源来巩固其全球的公司统治。

十、收购民主制度

企业所创造的利润（我是指利润、商业基金和单个商人的所得）正在被大把大把地拿来资助自由……拼命地向那些明白政治和经济自由之间关系的学者、社会科学家和记者们提供所需资金。

——前美国财政部部长 威廉·西蒙 (William Simon)^①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之前，我们以为公司所拥有的金钱仅够买下南方国家。现在我们发现它们也能把北方国家买下来。

——伊格纳齐奥·皮昂·埃斯卡兰特
(Ignacio Peon Escalante)
墨西哥人自由贸易行动网

20世纪70年代，围绕在美国公司周围的是反叛性的反消费主义青年文化、日益高涨的环境和商品安全运动，以及来自亚洲的严峻挑战。公司的全球霸权美梦被撕得支离破碎，甚至连它们国内的地盘都有可能丧失。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它们动

^① 转引自 *Justice for Sale: Shortchanging the Public Interest for Private Gain* (Washington, D. C.: Alliance for Justice, 1993), 1.

用了自己的集体政治资源，重新控制了政治和文化进程。它们用尽各种方法，包括先进的市场营销技术、老式的贿赂选票、资助与自己在思想意识上相同的研究人员、采取法律行动以及其他许多基层动员等。这些基层动员方式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反对公司的环境与消费主义运动所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但公司的这些动员都是资金充足、策略复杂和组织专业化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调控化、经济全球化和限制公司责任——一句话，就是扩大公司的权利，减少公司的义务。他们的这些动员活动仍在全力开展。

动员公司的政治资源

1971年，美国商会向弗吉尼亚律师、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鲍威尔（Lewis Powell）请教如何应对企业集团正面临的问题，鲍威尔拿出了一份备忘录，他以“美国自由企业体制受到攻击”来警告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和消费主义行动者以及“宣传反对这一体制，并一直不断地密谋要破坏它”的人，会一起发起攻击。他认为，现在是将“美国企业的智慧、灵活性和资源整理出来对抗那些破坏者”的时候了。^① 企业集团与志同道合的基金会建立起强大的联盟，上述这些背景将为这个联盟展开组织化的工作提供舞台，其努力的目标是把美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与他们的思想意识结合起来。

鲍威尔的建议中有一个提议，那就是让企业集团创建一个由企业组织并资助的法律中心，从而维持、提高企业在美国法院体系中的总体利益。在这一提议下，1973年太平洋法律基金会（PLF）成立。该基金会位于萨克拉门托商会大楼内，它是由公司资助的众多“公益性”法律公司中的第一家，这些法

^① 转引自 *Justice for Sale*, 10-11.

律公司的目标就是让资助自己的那些公司的收益有所增加。^①该基金会专门对“空气清洁和水资源法规、禁止对联邦的荒原进行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工人的权利和公司税收”等问题为公司的利益进行辩护。他们的收入中约有 80% 来自于公司或公司的基金会。^②

太平洋法律基金会的主管律师罗蒙德·蒙鲍斯 (Raymond Momboisse) 在 1980 年的一次演说中表露了该基金会的真实面目, 他攻击环境保护主义者, 说他们是“自私自利的、动机是为了自己……他们有能力在一个为了公共利益的、高尚动听的名义下, 隐瞒自己的真实意图, 他们对自己加之于大众的伤害漠不关心, 他们利用法律和大众传媒方面的缺陷, 最重要的是, 他们有能力对社会产生永久性的伤害”^③。

企业集团在一流法学院中资助建立法律和经济研究计划基地, 支持它们进行学术研究, 并提出一个假设: 没有规则调控的市场能够产生效率最高的——因此也是最为公正的——社会。企业全额资助在诸如乔治梅森大学和耶鲁大学这些名校中召开的学术会议, 从而把这些事先确定好的假设判断引入经济学原则之中, 并在法理学方面加以应用。^④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 公司的利益是由旧式的公司游说组织来表达的, 这些组织都有很易识别的名称: 啤酒协会、国家煤炭联合会、商会或美国石油协会。公益性组织在积极行动, 当它成功地把广大的市民力量动员起来并对国会施加压力之后, 公司们认为必须另外再找到一个全新的应对

① *Justice for Sale*, 11-12; Mark Megalli and Andy Friedman, *Masks of Deception: Corporate Front Groups in America* (Washington, D. C.: Essential Information, 1991), 153.

② Megalli and Friedman, *Masks of Deception*, 153.

③ As quoted in *Justice for Sale*, 12.

④ *Justice for Sale*.

方法。

公司开始建立自己的“市民”组织，这些组织的名称和外表是经过精心装饰的，掩盖了公司对它的资助和它的真正的组织目标。国家沼泽地联合会的会标是一只大雁欢快地在一片沼泽上飞翔，但该联合会其实是由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以及房地产开发商们资助的，其目标是为减少政府对沼泽地转变成矿产钻探地区和购物中心的限制。公司赞助的消费者警示协会正在对付食物安全方面的政府法规。美化美国协会通过反对乱丢废物运动努力给它的资助者——瓶装产业营建一个绿色环保的形象，同时这些资助者们也在与强制性的回收再利用法规进行着抗争。其策略就是让公众相信，乱丢废物是消费者的责任——而不是包装工业的责任。^①

上述及其他一些由工业赞助的类似组织——在《欺骗的面具——美国公司的外围组织》一书中记录了其中的36个此类团体——的观点在传媒的报道中一直被视为是支持市民的。它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要让公众放心，公司的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劳动力、健康状况和环境保护都只是“特殊”利益。这些团体的高层支持者包括陶氏化工公司（Dow Chemical）、埃克森公司（Exxon）、美国伽夫隆石油公司（Chevron USA）、美孚公司（Mobil）、杜邦公司（DuPont）、福特公司（Ford）、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hillip Morris）、辉瑞公司、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Busch）、孟山都公司、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菲利普斯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美国

^① 这类案例在 Megalli and Friedman 的 *Masks of Deception* 中有详细记录。

电话电报公司 (AT&T) 和阿科 (Arco) 公司。^①

在企业利益集团的资助下，新保守主义的政策智囊库如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建立起来，此前建立的死气沉沉的智囊库，如美国企业研究会又重新焕发出生机，后者的预算增加了十倍以上。^② 1978 年，教育事务研究会成立，它通过支持公司的学者提出研究计划，从而支持公司在经济自由方面的观点，满足公司的需求。^③

1970 年，《财富》杂志 500 强企业中只有一部分企业在华盛顿有公关部，而到 1980 年，80% 以上的企业都已经在此处设立了公关部。1974 年，工会获得一半的政治行动委员会资金，而到 1980 年，工会只得到了少于 1/4 的资金。^④ 伴随着 1981 年美国总统一里根的宣誓就职，公司自由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联盟日益加强了它们对权力工具的控制。

尽管参加这些运动的许多人真心地认为他们是在为公众的利益而奋斗，但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他们对民主多元主义前沿阵地的攻击，借助这种攻击推进公司自由主义思想实现的进程。尽管这种推进是在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但公司权力的大量滥用仍是对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无情嘲弄。

组建企业游说集团

企业圆桌会议是一个由最大的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组

① Rosemary Brown, "Unveiling Corporate Front Groups," *Co-op America Quarterly* (Winter 1994): 14. For a published directory of business-sponsored front groups, see Carl Deal, *The Greenpeace Guide to Anti-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Berkeley, Calif.: Odonian Press, 1993).

② William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2), 48.

③ *Justice for Sale*, 3.

④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成的国家间协会。诸如国家商会和国家制造业协会这样的行业间组织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它们包含了有着不同利益和观点的各类大小企业，但是企业圆桌会议的成员却都是与经济全球化议程紧密相连的大型跨国公司。

首次企业圆桌会议于1972年在美国召开。它有200名成员，其中包括了《财富》杂志美国工业企业500强中前50位中的42位，包括了全美8个最大的商业银行中的7个，10个最大的保险公司中的7个，包括全美7个最大的零售商企业中的5位，8个最大的运输公司中的7个和11个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中的9个。在这个论坛中，杜邦化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他的3个主要竞争对手陶氏化工公司、西方石油公司及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坐到了一起。通用汽车公司与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的首脑也共聚一堂——在其他的工业领域，情况也很相似。在这个论坛中，以美国为基地的全球最大的各家公司放弃了他们在竞争中存在的分歧，从而在美国社会经济政策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全美企业圆桌会议是这样进行自我介绍的：

本会议是一个由首席执行官们组成的协会，成员们审视影响经济发展的公共问题，力图站在一个能够反映健全的社会经济原则的立场。圆桌会议首创于1972年，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坚信在持续不断的公共政策争论中，企业的领导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圆桌会议相信，企业的根本利益与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因为后者是企业直接的消费者、雇员、投资者和供给者……会议成员的选择反映了会议的目的，那就是希望能让各个地方和各类企业表达出各自不同的意见。因此，大约

200名来自各个领域的首席执行官们能够超越行业界限对国家问题进行思考。^①

可以肯定的是，圆桌会议是美国最具有排他性、成员同质性程度最高的组织之一。它对所谓思考国家问题的“跨部门”性的理解是极其狭隘的。成员们几乎清一色是年纪在50岁以上的白人男性，他们的平均年薪是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70多倍。^②会议的成员主要都是背弃了对国家利益和立场的承诺，并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收益的公司。一旦立场明确，圆桌会议就会积极行动起来使自己在政治上被认可，这其中的行动就包括由作为会议成员的首席执行官们去亲自拜访各位参议员和众议员。

在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方面，圆桌会议发挥了尤为积极的作用。圆桌会议的成员认识到，自由贸易的追捧者如果仅仅是由该国200个最大的跨国公司组成的会员俱乐部，那么，公众可能会认为自由贸易仅仅是一个特殊利益问题，因此圆桌会议成立了一个名为美国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外围组织，这一组织吸纳了大约2300家美国公司和协会成为它的成员。尽管该组织声称它代表了广大选民的利益，但该组织成员在各州的首领都是圆桌会议的企业成员。除了4个成员之外，所有圆桌会议成员都可以通过向美国谈判代表的顾问委员会陈述自己的主张，从而享有参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进程的特权。圆桌会议成员利用评论、选编文章、新闻报道和收音机广播、电视评论等形式让美国人相信，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会给他们带来

① 引自圆桌会议印发的小册子。

② 此比例是按照《商业周刊》1993年4月16日发表的1992年美国主要的大公司首席执行官每年384万美元的薪酬来统计的。由于圆桌会议成员都是美国最大的一些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我们可以对《商业周刊》的估算再往高点推算。

高收入的工作，使墨西哥人向美国迁移的现象消失，并能够提高环境质量。

根据半球资源研究中心（Interhemispheric Resource Center）的观点，美国公司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之前的12年间，已经把18万个工作岗位转移到了墨西哥，9个美国与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中的巨头〔联信公司（Allied Signal）、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通用电气公司（IGE）、通用汽车公司（GM）、菲尔普斯道奇公司（Phelps Dodge）、联合技术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IBM公司、ITT和TRW公司〕都在这些公司之列。墨西哥已经认定北美自由贸易组织中的一些主导公司侵犯了工人的权利，没有执行工人安全标准。许多在美国是主要污染源的公司都迁至墨西哥，或在墨西哥生产美国禁止生产的产品。^①

出租民主制度

华盛顿特区主要的增长工业包括营利性的公关公司和由企业资助的政策研究所，通过制造事件、各种意见建议、专家分析、民意倾向调查、直邮（Direct Mail）和电话请求等方式，提供了公司当事人所需的“市民”支持和塑造公共形象等服务。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称其为“出租的民主制度”（democracy for hire）。^② 博雅公司（Burson Marsteller）——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关系公司，1992年的净利润达20400万美元——它在埃克森的瓦尔笛兹油轮（Exx-

^① Sarah Anderson, John Cavanagh, and Sandra Gross, *NAFTA's Corporate Cadre: An Analysis of the USA * NAFTA State Captain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1993); 索取地址 IPS, 1601 Connecticut Ave. NW, Washington, D. C., 20009.

^②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35.

on Valdez) 石油泄漏事件中为埃克森公司服务, 在波泊灾难 (Bhopal Disaster) 中为联合碳化物公司 (Union Carbide) 服务。在 1991 年, 排名前 50 位的公关公司的总盈利为 17 亿美元。^①

在美国, 有 17 万公关公司雇员正在从事控制新闻、公众舆论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工作, 从而为它的委托人利益服务, 这一数字比真正从事新闻报道的人数还要多 4 万——而且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这些公司会组织发动市民写信, 挑选提供有偿服务的作秀者假装成“家庭主妇”在公众聚会上传达公司的意见, 在出版物中发表对自己有利的新闻和精心挑选的文章。1990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一家有代表性的美国报纸上, 有 40% 的新闻内容是公关类型的新闻、故事纪实和意见建议。根据《哥伦比亚新闻评论》的说法, 《华尔街日报》有一半的内容是专门的公司新闻发布。^② 随着时间的推移, 广告领域与新闻领域之间的差异日趋缩小。

正如共和党一直以来是与有钱人站在一起那样, 民主党在历史上一直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 尤其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的利益。民主党人长期以来一直非常倚重于下层的强大政治组织——倚重于人民而不是金钱——在选举时赢得选票。这些组织反过来又迫使政治家们与下层人们形成某种联系, 并确保自身承担某种地方性的责任。该党的这种联系是紧密的。随着电视在美国人生活中所占地位的上升和劳工运动的衰落, 昂贵的电视传媒活动日益处于决定选举结果的中心地位。其结果就是, 曾经作为民主党组织基础的下层组织日益瓦解, 这使该党丧失了人民党的港湾 (Populist Moorings), 让那些作为

^① John Stauber, "Countering the Flack Attack," *Co-op America Quarterly* (Winter 1994) 18.

^② Stauber, "Countering the Flack attack", 18.

该党政治基础的人们无法再去表达他们的见解。

随着这类组织的崩溃，许多在民主党旗帜下担任职务的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建立自己的资金筹措组织。这使他们更加容易受到有钱人利益的影响，从而使大企业对两党制定政治议程的控制力度加强。威廉·格雷德认为，现在民主党的政策方向很大程度上是由6个华盛顿法律公司来制订的，这些法律公司将政治影响力出售给有钱的当事人，从民主党政治家那里挣钱。这些公司也在为共和党提供服务，它们所做的生意就是做将权力交给任何出钱给他们的捐客。^①美国民主制度的悲哀状态在此一览无遗。

共和党对新环境的反应与适应的速度是最快的，它采用了一些先进的专业性大众营销（Mass Marketing）方法技术来赢得选举的胜利。利用这些技术，该党完成了一个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就是利用和扩大无权无势的人们之间的相互疏远，建立了一个支持精英议程的选民政治基础。

作为商业界的人士，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对营销的理解更为深刻，他们把自己在销售商品中运用的那套方法运用到政治领域，这中间就没有什么中规中矩的旧式政治家们以往的犹豫不决。其结果就是，现在选民们被视为一个被动的“消费者”集合体，是巨大的潜在购买群体。经过科学抽样进行的研究能显示选民知道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选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时，它们都可以了解选民们的感受。选举活动设计的策略之一就是让候选人与这些消费者的态度联系在一起。宣传形象一旦形成，将会带来积极的回应并有利于

^①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253-254.

出售。^①

美国的民主制度并不仅仅是出售给美国的跨国公司。墨西哥政府就曾花费高达 2500 万美元的资金雇请了大量的著名华盛顿政治说客，来支持它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日本公司估计每年要花费 1 亿美元用来对美国进行政治游说，另外还花费 3 亿美元用来建构一个全国范围内的下层政治网络，借此来影响公众的态度。日本政府和公司合计共雇佣了 92 个华盛顿法律、公关和游说公司来为自己工作。加拿大相应的数字是 55 个，英国是 42 个，荷兰是 7 个。它们的目标就是重新改写美国的法律，使之有利于外国公司——这些行动通常都是很有效的。^②

公司自由主义——就像烟草公司声称尼古丁不会让人上瘾、吸烟不会危及健康那样，也是一种声称和承诺都是错误的、为自我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我们的政治文化中的主流观念。这种状况是一个长期的运动所取得的成果，这个运动运用最先进的技术，通过灵活运用大众营销和控制传媒手段获得上述成就。这种主流观念同时也是更大的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更大的运动就是实现市场全球化，并把公司自由主义与消费主义作为同质全球文化的价值观。

① Greider, *Who will Tell the People?*, 270.

② Pat Choate, "Political Advantage: Japan's Campaign for America,"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0, 87-103 "Is Japan 'Buying' U. S. Politics?"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0, 184-198.

十一、营销整个世界

如果谁有权力规划出美好生活的内容并让它广为人们接受，那么他就拥有最大的决定权……在 1890 年之后，美国的公司就拥有了这种权力，并且……这些公司与一些关键性的部门结成了联盟，开始把美国社会转变成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充斥着的是消费、舒适和身体上的享受、奢侈豪华、挥霍和并购，以及年年见长的商品。

——威廉·利奇^①

公司高级决策层所梦想的全球市场是由具有同质性品味和需求的人们组成的……瓶子、箱子和标签上的牌子都是些全球化的标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可能不知道联合国的旗子，但他们却可以立即认出这些标记。

——理查德·巴纳特与约翰·卡瓦纳^②

现代社会中，电视在一片争议声中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文化传播手段。我们的学校可能位列其次。电视业已经完全被公司利益集团控制住了，它们现在正在向我们的学校喊话。其目标不仅仅是卖出商品、巩固消费文化这么简单。它也创造出了一种政治文化，使人们在心里把公司利益等同于人类的利益。用

^① William Leach, *Land of Desire: Merchants, Power, and the Rise of a New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xiii.

^② Richard I. Barnet and John Cavanagh, "The Sound of Money," *Sojourners*, January 1994, 12.

保罗·豪肯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想法由引人关注的传媒表达出来，这些传媒都代表着资助它的那些公司的利益，公司进行这种资助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安排现有的一切，使观众忘记身边的世界”^①。

现有一切的重新安排始于一种呼吁，这种呼吁要求在经济中消费者决定一切而市场作出回应。当世界上买方和卖方的规模都很小时，这种呼吁可能会实现。没有什么个别卖方能期望创建一种有助于购买他或她的商品的新文化。但在目前我们这个社会情况并不是这样。当代的公司都毫不保留地表示要重建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创建出一种宽容的同质性文化。当公司要求增加宣传、图像说明、传媒、创新性产品、消费者研究、市场营销培训和其他无数支持性服务的时候，就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各种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帮助公司对其出售的商品形成一种无穷的生产欲望，帮助培养出与公司利益相一致的政治价值观。

从美国走向世界

曾经有一段时期美国的主流文化是大众营销者们的噩梦。节俭和朴素是著名的“新教伦理”的核心价值观，这一伦理是由早期的新教迁移者带进美国的。新教徒信仰要勤奋，要参与社区活动，要有节俭并献身于精神生活。他们基本的生活准则就是所需的物品若不能有效利用那么就不能贪求过多。他们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用完，穿烂，让它发挥作用或没有它也行。”^②

① Paul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132.

② Duane Elgin, *Voluntary Simplicity*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3), 50-52.

贵格会教徒对美国早期也有很大的影响。尽管它更强调宽容和平等，但它与新教一样，也强调勤奋和节俭的价值观对个人精神发展的重要性。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和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都是美国早期的重要作家，他们都把简朴视为是通向感受上帝的必由之路。^①

消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零售商巨头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一直在努力增加消费者对他们所提供商品的需求量。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利奇在其著作《欲望的土地：商人、权力和美国新文化的兴起》中记载了这些商人是如何把一个强调整洁和朴素这一精神导向的文化，转变成一个自我放纵的物质文化的过程。利奇发现，所谓市场只是简单地回应消费者需求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些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编造出来的，这些人的生存方式就是操纵事实，说服消费者购买公司认为最有利可图的商品：

事实上，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可能是最没有认同性的公共文化之一，它之所以没有认同性有两个原因：第一，它不是由“人民”创造的，而是由商业组织与其他精英群体合作提出的，这些精英群体热衷并献身于获取利润，并且使资本的规模日趋扩大。第二，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之所以是没有认同性的文化，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日常的行为（但并不是秘密进行的），它认为只有自身才是美好生活的唯一选择，把其他内容都排除在外。通过这种方式，它使美国人的公共生活日益减少，否定美国人接受其他类型的组织和以其他方式看待生活，将他们对真正民主的许可加

^① Elgin, *Voluntary Simplicity*, 50-52.

之于主流文化（如果有那么一种许可的话）。^①

平民主义文化发源于美国一般老百姓的心和灵感，它强调财产权的民主化，强调共和国的价值，认为在这个共和国中每个独立的家庭都应该有自己的土地和生产工具，都能生产出超出自己消费能力的产品，都参与到他们共享的社区之中。他们实行的是一种强大的社会经济模式，货币经济的引入只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补充。

在美国，从以家户（household）为主的社会性经济和社区性生产向初级的货币化经济的转变发生在19世纪中期，在这一时期里大公司的数量开始增加。然而，直到19世纪70年代，在某个特定工厂里工作的工人人数平均下来仍然不足10人。市场仍然主要是地方性的或地区性的，绝大多数企业都是个人所有并经营的——这个世界仍然和亚当·斯密的理想很相像。

在激发产品需求方面，大公司的技能越来越熟练。最终市场营销作为一个管理专业诞生了，早期的商学院开始开设这门课程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靠在工厂工作赚取工资来谋生，因此政府就把宣传消费主义作为维持就业水平的一种手段。

商家熟练地运用色彩、玻璃和灯光，通过优雅的模特和时装表演营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现世天堂形象。博物馆里的展览描述了新文化令人动心的地方。渐渐地，个人就被那些强化欲望文化的信息所包围。广告、百货大楼的陈列窗口、电子信息、时装表演、一流大酒店的豪华装修和电子公告栏等都透露出一个经过人工加工的、美好生活的形象。信贷计划可以让人

^① Leach, *Land of Desire*, xv.

们毫不费力地过上这种生活。利奇说：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拥有大批量生产型经济的国家，它也是第一个生产了大规模消费制度和大规模消费诱导机制的国家，这两者一前一后，先后被引入市场并帮助销售大规模生产的商品。与其他国家相比，在为企业目标服务的各种制度之间，美国……铸造了一个更有效、更普及的统一联盟。^①

如今，电视已经是一个最主要的媒介，公司通过电视塑造美国人的文化和行为。统计分析的结果令人不寒而栗。^② 2~5岁的美国孩子平均每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是3.5个小时；每个成年人是5个小时。在一般成年人的生活中，只有工作和睡觉用的时间比看电视的时间长，电视有效地取代了社区和家庭生活、文化追求以及阅读。按这个水平计算，美国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年会看大约21000个广告，这些广告绝大多数都带着相同的意思：“买我吧——现在就买！”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为约75%的商业性电视时间和将近50%的大众文化教育电视时间支付广告费。黄金时间里30秒钟的广告售价在20万至30万美元之间，只有最大的公司才有能力负担这么高的费用。尽管对电视节目的内容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规定，但节目的制作方却是受雇去创作那些做广告的人愿意出钱买的电视节目，他们必须把这些公司以及它们认为较适当的节目内容牢记在心。

杰里·曼德（Jerry Mander）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说在为

① Leach. *Land of Desire*, 11-12.

② 这些有关电视的数据和分析引自 Jerry Mander, *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 The Failure of Technology & the Survival of the Indian Nations* (San Francisco, Calif: Sierra Club Books, 1991), 75-82.

公司目标服务的传播媒介中，电视是几近完美的选择。他解释说：

电视能够把同一个形象同时灌输进数百万人的脑海中，它能够统一观点、知识、品味和欲求，使人们与这一形象传送者的品味与利益趋向一致。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形象的传送者是各种公司，它们理想中的生活是技术导向的、商品导向的、实利主义的和与自然相敌对的。卫星传输技术能够把电视节目传送到全球各个区域，其中有些区域在不久以前可能还不在于这种冲击的范围之内。^①

全球性公司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它们带去的不仅是自己生产的产品和品牌，而且带去了它们偏爱的传媒和先进的销售方法，借用这些东西，它们可以控制自己接触到的所有文化。

1989年《经济学家》杂志的报告说，全球性公司所花费的广告费用已经超过了2400亿美元。另外还有3800亿美元花费在包装、设计和其他类型的卖点提升上。这些花费加在一起等于世界上每个人人均分摊120美元。^②虽然这些费用大部分是直接用来生产与销售某一特定产品的，但它同时也有助于产生一种流行的全球消费文化，有助于使公众在心目中把公司利益——尤其是大公司的利益——与公众利益联系在一起。

从总体上看，全世界花费在公共教育方面的费用是人均207美元（南方国家是33美元），而公司却花费比人均公共教

^① Mander, *In the Absence of the Sacred*, 97-98.

^② As cited in Richard J. Barnet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Imperial Corporations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171-172.

育费用一半还要多的钱，来增创对公司友好的消费者。^①此外，广告宣传费用的增长速度也远远快于教育经费增长的速度。从1950年以来，广告费用已经增长了将近7倍——比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快1/3。^②

MTV 中的世界——“可乐是最佳选择”

盛田昭夫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篇吹捧经济融合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认定差异巨大的地方性文化是一种贸易障碍。^③尊重地方性的品味和文化差异性获得消费者认可的一个条件，这就使全球性的营销运动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公司营销者们的梦想是在一个对品牌忠诚的情势下形成一种全球化的消费文化，这样一个公司在曼谷、巴黎和纽约可以使用同一个广告来推销其产品。情况的确是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用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罗伯特·顾祖塔（Robert Goizueta）的话说就是，“全世界的人们通过名牌消费产品和其他一些事物联系在一起”^④。可口可乐成功地成为一个全球性的象征，这对任何地方的公司高层都具有启发意义。

MTV 是摇滚音乐电视频道。与绝大多数传媒相比，它具有更大的实力去实现做广告的人的梦想。它对全球青少年及年龄更小些的人群有普遍的吸引力，这使它成为消费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理想工具。MTV 的流行摇滚音乐节目以其简洁和无关联的形象，如万花筒般的变化多端为特征。到1993年，每天

① United Nations,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1993*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1993), 48.

② Alan Thein Durning, “Can’t Live without It,” *WorldWatch* 6, no. 3 (May-June 1993): 13.

③ Akio Morita, “Toward a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Atlantic Monthly*, June 1993.

④ As quoted in Barnett and Cavanagh, “The Sound of Money,” 14.

基本上有 72 个国家的 2.1 亿户家庭收看。理查德·巴纳特与约翰·卡瓦纳认为，MTV 娱乐网络专门从事流行音乐电视的制作，它为众多的商业产品提供从不间断的服务，“它可能是对五大洲青年人影响最大的教育者”。他们还认为：

演出和广告一起共同营造了一种渴望的氛围——渴望去爱某人、渴望会发生某件事，渴望结束孤单的生活，渴望购买什么东西——一张唱片、一张摇滚音乐会的门票、一件恤衫、一辆雷鸟汽车，等等。与演出相比，广告的效应并不是更好的，因为它的认同度并不是很高……在这个星球上，人们都使用着同样的电器来看着或听着同样的商业歌曲和故事。^①

莎拉·弗格森 (Sarah Ferguson) 认为，青年文化尤其是音乐在商品化，音乐曾经一直是年轻人表达反叛精神的主要手段，现在这一文化使年轻人丧失了自身的反叛性，并积极地阻止反面文化的发展。她写道：“从地下发展成主流的新音乐风格占据的（音乐）圈子，没有其他自由声音可插足。”^②

雅芳 (Avon) 化妆品公司是最为积极和努力普及消费文化的公司之一。1994 年 8 月 2 日，《电视之国》(TV Nation) 的播放让我们见证了雅芳发起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指向的人群是巴西亚马逊盆地那些肮脏贫困的坎帕塞纳斯 (Campesinas) 人，目标旨在使他们成为雅芳产品的新消费群体。在那里，7 万名雅芳公司的女推销员把雅芳的信息带到每个乡村农户的家里。巴西雅芳公司的总裁塞罗迪 (Ademar Se-

① Barnet and Cavanagh, "The Sound of Money," 14.

② Sarah Ferguson, "The Comfort of Being Sad: Kurt Cobain and the Politics of Damage," *Utne Reader*, July/August 1994, 62.

rodio) 解释说,“我们不是想人们买更多的产品,我们开始在找从来没有买过我们产品的那些人”。正如雅芳公司女推销员们的笔记里所显示的,她们在圣塔伦(Santarem)地区那些偏远的村庄里挨家挨户地访问,发现这些新的消费群体中有许多是瘦弱的、满脸皱纹的年迈妇女,她们与自己那些赤着脚的孩子住脏的棚屋里。圣塔伦地区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读书写字,平均每户每天的收入仅有3美元。

数百名雅芳公司的女推销员留在了圣塔伦地区,继续拍电视广告,广告画面显示的是性感、年青、皮肤光亮的妇女与英俊俊朗的年轻男子在一起的浪漫景色。她们告诉那些长年生活和太阳底下劳作的老年妇女,如果她们使用雅芳的产品,她们会恢复自己的美丽容颜。主要的宣传集中在一种叫做焕新(Renew)的皮肤护理产品上,这种产品售价每瓶40美元,它能够通过去掉使用者的表层皮肤而发挥效用。一个电视广告运用特殊制作效果塑造了一个妇女的形象,她那岁月流逝所带来的衰老皱纹从脸上消失,她神奇般地变得更年轻了。巴西雅芳公司的沟通指导艾拉格罗亚(Rosa Alegria)说,“为了买它,女人们可以倾其所有,她们不再买诸如衣服、鞋子这类的东西。如果她们觉得皮肤确有改观,她们宁愿不再买衣服,而改为去买电视上宣传的某种东西。人们认为这简直是一个奇迹”^①。

教室里的公司

公司现在开始积极控制第二个主要的文化传承制度,那就是学校。根据消费者协会的统计,1990年有2000万学生在课堂上使用公司宣传的某些教学工具。其中有些公司直接就去为

^① TV Nation, produced by Michael Moore, NBC Television, August 2, 1994.

垃圾食品、服装和保健产品做宣传。譬如，国家马铃薯委员会就会同终身学习组织（Lifetime Learning System）提出了“数数你的片数”这一具有数学教育性质的计划，为“国家马铃薯爱好者月”活动而赞美马铃薯片。甜味剂是一种代糖，它的制造商就赞助了一个“全面健康”计划。^①

公司也一直在积极地活动，想把他们的垃圾食品塞进学校售货机和学校的午餐计划中。以学校食品服务工人为目标的贸易展览和杂志中充满了诱人的字眼，例如，“把墨西哥椎型玉米面豆卷（Taco Bell）带去你们学校吧！”，“比萨店提供美味的学校午餐”。由于有人建议立法禁止软饮料和其他一些“营养价值最低下的”食物进入公立学校，为此可口可乐公司发动了一场游说攻势。可口可乐公司在亚特兰大的发言人唐纳森（Randal Donaldson）说：“我们的策略很简单。我们想把软饮料放到任何想喝它的人伸手可及的地方。我们努力使软饮料随处可得，学校是我们想让它打进去的地方之一。”^②

其他的信息则在寻求如何使公司自由主义的信仰和价值观在青年人的脑海中生根发芽。因此，以在《纽约时报》上买专版宣扬它的公共利益而闻名的美孚公司提供了由致富学习公司（Learning Enrichment）生产的课程课件，据称这个课堂使用的课件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评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当然主要是吹捧它所能带来的益处。

面对着公众的环境意识日益觉醒这一不可阻挡的趋势，公司的应对策略是把自己装扮成是绿色无害的，同时寻求以一种

① 引自 Alex Monar 有关公司在课堂上做广告的资料，“Corporations in the Classroom,” *Co-op America Quarterly* (Winter 1994): 19-20.

② 引自 Robert Pear, “Senator, Promoting Student Nutrition, Battles Coca-Cola,” *New York Times*, April 26, 1994, A-20.

有利于公司目标的方式来界定这一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美孚公司对公共教育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为课堂教学提供光盘，这些光盘都对塑料制品大加吹捧，说把它们掩埋在地下是一种最大的浪费。埃克森公司的一个名叫“能源立方体”的课件省略了有关燃料效率、石化燃料的替代品和全球变暖等内容。它解释说石油的“能量是来自于贮存在有机化学物质内的太阳能”，事实上，它是想让学生们在心中把汽油视同为太阳能。

美孚公司和其他公司一道积极支持着国家经济学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在小学和中学课堂中普及经济学教学。美孚公司在《纽约时报》上花钱购买的选编文章，对高中高年级学生仅能答对 35% 的经济学知识调查题深表悲哀。很显然，对于什么是正确的回答美孚公司有它自己的一套答案。该文章认为：

当提及国内问题时，经济学知识有助于人们理解税收增减对工作安全和他们的生活水平所带来的影响。当涉及环境政策和法规问题时，人们有必要掌握一些基本的经济学原则，譬如，供给与需求、成本与收益和公司必须营利，等等。^①

通用汽车公司向国内所有的公立、私立和教会所属的小学邮寄了一张名为“我需要地球，地球也需要我”的光盘。快乐的孩子在水花四溅的水中游泳，在环境优美的草地上奔跑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为了应对这种趋势，通用汽车公司的这张光盘提倡开展诸如植树和回收再利用的活动。但这张光盘并没有提

^① “A, B, C, D, Economics,” *New York Times*, May 26, 1992, A-23.

及需要公共运输 (Mass Transit) 或者需要重新对城市进行设计以减少交通方面的需求。通用汽车公司建议建立汽车收集站, 并对用过的汽油进行回收再利用。光盘中所说的一切和伴随着的老师课堂指导都没有错。但是总体描述却是具有误导性的, 因为它忽略了关键性的事实和观点。

一频道是一个由广告人资助的学校教育节目频道。在 12000 多所学校里, 它每天都要直接在教室里播放 12 分钟的条状糖果、快餐和旅游鞋等方面的新闻和广告。为了给每个教室换上新的卫星光碟和光盘设备, 学校不得不同意让一频道在学年的 90% 时间内在教室里对全国 90% 的学生播放它的节目。老师没有权力对这些节目的内容进行解释或者把电视机关掉。

一项调查显示, 绝大多数学生都认为既然一频道能够在教室里播放, 那就说明它做广告的那些商品都是对他们有好处的。^①

学校教育公司的资深副主席马克·埃文斯 (Mark Evans) 在《广告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对公司提出了下述质疑:

为了形成迈向 21 世纪的市场占有率和顾客群体, 越来越多的公司把教育市场视为最紧迫的、最为重大的和成本收益率最高的领域……(吉列公司计划把它的安全剃须刀介绍给青少年是其中一例)……在通过立足于教室的、同辈模仿的生活模式来铸造品牌和对该产品的信任度……但你能提出一个倡议, 让学生们从学校教室的过道走向超市过道吗?^②

^① Donella Meadows, "Corporate-Run Schools Are a Threat to Our Way of Life," *Valley News*, October 3, 1992, 22; Monar, "Corporations in the Classroom," 20.

^② 引自 Monar, "Corporations in the Classroom," 20.

如果不能的话，学校教育公司这个美国最主要的学校课程产品的生产者随时都准备帮你实现这个目标。

其他公司也都在打算以赢利为目标在公立学校中经营运作。公司有可能为了赢利而把教室变成公司销售、形象塑造和思想形成的、大众传媒的新销售市场，这是令人吃惊的——也是令人后怕的。

1984 年的世界

公司在广告、游说、倡议和公关等方面的费用，无论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大众传媒上花费的，其目的都是鼓励采取个人和集体的行动，通过运用任何能够激起消费者的需求反应的方法来支持和增加公司的利益。保罗·豪肯是这样描述这些方法的：

一家造纸公司用原始森林中没有被杀危险的鹿作为它对未来进行承诺的、图腾性的证据，但是他们同时仍在为扫清和反对国会修订濒危物种法而斗争着。在一个广告中，土著印第安人赞许地看着零乱的草地被孩子们用塑料袋收拾干净，广告说这些塑料袋是可以降解的，但实际上是不可降解的。（在好几个州，美孚公司所做的这个广告都被律师协会起诉并受到惩处）。辛普森（Simpson）纸业公司以梭罗、惠特曼和利奥博特等人的名义，引进了一个“回收再利用”纸的生产线，其中部分利用了消费后弃而不用的废料。英国的核能源公司也声称，核能是绿色能源，因为它不污染空气。^①

^①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129.

烟草公司之所以耗资数百万美元，其目的就是想让公众相信，吸烟有害健康的说法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汽车制造商反对排放标准；军火商反对枪支管制；化工厂在非法倾倒它们的有毒废物；药品公司参与进行价格垄断。这类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着。与这些公司所声称的相反，《商业周刊》描述得就很好：“现代的多国公司不是一种社会制度。他们在政府之间进行清偿，把定价转变成使税收最小化，寻求去影响判断、输出工作岗位或控制技术，从而保持竞争的界限范围。”^①

公司通过控制电视来塑造我们的文化和政治，这使我们想起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电影《1984》和他塑造的一个到处有监视器监控以便控制市民们对世界的感知的独裁社会景况。与奥威尔所预测的情景相比，我们现实的形势更加微妙，技术也更加先进了。弦线不是由政府而是由公司来拉动的。统治我们的是压迫性的市场，而不是压迫性的国家。

（统治的）技巧是极其简易的。它们都集中于控制我们个人认同和价值观所在地的文化象征。在大众传媒出现之前，这些文化象征是由那些相互交流并通过艺术手段来表达内心情感的人们集体创作出来的。它们传达着人们对我们是谁这一问题的共同领悟。我们花在由公司操纵和包装的电视世界里的时间越长，花在直接的人际交往上的时间就越少，只有通过这些人际交往，文化认同感和价值观才能被世代相传地表达出来，得到巩固并得以更新。那些控制了大众传媒的人正日益控制着核心文化。

公司全球化梦想的建构者们正在寻求创建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世界上最强大的公司集团创造并拥有的普同性文化

^① “Empires of the 21st Century?” *Business Week*, February 21, 1994, 19.

象征将会取代差异巨大的各种文化象征，后者把人们与特定的区域、价值观和人类社区联系在一起。文化象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认同感和意义源泉。它们可以确认我们的存在价值和我们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它们激发了我们对自己的社区及其独特的生态系统的忠诚感，以及对社区和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福利的责任感。当文化象征的控制权落到公司手里时，我们实质上就是认可他们有权决定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什么美国人、挪威人、埃及人、菲律宾人或墨西哥人，我们都只是“百事一代（Pepsi Generation）”的成员之一。“百事一代”这个说法与任何地方和任何意义都毫无干系，只是公司发现它有利可图而强加给我们的。市场专制可以比国家专制更加隐蔽，但它奴役大众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效率却并不见得比国家专制要低。

十二、消除公共利益

它们不再用子弹和绳索（来侵略）了，现在改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了。

——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①

为了吸引像您这样的公司……我们夷平高山、砍光丛林、填平沼泽、让河流改道，重建城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在我们国家能有一个更便捷的做生意的环境。

——菲律宾政府在《财富》（*Fortune*）杂志上做的广告^②

① 引自其向非洲 11 国首脑的讲话，Libreville, Gabon, May 27, 1993.

② 该广告是 1975 年菲律宾政府播放的，引自 Elizabeth M. Kraemer and Donella H. Meadows, “*Money Flows*” (draft paper, March 29, 1994), 19.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匆匆忙忙地建构全球制度的过程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是联合国。联合国打算把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其中每个国家都有相同的一票——至少在联合国大会上是这样。联合国中的各国代表都是公众人物，他们在公众面前公开辩论，这种辩论经常是非常激烈的。但是联合国大会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权力。真正采取行动的权力属于安理会，在安理会中每个主要的国家都有投票权。从这种治理模式我们可以认为，联合国主要是一个辩论的论坛。

与此相对应，另外3个主要的多边机构在公众的视野之外悄无声息地建立起来——它们就是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通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后为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这3个机构通常被合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纪念44个国家代表于1944年7月1日至22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经济的制度框架达成了一致意见。布雷顿森林体系广为人知的目标是防止各国采用武力方式解决争端，把整个世界统一在一个相互独立和经济繁荣的网络之中。但在该体系的创建者们眼中它还有另外一个目标，那就是在美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全球经济体系，从而使美国能够在没有挑战的情况下获得全球的市场和原料。^①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机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成立的。关贸总协定是在随后的会议中成立的。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机构虽然是联合国正式任命的“特殊机构”，但它们都是独立于联合国而自行运作的。它们的治理和

^① Robin Broad, *Unequal Alliance 1979-1986: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Philippine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21.

管理程序是秘密的，小心地躲在公众审查和民主讨论的范围之外。事实上，世界银行的国际运转系统是极其隐秘的，它有关国家计划、策略和优先领域等方面的许多最重要的资料就是对本组织内的高层领导也是保密的。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大国既有权力投票否决某项决议，也根据它们在组织内认购的资金比例而有相应大小的投票表决权——这样就能保证它们能够制定并控制组织的议程。^①

在这一章中，我们考察了在发挥其作用的过程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如何共同行动，进一步加深全球体系中低收入国家的依赖性的，以及低收入国家是怎样向公司殖民主义开放它们的经济体系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考察全球最大的公司是怎样利用关贸总协定及其后继者世界贸易组织来巩固它们的权力，并使它们不用承担公共责任的。

形成借贷需求

世界银行最初设立的主要目标是援助欧洲的复兴。然而，欧洲国家对世界银行的贷款需求不大。欧洲国家经济重建时，需要的是快速分散的赠款或者是条件宽松的贷款，从而达到收支平衡，并进口商品临时满足基本的需求。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提供了这种类型的帮助，世界银行却没有。直到1953年——世界银行组建9年之后——银行的贷款总额仅有17.5亿美元，其中只有4.97亿美元是贷给欧洲重建计划的。与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的41.3亿美元贷款相比，这一数字显得黯然失色。^②

^① Bruce Rich, "The Cuckoo in the Nest: Fifty Years of Political Meddling by the World Bank" *The Ecologist* 24,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4): 9.

^② Rich, "The Cuckoo in the Nest," 9.

世界银行 1947—1948 年的年度报告承认，不仅欧洲不需要它的贷款，当该组织转向低收入国家时，它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这些国家无力提供世界银行可以接受的项目计划。

世界银行声称，就像公司自由主义者声称市场仅对消费者的需求作出回应是错误的那样，它仅对借入国的需求和请求作出回应也是错误的。19 世纪后期的大零售业销路面临着节俭文化，这使它没有足够的消费者群体，世界银行所面临的问题与它们一样。公司开始重塑价值观和制度，从而使之能够产生消费其产品的消费者群体。世界银行所采取的对策与公司的对策非常相似，它很少关注自己的行动在更大范围内所带来的后果，而主要只关心满足自己的需求。

当收债人上门时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前，从世界银行及其在各地区的姐妹银行中贷款有一个有条不紊的程序。此后受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各国提高石油价格的影响，南方国家的外债急剧攀升，70 年代到 80 年代之间，低收入国家的长期外债从 210 亿美元上升至 1100 亿美元。^① 由于实际利率暴涨，很明显借入国的负担大大加重，它们面临的将是无法履行偿还义务，并有可能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金融体系的监控者，它们——非常像法院任命的破产案件的清算接收员——进行了干涉，在真正的破产国家和国际贷款人之间设定财务结算的条件。

由于有国际清算接收员这样的能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进行“结构调整”的名义下，将一整套的政策应对

^① *World Debt Tables 1992—1993: External Fin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gton, D. C.: World Bank, 1992), 212.

方案强加给负债国。每套政策应对方案都要求进行彻底的经济政策改革，目标是引导更多受调整的国家资源和生产活动去偿还外债，将公共财产和服务进行私有化，推行对全球经济更加开放的国家经济体制。进出口方面的限制规定和关税都进行了削减，并且提供津贴以吸引外国的投资。

其中的一些改革例如减少对富人们的补助金，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是过时的了。然而这些措施依然被用来资助投资者。政府减少了为穷人提供社会服务的费用，把省下来的钱用于偿还外债。非洲和拉丁美洲进行调整的国家在1980年至1987年之间人均的政府总费用支出出现了下降，而整个预算中用于利息支付的份额却上升了。预算清单中所有其他的预算份额——包括国防——都出现了下降。在拉丁美洲，政府预算中分配给利息支付的比重从9%上升至19.3%。在非洲，这一数字从7.7%上升至12.5%。^①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它们的结构调整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债务危机已经得到缓解。它们指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许多经过结构调整的国家随后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出口部门得以增加，出口商品的总价值增加，吸引了许多新的外国投资，在债务偿还方面的灵活性增强了。但是这些国家的国际债务和贸易赤字却在上涨，社会状况在恶化。

为了吸引外资，进行调整的政府压制工会，降低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它们为外国公司提供特殊的税收减免和补助金，放宽环境保护法规的执行力度。几十个国家都希望通过增加自然资源和农产品的出口来提高自己的外汇收入，这使得他们所出口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下降，因此为了保持现有

^① Frances Stewart, "The Many Faces of Adjust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 no. 12 (December 1991): 18-51.

的外汇收入，精选并出口这些商品的压力就会更大。出口商品的价格下降，外国投资者的利润被拿回他们的本国，加上关税堡垒的降低使国内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所有这些使这些国家绝大多数都出现了长期的贸易赤字。从1980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期10年的调整期开始之年）到1992年间，低收入国家总的贸易赤字从65亿美元增加到347亿美元。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提供更多的贷款帮助这些国家支付日益增长的贸易赤字，作为它们执行结构调整的奖赏。结果，低收入国家的国际债务从1980年的1340亿美元增加到1992年的4730美元。每年支付的外债利息从64亿美元上升至183亿美元。^① 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指导下，世界上低收入国家的自立能力不但没有增强，反而每年都在把自己的未来更多地抵押给了国际体系。

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和政策中我们可以推断，在它们所偏爱的世界中，一国国内消费的所有商品都要从国外进口，并用从外国银行借来的钱来支付这些商品。所有的国内生产性资产和自然资源都归外国公司所有，都致力于出口商品来偿清外债。所有的公共服务都由赢利性的外国公司来提供。如果目标是帮助穷人，那它是毫无意义的。如果目标是增强世界的全球性公司的权力和利益的话，那它就是完美无缺的。

如果穷人很重要

正确地理解，发展应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人们的人文、制度和技术能力都得以提高，并利用掌握的资源生产那

① *World Debt Tables* 1992—1993, 208.

些持续地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商品和服务。有许多人把这一过程叫做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人有利，也是因为它是以人为中心的。尤其重要的是它把穷人和被排斥的人都包括在内，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① 在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国外的一小部分帮助是有助益的，但如果外国的投资过多的话就可能会有碍真正的发展，甚至会断送掉人们已经拥有的维生能力。

我们把问题进行提炼精简。贫困——一般被定义为是金钱的不足——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与缺钱相联系的被剥夺（deprivation）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无法得到充足的食物、衣服、住房和其他一些体面的生活所需的物质。这一简单的事实暗示，以人为中心要同时选择进口替代模式和出口导向模式，在早期的发展争论中，一般认为唯一的抉择就是，实行一些政策，使之能够为那些正在受剥夺的人们提供一些机会，让他们创造出使自己过上好日子所需的一切。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就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在做的一切。它们都进行大量的教育投资，使成年识字率和基础教育水平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它们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从而产生了一个建立在小型农场生产基础上的繁荣的农村经济；它们支持乡村工业的发展，让它们生产出小农户所需的商品。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是公平导向而不是出口导向的——这正好与公司自由主义者所谓的势不可挡的历史趋势相反。这些国家只有发展了基础广泛的国内经济之后，才会在国际经济中成为主要的出口国。

从跨国公司资本和世界银行的立场来看，以人为中心的发

^① David C. Korten, *Getting to the 21st Century: Voluntary Action and the Global Agenda* (West Hartford, Conn.: Kumarian Press, 1990).

展策略存在着一个重大的缺陷。因为它对进口的需求非常之少，因此对外国贷款也是需求不多。此外，它支持财产的地方性所有权，因而没有为全球性公司提供什么投资的空间。

当外国援助的赢利是用来使人们更加依赖于进口技术和专家时，用来鼓励依赖进口的消费生活方式、投资和腐败时，用进口商品取代国内生产的产品时，用来把数百万人从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和水源上赶出去时，这种外国援助即使规模庞大，对发展也起着反向的作用——上述这些都是世界银行的工程项目和结构调整计划通常会带来的后果。

此外，有证据表明，即使用世界银行自己界定的那种狭隘标准来衡量，它的绝大多数计划都是失败的。1992年，一个由威尔·沃朋汉斯（Willi Wapenhans）领导的世界银行国际研究小组发表了一个名为《有效实施：影响发展的关键因素》的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说，在1991年完成的世界银行资助计划中，有38%的计划在完成阶段失败了。^①更早些时候，世界银行的运行评估部就已经开展了一项为期4~10年的跟踪连续评估，评估对象是那些被世界银行认定在完成阶段是成功的项目。研究发现，25个被认定在完成时是成功的项目中有12个项目最终被证实其实是失败了。^②1991年所完成的项目中被认定成功结项的项目占62%。如果其中有一半项目最终得到了他们所预期的回报的话，那么不足1/3的世界银行项目就能够提供足够的经济收益来证明最初的投资决策是正确的。然而，无论失败与否，这些国家都要用自己宝贵的外汇去偿还贷款。

^① Reported by Pratap Chatterjee, "World Bank Failures Soar to 37.5% of Completed Projects in 1991," *Third World Economics*, December 16-31, 1992, 2.

^② Reported by Michael Cernea, "Farmer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Dialogue* 8, no21 (Summer1987): 1-19.

世界银行是不会为自己的错误决策承担任何责任的。

如果用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或加强民主治理制度的贡献来衡量的话，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遭遇了灾难性的失败，它给世界上的穷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严重阻碍了他们的发展。就执行项目最初的创建人所设定的要求而言——在经济上有权势者的控制下推进经济的全球化——两者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帮助有权势的政治选民与公司自由主义结成同盟，它弱化了南方国家的民主责任感，攫取了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们的职权，扫清了民主制度所设定的绝大多数法律和制度障碍，并通过跨国公司重新对南方国家进行殖民统治。

全球最高的审判和立法机构

布雷顿森林会议呼吁建立的第三个机构——国际贸易组织——没有成立，因为美国国会担心它的权力会侵犯美国的主权。关贸总协定代替了它的位置，但它的地位有点模糊不清，因为将近 50 年的时间里它一直是作为一个多边贸易谈判的机关而存在的，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 1995 年 1 月 1 日关税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平静地催生了世界贸易组织为止。对公司自由主义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低收入国家完成了公司自由主义学说的制度化过程，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既被授权又有实施能力，可以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同时完成这个制度化的过程。

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协议有 2000 页，其中的关键性条款掩藏在第 XVI 条第 4 段：“每个成员必须保证自己的法律、规则和行政程序与附加协议中所规定的义务保持一致性。”这个“附加协议”包括所有涉及商品、服务和知识产权贸易的主要多边协议。如果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成员国认为另一成员国的

法律剥夺了它根据新贸易规则本可以得到的利益时，该条款允许该成员国对另一成员国的法律提出质疑。这其中包括任何正式的法律，只有它要求进口商品需满足的地方或国家卫生、安全、劳动力或环境标准高于世界贸易组织所接受的标准。除非投诉方所在国的政府能够向世界贸易组织专门小组证明，它已经满足了大量的限制性条款，否则它就必须使自己的法律与要求较低的国际标准保持一致，或者接受永久性的罚款或贸易制裁。

世界贸易组织的目标就是“调和”国际间的各种标准。如果法规要求进口的商品满足地方性的标准，如回收再利用、使用含致癌物的添加剂、汽车安全、有毒物质、标签和肉类检测等，那么它们都会受到挑战性质疑。违反国必须证明它的标准的存在具有科学的依据。若理由仅仅是因为其国民不愿接受世界贸易组织的较低标准所带来的风险，那别国是无法认同这种解释的。

限制本国资源——如森林产品、矿物和渔产品——出口的各种保护性措施可能会被裁定为是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要求本地砍伐的木材或其他资源必须在本地周转，从而为本地提供就业岗位的做法也会得到同样的裁决。同时也必须提及的情况包括防止有些国家对本地投资者给予高于外国投资者的优惠待遇，或没有保护好外国公司的知识产权（著作权和专利权）。在新的世界贸易组织的统治之下，地方利益不再是地方法律存在的合理根据。国际贸易利益基本上就是跨国公司的利益，它拥有优先权。

世界贸易组织也可以对成员国权限范围内的国家法律和地方政府提出质疑，即使这些政府并不是新协定的签署国也是如此。有管辖权的国家政府被迫采取各种合理的措施来确保这些国家或地方政府去遵从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这些“合理的措

施”包括优先适用的法规、起诉和取消财政资助。

地方性法规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下容易受到挑战，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真的会遇到挑战。但是，确实也存在大量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同类的法规被此前较为宽松的关贸总协定规则成功地推翻了。还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被批准之前，美国、加拿大、欧共体和日本都已经彼此收集了对方大量的法律清单，一旦协定生效它们就准备把这些法律作为其质疑的对象。

尽管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是一个国家间的协定，质疑是由一国向另一国提出的，但一个具体质疑的推动力通常却是来自于那些认为自己受制于某一种特定法律的跨国公司。例如，烟草公司就不断地利用贸易协定反对那些旨在减少吸烟危害的卫生改革。^①

一项对国家或地方性法律的质疑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主诉方会在一个秘密听证会上向由3个贸易专家组成的专门小组提供他们的事实，主诉者一般是专门从事代理公司当事人的贸易事务的律师。除非某一特定的专门小组发出请求，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条款规定要有第三方的出席，例如来自非政府组织的制造业工会（Amicus）的简短发言。递交给专门小组的文件是秘密的，除非应诉的政府选择公开它自己的文件。专门小组的成员若被认为是支持某一个主张或决定的，那么他将被很明确地要求回避。举证的义务由应诉方承担，它应该证明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被质疑的法律并没有对贸易产生限制作用。

如果一个专门小组裁定某一国内法律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

^① Paul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99-100.

的规则，它会建议被诉的国家修改这一法律。这个小组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法院。一国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完成法律的修改，它会面临着经济处罚、贸易制裁或两者兼而有之。

在建议的相关规则中，复查小组的建议在提交 60 天后自动生效，除非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成员一致投票同意拒绝这些建议。这就意味着这 100 多个国家包括赢得这个决定的国家都必须投票反对专门小组的决定并推翻它——这实际上使上诉程序几乎等于是毫无意义的。

世界贸易组织既有立法权也有司法裁决权。关贸总协定允许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在 2/3 成员国代表投票同意的情况下更改某一贸易规则。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贸易律师的全球议会，在未向各国立法机构咨询的情况下，它就有权自行修改自己的章程。

代表公司利益的治理

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扮演了极具影响力的角色，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它们也十分活跃。尤其是在美国代表团，它们的利益得到很好的表达，而美国代表团在关贸总协定的协议形成过程中发挥了轴心的作用。这种许可公司参与代表团的现象存在的关键在于 1974 年的美国贸易法，该法建立了一个贸易顾问委员会制度，把公众的观点引进美国的贸易谈判过程之中。^① 贸易委员会要遵守 1972 年的联邦顾问委员会法的规定。这一法案为所有诸如此类的各种联邦顾问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指导方针。这其中包括要求公众的意见必须

^① 有关贸易顾问委员会的信息是自 Tom Hilliard, *Trade Advisory Committees: Privileged Access for Polluters* (Washington D. C.: Public Citizen's Congress Watch, 1991).

“在表达出来的观点的要点和顾问委员会执行的各种功能之间被很好地进行均衡”。顾问委员会的程序也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

美国贸易代表处把这一要求仅仅解释为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代表企业这个集体，并“在部门之间、生产线之间、大小公司之间、各个地理区域之间和地区团体之间进行均衡”。^①国会民众监督机构在1991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在3个主要的贸易顾问委员会总计111名委员中只有2名是工会代表。批准设置的环保组织的一个席位仍然空缺，也没有消费者的代表。贸易小组很少向公众通报它的会议情况，也不允许公众参加会议。

然而，公司利益是很好地被代表着的。该研究发现，3个委员会中共计有92个委员代表着某个公司，有17位委员是贸易工业联合会的代表，有10个委员是化工业的代表。这些委员会中最重要的就是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其成员有IBM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伯利恒钢铁公司、时代华纳公司、3M公司、康宁公司、美洲银行公司、美国运通公司、斯科特纸业公司、陶氏化工公司、波音公司、柯达公司、美孚公司、阿莫科公司、辉瑞公司、惠普公司、惠好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它们也都是美国圆桌会议的成员。这些成员中除了通用汽车公司外都是由该委员会的会长或主席亲自做代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官员们在各自的公司里都是首席执行官。国会民众监督机构认为：

^①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and Office of the U. S. Trade Representative, *Procedures and Rules for the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s for Trade Policy Matters*, (n. d.), 3, as cited in Hilliard, *Trade Advisory Committees*, 9.

顾问委员会与政府的贸易谈判代表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因此必须对专门小组的成员进行安全性的甄别。委员会成员有一个特权，那就是有一个特殊的阅览室，里面有各种已分类的文件供非政府的顾问们阅读。为了使顾问们对正在进行的关贸总协定谈判的看法能够更快地传达给谈判代表，委员会建立了一个数据库，谈判代表动一动手指就能立即看到一个顾问委员会成员所说的话。贸易顾问体系的政府方发起人不辞辛苦的工作令谈判代表对谈判程序中的细枝末节都了如指掌。公司方的贸易顾问们尽管对谈判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他们都是无声无息地暗地在幕后工作的。^①

商业部 1989 年的一份文件向我们叙述了在 1979 年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的谈判中，顾问委员会成员是如何介入其中的：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们在华盛顿花费大量的时间与贸易代表们就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磋商，并检查了拟提出的协定的原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贸易代表们都是遵循顾问委员会的建议的……如果没有执行他们的建议，政府就会告诉委员会为什么不能采纳他们的建议的原因。^②

在这 3 个贸易顾问小组中的 92 个公司中，有 27 个公司或他们的分公司在 1980 年至 1990 年期间由于没有遵守现行的环境保护法规，而被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总计罚款了大约 1210 万美元。其中的 5 个公司——杜邦公司、孟山都公司、

① Hilliard, *Trade Advisory Committees*, 7.

② “Government Seeks Advice from Industry on U. S. Trade Policy,” *Business America*, January 16, 1989, 9, as cited in Hilliard, 7.

3M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柯达公司——都位居环境保护署的十大危险废物排放公司之列。公司集团曾经尝试反对加利福尼亚州安全和有毒物质监管法，这次尝试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在这过程中，委员会成员中有29个公司或他们的分公司共为这次努力捐赠了80万美元，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法案在全美国范围内是一个首创，它要求对有致癌可能性的商品进行明码标识，要求限制饮用水中的有毒排放物的排放量。在另外一次较量中，委员会成员中有29个公司共筹集210万美元成功地使另一个加利福尼亚州首创的名为“巨大绿色”的法案流产，这一法案中有许多条款要求对有毒化工产品排放物设立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①

克莱顿·尤特（Clayton Yeutter）曾是乔治·布什政府的农业部部长，他公开说，他在任期内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运用关贸总协定来否决、取代严格的社会和国家食品安全法。他辩称道，“如果世界其他地方都认为对某一商品应采取某种标准，而美国或欧洲委员会的标准与它不一致的话，那么美国就得承认是自己错了”^②。

世界银行组织采纳由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或 Codex）制定的全球食物卫生和安全标准。食品法典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1963年的政府间组织，它由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管理，工作目标是建立农药残留、添加剂、兽药残渣和标签等方面的国际标准。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批评者认为，该标准受到工业一方的严重影响，倾向于与下行的标准保持一致。例如，

^① Hilliard, *Trade Advisory Committees*.

^② As quoted in Mark Ritchie, "GATT, Agriculture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US Double Zero Plan," *The Ecologist* 20,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90): 217.

美国绿色和平组织的研究发现，食品法典委员会至少在 8 个广泛使用的农药方面的安全标准系数比美国当前的标准要低 25。^① 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所允许的 DDT 残余量比美国法律规定的要高 50 倍。^②

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政府代表团一般包括非政府的代表，但他们一般都不是来自于工业部门的。在 1989 年至 1991 年之间，有 140 个世界上最大的多国食品和农业化工企业参加了食品法典委员会的会议。在总计 2587 名个人与会者中，只有 26 名代表来自公益团体。^③ 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公司雀巢公司有 38 名代表与会。雀巢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解释说，“我认为政府更有可能在公司中，而不是在粮食部门自封的阿亚图拉^④（Ayatollahs）中找到合格的人选。”^⑤

保护知识产权的垄断

为了确保竞争性的市场有效运转，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了许多必要的条款。但对于跨国公司运用经济权力以不公平的手段将竞争者排挤出市场的情况，世界贸易组织却没有采取措施去加以限制，也没有措施去限制公司通过并购吸纳竞争者，或限

① 参见“Power: The Central Issue,” *The Ecologist* 22, no. 4 (July/August 1992): 159.

② Cited in Ritchie, “GATT,” 216.

③ 参见 Tim Lang 为英国国家粮食联盟作的调研，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Protecting the Future against Free Trade* (New York: New Press, 1993), 100-103.

④ 阿亚图拉：高级的男性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权威，一般担任一个政治角色并被认为是值得仿效的对象。——译者注。

⑤ 1993 年 4 月 24 日与《新科学家》杂志访谈，见 Natalie Avery, “How Companies Influence Global Food Standards,” 最新发表于 *Third World Network Features*, 87 Cantonment Road, Penang, Malaysia, January 1994, 7.

制公司与竞争者结成战略性同盟以共享技术、生产设备和市场。事实上，世界贸易组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内容要求强化政府法规和标准，而且都是在知识产权的协议之中：专利权、著作权和商标权。在协议中世界贸易组织要求各国政府进行强有力的干预，来保护公司对信息和技术的独占垄断权。

尤其糟糕的是，公司正在努力通过申请专利把包括种子和天然药物在内的遗传物质（genetic material）据为己有。美国公司在国内积极寻求对种子和遗传物质进行专利保护，他们说服政府，把保护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基因工程生物，包括除了基因工程合成的人之外的、所有小至微生物大至动植物的生物。一些公司把基因加入某一物种的种子中，并对这一制作方法申请专利，借此他们就有效地获得了对整个物种进行研究的权利，以及研究所产生的有用产品的独家垄断权。这些公司急急忙忙地想在世界贸易组织之下将这种垄断权扩展到全世界。艾格瑞斯特公司是格雷斯公司的子公司，它于1992年获得了一项所有基因工程或“转基因”的棉花品种的美国专利，并正在其他国家地区申请同样的专利保护，这些国家地区包括印度、中国、巴西和欧盟，它们占世界上棉花产量的60%。1994年3月，该公司在一项所有的转基因大豆方面获得了欧洲专利，相似的专利申请也正在美国进行。

多年以来，农民们都是从上一次丰收的农作物中留下种子供下一次播种用。根据美国目前的专利法规定，如果一个农民保留并重新播种了某种专利产品的种子，他就违反了专利法。^① 公司正在向全球进军希望能够对种子和其他的生命形式进行全球垄断，这成为印度农民举行游行示威的原因之所在，

^① Hope Shand, "Patenting the Planet,"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ne 1994, 9-3.

因为这些农民发现，在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下，他们只有向跨国公司支付专利税后才能储备自己的种子。^①

汉斯·里恩德斯（Hans Leenders）是公司种子储藏与培育工业联合会的秘书长，他就清楚地表达了企业对于什么是人们的正确的、适当的维生手段的观点：

即使绝大多数国家的农民都有从自己的农产品中保留种子的传统，但在环境改变的背景下，有这种传统并不等于说农民可以不支付专利税而使用这种种子并生产出商业性的产品……种子公司将会为更好地进行保护而努力奋斗。^②

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是南方国家反对将生命形式进行专利化的领导人，她认为“这其实是要求将农业和粮食系统的全球垄断权交给跨国公司的另一种说法”^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其实是一部分公司正在招摇地努力着，努力建立自己对世界上共用的生物遗产的独家垄断权。^④

回顾这3个布雷顿森林机构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就会发现，它们的真正功能是极其专一的。世界银行是一种专门为北方国家的大公司提供出口资助的制度设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北方国家金融机构的收债人。关贸总协定则为公司创建并实施了

① Shand, "Patenting the Planet," 9-13.

② As quoted in Vandana Shiva, *Monocultures of the Mind: Perspectives on Biodiversity and Biotechnology* (London: Zed Press, 1993), 122.

③ Shiva, *Monocultures of the Mind*, 122.

④ *The Ecologist, Whose Common Future? Reclaiming the Commons*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3), 55-56.

权利保护法案，从而使世界性的大公司自身的事务不受人民、社区和民主政府的干涉。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1994 年庆祝了它们的五十华诞。世界各地的市民组织为这一事件在全球发起了一个名为“50 年已足够了”的运动。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这 50 年历史何止是足够了，全世界的人们和环境几乎再也无法忍受这一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终结强国对弱国的统治。它只是以更隐蔽的、更具有欺骗性的方式掩盖了殖民主义。与旧式的国家殖民主义一样，新的公司殖民主义并不是什么不可避免的历史力量推进的产物。它只是人们在追求精英人群的利益基础上进行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在推进调控化和经济全球化方面，这种精英人群的利益与公司的利益紧密相连。其结果就是，最大的跨国公司和全球金融体系所掌握的控制人类事务的权力日益增长，它们使用这些权力去追求各种利益，而这些与人类的共同利益却日益相悖。当政治经济权力集中在一部分能够命令绝大多数公众的巨型公司的手中时，就不可能会有一个健康、公平和民主的社会了。我们已经创建了一个系统，就连这个系统的创建者及从中获得丰厚回报的人现在都已经无力去控制它了。在第四部分，我们会考察这一系统的本质和运作机制。

第四部分 无赖的金融体制

十三、金钱游戏

在这个新的市场中……数十亿的财富能在一霎间进出一个经济体系，这种金钱的力量是如此的惊人，所以一些观察者发现这种游资（hot-money）背景正成为一个影子世界政府——这必将导致民族国家主权概念的沦丧。

——《商业周刊》^①

现代银行系统什么都不生产，只生产货币。这一过程可能是制币这一手艺发明以来最令人吃惊的事情了……如果你想成为银行家们的奴隶，请为你的奴隶身份付完款，然后让银行家们产生出货币来就行了。

——前英格兰银行（1937）董事 约西亚·斯坦普勋爵
(Lord Josiah Stamp)

几乎每一天里都有 50 万到 100 万人在黎明时分就爬起来，打开电脑，来到他们自己的世界里，忘记了现实世界中的人

^① “Hot Money,” *Business Week*, March 20, 1995, 46.

们、事情和大自然，沉湎于世界上最赚钱的电脑游戏“货币游戏2”之中。上了线后，他们就进入了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由数字代表着货币和复杂的规则，货币遵守这些规则可以出现无穷无尽的形式变化，每次变化都有它自身独特的风险和再生产的特性。通过互动，这些进行竞争性交易的游戏玩家都力图从其他玩家手里赢得货币，放进自己的账户里。玩家也可以通过相互借贷和出价来使自己游戏中的账户数字渐增。他们也可以购买大量的外来的金融工具，从而使他们不用真正借入货币就可以平衡他们的储备。这玩起来像是一个游戏，但其结果却是在现实中真实地存在着的。

经济全球化的传说并不只是斯彻特斯城居民的幻想世界和全球帝国建构者们梦想中的故事。另一个不受个人力量控制的故事正在上演，它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制度系统之中——这是一个有关货币及其作为一种制度的演变的故事，它正在以一种危及人类利益的方式改造着我们人类社会。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现了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有害的一面，让我们认识到，市场有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使自身偏离高效率的财富生产，转向财富的剥削和集中化。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它使那些思想深邃的、善良的人们被欺骗，从而服务于甚至直接制造出对贪欲的无尽追求，由此产生的后果既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也不是他们能够宽恕并接受的。

尽管这些后果是全球性的，这里我们像上一部分一样只是着重关注美国，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全球的经济及其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美国一直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因此，全球经济系统的力量及其功能错位应该是首先从美国显现出来，并向全球扩散的。

货币与价值的脱节

要理解全球的金融体系发生了什么，我们首先得了解货币

的本质。货币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发明，它的产生是为了满足一种重要的需求。

最早期的市场交换是物与物之间直接的等价交换，这意味着相遇的两个人只有在一方所拥有的物品正好是另一方所想要交换的物品时，交易才会发生。商业的有效扩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当人们开始使用某种自身拥有固定价值的物品——装饰性的贝壳、盐块、一些贵重的金属或者是宝石作为交换的媒介物时，这种受限的状态才开始得以改观。最终，金属铸币根据自身所含的贵重金属分量提供了标准的交换单位，这些贵重金属通常是黄金或是白银。后来出现了一个新想法，那就是如果把贵重金属放在地下室里，而发行交换所需的贵重金属的纸币可能会更便捷一些。在某种意义上，纸币最初是一种收据的等价物，它表明持票人拥有一定价值的贵重金属，但纸币更方便、更便于携带。

所有这些变革都只是走向货币与真正的价值相分离的其中一大步。1944年具有历史意义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迈出了另一大步，在这次会议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诞生。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新型全球金融体系，每个参与这一体系的国家都保证将自己的货币以固定的汇率与美元相挂钩。反过来，美国政府保证美元与黄金的交换比价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水平上。这一体系使世界上所有的通货都以黄金为标准，这一标准由美国储备在肯塔基州纳克斯堡（Fort Knox）的黄金作为后备。许多政府也因此接受以美元作为黄金储备的证明，选择用美元而不是黄金作为他们控制的国际外汇储备。

在随后的20多年里，这一金融体系运行得非常良好，但后来有一个迹象越来越明显，那就是美国为了给其全球范围内的庞大军队和商业扩张提供经费，制造出来的美元日益增加，

已经超过了它能够用黄金换回的能力。美元成为一张仅由美国政府发行、上面写着数字和一些复杂的艺术作品的高质量纸张而已。世界各国的通货不再与任何价值物相联系，只有在达成共识之后，其他国家才会接受这些货币用来交换真正的商品和服务。

计算机广泛运用之后，下一步已经比较明显了——废除纸币，只是简单地在计算机中存储货币的数额就行了。虽然硬币和纸币依然在流通，但越来越多的世界金融交易是直接电脑之间进行电子划账的。货币已经就为一种几乎与任何实际价值物无关的、纯粹的抽象物。

金融体系的这种转变需要在四个基本方面取得进展：

1. 美国在用美元资助它的全球扩张，其中有许多美元现在出现在外国银行或者是美国银行的国外支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这些美元是不受美国联邦储备系统规则和储备要求的约束的。

2. 计算机化和全球化把全球的金融市场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任何一台计算机终端上的个人都可以与各个主要市场的价格波动保持即时性的联系，能够在其中一个或所有的市场上几乎同时地进行交易。可以给一台计算机编程序，这样它就能够在无人操纵的情况下进行上述操作，能够自动地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内执行牵涉几十亿美元的交易。

3. 投资与否的决策权此前曾经是由许多个人来掌握的，现在这种权力集中在相对较少的专业投资经理人的手中。由于个人把他们的储蓄放在专业的投资经营领域，而不是用来购买并持有股票，因此互惠基金所控制的投资基金的总额在3年之内翻了一番，到1994年7月底总额已

经达到 20000 亿美元。与此同时，银行业方面也进行了重大的改组联合——仅在 1992 年 9 月到 1993 年 9 月期间就有 500 多家银行进行合并或者是关闭了^①——巨大的基金投资集中控制在主要的国际“货币中心”——银行的手里。养老基金估计现在的财富总额已达到 40000 亿美元，它主要是由这些巨型银行的信托机构进行管理，这大大地增加了它们的金融权力。所有公司投资总存储量的 1/3 和 40% 的公司债券来自退休基金。^②

4. 投资的期限已经大大缩短。那些进行基金投资管理的经理们以他们能够带来的收益为招牌来相互竞争投资者的资金。互惠基金的成绩每天都在世界各大主要报刊上刊登，每个月和每个年度都有无数的部门在比较基金运转的情况。个体投资者有权根据各种基金运行的结果在各种基金之中进行投资转移，他们只要按一下电话按键或者点一下个人电脑的鼠标就可以完成这一操作。对互惠基金的经理人来说，所谓短期投资就是指一天或更短的投资，长期投资可能就是一个月。养老基金的经理人的评价周期稍微长些。

由于巨大的竞争压力要求产生即时性的收益，所以专业经理人员经过经营管理使投资总额中的个人储蓄得到增值。对一个生产性的投资而言，上述投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难以使自

① “Another Year in ‘Bank Heaven’?” *Business Week*, January 10, 1994, 103.

② 养老基金数据来自 Randy Barber and Teresa Ghilarducci, “Pension Funds, Capital Markets, and the Economic Future,” in Gary A. Dymski, Gerald Epstein, and Robert Pollin (eds.), *Transforming the U. S. Financial System: Equity and Efficiency for the 21st Century*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3), 288.

身达到成熟的程度。可以用来进行这类“投资”的金钱数额远远多于现实存在的生产性投资机会。市场所期望得到的回报是绝大多数生产性投资在一年以上的运行周期里也难以提供的。因此，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就抛弃了生产性投资，偏爱于掠夺性投资，并且在无视这种行为所产生的人类后果的情况下自行运转着。

金融系统日益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而运转着，其规模之大使全球经济中的生产性部门都相形见绌。货币游戏的玩家们将资金在世界各地流动着并在一霎间放弃投资，这使世界日益处在巨大的货币波动的影响之下。乔尔·库特兹曼（Joel Kurtzman）是《纽约时报》的前任商业版编辑，后来是《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据他估计，在世界生产性经济中每1美元周转一次，在纯金融经济中虽然无人知道确切的周转速率，但相应地会有大概20美元到50美元的周转。仅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每天都有大约8000亿美元到10000亿美元的成交量^①，远远高于商品和服务每天200亿美元到250亿美元交易量这一数值。据库特兹曼分析：

这8000亿美元交易额中的绝大部分……都投向了期限非常短的投机性投资之中——时间从几小时到几天，最多不超过几个月……这些钱只投在制造货币的领域……这么多的钱完全足以购买日本9个最大的公司——即使把这些公司估价高些——这些公司包括日本电报电话公司、日本7个最大的银行和丰田汽车公司……这些钱投向了选择

^① 在1993年7月一个普通的交易日中，仅在纽约票据交换所同业银行支付系统中，就出现10870亿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交易。参见 Jay Mathews, “Putting Currency on Trial,”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2, 1993, H-1.

性贸易、股票投机和固定利息率贸易。它也投向那些短期的随机性交易之中，在这种交易中，投资者以一种比价购买诸如债券或通货这类产品，希望在另一次交易中以另一种比价卖出这些产品并从中获利，有时通过电子手段这种买与卖的交易几乎同时发生。^①

上述这种货币与任何真正的价值都没有关系。然而这些货币的经理人员冒着丢失声誉和职业的危险，进行着数以百万计的这种高速的、短期的交易，并使这些货币的升值速度比一般的利润升值速度还要快。这种增长依赖于金融系统的能力，金融系统能够在不管产出的商品和服务的实际价值是多少的情况下，不停地提高所交易的金融资产的市场价值。当这种增长出现后，控制这一增值资产的人的金融或购买能力也就提高了，与此相比，生产真正价值的其他成员的购买力就相对下降了，他们的相对补偿能力也在减弱。^②

巨大的货币制造机器

有两种方式可以在不创造价值的情况下生产出货币：一种方式是负债；另一种是抬高资产价值。全球金融体系对这两种方式的各种具体运用手段都很擅长，能够熟练地运用它们来生产货币。

① Joel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64, 149.

② 详细的非技术性财经讨论可参阅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Howard M. Wachtel, *The Money Mandarins: The Making of a Supra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0); 和 Roy C. Smith, *The Money War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Buyout Boom of the 1980s* (Plume, N. Y.: Truman Talley Books, 1990).

负债

只要学习一点基础性的经济学课程，人们就会对银行系统通过逐渐增加货币生产量来制造货币的方式都不太陌生。在美国，当联邦储备在开放市场购买政府的债券时，负债的情况就出现了。比如说联邦储备委员会从 A 这个人手里购买了 1000 美元的债券，A 是把他的钱存在 M 银行里的账户上的。然后联邦储备就加给 M 银行的储备账户 1000 美元来完成这一购买行为。当仅要求 M 银行保留一定比的储备金，如 10% 时，它就能够从中借出 900 美元给 B 这个人，而 B 的储蓄账户是在 N 银行。现在 A 在 M 银行有现金资产 1000 美元，而 B 在 N 银行有 900 美元。保持 10% 的储备率不变，N 银行能够把 810 美元出借给 C，而 C 在 O 银行里有储蓄账户，O 银行就能借出 729 美元给 D，依此类推。联邦储备最初购买的 1000 美元债券最终使银行通过发行 9000 美元的新贷款而在银行里生产 9000 美元的新储蓄——在没有创造任何有价值事物的条件下货币被生产出来了。

联邦储备放进银行系统的新货币总计是 1000 美元，但因此而逐渐增长成为 10000 美元新货币，在这里有 9000 美元是处于借贷的状态，银行希望借此通过活期利息率取得收益，我们假设是 8%。这意味着银行系统每年有望最少能从这 9000 美元的贷款中获得 720 美元的利润回报，银行得到这些回报，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把一个数目加在借入方的账户上，然后在自己的未付贷款数目中记入相应数目的资产额。现在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说银行是个好行业了。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使用了经典教科书中关于银行怎样产生货币的例子，假定平均的储备金要求是 10%——真正的储备金要求是在 0%~14% 之间，这根据银行的规模和账目的性

质来定——这些储备金必须留作为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储蓄。^① 如果没有这个储备金的规定，从理论上说，银行能够无限制地进行货币的生产。

当美国在国外的花费超出了它的财力时，在世界各地流通的美元供应总量中将会有比重越来越大的美元流向外国银行和美国银行的海外支行。有名的货币如欧元，它不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储备要求的约束。如果银行控制着账户，而政府无法强制要求它保留一定的储备的话，那么这些银行就会把它的所有储蓄的数目都借出去，如果它们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全球的银行系统就能够无穷无尽地扩大它的货币提供量。

资产价值

一种股票或者一种无形资产如土地与一件艺术品的价值是由市场对它的需求程度来决定的。如果一个经济系统中充满了货币与追求快速回报的投资者的话，那么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受投机商希望别的投机商继续抬高价格的影响。布雷迪(Nicholas F. Brady)是乔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他曾说过，“如果资产是黄金或者是石油的话，这种现象就叫做通货膨胀。如果是股票则叫做财富创造”^② 这一过程是自足的。当一项资产的价格上涨时，更多的投机商就会被吸引过来，价格就继续上涨，然后会吸引了更多的投机商——直到这个气泡爆炸为止，这就好像墨西哥的股票过度膨胀后崩溃，导致1995年的比索危机一样。

^① 实际比率根据如银行总资产等因素而有所变动，但平均值稍低于10%。

^② *Report of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Market Mechanism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1-2, as cited in Wachtel, 251.

拥有这类资产的人既没有改变自己资产的潜在价值，也没有改变资产生产真正的商品和服务的社会能力，但是他们的购买力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出现巨大的变化。我们经常会受这样一种观点的影响，那就是购买力的变化是与真正财富的变化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经常是简单的和虚构的。下面的内容摘录自乔尔·库特兹所写的《货币的消亡》一书，它描述了1987年10月19日纽约股票交易所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一天之内下跌22.6%之后，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如果从1987年8月份的牛市时期来看，仅仅两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投资者们就损失了1万多亿美元。这一损失等于美国包括所有的住房、工厂、办公大楼、道路和升值的不动产等一切人造事物的价值的1/8。这一损失非常之大，它能使人们瞠目结舌、思维停顿。1万多亿美元够全世界的人吃上两年，能够使第三世界处于悲惨困境之中的各国变成中等收入的国家。它能够购买1000艘核航空母舰。^①

那些投资于股票市场的人其实是在丧失自身的购买力。库特兹曼所提到的住房、工厂、办公大楼、道路和升值的不动产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实际上这10000亿美元连向全世界提供5分钟供给的能力都没有，原因很简单：人们不能吃钱。他们吃的是食物，股票市场价值的崩溃本身对世界上真正的粮食供应增加或减少的影响还比不上一粒大米的影响大。只有当特定公司的股份能够买卖时价格才会发生变化。这些公司的生产能

^①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98.

力，甚至他们银行账户的可用现金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此外，尽管对个人来说，股票价值代表着他的潜在购买力，但它们并不真正地反映市场上所有投资者的购买力的总和，原因很简单：因为你不能用股票凭证去买东西。譬如，你不能拿一张股票凭证交给你所在地区杂货店的收银员来付账。你首先得先卖掉股票，把它变成现金。尽管任何个人都可以以现价卖掉一张股票凭证并用换来的钱买货物，但如果每个人都同时这样做的话，1987年10月19日所发生的一切就会重现。他们持有的股票就会像被刺破了的气球一样迅速贬值。这个“钱”——购买力——就会迅速蒸发。我们所面对的是市场投机商们建构出来的一个财富的幻觉。它代表着持有者们的真正购买力，但条件是气球仍在膨胀。

世界金融市场上交易的这些巨大金额正在其整体性质上发生着急剧的变化，发展的趋势是金融分析家们和商人正在被理论数学家也即“定量主义者”所取代。他们运用高深的概率理论和混沌理论在数学公式的基础上建构项目管理策略。因为人们无法用新的项目管理策略所要求的最佳速度来计算并做出决策，所以世界金融市场的交易就在与生意毫无关联这一形象的基础上，直接由计算机来完成。按库特兹曼的说法：

至少从最古老的意义上看，这些计算机程序不是在交易股票，因为它们与那些引发公平问题的公司没有什么关系……计算机只是很简单地……交易着数学上精确描述的金融产品（股票、通货、债券、期权、期货）。只要所有的参数与保存在电脑程序中的描述完全一致，到底是哪种产品符合这种描述是不重要的。对股票而言，如果它的波动率、价格、交易规则、投资收益和Beta值（风险系数）与电脑里描述的一模一样的话，那么任何人都可以买卖股

票。计算机很少关心股票是 IBM 公司的、迪斯尼公司的还是 MCI 公司的。计算机不关心该公司是在制造核弹头、反应堆还是在制造药品。它不关心在北卡罗来纳州或者南非是否还有树木。^①

金融系统的决策日益由计算机来决定，这些计算机以深奥的数学公式为基础，目标是唯一的，那就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纯粹的抽象物来进行复制。这与 1776 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市场无形之手的思想相去甚远，但却是 20 世纪 90 年代“自由市场”统治世界的现实情况。全球金融体系已成为一个寄生的肉食动物——它以自己的主人——生产性经济的血肉为生。

十四、掠食性的金融

你怎样挣钱都挣不了这样多。美元已经走上了邪路，它的活动范围太狭小了……任何用美元或其他通货进行投机或者贸易的人都不会挣钱也不会输钱。你对一切都无能为力。这真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太平洋安全银行外汇交易商 卡米那·罗通顿^②

(Carmine Rotondo)

①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161.

② 此言论是在 1987 年货币较稳定的时期做出的，引自 Hobart Rowen, “Wielding jawbone to Protect the Dollar,”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87, H-1, 参见 Howard M. Wachtel, *The Money Mandarins: The Making of a Supranational Economic Order*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0), 269.

公司自由主义思想的假设之一就是，从投资行动能够增加经济蛋糕的规模、提高社会的净福利并因而提高所有人的福利这个角度来看，其本质上它是“生产性”的。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经济系统中，大多数的投资都是生产性的。但是全球化经济却不是一个健康运作的经济系统。在太多的例子中，它奖赏的都是提成性（extractive）的投资者，这些人并没有生产出财富，他们只是简单地提成并聚集现有的财富。一般说来，提取性投资者的收益是建立在其他人或社会损失的基础之上的。

在最糟糕的情况下，一个提成性的投资即使会给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回报，实际上也会使社会总财富减少。一个团体能够保持资产的生产性潜能，并为即时性的利润而清算资产，当一个投资者能够从这个团体手中取得一项生产性资产或资源——譬如土地、木材或者甚至一家公司——的控制权时，（上述这种总财富减少的）情况就会发生。投资者正在提成财富而不是在生产财富。在某种情况下譬如一片原始森林，资产可能是不可再生的。一项投资如土地或股票价值的升值如果只是产生了货币或赢得权力，没有生产任何相应的价值，那么它也是一种提成性的投资形式。投资者什么都没有生产，但他或她的社会购买力份额却增加了。

投机是另一种形式的提成性投资。金融投机商所从事的不过是一种形式复杂的赌博——压注于所选择的价值，赌它升或降。一个投机商赢利了，他或她仅是获得了别人所生产的财富的所有权。如果一个用借来的钱进行投资的大投机者投机失利了，大金融机构的生存就会处在危险之中，其结果是要求助于政府财政的紧急援助（bailout）才能使金融系统免于崩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公众都受到了损失。几乎没有什么投机商的行为会有助于财富或社会福利的增加。

尽管投机商们认为他们的行为提高了市场的流动性和稳定

性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场中，投机性的金融活动是不稳定和经济破坏的主要根源。此外，无论投机商对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做出了多大贡献，就他所提取的利润和所花费的费用而言，这些贡献都是有着巨大的成本的。高层次的衍生性金融手段将会引发其他的风险和经济失调，这些也是尤其值得关注的地方。

衍生性契约（derivatives contracts）是目前金融新闻报道的一个热点，它指把赌注压在股票价格的变动情况、通货的价格、利率甚至是全部的市场指标上。利率方面的期货合同直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才出现。如今尚未履行的利率合同达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① 据估计，1994年年中尚未履行的衍生性合同的总价值大约是12万亿多美元。^② 1993年《经济学家》杂志估计，全球的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股票总价值在20万亿美元左右。^③

衍生性金融手段风险尤其巨大，原因就是它们通常是用赢利购买得来的，这意味着买家他最初只有很少的一点储蓄来应对潜在的财务风险。最大的玩家即使他们潜在的财务风险可能导致数亿美元的损失，可能也根本没人要求他存留任何钱以应对财务风险。^④

更高级一些的衍生性金融手段是非常复杂的，就是那些从事此类交易的人都经常难窥其中的奥妙，用《财富》杂志的话

① Joel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128.

② Felix Rohatyn, "World Capital: The Need and the Risk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4, 1994, 53.

③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Everybody's Favourite Monsters," *The Economist*, March 27, 1993, 6.

④ 观点来自与丹麦哥本哈根盖亚公司总裁 J. T. Ross Jackson 的私人谈话。

来说就是：

如果运用得当，这些衍生性金融手段会使这个世界更加简单化，因为它使它的买家有能力去处理和转移风险。但若掌握在投资商、不择手段的小贩手中，它们就是风险生成的强大的杠杆借贷机制（leveraged mechanism）^①。

不确定性和风险的生成

对真正从事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贸易的全球跨国公司而言，不同通货之间兑换关系不时的波动可能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在决定利润或亏损方面，它可能会比生产效率或市场份额的作用还要大。相反，投机商们会利用这种波幅率而生意兴隆，因为波幅率通过下列方式成为他们提取收益的源泉：

1. 判断同一种或相似的商品、金融工具在两个市场中的暂时价格是不同的。这种判断使投机商们立即从价格较低的市场中买进，从价格较高的市场中卖出。这种行为的盈利幅度不大，但它基本是没有风险的。当投入的货币数量巨大时，这种策略是十分有利可图的。问题的关键是其他人也会发现这个机会。因此速度是非常关键的，有一家公司花了3500万美元购买了一台超级计算机，它的目的仅仅是希望能够比别人抢先2秒钟判断东京的股票走势。^②

^① Carol J. Loomis, "Untangling the Derivatives Mess," *Fortune*, March 20, 1995, 50. 杠杆借贷，也称举债经营，指借钱进行投机买卖以期获得大于利息的利润——译者注。

^② "Survey: Frontiers of Finance: On the Edge," *The Economist*, October 9, 1993, 4.

2. 推测商品、通货汇率、利率和诸如股票、债券、各种衍生性产品等的价格波动。投机行为包括投赌注于短期的价格波动。这些赌博有很大的风险，当它是用借来的钱举债经营时情况尤其如此。

3. 确保其他投资的安全以抵抗未来价格变动的风险。有些人把卖出衍生性的合同作为风险保障的一种形式，譬如一个农场主通过一个期货合同把自己的农产品价格固定在一个数字上。然而，与风险保障相比，越是复杂的衍生性手段的投机性程度就越大。

在稳定的金融市场中，人们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投机性的利润。在大多数情况下，提成性的投资者是利用价格的波动来获得生产性投资者和实际的劳动者所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这是对其他的生产性产出私自征收的一种赋税。例如，我们很难看到电子连线市场是怎样为公众的目的而进行价格调整，从而减少两秒钟的差别的。金融市场的波动程度越大，各种形式的提取行为的机会就越大。

风险更大、更不稳定的提成性投资方式在一种新生的互惠基金形成过程中获得了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基金叫对冲基金（Hedge Funds）——该基金专门进行高风险的短期投机，并要求最低的初期投资额不低于 100 万美元。这类基金中最大的一种叫“量子基金”（Quantum Fund），其老板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该基金控制着价值 110 多亿美元的投资财富。因为这种扩张性的对冲基金可以通过杠杆借贷使每一美元的投资财富能借入 25 美元或更多的财富，所以一个 100 亿美元的基金等于能够潜在地控制超过 2500 亿美元的财富。1993 年许多大型的对冲基金可以为其股东带来 50% 的收益。但伴随着的失利风险也是很大的。有一个小型的对冲基金在两

个月之内就在抵押市场中损失 6 亿美元，不得不以破产告终。^①

对冲基金有总体较高的杠杆借贷率，这使基金的潜在赢利和风险都在增加。当家庭购买者、农户和从事生产的公司的贷款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时，对冲基金就会与银行系统的基金联系在一起，参与满足贷款需要的行动，但这种方式是否对社会有益仍值得怀疑。

索罗斯宣称，投机商可以让市场更快地走向平衡状态，从而提高市场的稳定性，但在联邦众议院银行委员会（The Banking Committee of the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证据面前，他的谎言最近被他自己戳穿了。索罗斯告诉该委员会说，当某一投机商赌某种价格将会上升但实际却是下降了，为了保护他自己，该投机商不得不把自己的基金卖出，这将会使价格的下降速度加快，并使市场的波动性上升。然而，索罗斯告诉该委员会说价格波动并不是一个问题，除非所有人都同时卖出并产生一种“中断”（discontinuity），因为这意味着没有买家。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处于市场中的人都将无法卖出，进而遭受到“灾难性的损失”。^② 他的证据很明显揭露了专业投机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价格波动是他们利润的源泉。如果他们从事的是生产性投资的话，他们对价格波动的观点肯定是另外一个样子。

索罗斯是靠经验来宣称说投机商能够塑造市场价格的方向并带来稳定性的。他已经有这种金融市场的塑造者的传奇式的名望。《纽约时报》在文章《索罗斯在说，全球市场在听》中

^① Saul Hansell, "A Primer on Hedge Funds: Hush-Hush and for the Rich,"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94, A-1, D-15.

^② "Excerpts from Soros Testimony,"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1994, D-6.

就赞誉他，说他只要告诉别人他已经使自己投资的价格上涨了，他的投资价格就真的会上涨。在把赌注押在德国马克上后，索罗斯在《泰晤士报》（伦敦）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说，“我希望马克与所有其他通货间的汇率比价下跌”。跟《纽约时报》的说法一模一样，它真的就下跌了，以至于“美国和欧洲的交易商都说这个市场是索罗斯的市场”^①。1993年11月5日，《纽约时报》的商业版面里有一个故事叫做“有关索罗斯购买的传言使黄金价格飙升”。

1992年9月，为了与英国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成功地维持英镑价值的行为相对抗，索罗斯卖掉了价值100亿美元的英镑。^②在这过程中，他被誉为是迫使英镑贬值的主要人物，因为英镑贬值可以打破固定汇率体系，当时各国政府正尝试着把这种汇率体系运用于欧洲联盟。固定汇率是一个受投机商们诅咒的事物，因为它们消除了投机商赖以生存的价格波动空间。因为索罗斯扮演了一个保护投机利润机会的角色，所以他从金融系统中提取了估计约10亿美元来充实他的投资基金。^③这一行为在金融场所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在11个多月的时间里英镑对日元的比价下跌了41%。这其中就存在着投机商们视为机会来源的各种各样的波动率。^④

拉扎德兄弟公司（Lazard Freres & Co.）的高级合伙人费

① Allen R. Myerson, “When Soros Speaks, World Markets Listen,” *New York Times*, June 10, 1993, D-1.

② “Big Winner from Plunge in Sterling,”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7, 1992, D-9.

③ Elizabeth M. Kraemer and Donella H. Meadow, “Money Flows”（为1994年3月24日 Environmental Grantmakers 年会而准备的论文），48.

④ Jay Mathews, “Putting Currency Trading on Trial,” *Washington Post*, August 22, 1993, H-1, H-4.

利克斯·罗哈廷 (Felix Rohatyn) 做了下述结论, 这些结论的根据和可靠性已经日益明显:

在许多情况下, 与中央银行的干预相比, 从总体上看对冲基金以及投机性行为现在可能要对外汇和利率变动负更大的责任。

……衍生性的金融业务……引发了包括金融制度与全球的公司在内的一连串的危机; 这个链条中的任何一个弱点或漏洞 (例如一个大量投资于衍生性金融业务的大机构破产) 都会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严重的影响。^①

1994年, 许多大公司、银行甚至是地方政府都开始积极参与衍生性金融业务市场, 把它作为抬高自身利润的一种手段, 这一情况已经引起商业媒体的关注。风险可能很大, 但是这些作为主要玩家的机构一般在公开的财务报表中都不泄露他们在衍生性金融市场上的财务风险, 而更愿意把它们称为“表外业务” (Off-Balance-Sheet) 交易。这使投资者和公众很难准确地估计真正的风险有多大。

只有在报道了重大损失之后, 人们才知道事实的真相, 譬如, 当宝洁公司宣布由于利率抬升的速度比预测的更为迅猛, 他们的衍生性金融业务损失了 10200 万美元时^②; 又如, 当不动产坏账需要对新英格兰银行进行联邦保偿时, 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大约有 330 亿美元的总资产。然而管理者却发现该

① Felix Rohatyn, "World Capital: The Need and the Risk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4, 1994, 51-52.

② Saul Hansell, "A Bad Bet for P. & G.," *New York Times*, April 14, 1994, D-6.

银行还有通过各种衍生性手段进行的表外业务投入 360 亿美元。^①

1994 年 7 月，潘恩韦伯集团 (The Paine Webber Group) 宣布，它将花费 2.68 亿美元去保偿它的一种货币市场基金，该基金在一次衍生性金融业务投资失利之前，一直都是以安全、可靠而著称的。1994 年美洲银行公司和加弗瑞公司 (Piper Jaffray) 也采取了相似的行动。^②

1994 年，最为公众所熟知的衍生性金融业务冲击波出现在 12 月份，当时加利福尼亚州亚奥林吉县宣布，它用公共资金买来的 74 亿美元投资基金将会损失 15 亿美元，这些公共资金来自该县 187 个学校区、交通当局和各个城市。该县借了 140 亿美元投资于对利率敏感的衍生性金融业务，当利率上升时它就亏损了。结果是，该县必须对包括学校在内的共同服务进行重大的经费削减，并可能急剧地提高税收。^③

1995 年 2 月出现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一位在新加坡巴林银行 (Barings) 办公室工作了 28 年的交易商在大约 4 周的时间之内把该公司 290 亿美元的货币投入到日本日经股票指数期货和日本的利率业务中去——这给该公司带来 13 亿美元的损失。它使得有着 233 年历史、令人尊重的巴林银行所拥有的 9 亿资产丧失殆尽，并被迫宣布破产。^④ 在这个消息宣布之后

① Rohatyn, "World Capital," 52.

② Susan Antilla, "A Concealed Danger for Funds," *New York Times*, April 17, 1994, 15.

③ "Today, Orange County: The Muni Mess on Wall Street: How Bad?" *Business Week*, December 19, 1994, 28-30.

④ Saul Ansell, "For Rogue Traders, Yet Another Victim,"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1995, D1, D8; "The Lesson from Barings' Straits," *Business Week*, March 13, 1995, 30-32; Richard W. Stevenson, "Young Trader's \$29 Billion Bet Brings Down a Venerable Firm,"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8, 1995, A-1, D-9.

的4小时交易中，东京日经指数下挫了4.6%。^① 一个没有特殊的个人财富和名望的交易商的行为就能引起这样严重的结果，这是全球金融系统易受忽视的不稳定性的标志，在这一系统中，数以千亿的美元会对最新的新闻曝光迅速作出反应。

从波动中获利

私人投资者在全球货币市场投入大量的金融资源，他们对政府通过利率管理和外汇比价来保持经济稳定的努力嗤之以鼻。艾伦·马特兹（Allen Metzler）是全球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研究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估计，全球的中央银行行长如果达成一个一致意见去保护某种通货不受投机行为的攻击，那么他们最好有能力能够在一天之内集中140亿美元的货币，这与通货投机商每天超过800亿的交易额相比，这一数字也是少得可怜的。^②

在1994年上半年美元对日元和马克的比价下跌了近10%。1994年6月24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16个中央银行协调采取干涉行动，拿出大约30亿~50亿美元来减缓这种下跌趋势。这一市场就很少被人注意。

现在我们的处境是上述干涉已经根本无法减少波动，它们所能做的仅仅就是在把纳税人的钱交到投机商们的手中。

1994年12月，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冲击使我们对金融系统失调的代价之昂贵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尽管金融传媒几乎没有讨论这一事件，但墨西哥金融危机的背景与它的经济奇迹景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墨西哥的经济奇迹是在宣传推销北

^① Sheryl Wu Dunn, "Tokyo Stocks Plunge on British Firm's Collaps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1995, D-1.

^② 参见 Joel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89-91.

美自由贸易组织的运动期间由克林顿政府和大公司向公众描述的。

许多年以来，墨西哥一直在增加它的国外借贷——因此使它的外债在增加——来偿还消费品的进口、资本流失和债务利息。这种借贷采取了多种形式，其中包括高风险、高利率的债券给外国人；把公共公司卖给外国私人利益集团；用投机性的狂热吸收外资使墨西哥的股票市场猛涨。在此前的5年内，墨西哥所吸纳的700亿美元外国“投资”资金中，仅有10%左右的资金真正地用于物资商品的生产，用来扩大生产能力，并因此形成偿还外债的能力。许多转入外国人手中的资产的价格是建立在虚假膨胀的资产负债表基础之上的。仅预计的债息支付额一项就超过了该国预计的出口收入。墨西哥的“经济奇迹”仅仅是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Ponzi Scheme）。^①

哪些人从这些资金流入中获利了呢？在这期间一部分墨西哥人聚集了大量的财富。《福布斯》杂志在1993年度对世界富豪们的调查中列出了14名墨西哥的亿万富翁。1994年的调查中列出了24名。^②

这个经济泡沫在1994年12月破灭。当投机商从市场蜂拥出逃时，用比索来衡量，墨西哥损失了其股票市值的30%。由于资金外逃，这样就产生一种压力要求过度升值的比索贬值，这样就把墨西哥政府拖进了深深的财务危机之中，迫使政府对比索进行贬值。这极大地改变了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使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价格抬升到很高程度，大多数墨西

① 据自 Leg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财政总监 Christopher Whalen 的一次访谈，参见 Russell Monkhiber of the *Corporate Crime Reporter* January 19, 1995, 在网上发布。

② “The World’s Wealthiest People,” *Forbes*, July 5, 1993, 66; “The Billionaires,” *Forbes*, July 18, 1994, 194-195.

哥市场都没有能力买进。如果出现墨西哥政府被迫不履行契约义务的情况，那么那些控制着墨西哥债券的华尔街投资者们就会跑去向美国政府哭叫，说天要塌了，除非美国纳税人愿意资助进行保偿。克林顿总统绕过持反对意见的国会，建立了一个保偿计划，拿出总计 500 多亿美元纳税人的钱来确保华尔街银行和投资机构能够收回他们的投资。该计划的批评者注意到，这些钱一分也没有流到这次危机中承受了主要负担的数百万墨西哥穷人和中产阶级的手中。

到 1995 年 3 月中旬为止，这种保偿计划和墨西哥政府发行利率高达 92% 的债券措施都没能阻止住比索的持续下跌。墨西哥政府强制实施的经济紧缩措施在 1995 年前 4 个月里大概使 75 万墨西哥人失业，政府对抵押品、信用卡和购车贷款征收高达 90% 以上的利息率，这使许多家庭负债累累。^① 由于向墨西哥出口量减少，估计美国的工作岗位的减少量可能会高达 50 万个。^②

当投机商们迅速地把他们的货币向安全的避难所转移时，从墨西哥危机开始的冲击波在相互联系着的全球金融市场产生回声。墨西哥股票市场的泡沫破灭之后，持有其他拉丁美洲国家金融证券的投机商们开始紧张起来，他们很快就把自己的钱撤出来，这导致在一个月之内拉美主要的股票投资每股的股值下跌了 30% 多。^③ 当美国的保偿计划把美元与下跌的比索连在一起之后，谨慎的投机商们就卖出美元，购买德国马克和日

① Anthony DePalma, "Mexicans Ask How Far Social Fabric Can Stretch," *New York Times*, March 12, 1995, A-1.

② Alien R. Nyerson, "Peso's Plunge May Cost Thousands of U. S. Job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0, 1995, D-4.

③ Anthony DePalma, "Crisis in Mexico Deepens Damage in Latin Market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1, 1995, A-1, D-2.

元，这更进一步地削弱了美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的地位。^①

那些云端高处的斯彻特斯城居民们怎样看待这些问题呢？在墨西哥比索崩溃的过程中我碰巧正在从纽约飞往旧金山的飞机上。1995年3月的美国航空公司杂志《半球》放在飞机的每个座位袋里面，杂志的一篇重头文章就是盛赞北美自由贸易组织的成功并希望它能够向西半球扩展。^②

投机商们有能力在顷刻之内使巨额的货币在市场之间流动，这使他们拥有了一个武器，让公共政策为他们的利益服务。他们越来越公开化的做法引起人们注意这一事实。华盛顿特区卡托研究所是宣传公司自由主义的智囊库，该所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雷格·罗伯茨（Paul Craig Roberts）在《商业周刊》的公共教育版对克林顿政府进行了谴责：

美元也处在压力之下，因为投资者已经意识到克林顿政府支持“大政府”的解决方法，而世界的其他地方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都在缩减政府的管理范围，并因而使自身经济增长迅速。股权的投资者们已经形成了一种全球观，他们更偏爱那些政府规模正在压缩、经济增长前景良好的地方……有许多欠妥的法律正在以整个经济运行为代价而为一些特殊利益群体谋利，如果国会能够废除这些法律，如果国会能够消除美国联邦法典中数以千计的反生产

① Ralph Nader, testimony on the bailout of the Mexican government before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U. S. Senate, Washington, D. C., March 9, 1995, 4; David E. Sanger, "Dollar Dips as the Peso Falls Again," *New York Times*, March 10, 1995, D-1.

② Harvey D. Shapiro, "After NAFTA: Facing the New Global Economy," *Hemispheres*, March 1995, 74-79.

性法规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了。^①

上述的投资转移过程很简单。如果那些掌握着全球各地数千亿美元游资的投机商们认为某一政府的政策对“特殊利益群体”过于偏心了——他们所指的特殊利益群体是诸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劳动人民或穷人等群体——把这些群体的利益放在投机商们的利益之上了，他们就会把自己的钱拿到别的地方去，并在这一转移的过程中造成该地区的混乱。在他们看来，随之而来的经济破坏仅仅只是证明了他们的论点，即那些冒犯了他们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是不正确的。一名纽约外汇交易分析师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观点就很具有代表性：“许多中央银行喜欢把责任推卸给投机商们。我认为与投机攻击相比，银行在管理自己的货币政策上的严重失职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②

只要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那些有大量储蓄的人投资于使社会获益的生产性用途，并希望从中获得稳定的长期收益，那么，金融传媒就仍将继续描述着在全球投资者和国际资本流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斯彻特斯城居民不情愿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金融制度曾经一度为生产性投资提供了流动性资金，但现在它已经转变成为一个掠夺性的、风险丛生的、为投机利益所驱动的全球金融体系，它所从事的工作就是从纳税人和生产性经济中进行非生产性的利益提成。这一体系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容易失控的，并会危及这个星球上每一个人的福利。在它更明显一些的罪孽中，这种转变性的金融体系正在吞食那些一度是优秀地方居民的公司，使人们几乎无法实现负责任的社会管理，并迫使生产性经济将人视为高成本的经济效

^① Paul Craig Roberts, "How Clinton Is Bashing the Buck," *Business Week*, August 8, 1994, 14.

^② Mathews, "Putting Currency Trading on Trial," H-4.

率的阻碍物，从而对人加以排斥。

十五、公司并购

1988年完成的合并、收购和保偿计划耗资2660亿美元之巨……这笔金额……不过是新机器里的一个衔接螺栓……它不是少量的新肥料，也不是一种新作物的一颗种子……一个公司如果考虑其长远利益并对自身的社会责任持开明的态度，那么它就会面临被一个投资集团控制的危险，这个集团通过接管该公司，使该公司转而去追求短期的利益来获得经济收益。

——威廉·多格^①

要在一个复杂的现代经济体系中找到创造新价值的方法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掠食性的经济所要求产生的回报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远远大于生产性经济，要在这样一种经济中发现创造新价值的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② 要获得系统所要求的利润，最快的一种方法就是从一个较弱的市场玩家手中夺取并吞食他已有的价值。在一个自由市场中，“较弱的”玩家一般就是为其未来而进行投资的公司；就是能够给雇员们提供一个安全的、报酬丰厚的工作职位的公司；就是缴纳相当比例的地方税的公司；就是向一个完全基金化的养老信托基金支付款项

^① William M.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x.

^② “创造新价值”这一词语通常被公司自由主义者歪曲为任何能造成通货膨胀或可榨取利润的手段。我在此用它表示增加货品、服务和资产产值的实际值的东西。

的公司；就是一个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并且因此对人类的长远利益负责任的公司。在一个健康运行的经济中，这样的公司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它们向其股东提供的是稳固的和可靠的——但不是过度的——长期利润。然而，它们并不会产生出计算机化的交易项目所要求的、即时性的股东收益。

正如乔尔·库特兹曼所指出的，从目前的市场逻辑来看，上述这种公司应该卖掉它们的资产，向它们的股东们支付所得的赢利：

从投资者鼻尖下的计算机推演模型来看，公司将自身进行分拆是有好处的。它们可以支付丰厚的报偿，它们的股票价格依然很高，它们几乎不用为其未来而在研究和开发方面进行任何投资。这种公司都能获得成功，所有依靠计算机的市场玩家都会争相去把它买下来的。^①

当负责的经理们不愿意去自己吞并自己的公司时，金融系统就会急切地由其他愿意的人出资来使经理人离职。其结果就是，掠夺性的金融系统就会与掠夺性的市场相配合，宣称那些负责的经理们“效率太低下了”，并把他们从系统中清除出去，从而使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成为濒危的物种。

攻击“效率低下”的公司

公司的攻击者是提成性投资者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它专门从事于捕食正在运转着的公司。尽管其中的内情很复杂，权力斗争也经常是很龌龊的，但基本的过程是极其简单而且是有利

^① Joel Kurtzman, *The Death of Mone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164.

可图的。攻击者们先确定一个在公开股票市场进行交易的公司，认定该公司“瓦解”所产生的价值将超过它目前股份的市值。有时候被选中的公司的运营的确是有问题，但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公司都是运营良好、财务记录优良的公司，它们都是好公民并且目光长远。它们可能有大量的现金储备作为后盾来预防经济的下滑。可能也有自然资源的存储，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可持续生产的基础上利用这些资源。一般来说，攻击者们会特意选择那些拥有储备和长期资源的公司，因为这些资源可以出售并将其成本外部化，让社会来负担成本。

一旦上述这种公司被认定了，预期的攻击者们会组建一个新公司作为目标公司的储藏所。这种储藏性的公司一般在财务上几乎都是完全负债的，几乎没有什么股权。用借来的资金暗地里在公开的股票交易市场购买目标公司的股份，购买价是在当前的价格至法律所允许的最高价格之间。然后出价让该公司的董事会用高于浮动价格但低于令公司瓦解的价格来买回那些公司尚未支付的股票。如果这个接管出价是成功的，那么这个猎取公司就将这个购买来的公司合并进自己的公司里，购买被购公司所欠下的债务就转移给了被购公司。通过运用一点金融技巧，已被购买的公司就会用自己的资产来保证偿还购买中发生的债务。

策划了这个交易的那些人为自己的“部门”集聚了巨大的费用，使股份集中起来，从而使自己所得的利润变得真正无风险。因为这个交易所需的钱主要来自银行或投资基金，所以这给其他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其中包括那些保证了银行储备并放弃了税收资助财政贷款的利率偿付权利的公众，包括那些资金处于危险境地的小投资者和养老金的享有者。

这个“新”公司现在有大量的额外债务。为了清偿这些债务，新的管理层必须减少它的现金储备，减少养老基金，卖掉

有用的部门，从而迅速得到现金；与工人谈判降低工资，把生产设备运到海外，用光所有存储下来的自然资源，削减维护和研究费用，从而增加短期性的收益——这一般是以损害长期收益能力为代价的。将近 2000 个案例证实，公司的新主人从公司的养老金账户中总计偷走了 210 亿美元，他们总是称这个账户是一种“过分的”投资，并用它们来偿付债务。^①

一旦债务偿清了，这个公司每年的利润就会迅速增长。该公司会选择在一个有利时机提供股份让人认购，从而使股份又重新回到公众的手中。攻击者们就会祝贺他（她）们自己“提高了经济效率”，或为经济系统“增加了价值”，并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就是杠杠收购（Leveraged Buyout），一种公司并购的形式的基本内容。

杠杠收购的关键就在于有能力去集聚财政资源。有人可能会认为，负责任的银行家和股票投资商会规避这种交易，因为这种交易会把大量不安全的贷款转给那些没有资产的新公司。但恰恰相反，交易方提供了极高的利息率来抵消抵押物缺少的不足。银行和投资机构经常相互竞争，以赢得机会参与并购。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一些大银行同时都为石油美元（Petrodollars）所困扰，这些石油美元是在 70 年代挥洒在负债的南方国家身上的，这些银行一听到新的接管战传闻就第一时间通过提供融资来寻找交易方。一般而言，最终的融资组合采用银行贷款和投资相结合的方式，这些钱是通过卖出高利率的债券而得来的，我们一般把这种债券叫做“垃圾债券”（Junk

^① 数据合成自 Donald L. Bartlett and James B. Steele, "America: What Went Wrong? Part 8: The Disappearing Pensions," *Philadelphia Inquirer*, October 27, 1991, 1-A, 参见 Jonathan Greenberg, "The Hidden Costs of Corporate Takeovers," in Jonathan Greenberg and William Kistler (eds.), *Buying America Back* (Tulsa, Okla.: Council Oak Books, 1992), 153.

Bonds), 因为它是由那些没有财产的空壳公司发行的。

所有这些都是以一种不考虑道德因素、令人不寒而栗的氛围中完成的。华尔街天才式的人物丹尼斯·列文 (Dennis Levine) 因从事内部人交易而锒铛入狱,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们在华尔街所从事的是那种只能靠感官认识的事业, 因此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挪动数十亿的美元会对实际生活中的工作职位, 并进而对数百万美国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华尔街经常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垄断委员会, 从我们所使用的术语中可以看出我们很大程度上是以游戏的态度来行动的。当我们认定了一个公司作为猎取目标时, 我们会叫这是“正在玩游戏”。我们用一些怪诞的术语来命名游戏的各个部分: 白衣骑士、目标靶子、驱鲨器、帕克曼防卫、毒药、绿色邮件和金降落伞等。记录得分卡是很简单的一件事——赢家就是那些交易最多、赚钱最多的人。^①

我们可以看看在被公司攻击者查尔斯·赫维兹 (Charles Hurwitz) 并购后, 太平洋木材公司及其在加利福尼亚沿岸所拥有的古老红木所遭遇的一切, 从中可以反映出在并购完成之后经常都会发生些什么事情。在赫维兹开始对该公司进行恶意并购之前, 这个由家族经营的太平洋木材公司是美国最著名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都极其良好的公司之一。它是倡导进行可持续性的木材开发和利用其拥有的大量古老红木的典范, 它慷慨地将其利润分配给雇员, 超量支付养老基金以保证它能够实

^① 引自 “The Power of the Transnationals,” *The Ecologist* 22, no. 4 (July/August 1992): 159.

现自身的许诺，即使在木材市场效益下滑的情况下该公司也没有裁员。^① 它的这些行为使其成为并购的主要对象。

在确定已经控制了该公司之后，赫维兹立即把这些千年古树的砍伐量增加了一倍。据《泰晤士报》报道：“1990年，该公司开辟了一个1.5英里长的宽阔通路直通河源森林的中部，他们私下地窃笑，把它称之为是‘我们野生动植物学家们从事研究的小径’。”^② 赫维兹在一次视察位于新斯科（Scotia）的太平洋制造厂时，对员工们说：“曾经有一个关于黄金法则的传说，我就拥有这个黄金法则。”在这种宣告之下，他从公司的9300万美元的退休基金中提取了5500万。^③ 剩下的3800万投资于行政人寿保险公司（The Executive Life Insurance Company）的养老金，这个公司曾经资助他发放此次并购的垃圾基金——但这个公司最终破产了。^④

一些公司攻击者的伪善甚至比其行为更无耻。投机商乔治·罗伯特斯（George Roberts）在接管赛福维（Safeway）连锁超市之后，为了给随后进行的裁员和工资下调作辩护，竟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们负责任地对待连锁超市的所有员工……如果他们想与世界的其他企业竞争的话，他们必须按拟定的计划进行生产。现在是我们实行这个计划的时候了。”^⑤

罗伯特斯和他的另一个主要合伙人两人的身家都超过4.5

① Ned Daly, “Ravaging the Redwoods; Charles Hurwitz, Michael Milken and the cost of Greed”, *Multinational Monitor*, September 1994, 12.

② John Skow, “Redwoods: The Last Stand,” *Time*, June 6, 1994, 59.

③ Skow, “Redwoods,” 59.

④ Daly, “Ravaging the Redwoods,” 13.

⑤ 引自 Susan Faludi, “The Reckoning: Safeway LBO Yields Vast Profits But Exact a Heavy Human Toll,” *Wall Street Journal*, May 16, 1990, 1A, and cited in Greenburg, 159.

亿美元，他们与其他3个合伙人一起接管了赛福维连锁超市。他们这个团体总共集中了约200万美元的个人财富来完成这次并购。《福布斯》杂志用一个标题来预测这次并购的结果，那就是《并购挽救了赛福维》，它使该公司摆脱了“竞争力低下的状况和傲慢的工会组织”^①。丹佛的赛福维员工的工资下降了15%，货车司机埋怨一个班要上16个小时。大约有5亿美元的税款被转用来偿付利息，此前由数万赛福维员工缴纳的数亿美元税款不翼而飞。他们激起持赛福维股票员工的贪欲，并提高了美国经济的竞争力，为此他们5个合伙人总计共挣得2亿多美元的利润。^②

利息收入可以享受税收减免这一规定使上述的一切都成为可能。那些本应成为税收的利润在运转着，这些利润被转化了可减免税的利息收入，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公众就资助了对国家的生产性公司的财产进行并购的行为。这些对美国的纳税人影响深远。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司要交4美元的税才能获得1美元的利润。到了80年代，债务资助的增长使这一比率完全颠倒过来，公司每交1美元的税就可以得到3美元的利润。一项研究推断说，因为这种变化，每年有约920亿美元从税收变成了利息收入。50年代美国公司缴纳的税收占美国总税收收入的39%，而到了80年代，它们只占17%。个人纳税所占的份额却从61%上升到83%。许多公司在被接管的前一年仍能收到来自政府的退税款项。^③

对那些胃口大且能运用攻击手段的公司而言，公司攻击和

① Gretchen Morgenson, "The Buyout That Saved Safeway," *Forbes*, November 12, 1990, 88, as cited in Greenberg, 155.

② Greenberg, *Buying America Back*, 155.

③ 数据合成自 Donald L. Bartlett and James B. Steele, "America: What Went Wrong?" Part 3: "Shifting Taxes from Them to You," *Philadelphia Inquirer*, October 22, 1991, 1-A, as cited in Greenberg, 152.

其他掠夺形式的提成性投资已经成为它们一个相当大的回报来源。1982年，美国人必须要有1亿美元的身家才能被《福布斯》杂志列入全美400富豪之中。1982年的富豪名单中只有19位从政府的资助手段中获益。仅仅5年之后，1987年，要进入400富豪榜最少需要有2.25亿美元的财产才行，400名富豪中有69位得益于政府资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公司接管的浪潮中大赚了一把。^①

公司攻击者明目张胆地宣称，他们消除了效率低下的现象，从而为美国经济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服务，并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帮助美国恢复了经济的竞争力。有一个报刊以最轻微的挑战姿态小心翼翼地表达着它们的呼吁。金融记者乔纳森·格林伯格（Jonathan Greenberg）写到：“在里根时代，巨商们的强盗逻辑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生活工资水平扼杀了美国的经济。”正如格林伯格的结论那样，“公司接管时代的真相与经济竞争力之间毫不相干。事实很简单：我们被这些公司抢劫了”^②。

逃避社会责任

公司组织的成员坚持认为，公司暴行的问题可以通过自身的自我调整来解决，不需要什么公众的监督和强制措施。这就更像是建议让警察局和法院解散，而支持指派街头惯犯自己去充当警察一样。

其他人则认为负社会责任的行为一般都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因此，仅就经济利益考虑这种行为是一种合理的选择行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长期角度看，负责任的

^① Greenberg, *Buying America Back*, 151.

^② Greenberg, *Buying America Back*, 159.

行为确实会带来更大的利润，但是金融市场需要的是即时性的回报，那些公司攻击者一直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那些没有对金融市场的要求做出回应的公司变成一堆废物。

还有一些人认为公司仅仅只是一些人的集合体，让公司里的人们提高认识，让他们明白自身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他们也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实际上许多经理人的社会和环境意识都很高。问题在于这些经理是在一个掠夺性的系统中工作，这个系统不准他们问自己“什么是正确的？”，而要问自己“做什么事情才能迅速获得最大的利润？”如果这些经理对公司在社会中的作用有一个真正社会性的认识，那么他们就会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状态之下。他们必须要么放弃自己的认识，要么就有被这一系统驱逐出去的危险。

生产鞋产品的 SR 公司 (Stride Rite)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① 该公司除了对慈善事业进行了慷慨捐赠之外，还有一个举世闻名之处，那就是它的决策是把工厂和设备分布在美国最为萧条的内城区和乡村社区，从而促使这些地区获得重生，并为少数民族提供了稳固的、高收入的工作。这一决策是该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阿诺德·海特 (Arnold Hiatt) 的一个坚定承诺，他认为，企业除了让股东挣钱之外，也应该能够对社区生活做出更大的贡献。作为首席执行官，海特在 1984 年之前一直能够使他的董事会与这一决策保持步伐一致。

1984 年，该公司的收入下降了 68%，这是 13 年来首次出现的利润下跌，这使董事会成员相信公司必须把生产部门转移到国外。他们关心的众多事情之一就是如果他们不进行这种转

^① 据 Joseph Pereira, “Split Personality,” 重印于 *Unte Reader*, September/October 1993, 63-66, from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移，他们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接管并购的目标。海特竭尽全力与董事会进行斗争，最终被迫辞职。根据 SR 公司董事和前任副主席梅耶斯·索罗斯勃格（Myles Slosberg）的说法，从此以后，追求低成本的劳动力价格就成为公司的一项“神圣使命”。公司承担了来自经济系统的巨大压力。它的美国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在 1200 美元到 1400 美元之间，另外还有员工福利。为该公司生产鞋子的合同方所雇佣的中国工人每个月工资只有 100 美元到 150 美元。公司除了把它的工厂转移到海外之外，还把它在国内的工厂分布中心从马萨诸塞州转至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以利用当地低成本的美国家劳动力资源，并享受州政府提供的为期 10 年总价值 2400 万美元的税收减免。

SR 公司的销售额翻了一番，它的股票价值上涨了 6 倍，这使它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大受欢迎的对象，这其中包括那些对该公司的捐赠记录印象深刻的、有社会良知的投资者。该公司的现任董事长艾尔文·西蒙斯（Arvin Shames）说：“对公司来说，把工作职位带到那些没有经济意识的地区去，是一个对公司和社区财富进行分散化的行为。”^①

SR 公司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它再现了掠夺性的全球经济那种残酷无情的运作方式。在公共税收负担的减轻和工作岗位从高工资工人那里转移给了低工资工人手中的共同作用之下，SR 公司的管理层参与了巨大的再分配运动，把财富从劳工手中转移给股东——从以自己的技术和身体力行来创造价值的人那里重新把财富分配给那些仅利用自己多余的钱的人手中。然而 SR 公司的管理层并没有做错什么。

如果海特在那些日子里仍然是首席执行官，仍然坚持自己的信念，不愿把生产线移至海外，投资银行家组成的伺机群体

^① 引自 Pereira, “Split Personality,” 64.

(hovering group) 极有可能认为这是对公司股东的一种“受托责任的违反”。他们会通过敌意收购 (hostile takeover) 得到该公司，解雇该公司关注社会的管理层，然后把生产线以更加突然的形式转移到海外，从而给当地社区和人民带来更坏的后果。

有些投资基金专门从事一种工作，那就是买卖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中那些不愿迁至低工资国家的公司。美、墨出口加工基金 (AmeriMax Maquiladora) 是由美国和墨西哥投资者组成的团体，它最初是由墨西哥最大的国家开发银行纳芬莎银行 (Nafinsa) 支持建立的。它专门盯着那些不愿迁往国外的美国公司。它在计划书上说：

本基金将收购适合移至“出口加工区”的、美国现有的国内公司，生产过程的部分或全部都将会重新在墨西哥进行部署，以利用当地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那些劳动力成本是公司商品成本的重要决定要素的公司，是基金要寻找的目标。预计基金在控制一个公司之后，将会在6个月到18个月之内将公司生产过程中的指定部分转运到墨西哥，重新进行安排，利用产品的劳动力成本下降的优势。

我们估计，一个制造公司在美国需要全部负担的总劳动力成本大约在每个劳动力每小时7美元到10美元之间，而在墨西哥出口加工区这一成本是在每人每小时1.15美元到1.5美元之间。尽管具体情况会有所不同，但可以据此估计，如果重新安排生产过程，那么就意味着每年可以在每个雇员身上节省10000美元至17000美元。据预

测，绝大多数投资将会维持3年到8年。^①

将这些经过重新调整的公司转卖出去将会获得的潜在收益是非常巨大的。以每个员工每年节省17000美元计算，从美国把1000个工作岗位转移到墨西哥，每年就会潜在地增加1700万美元的利润。假定一个公司每年所卖的股票价值是它每年利润的10倍，那么经过转化，在市场上该公司的股票价值就增长了1.7亿美元。^②很清楚的一点就是，那些投资于这类计划的人并非如人们希望的那样是想要为贫穷的墨西哥工人带来稳定的和高收入的工作。

无赖的金融体系正在积极地对生产性公司部门进行并购。它以提高经济效率为名，使得负责任的管理更加不可能实现。那些呼吁公司经理们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的人，忽视了这一基本问题。公司经理们生活、工作的系统实际上是在吞食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这一系统正在把它自身转变成为一个有两个阶层的结构体系：在特权阶层与一无所有的阶层之间，在有能力使自己置身于主要的市场力量之外的人与作为全球竞争祭坛的牺牲品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隔阂很深的世界。

十六、受控制的竞争

企业系统正日益采取小型和中型的核心公司的形式，它们与包括公司、政府和社区在内的其他或大或小的组织

^① 参见 Ross Perot and Pat Choate, *Save Your job, Save Our Country: Why NAFTA Must Be Stopped-Now!* (New York: Hyperion, 1993), 52-53.

^② Perot and Choate, *Save your job*, 52-53.

网络联系在一起……（这些）网络化的工业组织形式……展示了一种强化，也可能是弱化工作和收入的、历史性的分层趋势。

——贝纳特·哈里森^①

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部署其设施的能力总体上在急剧增强，这实际上使所有的工人、社区和国家等竞争者都在为这些公司的利益而行动着。其结果就是一个“走向下层的竞赛”，工资和社会条件都倾向于下跌至最绝望的地步。

——杰瑞米·布雷切^②

1993年9月14日，杜邦公司宣布，为了减少成本，到1994年年中该公司将在其美国的化工企业中裁减4500名员工。当这4500个家庭努力去接受经济系统认为它们的家庭支柱是一个多余的负担这一事实时，金融市场却在欢呼。这只是杜邦公司更大的削减计划中的一部分：该公司准备在其全球13.3万员工中裁减9千人——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的目标都是为了把该公司每年的成本减少30亿美元。^③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当天，杜邦公司的股票价值每股上扬了1.75美元。在金融报刊中，这样的消息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很清楚，工业结构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经济学家》杂志说：

① Bennett Harrison,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3), 220.

② Jeremy Brecher, "Global Village or Global Pillage?" *The Nation*, December 6, 1993, 685-88.

③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and a Few More Heads," *Business Week*, January 31, 1994 28-29.

公司世界里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公司的规模变得更小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正好颠倒了过来……现在是大公司在缩小，而小公司在扩大。这一趋势是很明显的——企业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忽视它将自担风险。^①

人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大型的公司巨头已经变得太过于庞大和官僚化了，已经无法与更灵活、更具有革新性的小公司进行竞争。我们知道，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市场中这种小型公司正迅速赢得竞争优势。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指出，大公司正在成百上千地削减员工。为了支持他们的论点，他们引用统计数据来证明新的就业和技术革新主要是出自更具有竞争力的小型和中型的公司。尽管就业增长和技术革新确实是主要来自于较小的公司，但因此就认为小型公司在全球市场中具有优势，那就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了。

核心区域的合作与合并

尽管所有的公司都推崇自由市场竞争，但绝大多数公司都试图利用各种机会使自身避开这种竞争。正如亚当·斯密在1776年所说的：“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② 这些公司并不是生来就具有这种邪恶的动机的。竞争会产生骚乱，这就为投机者提供了机会。但是对那些管理生产性企业的人而言，竞争所导致的不确定性将会使投资计划具有根本性的困难，会破坏公司的有序运转，会导致严重的经

① “The Rise and Rise of America’s Small Firms,” *The Economist*, January 21, 1989, 73.

② 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册），第122页。

济效率低下。市场竞争的一个天然法则可能就是存在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想通过减少竞争来增加市场的可预测性和对市场的控制。

公司通过运用长期以来一直在使用着的方法，通过提高它们对资本、市场、技术和竞争者的控制能力来减少全球化经济中的竞争。全球化经济与现代信息技术的结合使公司的这种控制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竞争的策略也是相似的，较弱小的竞争者被吸纳、控制或者被压得粉碎。强大的竞争者们通过策略性的同盟、合并、调解、并购和理事对话交流委员会等形式寻求相互间的调停、和解。

公司自由主义者最喜爱的一个支持全球化的论点就是，国家市场的开放会带来更大的竞争性并提高效率。这个观点忽略了一个更重大的事实，那就是如果市场是全球性的，垄断力量将会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加强。只要国界一开放，压力的增强将会使公司为了在全球市场中更具有“竞争性”而与更强大的公司合并。正如飞利浦莫里斯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使自己成为全美最大的食品公司时所做的一样，在合并了一家克雷福公司和一家通用食品公司之后，它并没有使美国的市场具有更大的竞争性。相反，它创造了一个强大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它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和规划各种垄断权力。

如同“拇指规律”那样，经济学家们认为，当4个最大的公司控制了40%以上的销售份额的时候，国内市场就会变成具有垄断性。美国4个最大的设备公司（惠而普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伊莱克斯/WCI和美泰公司）通过合并和联营，在1990年控制了美国设备市场92%的份额。4个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美洲航空公司、德尔塔航空公司和西北航空公司）占据了旅客总里程的66%。4个计算机软件公司（微软公司、Lotus公司、Novell/Digital公司和WordPerfect公司）在

1990年控制了55%的美国计算机软件市场，它们中的两个（Novell公司与WordPerfect公司）在1994年6月27日合并为一家公司。^①

如果有5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市场，那么这个市场就被视为是“高度”垄断性的。《经济学家》杂志最近报告了12个全球性产业中的五大公司集中系数。集中程度最高的是耐用消费品部门，在该产业中最大的5家公司控制了将近70%的全球市场。在机动车、航空业、航空航天、电子元件、电力和电子和钢铁业中，最大的5个公司控制的份额都超过50%，这使它们都名列垄断性公司的名单之中。在石油、个人计算机和大众传媒业中，5个最大的公司控制了40%以上的销售份额，显示出强烈的垄断倾向。^②

很明显，全球化会提高竞争性的观点是错误的，与此相反，它强化了全球规模的垄断这一发展趋势。

在贸易谈判中农业一直是一个主要的焦点。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强烈呼吁要求削减障碍，从而使农产品的贸易更加自由，呼吁欧洲和日本取消对农业的保护措施。美国农业的现状揭示了为什么美国的农产品公司会如此热心地要求对农业市场进行“自由化”。这只是对全球农业进行调整，使之形成由农产品工业巨头控制结构双层体系进程的一个步骤。

从1935年到1989年间，美国小公司的数量从680万个下降到不足210万个；而同期美国的人口却翻了一番。如同农民被排除在企业之外一样，曾经一度支持农业的地方性供应商、

① “The Age of Consolidation,” *Business Week*, October 14, 1991, 86-94. “Making the Perfect Connection,” *WordPerfect Report*, Summer/Fall 1994, 2.

② 这些估算来自“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Everybody’s Favourite Monsters,” *The Economist*, March 27, 1993 (special supplement), 17.

小商人及其他小企业的命运也是相同的。整体性的乡村社区已经消失殆尽。而同时，美国大的农产品公司却成长起来并巩固了其地位。美国十个最大的“公司”现在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农产品公司，其中包括泰森（Tyson）食品公司、康家（Con-Agra）贸易公司、葛德克斯特（Gold Kist）公司、大陆谷物（Continental Grain）公司、普度（Perdue）农场公司、朝圣者公司（Pilgrims Pride）和嘉吉（Cargill）公司——每个公司每年农产品销售额都在3.1亿美元至17亿美元之间。

两个规模最大的粮食公司——嘉吉公司和康家贸易公司——控制了美国50%份额的粮食出口。三大公司——爱华牛肉公司（IBP）、嘉吉公司和康家贸易公司——提供了美国将近80%的牛肉。一个公司——金宝（Campbell's）公司——控制了全美近70%的汤料市场。四大公司——凯洛格（Kellogg）公司、通用食品（General Mills）公司、菲利浦莫里斯（Philip Morris）公司与贵格（Quaker）饮料公司——控制了近85%的全美凉麦片市场。四大公司——康家贸易公司、ADM食品公司、嘉吉公司和贝氏堡（Pillsbury）公司——提供了全美近60%的面粉。这种集中的趋势，部分地是1982年至1990年之间美国4100家食品公司进行合并和杠杆收购的结果——这种合并的趋势目前仍在继续。^①

公司引导了公众的一种观点，那就是日本、北美和欧洲的公司巨头们正在国际市场上共同行动，把合并剔除在外。这种想象其实是一种日益增长的幻想，它是极其模糊的。实际上，

^① A. V Krebs, *The Corporate Reapers: The Book of Agribusiness* (Washington, D. C.: Essential Books, 1992); A. V. Krebs, "America's New 'Centrally Planned' Food Economy" (information sheet distributed by Prairie Fire Rural Action, Des Moines, Iowa), 74, as quoted in Harrison, 13.

一些核心公司正通过与主要对手之间进行风险共担的和策略性的结盟，来加强它们对市场的共同控制。经过这些安排，公司的股份可以得到特定的专业领域、技术、生产设施和市场，分散研究和新产品开发的成本和风险，并维持好与其主要竞争对手之间的关系。

譬如，美国电脑巨人 IBM 公司、苹果电脑公司和摩托罗拉公司构成了一个公司间的联盟，共同生产下一代电脑的操作系统和微处理器。1991 年，苹果公司与索尼公司合作生产了最便宜的笔记本电脑。^①

丰田公司与通用汽车公司达成了一个协议，让后者在美国生产丰田汽车并在日本销售。通用汽车公司现在拥有日本五十铃汽车制造公司 37.5% 的股份，后者以通用和欧宝这两个牌子来生产并销售汽车。克莱斯勒公司在三菱公司和玛莎拉蒂公司拥有控股权。福特汽车公司在马自达公司有 25% 的股份，并在马自达公司董事会任命了 3 个独立董事。福特汽车公司和马自达公司在日本共同拥有一个销售网络，它们在新产品研发和生产技术共享方面进行着合作。^②《经济学家》杂志建议我们做下述练习：

以一个真正的大国际公司如汽车业为例，公司生产高度精密并且相当昂贵的产品。沿着一个正方形的四边写下所有制造商的名字（汽车业至少有 20 个大公司的名字）。不管公司是在一种或多种产品之间，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它们相互之间在设计、研究、部件、整体组装、布局或销售等方面进行风险共担或相互结盟，我们就用线

① “The Virtual Corporation” *Business Week*, February 8, 1993, 100.

② “The Partners,” *Business Week*, February 10, 1992, 102-107.

把它们连起来。很快，这幅图就变成了无法理解的一团乱麻；就好像是每个公司都与其他公司联系在一起了。汽车行业也不例外。在计算机硬件、计算机软件、航空航天、药品、通讯、国防以及其他许多领域情况也很类似。^①

博思 (Booz, Allen & Hamilton) 公司是一家管理咨询公司，它的副主席克鲁斯·弗里德汉 (Cyrus Friedheim) 预测，未来的经济将采取他称之为“关系—企业”的形式，在这个企业的网络中，各个公司就像是一个公司似的进行着跨行业跨国界的战略结盟。他提到，波音公司、空中巴士协会会员、麦道—道格拉斯飞机公司、三菱公司、川崎公司和富士公司之间正在进行商讨，要合作共同开发一种新型的超大型喷气式客机，他也提及世界上主要的电信公司将组成一个团体，该团体的目标就是建成一个水下光缆的全球网络。根据弗里德汉的说法，这些公司的联合体将会使目前的全球公司巨人相形见绌。在21世纪早期，一个关系企业集团的收入总计大约会达到1万亿美元，这使它们比除了6个最大的国家经济实体外的其他经济体都要大。^②

世界性的公司巨人正在形成一个运作性的竞争体系，通过这一体系，它们积极地限制相互之间的竞争，而对处于它们外围的较小企业和地区之间则鼓励它们进行激烈的竞争。这种情况将会使外围企业承担更多的“附加值”成本，以使处于核心区域的公司能够给它贪婪的主人——全球金融体系带来更大的利润。

①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14.

② *The Economist*, February 6, 1993, 69.

集中管理的经济

经济权力正在集中，我们可以从统计数据中揭示出这种集中的程度：在世界上 100 个最大的经济体中有 50 个是公司。^① 1991 年全球最大的 10 个公司的销售总额比世界上最小的 100 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② 1992 年通用汽车公司的销售收入（1330 亿美元）约等于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尼泊尔、孟加拉国、扎伊尔、乌干达、尼日利亚、肯尼亚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这些国家共有 5.5 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1/10。

世界上最大的 200 个工业公司只雇佣了 1% 的世界人口中的 1/3，但却控制着全球经济产量的 28.3%。^③ 除金融机构外，世界最大的 300 个跨国公司拥有大约 25% 的世界生产性资产。^④ 经济学家估计全球的生产性资产大约有 20 万亿美元，世界上 50 个最大的商业银行和各种金融公司的资产总额大约

① 这是以 1991 年各国家 GNP 与世界最大企业同年总销售额相比得出的。GNP 数据来自 *The Universal Almanac*, 1994 (Kansas City, Mo.: Andrews and McMeel, 1993) supplemented by *The Economist, Book of Vital World Statis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0). 全球 500 强工业、全球 50 强公用服务业、全球 50 强零售业、全球 50 强各类服务公司的销售总额，数据引自 *Hoover's Handbook of World Business* 1993 (Austin, Tex.: Reference Press, 1993). 各种资料显示，100 个经济强体中的只有 50 个为公司。这一相对较小的比例是根据《财富》杂志中世界 100 强“工业”列表中计算出来的，这个列表没有包括非工业公司。

② Paul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93), 92.

③ Sarah Anderson and John Cavanagh, “The Top 200: The Rise of Global Corporate Power;”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 C., report released September 25, 1996, 2-3.

④ “A survey of Multinationals,” 6.

等于这个数字的 60%。^① 全球发展的趋势很清楚，那就是市场和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正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公司的手中，这些公司对整个全球的就业所做出的贡献是很小的。公司巨头们正在裁减人员，但却没有减少自己对市场、金钱或技术的控制。

这种经济权力集中在少数公司手中的现象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矛盾。公司自由主义者经常声称中央集权式的经济计划的效率是极其低下的，它对市场消费者的需求反应不敏感。然而与莫斯科的中央经济计划的制定者对经济的控制程度相比，代替中央集权经济的公司通过它们的生产网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还要更高。它选择集中地进行收购、出售、拆除或关闭部分单元的管理，笔尖一动就雇佣或解雇一批人，随意地在全球范围内转迁生产部门，决定子公司为了母公司该舍弃哪些收入，任命或解雇分公司的经理人员，设立转让价格和其他条件来控制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交易，决定某个生产部门是否能够在市场上进行公开买卖还是必须只能与公司的其他部门进行交易。除非高级管理层想要征求不同的意见，否则上述这些方面的决定是很少接受任何下属个人或部门的质疑和评论的。

虽然没有什么全球公司对经济管理的程度还像前苏联经济管理的程度那样高，但它们是很相近的。1991 年世界上 5 个最大的多样化服务公司（都位于日本）的销售额大约等于前苏联 1988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全部。古巴的国民生产总值为 261 亿美元，在世界集中管理的经济体中它位列第 72 名；前面的 71 个都是全球性的公司。弱小的朝鲜甚至都没有进入世界集中管理式经济体 500 强之列。

^① 金融公司与商业银行的资产的数据来自 *Hoover's Handbook of World Business*, 68, 72.

绝非偶然的是，从内部统治结构上看，公司是权威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组织之一，它可以与任何极权主义的国家相匹敌。公司的雇员们把绝大部分意识清楚的好时光都花费在按规则的指示来穿着打扮、发表言论、决定自身的价值观与行为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公司的员工会在甚至没有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被解雇。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小型与中型化”的转变，正在寻求把它的这种权威扩展到公司领域之外，通过允许公司加强控制，同时减少它对网络成员的福利所负的责任这样的方式，让公司把权威延伸到组织的更大网络之中。

削减工作岗位与巩固权力

尽管各地区之间存在差异，但世界上最为成功的跨国公司——无论是在日本、欧洲还是美国——都参与到一个转变进程之中，那就是通过复杂的组织网络形式，改造自身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巩固和加强。《弱化与均化：变迁时代公司权力变化的一道风景线》一书的作者贝纳特·哈里森称上述转变为“没有中央集权的集中化”。这种改造过程中有四个要素与我们的讨论关系尤为密切。

裁员与承包 裁员的表现形式是大量削减员工的数量，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只是更大的组织策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大的计划是裁减公司内部的运行程序，一般包括财政、销售和外围技术功能，从而保留其“核心能力”，这些都是公司经济权力的主要来源。这些功能部门的员工都被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并被合并入公司的总部。

外围的功能包括许多生产活动都被转移至网络之外，由相对较小的外部承包合同方来完成，这些外部合同方通常都是来自于低收入的国家。工作岗位从公司的核心区域转移到外围的

合同方那里，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公司的生产网络，这个网络依靠由核心公司掌握的市场和技术来运作。外围活动中不是承包和不能自动运作的那一部分可能会被安排在远离公司总部的地方。譬如，大型保险公司和银行的“后台管理系统”一般就会配置一些工资低下的女办事员。

使用电脑和自动化系统来减少员工和库存商品 核心公司让全能的电脑和自动化系统来承担它能胜任的生产功能，把它们引进信息管理系统，让它来灵活协调生产网络中的各种活动。自动化有两个关键性的意图。一个就是把工人的数量削减到最低的程度，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计划就是让由电脑控制的声音识别系统来代替数千名电话接线员。^① 第二个就是将库存商品减少到最低，方法是使用部件与供应品“及时制”（just in time）交货方式，把分散的供应商和销售渠道联系在一起。

通过合并、收购和策略性的结盟来减少竞争的压力 在主要的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的公司会通过一系列的策略来对它们之间潜在的破坏性竞争进行控制。一种方法就是通过合并和收购来进行融合，另一种方法就是建立策略性的同盟，借此它们相互之间进行技术、生产设施和市场的共享并共同从事研究开发。

投资于总部的配合与纪律来保持忠诚和履行 在核心地域工作的人会拥有全额的津贴和吸引人的工作条件，这些都是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和承诺的一种补偿。他们的工作就是保护、控制和扩大公司垄断权力的各种来源，这包括公司的牌子、形象、商标、知识产权、金融和政治资产以及策略性的同盟。

外围的职能——或者是被转移至公司内部的下属部门，或

^① “Let the Good Times Roll,” 28-29.

者是转移给依赖于公司生意的外部供应商——它们都是由低报酬的并且经常是临时工或兼职的“不固定的”员工来完成，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津贴，公司也不会给予他们什么承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双层的结构，它们各自的竞争压力是极不相同的。如果有什么不利的情形，控制了主要网络的核心公司之间就会进行大量的合作，来维持他们对市场和技术的共同垄断。外围部门即使仍旧被保留在公司的内部，它也要以一个独立的小合同承包方的身份为争得公司长期的生意而相互进行激烈的竞争。因此它们不得不将自己的成本削减到最低的程度。这种双层结构是解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收入鸿沟日益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哈里森认为：“应该对驱使当前公司组织的平均规模下降负责任的是大公司的策略性裁员，而不是小公司在某些方面的惊人增长。”^① 美国 1000 个最大的公司创造了全美国 60% 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剩下的才是由 1100 万个小公司来生产的。^② 承包确实给小公司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权力仍旧如故——掌握在公司巨头们的手中。由于无法控制市场，较小的公司围绕着核心公司部门转，这些小公司更像是一个核心公司的依赖性附属机构，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企业。

上述内容解释了为什么全球最大的公司在随意解雇那些受到良好教育、忠心耿耿并辛勤工作的员工的同时，公司的真正权力却得以不断地增强。1980 年至 1993 年之间，《财富》杂志所列 500 家工业企业就削减了 440 万个工作岗位，这等于它们此前提供的工作岗位总和的 1/4。就在这同一时期，这些企业的销售额增长了 1.4 倍，资产总额增长了 2.3 倍。这些最大

① Harrison, *Lean and Mean*, 18.

②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8.

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增长了 6.1 倍，达到每人每年平均 380 万美元。^①

尽管有些公司是由于市场疲软和管理不善而被迫压缩规模的，但其他公司却是在公司实力强大的情况下进行规模压缩的。GTE 公司在 1994 年 1 月 13 日宣布了一项计划：在市场强劲和经营收入稳步上升的情况下裁减了 17000 名员工。其他一些市场份额和利润都在增长的公司也在 1993 年的年末或者 1994 年年初宣布大幅裁员，这些公司包括吉列 (Gillette) 公司 (裁员 2000 名)、阿科 (Arco) 公司 (裁员 1300 名)、太平洋电信 (Pacific Telesis) 公司 (裁员 10000 名) 和施乐 (Xerox) 公司 (裁员 10000 名)。一些公司对工资单进行实质性的削减。其他的削减是将部分产品转变为外部采办 (outsourcing)。与工作岗位进行重大削减相伴而至的是合并和收购，这些并购的目标通常在减少就业成本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市场份额。美国雪佛龙 (Chevron) 石油公司在 1984 年与海湾 (Gulf) 公司合并之后，两者就一共削减了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即大约 50000 名员工，在 1992—1993 年度它又裁减了 500 名员工。^②

通用电气公司在 11 年间共削减了 10 万名员工，这使它到 1992 年时公司的员工数已经下降到 26.8 万人。而这同一时期，其销售额从 270 亿美元上升至 620 亿美元，纯收入从 15 亿美元上升至 47 亿美元。^③ 通用电气公司规模缩小了，但这

① “Executive Pay: The Party Ain’t Over Yet,” *Business Week*, April 26, 1993, 56-62; “That Eye-Popping Executive Pay: Is Anybody Worth This Much?” *Business Week*, April 25, 1994, 52-38.

② Brain O’Reilly, “The New Deal: What Companies and Employees Owe One Another,” *Fortune*, June 13, 1994, 95.

③ John Naisbitt, *Global Paradox*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4), 14.

种缩小仅仅是分享利润增长和市场份额上升的工人人数在减少。它主要是放弃了向 10 万名员工及其家庭提供大量的高薪酬的工作岗位的承诺，它并没有缩减自己在技术、金融或市场方面的权力。

在农业部门中，我们可以找到有关双层结构的更加生动的例子。大型的农产品公司在提高自己利润的同时，一般都把生产承包给较小的公司，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自己的风险。小公司的所有者提供了生产所需的所有主要资本，承担了农作物减产的风险。由于大型公司控制了市场，所以小公司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大公司所规定的条件——这包括生产方法、要求农民购买的生产投入的价格、小公司购买粮食的价格。农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接受条件、与企业脱钩或者转而种植另一种市场还没有被核心公司控制的农作物。农业的这种结构调整导致了消费者食物开支中农民所占份额的下降，从 1910 年 41% 下降到 1990 年的 9%。^①

美国农业部在 1980 年编制的图表表明，98% 的甜菜、95% 的流体牛奶、89% 的鸡肉烤制品、85% 的加工蔬菜和 80% 的留种作物都是签署了生产和销售合同的。如果一个合同方公司控制了市场，那么生产者就只能任其宰割了。譬如，当德蒙特公司决定将桃子采购的重心从北加利福尼亚转移至意大利和南非时，当地的许多签约农民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市场的消失，而导致市场消失的原因与当地是否爱吃桃子是毫无关系的。^②

上述情形无情地嘲弄了亚当·斯密，他支持的是那种由小

① Joan Dye Gussow, "A Nutrition Policy... That Leads to a Food Policy... That Leads to an Agricultural Policy," *WHY Magazine*, Summer 1993, 25.

② Krebs, *The Corporate Reapers*, 102.

买卖双方构成的竞争性市场。但实际情况是，农民所接受的产品价格低于正常竞争所形成的价格，而消费者所接受的产品价格却高于正常竞争所形成的价格。^① 世界上主要的农产品公司很快就把这种体系扩展到世界各地。

品牌实力与零售实力

在这个结构调整的闹剧中我们看到了第二个闹剧，那就是由加工业巨头们和零售业巨头们之间为了争夺核心网络位置的控制权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我们可以从美国零售商破产速度日益上升的过程中看到零售业巨头们日益取得的成功。从1991年以来，零售公司破产的速度从1989年的大约11000家上升到每年超过17000家。它们许多都是被巨型零售业公司排挤出市场的。^②《商业周刊》认为：

美国零售业内部进行的大量合并已经产生了巨大而“有实力的零售商”，他们运用先进的库存管理、相当协调的挑选，最重要的是有竞争力的价格把弱小的公司挤出市场，吸纳了消费者更多的金钱……他们正在告诉包括最大的制造商在内的所有制造商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应该是什么颜色和尺寸、装运多少以及什么时候装运……包装业的领头羊当然是沃尔玛仓储（Wal-Mart Stores）公司了。预计本国处于首位的零售商的销售额会有25%的增长，达到大约550亿美元，而同期的零售业总体增长将会很幸

① Krebs, *The Corporate Reapers*, 372-382.

② “Learning to Survive in the '90s,” *Business Week*, January 10, 1994, 95.

运地达到4%。^①

沃尔玛公司在一个年增长率为4%的行业中获得了高达25%的年增长率，它的增长很明显是以缺乏相对强大的竞争对手为代价的。小型的零售商过去是绝大多数市镇的商业核心与就业岗位的主要来源，现在它们所受的打击尤为严重。分析人士预测，1992年小零售商所占据的总销售额到2000年将会减少一半。系统分析家与专栏作家多尼拉·麦多斯（Donella Meadows）描述了一家沃尔玛超市进入一个城镇后所发生的一切：

在爱荷华州，沃尔玛超市平均每年的总收入是1300万美元，整个地区的销售额每年增加400万美元，这意味着它从现存的商店里抢走了价值900万美元的生意。在一家沃尔玛超市到达之后的三年至四年之内，在其半径20英里之内的零售商店的销售额下降了25%；其半径范围在20英里至50英里之间的，销售额下降了10%。

马萨诸塞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家标准的沃尔玛超市可以增加140个工作岗位，但它使230个收入更高的工作岗位消失……尽管公共投资一直在力图复兴商业闹市区，但空房率仍在上升，租房率在下降。留下来的公司所支付的工资和税收更低了。购物中心中的竞争性连锁店也一去不复回了。^②

大型的零售业超级巨头——沃尔玛公司、卡玛特

^① “Channeling Big Stores’ Awesome Clout,” *Business Week*, December 21, 1992, 98.

^② Donella Meadows, “Wal-Mart Should Come on Our Terms, Not at Our Expense,” *Valley News*, June 12, 1993, 26.

(Kmart) 公司、玩具反斗城连锁 (Toys ‘R’ Us) 公司、家得宝 (Home Depot) 公司、环城电子商店 (Circuit City Stores) 公司、迪奥德百货公司 (Dillard Department Stores)、靶标连锁公司 (Target Stores) 和好事多 (Costco) 公司, 以及其他一些公司——都是巨大的消费者商品网络中的核心公司。零售业巨头们是声名狼藉的, 因为它们会经常操纵供应商之间的竞争, 会突然把它们供货来源由国内公司转向诸如中国、孟加拉国这样的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当小制造商们的主要市场消失之后, 他们中的许多人会突然发现自己破产了。即使是像宝洁公司这样的制造业巨头, 由于缺乏自己的销售渠道, 它们也承受着零售业巨头们压低价格与利润率的强大压力。

当大型零售商实力上升之后, 它们会更加偏爱规模较大的供货商, 因为后者有良好的资源和先进的技术, 可以满足零售商们在定制商品和包装、计算机联网和特殊的交货计划等方面的需求。这就导致制造业方面进行着更进一步的合并。仅在 10 年之前还没有哪一个玩具厂家能够控制 5% 以上的市场份额。^① 现在玩具市场是由玩具反斗城连锁公司以及高折扣的巨头如沃尔玛公司、卡玛特公司和靶标连锁公司控制着, 制造方面仅由 6 家公司控制着。

人们基本上认为这是向更高的效率的一种迈进, 《商业周刊》却提出了一个警示: “如果大零售商的增长消灭了太多的小公司, 并且迫使太多的大公司躲避风险, 那又该怎么办? 零售商和维持它们生存的供货商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最终会导致

^① “Clout! More and More, Retail Giants Rule the Marketplace,” *Business Week*, December 21, 1992, 66-73 “Brawls in Toyland,” *Business Week*, December 21, 1992, 36-37.

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以及创新性的消减。”^①

落到底层的竞争

在核心地域的竞争日益减少的同时，处于外围地域的小公司、工人和各个地区之间的竞争却是日趋激烈，因为它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相互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公司自由主义者所说的“更加全球化的竞争”更确切地说实际上应该是出于底层的竞争。如果你不雇佣童工，不去欺骗工人加班加点，不去强加给工人残忍的定额，不去使用不安全的生产设施，那么你从大零售商手中得到订单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小。如果一个制造商不这么做，那么他的产品价格就会比这么做的制造商的产品价格要高。由于有数以亿计的人们正在争夺全球化经济所提供的各种工作岗位，所以总会有甘心情愿的竞争者。受利润最大化的驱动，核心公司对上述违规行为一直都是视而不见，并坚持认为它们没有责任去关心合同方工厂中的劳动条件。

即使是在“现代的和富裕的”北方国家里，对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工作条件的境况仍然让人们觉得仿佛又回到了早期工业革命的时代。下面是对位于现代、富裕的旧金山的合同制衣厂里工作条件的描述：

许多工厂都漆黑而拥挤，没有窗户……工人一般一天要工作12小时，没有休息日，每天只有午餐时的一次休息。在这个富庶的现代大都市里，许多工厂执行着19世纪的残酷制度。一位貌似亚洲人的工人说：“工人们之间是不准交流谈话的，他们不允许我们去洗手间。”……由于意识到制造商热心于在讨价还价的基础上形成价格，所

^① “Clout!” 73.

以圣弗朗西斯科湾地区 (The Bay Area) 近 600 家缝纫合同厂商都参与了这种割喉式 (Cutthroat) 的玩命竞争——这经常是一种达尔文式的淘汰，落到底层……制造商们有另一个强有力的筹码来降低出价。全科特 (Katie Quan) 是旧金山国际女士服装工人联合会的一名经理，她解释说：“他们说了，‘如果你们不接这个订单，我们就把它转到海外去，你就会失业，你们的工人就会挨饿。’”

1992 年，(劳工部) 对美国塞班岛保护区服装厂的一项调查发现，工作条件就像契约式的苦役：中国工人的护照已被没收，每周要工作 84 个小时，工资却少得可怜。^①

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工作条件在地理意义上的差别正在日趋模糊。多卡·代日 (Dorka Diaz) 是一名 20 岁的工人，此前在洪都拉斯为美国的跨国公司莱斯利伐公司工作，她在美国国会劳资关系委员会作证说，她在洪都拉斯与一群十二三岁的女孩一起被锁在工厂里为公司工作，工厂里的温度高达华氏 100 度，没有干净的饮用水。她每周工作 54 小时，工资却只有 20 美元多一点。她和她 3 岁大的儿子生活在饥饿的边缘。1994 年 4 月，她由于试图组建一个工会而被解雇。^②

中国已经成为外国投资者与公司以极低的价格为海外采购寻找廉价的劳动力和外部采办的乐土。《商业周刊》是这样描述当前中国工人的工作条件的：

① Laurie Udesky, “Sweatshops behind the Labels: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Gap,” *The Nation*, May 16, 1994, 666-668.

② Diaz 女士在美国众议院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属下的劳资关系小组听证会上的证词, Wilkes-Barre, Pa., June 7, 1994, 引自在《纽约时报》上登载的广告, June 19, 1994, A-23, by the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

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沿海省份雇佣了约 600 万的中国工人，在这些企业中意外事故不断发生。在有些工厂里，工人受到惩罚、殴打、脱衣检查，甚至是在工作期间不准去卫生间。在位于福建省厦门市的一家外资公司里，由于机器老化，有 40 名工人——该工厂工人总数的 1/10——的手指被轧断。根据官方报道，去年一年广东省发生了 45000 起工业事故，夺去了 8700 人的生命……上个月……在一家广东工厂的意外事故中有 76 名工人丧生。^①

在印度，估计有 5500 万儿童在各种苦役般的条件下工作，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包身工——其实就是奴隶——在最令人吃惊的条件下工作。有些儿童是为了偿还贫穷的父母的债务而工作，有些是被无力养活他们的父母亲卖去做奴役的，另外有些人是被绑架来的。这些不幸的儿童是毫无工资报酬的。印度前任首席法官巴格沃蒂（P. M. Bhagwati）曾在公开作证中提及童工每天工作 14 到 20 小时的实例：“他们被殴打、（被用红烫的铁棒）打上烙印，甚至被头下脚上地倒吊在树上。”

印度毛毯行业中有超过 30 万名的童工，这些毛毯厂每年向全球出口价值 3 亿美元的毛毯，主要是出口美国和德国。他们每天工作 14 到 16 个小时，每周工作 7 天，每年工作 52 周。印度的地毯生产商辩称说，在与巴基斯坦、尼泊尔、摩洛哥以及其他也使用童工的国家的地毯工业的竞争中，他们也必须使用童工以便能够生存下去。^②

那些注意到全球性竞争这一呼吁的人必须记住，这种呼吁必将成功地使落入低层的竞争成为没有终结点的游戏。

① “Damping Labor’s Fires,” *Business Week*, August 1, 1994, 40-41.

② Robert A. Senser, “Outlawing the Crime of Child Slavery,” *Freedom Review*, November-December 1993, 29-35.

按照传统的说法，市场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能够锻炼公司，使之保持着全面的经济高效率。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最大的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去控制竞争，使它们之间的竞争最小化，而使其他公司之间的竞争最大化——它们把竞争作为一个更有效的控制工具，从而把更多的成本转嫁给民众和社区。

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制度转型的潜在模式不断地把权力从民众和社区手里集中到大型公司的手中，而这些公司却不履行对人类责任的承诺，其行为与人类利益已经相去甚远。在这个无赖的系统中，我们已经成为暴政者们的俘虏，这个系统正如一个自动驾驶的飞机一样向一座巨大的山脉迎面撞去。由于它本身的急切需要，该系统已经控制了我們生活中的许多重要方面，它不断地要求我们全身心地为它的利益服务——也就是挣钱。我们现在面临着的命运更加可怕：这一系统已经控制了各种制度，而这些制度此前一直是为满足我们的需要而服务的，而且该系统还认为可以通过消除低效率来增加他们的收益，而这一系统已经发现，人类是低效率的主要源泉。

十七、人类无处立足

我们正在走入人类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为全球人口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工人数量越来越少了。

——杰瑞米·里夫金^①

^① Jeremy Rifkin, *The End of Work* (New York: G. E Putnam's Sons, 1995), xiv.

在当代西方的公司经济中，市场已经成为一种消极的制度。积极的制度是公司……这种本质上很狭猛、目光很短浅的组织……公司已经发展到了以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为任何控制它的人的利益服务的程度。

——威廉·多格^①

我们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可以不断地看到这样一个模式：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名义下，全球化经济把它所不需要的数以亿计的人们抛弃了。在墨西哥，小农被赶离了家园，为机械化的工业让位。在印度，他们被迫交出土地来建水库发电，从而使更先进的机器能够取代工厂里的工人。在华尔街，在计算机终端键入命令、在全球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人工交易员被更先进的电脑系统所取代。大型零售商们所经营的超市将小镇里的零售商挤出市场，而这些大型零售商反过来又受到网络零售商的威胁。声音识别系统和自动应答装置取代了电话接线员，多媒体教育取代了教师，公司的规模压缩正在解雇多余的工人和中层管理人员，公司合并和收购使中层甚至高层管理人员失业，这是一个永不停息的过程。

从体力走向脑力

我们现在正迈进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门槛。第一次工业革命利用人类新近确立的能源控制能力给机器提供了巨大的力量，从而使工业对人类体力劳动力的需求急剧地减少。然而，机器不会计算，不会推理，不会识别视觉图像，也不会认识或翻译人们的语言。因此，每台机器都需要有人工操作员作为它的头

^① William M.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9), ix, xiii.

脑，需要一个人工媒介服务来作为它的眼睛和耳朵。机器的数量越多，照管机器所需要的人员就越多。机器越复杂，它就对操作员的技术要求就越高，高技术员工所要求的工资水平也越高。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利用信息技术方面的进步，它使用电脑和电子元件作为机器的眼、耳和脑，让它们自行地看、听、理解并采取行动。

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都处于一种无忧无虑的、安全的位置之上，他们安慰我们，要我们不要庸人自扰了。他们告诉我们说，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一样，产量的提高将会刺激经济的增长，而增长就意味着工作岗位的增加。他们没有提及的一个事实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英国纺织品工业实现了机械化，英国是把随之而来的大量工人的失业转移给了印度。它对从印度出口到英国的纺织品征收强制性的关税，而英国的殖民统治者却几乎是免除了英国纺织品出口给印度的关税，同时对印度为国内市场生产的布料和家庭纺织业课税。殖民地也吸收了大量欧洲经济发展中多余的移民。在向殖民地输出商品的同时，殖民统治者还征用殖民地最好的土地，用来种植出口到母国的农作物，例如棉花等。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应该被界定为阶级的殖民化，而不是地理区域的殖民化，因为它使全球更多的人口进入殖民化的等级序列之中。

效率是指以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收益。当我们提高了每小时劳动力的生产量时，我们说效率提高了。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偏爱使用的各种简化的例子来看，效率提高似乎是一件好事。

一个农民买了一台拖拉机，他就能耕种更多的土地，为家里带来更多的粮食或收入，或者在田地里劳作的时间就会缩短。这个农民得到的一切并没有使任何人失去什么，通过一系

列这类途径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加富裕。

不幸的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像教科书中描述的那么简单。应该注意到，在我们上述例子中的管理者、所有者和劳动者只有一个，都是同一个人——他做出决策，承担成本，决定生产收益是否继续投入来增加生产量，还是减少工作的时间。在现实世界中，决策可能是由唯利是图的农产品公司来做出的。他们将会用自己所偏爱的一些工人来提高其产出；其余的人将会失业，而且这些失业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这样看来，在一个没有组织的、劳动力过剩的世界里，产出提高唯一可以确定的受益人就是资本的拥有者。然而，正如管理分析家威廉·多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现在好像正处在把这些资本所有者也排挤出去的进程之中：

公司是一个真正的弗兰肯斯泰因式的 (Frankenstein) 怪物^①——一个人为制造的个体，它只对没有灵魂的自我负责任。它们用一些令人着迷的可能性来描述自己。公司开始尽可能地买进自己的股票，把它放在自己的金库里。按照逻辑推理的结论，以公司将把自己100%的股份全都放在自己的金库里为例，这些股票本应该是分散在那些真正的个体的人们手中。那么公司又将对谁、对什么负责任呢？把这个集体无责任的推测向前更进一步……一个公司能够完全不仅放弃人类所有权，而且放弃工人和管理人员吗？……如果这样，那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它实际上将会变成一个由电脑网络监控的

^①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雪莱 1818 年所著的《弗兰肯斯泰因》中的一个生理学家自创的一个怪物叫弗兰肯斯泰因，结果生理学家自己被怪物所毁。现指脱离了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创造者的媒介或作品。——译者注。

机器网络，它决定着怎么买，怎么进行生产，怎么卖。它的目标将会是日益扩张自身，方法是获得更多的机器，运用更多的计算机监控这些机器，从而使自身变得更加强大。在它机械性地追求权力和利润的动机中，它只对自己负责任。这就是最为纯粹的资本主义，除了利润和权力之外，它不关心其他任何事物。^①

一个全球性公司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自由，可以按自己的发展趋势去发展，那么可能会有这么样的一天，那就是公司会获得最终意义上的高效率生产。它会成为一个仅仅由电脑和机器构成的实体，在这个实体中电脑和机器不断地从事着金钱的复制。我们可以称之为完美的高效率公司。尽管这不是任何人所想要的结果，但我们的行动好像就是以这个结果为追求目标的。

高层的痛苦

斯彻特斯城的居民们明目张胆地对处于自我毁灭的高级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系公开进行辩护，而在这些行动的后面隐藏着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精英人物的忧虑和不安也在日益增长。在1980年到1982年间，有79%的经理报告说他们工作的稳定性是“好的”或者是“非常好的”。到1992年至1994年间，这一数字下降到55%。^②这并不仅仅是他们的地位日益处于危险之境。这是一种对某件事情完全是错误的理性发现：他们正在把一个极其糟糕的世界交给自己的后代。许多公司的经理都面临着窘境：自身的价值观与公司要求

^① Dugger, *Corporate Hegemony*, 13.

^② Brian O'Reilly, "The New Deal: What Companies and Employees Owe One Another," *Fortune*, June 13, 1994, 50.

他们做的一切之间的冲突在日益加深。

大众传媒在为高层管理人员天价般的薪酬辩护时通常强调，这样的酬金会促进公司领导人竭尽全力为公司服务。通用动力公司的董事长威廉·安德斯（William A. Anders）由于使本公司的股票价格在10天之内升值45%而被奖励160万美元，该公司的发言人对《华盛顿邮报》说，必须有奖金计划来给予公司的高层以动力，让他们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并以股东的回报最大化为中心。^①这就出现了一个尤其受人关注的呼吁，它要求对全球最有特权、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员进行数百万美元的奖励，以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

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是哈佛大学的前任校长，他提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他认为必须给予公司的高层领导人这样的巨额奖励，以确保他们会把股东的短期利益摆在其他利益之上，否则的话，他们会考虑其他方面的利益——譬如考虑那些员工、社区甚至是公司自身的长期生存能力等。^②简而言之，应该给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以巨额的奖励，从而使他们不再按自己的那种应负社会责任的本能来行事。从这个方面来看，在公司缩减规模的年代里，高层管理层所获得的高额工资就变得非常令人恶心了。

由于不停地看到公司的这种血腥行为，越来越多的经理人对他们的工作失去了热情。正如1994年7月25日的《财富》杂志在它的封面故事《筋疲力尽的老板们》中所述的那样：

^① John Burgess, "Debate on Executive Pay Moves across the Atlantic,"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4, 1991, Business/Finance section, 1.

^② Derek Bok *The Cost of Talent: How Executives and Professionals Are Paid and How It Affects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93), 108-111.

那些受过训练、被要求进行建设的经理们现在却拿着工资去进行破坏。他们不雇佣员工，他们在解雇员工。他们不喜欢这个新的使命，但他们几乎都知道反对也没用。这种现实使日常工作与以前不同了：工作不再有精力；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

在这种形势下，工作时太过于高兴似乎变得有点不道德了。所以员工们变得更郁闷、更谨慎了，他们担心在下一轮的裁员中自己会不会失业。与此同时，为了填补那些已被解雇员工的空缺，他们必须工作得更加努力，工作时间也更长了。疲劳和怨恨情绪开始在他们中间滋生。^①

金融投资商们整天通过远离现实生活的计算机终端使数不清的美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与他们不同，公司的经理们必须整天与活生生的人一起处理事务。他们必须迎合财富拥有者提高效率的要求，为此他们欺骗此前的朋友和同事（把他们解雇），这种经历就像是失去自己所爱的人一样令他们心力交瘁。正如一位首席执行官告诉《财富》杂志的那样，“第一次解雇员工时你会认为这只是做生意的必要组成部分，因而会心安理得。第二次解雇时我就开始疑惑了‘这种解雇会导致多少妇女流产？有多少人会离婚？多少人会自杀？’我只有通过努力工作来迫使自己不再想这些问题”^②。

一个从事人事招聘工作的人员告诉我说他去探望了一位经理，这位经理刚刚几次解雇了其直接的下属。这位经理此前非常健壮、有魄力，而现在他染上了烟瘾，体重下降了，对这位人事招聘人员视而不见，而且看上去精神非常紧张。还有一位

① Lee Smith, "Burned-Out Bosses," *Fortune*, July 25, 1994, 44-46.

② Smith, "Burned-Out Bosses," 44-46.

经理此前解雇了数千人的工作，他现在吃不好，睡不香，因为他必须再一次让他的数千个前同事流落街头。他开始本能地发出叫喊声，并有一天终于卧床不起。

在美国，那些爬到金钱和专业顶峰的人很少会有什么身体上的不舒服。然而，他们意识到多少钱都买不到心灵上的安宁，买不到一个稳固而爱意融融的家庭，买不到相互关心的朋友，买不到一种自己从事的工作很有意义、很重要的那种感觉。

即使是对那些曾经在本行业处于权力和声誉之巅的经理们来说，形势也是在变化的。理查德·森德（Richard W. Snyder）是出版业中一位最有权势的著名人物，他在自己33年的职业生涯中，使西蒙与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公司成为一个年收入达到20亿美元的美国主要的信息传播公司。1994年6月14日，他参加了一个包括维亚康姆（Viacom）公司首席执行官在内的5分钟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的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的职务被突然而且理由含糊其辞地解除了，因为维亚康姆公司刚刚接管了西蒙与舒斯特公司的母公司派拉蒙（Paramount）传播有限公司。解雇的理由仅仅是非常简单的一句“风格不同。”^①

在董事长凯·惠特莫尔（Kay R. Whitmore）的领导下，柯达公司1992年的赢利达11.4亿美元——占销售额的近5%。1993年8月6日，他被公司的独立董事们解雇，理由是他在减少成本方面行动迟缓。他在1992年仅在柯达公司的13.2万名员工中裁减了3000名员工。而机构股东（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吵着至少要裁减2万名员工。金融分析家

^① Sarah Lyall, "Publishing Chief Is Out at Viacom," *New York Times*, June 15, 1994, D-1, D-16.

把他的被解雇视为一个很明显的证据，那就是独立董事们正努力把投资者的利益放在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之上。在这一天收市时，柯达公司的股票每股上涨了 3.25 美元。^①

没有什么人可以幸免。金字塔各阶层中的任何层次都不安全。《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写道：

做美国大公司的老板一直以来就是世界上最稳定、报酬最为丰厚的职业之一。而且直到前些时候情况还都是如此。上周 IBM 公司、西屋公司和美国运通公司的老板被解雇了。再往前几个月，罗伯特·斯坦佩尔（Robert Stempel）担任的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一职就很随意地被罢免了……现在大公司的高层都在疑惑下一个被解雇的会是谁^②

《经济学家》杂志把这种现象归因于股权由个人投资者向绩效取向的投资基金转移的结果，这些基金把它们认为“管理不力”的高层经理人剔除出去。这是“接管战”（takeover battles）的需要，因为基金管理人明白，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雇那些执行命令迟缓的经理人。

有限的承诺

公司的重构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对员工人数进行大规模的削减；它也是一个未被解雇的那部分人待遇下降的过程。白领劳动力市场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劳动力交流中心，在这个中心中没

① “Cetting Rid of the Boss,” *The Economist*, February 6, 1993, 13.

② “Getting Rid of the Buss,” *The Economist*, February 6, 1993, 13.

有工作的计日劳动力希望当天能有人雇他干一天活。“及时制”库存管理的方式现在也运用到劳动力的管理上了。

在此前的10年里，临时性机构所雇佣的工人数量增长了240%。人力公司是美国7000家猎头公司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该公司在册的临时工有60万名，它现在是美国最大的私人雇主。尽管有些工人是自愿选择做临时工或做兼职工作的，但在1993年，全美2100万临时工中有将近1/3的人说他们更喜欢做全职工作。许多失业的工人开始成为自雇佣者，自己签约做临时工作。他们中绝大部分人的收入都急剧地下降了。尽管大量相关的证据都是小道消息，没有有力的证据，但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989年到1992年，美国自雇佣者的实际收入的中位数下降了12.6%，仅为每年18544美元。许多新近成为自雇佣者的人每年的收入远远低于18000美元——这一数字是目前美国经济所提供的、能够勉强维持一个家庭生存下去的最低标准。^①

年轻的专业人员现在正在他们的公司之外积极地咨询自己的职业生涯计划，他们写自己的简历，在公司外面签自己的合约。他们已做好了准备，在所在公司不要他们或有更好的机会时就跳槽走人。年轻人所接受的建议使他们的职业活动活跃起来：这些建议把每个工作都视为是自雇佣性质的。^②

在不久以前，一个人所工作的公司就像是他的家一样。它是个人化的、变化缓慢的世界的一个主要支持系统。一个好工作并不仅仅意味着收入高。它也是价值认同和持久性人际关系的来源。在那些年代里，工作没有给家庭带来多少压力。而在

① “The Contingency Work Force,” *Fortune*, January 24, 1994, 31.

② “Planning a Career in a World Without Managers”, *Fortune*, March 20, 1995, 72-80.

当今的工作市场中，白领与蓝领的区别已经不像有固定工作者与无固定工作者之间的区别那样重要了。这一体系形成了一种“当你能从中取利时，不要错过”的态度。管好你自己，别人是不会理你的。

癌症的蔓延

美国公司和金融市场的特征是其价值观和运转机制已经功能失调，这一特性就像恶性肿瘤的扩散一样传播到日本和欧洲，这些地方的公司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传统，那就是对公司员工和公司所在地区的利益有一种责任感。跟美国相似，欧洲进行的一系列公司重组，到1994年5月，已经使欧洲的失业率上升至10.9%。^① 尽管这一比率已经很高了，但它的后面还隐藏了更深层次的功能失调。在比利时，1992年的失业率是8.5%，但有25%的劳动力却是依靠公共援助计划为生的。^② 长期的失业正导致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加强，加剧了种族间的紧张局势，并且刺激了反对外来移民的浪潮出现恶性反弹。年轻人的失业情况尤其突出，他们的失业率是一般人群的两倍，而且还在增长。1994年3月，5万名学生在巴黎的林阴大道上游行示威，他们“笑骂警察并且高呼要工作的口号”。一项对欧洲3000名青少年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青少年“很困惑、很脆弱，对自己未来的经济状况很担忧”^③。

公司控制的传媒宣传机器为上述这些冲击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力量，它们的宣传很快就能够把过度的公司全球化所引

^① “Slash and Earn on the Continent,” *Business Week*, May 2, 1994, 45-46.

^② “Europe’s Economic Agony”, *Business Week*, February 15, 1993, 49.

^③ “Rage in the Streets,” *Business Week*, April 11, 1994. 46.

发的任何不公平说成是公平的，即使这种不公平程度在加深它也能够如此。《经济学家》杂志指出，欧洲的失业率平均起来要比美国高出3个百分点，它警告说：“没有什么贸易堡垒能够把技术的革新拒之门外，这些技术革新已经使富国里的工作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贸易战所带来的工作岗位肯定是比它所破坏的工作岗位要少。”^① 它建议欧洲各国仿效美国，削减社会安全网的力度。因为这种安全网“使失业者缺少找工作的动力”；降到最低水平的工资“使年轻工人放弃工作”；实行雇主社会保障缴款制度，从而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严格的就业保护法规”，即通过“一旦这些工人列在了薪金名册上，就让公司解雇他们变得如果不是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方法，来阻止公司解雇工人。针对一些人提出美国的工作质量在恶化是上述政策所带来的说法，《经济学家》杂志给出了明确的回应：

悲观的商人们认为，（美国所创造的工作岗位）中临时工作、兼职工作和收入低下的工作太多了。在过去的10年中，低技能的工人的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然而与欧洲相比，这还是一个胜利——是劳动力市场运行良好的实例——而不是一种失败。由于生产下降，美国和欧洲都将面临着对低技能的劳动力需求下降的局面。在美国，由于允许这类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可以下降，所以很少有人会为此而失业。相反，欧洲的工人坚持工资的可升不可降，那么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使自己失业。^②

① “Doleful,” *The Economist*, October 9, 1993, 17.

② “Doleful,” 17.

总之，按照公司传媒的说法，欧洲失业率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给予穷人的太多，富人的负担过重，同时实行的制度限制了公司进行大规模压缩的能力。《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认为，欧洲各国所采取的降低最低工资标准、削减纳税名目和放宽就业保护法规的限制性规定等步骤，是未来希望的一个象征。^①《商业周刊》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

一旦下层的循环系统出现衰退，为了确保自己的竞争力，欧洲应该很乐意看到自己更多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东欧和其他地方去……在削减农业补贴的同时，继续对高工资和公司税收、工作时间的短暂、劳动力的不流动以及奢侈的社会保障计划进行改革。如果欧洲各国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它的衰退可能导致的就不仅仅是工作转移的一种恶性循环……建立贸易堡垒只会使欧洲各国远离他们应当遵守的戒律。^②

尽管行动比美国要慢一点，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公司和政府都已日益开始关注这个建议了。这意味着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目前正困扰着欧洲的失业率、种族紧张局势和社会不稳定的局面将会继续加剧。我们可以推测，到时候《经济学家》杂志一定会赞扬欧洲所取得的成功。

公司帝国构建者的梦想正在很快地成为现实。这一全球体系正在就国与国之间的标准问题进行协调——甚至连最不常用的单词都被包括在内。受全球金融市场迫切需要的驱使，这一全球体系认为只有金钱是有价值的。人类由于对生存工资、繁

① “Doleful,” 17.

② “Europe’s Economic Agony”, 48-49.

荣的社区和健康的环境有着无穷无尽的特殊需求，因此他们是一个不受欢迎的经济负担——是消除低效率的阻力。

无赖的金融体系正利用人类、地球和社区与文化共同纽带为自己的当前市场定价服务。这一金融体系所追求的各种经济增长并不会保护人类的福利。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想怎样活法？如果我们想要的社会认为生活比金钱重要的话，那么我们就要重建我们的制度体系。

第五部分 收回权利

十八、生态革命

只要有意识地去改变现实的内在形象，我们可以改变整个世界。

——威利斯·哈曼^①

我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体化，越来越多的人就像两个人一样相互理解对方……新的思想、共同价值观和其他的生活方式出现的时机已经成熟。

——肯尼亚绿带运动 统筹旺加里·马塔伊^②

世界如果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

^① Willis Harman, *Global Mind Change: The Promise of the Last Ye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dianapolis, Ind.: Knowledge Systems, 1988).

^② Wangari Maathai, "All We Need Is Will," in *Can the Environment Be Saved without a Radical New Approach to World Development?* (Geneva: CONGO Planning Committee for UNCED, 1992), 27.

的数十亿被排斥的民众，另一边是用城堡保卫自己的财产和奢侈生活的一小群精英人士，这样的世界是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看到的。身在其中的社会和环境系统面临崩溃的命运，没有人会为此而欢呼雀跃。然而现在我们仍然允许那少数的几百万人为了他们那些难以想象的需要而积聚着财富，我们还在继续让人类文化，甚至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存处在危险之中。我们继续在大胆地向那个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局走去。

我们现在开始明白，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我们正在创造的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社会，它正在繁衍出病态的行为——暴力、恶性竞争、自杀、吸毒、贪婪和环境退化——这些随处可见的现象。当社会没有满足其成员在社会联系、信任、爱和共同的神圣生命意义等方面的需要时，上述这些病态行为就必然会出现。^① 这种功能失调体现出三种危机，即贫困问题的恶化、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的解体。

集体性疯狂的追名逐利使社会功能失调的局面更加恶化，但它并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中间有人持有一种完全虚幻的观点，认为我们处在一种不可抵抗的历史力量的支配之下，人类具有内在的、不可逆转的不完善性，这需要我们调整自己去适应这种状况。公司全球化是由一部分有意识进行选择的人来推进的，而这些人是通过公司利益的棱镜来看这个世界的。人类发展可供选择的其他方向确实存在着，那些透过人类利益的棱镜来看这个世界的人既有权利也有能力去选择这些方向。

一个健康的社会依赖于健康的、有实权的地方社区，社区帮助人们相互之间形成了相互关爱的人际关系，帮助我们与这

^① Mary E. Clark, "The Backward Ones," *PCD Forum Column* no. 51, June 25, 1993.

个生活世界的某一个特殊部分联系起来，通过这个部分我们的生活交织在一起，不可分割。这样的社会必须通过地方层次的行动，一户一户、一个社区一个社区地建构起来。事实上，我们已经建构起来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使地方失去了权力，使上述行动的实施——如果还有可能实施的话——变得困难重重。

为了改变这种功能失调的现象，我们必须抛弃我们有共同文化梦想的这种幻觉，收回我们此前交给那些无能的机构的权力，重新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重新编织关爱的家庭和社区的基本构架，从而为人类和其他生命提供生活的场所。这些行动都是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但它们要求我们改变主流的信仰体系、价值观和社会的各种制度构架——这是一个可以与引导我们进入科学—工业时代的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生态革命。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对我们都有启发意义的。

关于存在的各种观点

主流观点对于存在（reality）的本质是什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是哥白尼革命发生的基础。这些问题必须接受验证，因为它们直接探寻了我们现存问题的根源，并有助于我们分清生态革命所面临的挑战。^①

先验的一元论（它认为意识或精神先于物质而存在）是许多东方文化的哲学基础，至少在受到西方的科学、工业化和全球竞争、消费主义在近期的冲击之前，情况的确是这样的。这种哲学传统的拥护者认为意识是本原，而物质是意识或精神力量的一种产物。这种信念认为所有的意识包括意识的物质表现

^① 以下讨论来自 Harman 的讨论，34-35；Duane Elgin, *Awakening Earth: Exploring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ulture and Consciousnes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93), 15-16；以及与 William Ellis 的私人谈话。

形式都起源于同一个潜在的主体。先验的一元论认为，内心的智慧通过我们与无限的世界进行心灵上的沟通，成为有效认知的主要源泉。这种哲学传统一般是与对物质事物的拒斥，与对自己的物质条件的宿命式的认命，与强烈的社区意识和对自然深深的敬畏等联系在一起的。

在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却走过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它把神进行人性化，认为神住在遥远的和与世隔绝的地区，神的注意力集中在关心地球及其居住者人类的身上。在这种传统中，神的意志和智慧是由先知来表现的，譬如摩西或他的化身耶稣等。世界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太阳、许多恒星和行星围绕在它周围。直到500年之前，这种信仰一直都是欧洲科学思想、道德及政治权威的基础。

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Nicholas Copernicus）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一书。他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地球只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星球之一，太阳本身也只是宇宙中无数类似的恒星中的一个。这就在科学和教会之间产生了历史性的冲突：在科学观察与神灵的启示之间，哪一个是人类知识更有效的来源呢？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它认为物质产生意识或精神）就成为科学所提出的现实的真正形象，并被历史学家称为哥白尼革命。这种哲学传统的追随者们认为，物质是本原，物质的测量方法是知识的有效来源，意识感受仅是物质复杂性在人头脑中的反映。对这种传统来说，任何独立于物质存在之外而存在的意识表现形式都是不可能的。在科学—工业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是西方科学训练和文化的基石。它通常与对精神意识的拒斥，与强调唯物主义，与个人主义和对自然的开发利用等联系在一起。

根据历史学家爱德华·伯恩斯（Edward McNall Burns）的观点，哥白尼革命的重要性在于“哲学家不再需要将神的启

示尊称为真相的来源；推理已经成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而整个神学宇宙观就像一件烂衣服一样被弃之不顾”^①。教会的知识和道德权威一落千丈。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那些能够测量的事物才是合适的科学研究对象，才能够进行因果解释，这种观点使科学能够把“科学解释与诸如神灵的幻想、神的恩惠等前科学时代的解释区分出来”^②。然而，这也意味着意识、价值观、美学和其他的人类实践等将被排除在科学探索的范围之外。科学不承认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方式，这使它有效地摆脱了科学知识在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道德责任。

17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把唯物主义的一元论推向了一个极端。他认为除了物质之外别无他物。如果说神存在的话，那么他是一定有一个物质实体。霍布斯认为，善就是能给我们带来快乐的事物，恶就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事物，生活中唯一有意义的目标就是追求快乐^③——这一价值体系现在成为公司全球化的潜在的道德假设。

宗教和科学制度——两者对存在都有自己的观点——从此都在争取占据西方社会里人们的心。二元论（它认为物质和精神是存在的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方面）为宗教和科学世界观提供了一个不太稳定的折中方案。当教会仍过着一种约束心灵的生活时，非宗教的世俗社会已经开始把物质世界视为他们的主要的世界，把唯物主义视为他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把最终的经济增长视为人类根本的追求目标。

作为一种科学哲学，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为科学—工业时代

① Edward McNall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Their History and Their Culture*, 5th ed. (New York: W. W. Norton, 1958), 520.

② Harman, *Global Mind Change*, 12.

③ Burns, *Western Civilizations*, 521.

的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可能性。作为一种深深地植根于现代文明中的生活哲学，它把我们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因为它很自然地就让我们接受了霍布斯主义的价值观，使我们远离任何更高层次的目的和意图。由于把物质上的自我放纵视为我们的目标，所以为了经济公平或为了关心后代而呼吁对这种放纵进行限制，就等于是呼吁牺牲生活的全部意义。正如公司自由主义者有时认为的那样，随之而来的结论就是，那些有经济力量继续尽情享受欢乐的人是最理性的。如果环境保护主义者牺牲了自己的快乐，而他们在最后却被证明是错误的，那么他们还不如放弃自己的这一事业，去享受无穷的美好生活。如果环境保护主义者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欢乐就会以自我毁灭而告终，但是至少他们在自己能够享受的时候享受了。

唯物主义的一元论也为一种经济学开辟了一条道路，这种经济学意欲获得真正科学的地位，它采用可观察可测量的市场价格作为人类价值观的唯一的仲裁人。这种经济学所能理解和解释的仅仅是纯粹的普遍性的人类行为，这些行为不涉及价值观、忠诚、渴望、爱、心理上的矛盾、利他主义、精神、良心，甚至也不包括形而上的信仰。这种经济学集中关注我们的经验和福利，但这些东西通常是很难观察的，更不用说是去测量了。因此，正如科学自己界定的那样，社会科学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因为对于许多社会行为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缺少直接观察或测量的手段去测量它。

这种状况促使社会科学家做出选择：要么为了使科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相一致，重新去界定科学探索的规定；要么就把我们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那些特性排除在研究考虑的范围之外。为了取得学科的科学地位，经济学家们选择采用了后一种方法。它假定一个假想中的经济人只是机械地追求自身的满足，它根据可测量的经济收益来解释一切。每当一个经济模型需要

一个人类的决策者时——不考虑性别——经济学家就会建构出一个虚构的、有决断力而且没有人类情感的经济人，这个经济人做出每个选择时都以该选择是否有经济回报为判断标准。

在剔除人类的情感之后，经济学家接着又剔除了行为这一因素。经济学家们发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实在是太复杂了，实在是难以测量，他们选择去测量市场行为而不愿意去测量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市场行为包括价格和货币的流动，这些都是很容易进行观察和测量的。

由于一门科学必须是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所以经济学把所有的价值都简化为由市场价格来揭示的市场价值。因此自然无偿带给人类的那些空气、水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都被视为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在这些东西成为稀缺物质时，才可能销售它们。相反，黄金和钻石虽然在日常生活中不经常使用，但它们却具有极高的价值。通过计算一个人一生的收入潜力或者“经济贡献”，我们就可以估计出他一生的价值是多少。正如一位愤世嫉俗者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家知道任何事物的价格，却对他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当代哲学家雅各·尼德曼（Jacob Needleman）指出：“换个时间和场合，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金钱’作为自己的第一选择；人们渴望着得救、美、权力、力量、快乐、规矩、解释、食物、冒险、征服、舒适。但是现在，金钱——是所有人的渴求之物。”^①为什么现代社会用对金钱——仅仅是一个无内在价值的数字——的追求作为自我及其各种价值的唯一解释？刚开始，这个问题似乎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让人好奇的难题，最后我们渐渐地认识到一个现实，那就是一个现代的金

^① Jacob Needleman, *Money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91), 40-42.

社会的生存离不开金钱。乔·杜明桂 (Joe Dominguez) 和维基·罗宾 (Vicki Robin) 合著的在《纽约时报》排行榜列为畅销书的《要钱还是要生活》(Your Money or Your Life) 中认为, 金钱成为“某种我们常常紧缺的东西, 某种我们努力去赢得的东西, 借助于金钱, 我们实现自己的权力、幸福、安全、认同、成功、满足、成就和个人的价值”^①。

由于接受了我们必须依靠金钱才能满足生存需求这一事实, 再加上宣传信息的不断狂轰滥炸, 我们很容易就会陷入一种模式, 认为金钱能够给我们提供成就感、认同感、归属感、价值感和意义感——我们忘记了一个简单的事实, 那就是只有真实事物的伪造品才会拿出来出售。要想获得真正的东西, 我们必须建立相互关爱的人际关系, 做个好朋友和好邻居, 在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 投身社区生活得到发展并保证我们的这种能力。

但是市场专家带给我们的却是不同的文化信息。他们不卖洗衣服的肥皂, 他们卖的是认可、成就和个人的价值。他们不卖汽车, 他们卖的是我们真正想要的权力、自由和成功——一种感到自己还活着、还在与别人联系以及自己是自由的感觉。要去购买市场所提供的一切, 我们就要拥有金钱。正如杜明桂与罗宾所解释的那样:

金钱是我们选择用来交换的一种手段, 用它把我们的生活精力……和我们时间进行分配, 与我们宝贵的生活时间进行交换。我们工作时, 实际上是在用我们的生活精力

^① Joe Dominguez and Vicki Robin,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Transforming Your Relationships With Money and Achieving Financial Independence* (New York: Viking, 1992), 54.

来换取金钱。这一真理既简单又极其复杂。^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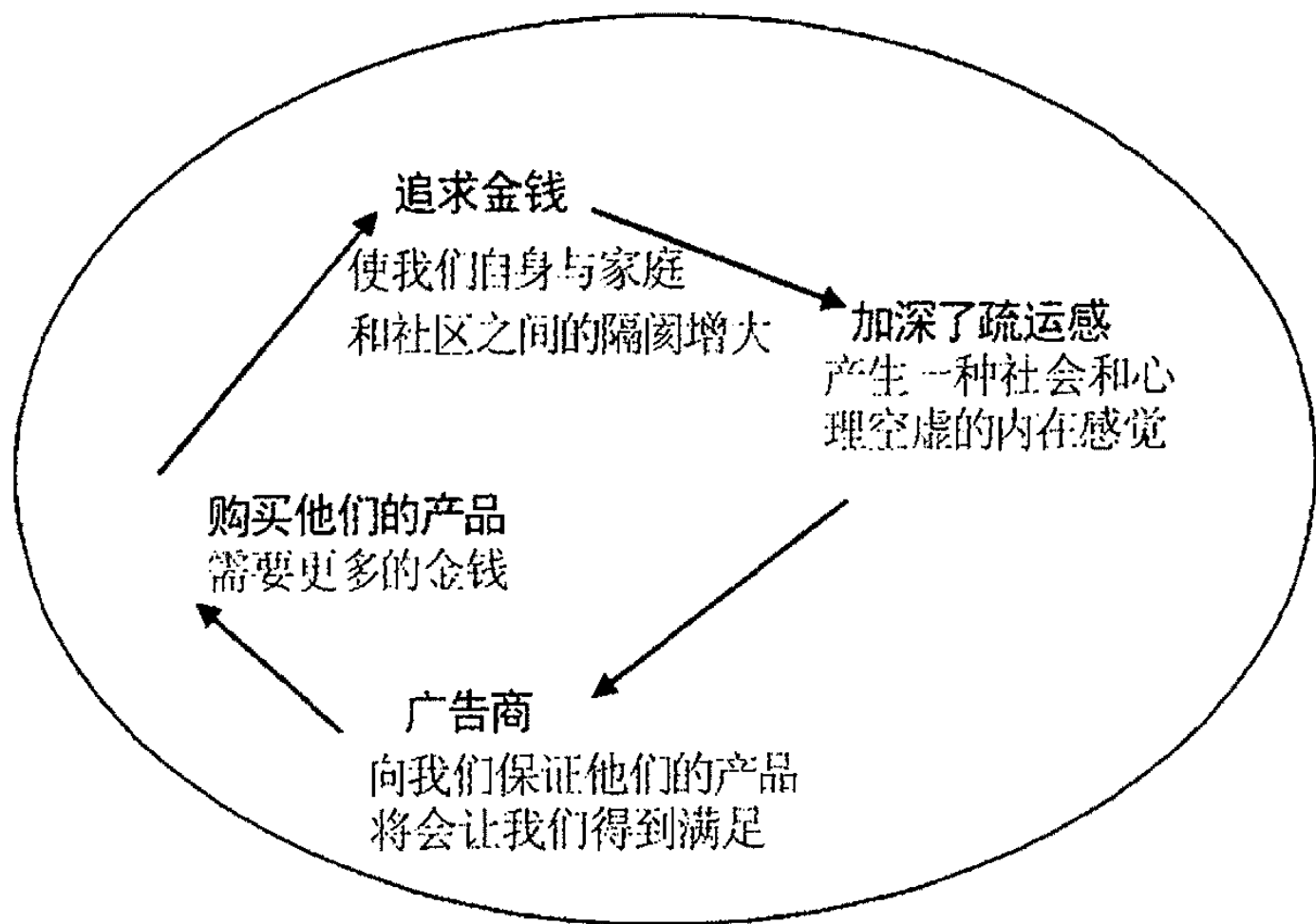
金钱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它是我们在另一个时间地点获得与其他人一样的东西的凭证。它是使生活精力获得的东西得以增加的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我的价值为何？”这一问题的答案，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成就和财富聚集程度的测量手段。专业慈善团体甚至把金钱视为是衡量我们同情心的一种手段，“你与众不同，今天就把支票送来吧”。由于用金钱来衡量我们自身，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与生活、与我们自身的精神本性相疏远，并日益陷于这种恶性循环的旋涡之中（见图18.1）。

公司传媒不愿告诉我们的是，只有与家庭、社区、自然和宇宙保持着和谐关系，这样我们才能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的满足感。相反，这些传媒不断地向我们重复一个错误的观点：不管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市场都可以立即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目标就是消费——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购物的。由于沉迷于市场的甜言蜜语，我们一直低估了为挣钱而付出的生活精力，并高估了通过花钱预期获得的生活精力。花在挣钱上的生活精力越多，我们交给这些制度的权力就越多，而这些制度控制着我们所挣的钱及用这些钱所买的东西。我们交出来的权力能够很好地为公司利益服务，因为公司是金钱的产物，由于我们是自然和精神的产物，所以说公司不是为人类的利益服务的。

地球满足我们的贪婪的能力有一定的限度，借此我们可以重新认识自身，我们发现自己面前摆着一个美丽的真理。我们追求物质丰裕，而所得到的是物质匮乏，但如果我们追求生活，那么所得到的就会是一种社会上、精神上，甚至是物质上

^① Dominguez and Robin,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54.

图 18.1 隔阂加深的循环图



丰裕的新感受。

人如果生活在一个充满爱意的世界里，那么他们就会很少寻求强制性的、外部性的个人物品的慰藉。由于情感匮乏，任何物质上的极度放纵都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物质世界并不能满足我们的所有需要。一个没有爱意的世界最终也会变成一个物质匮乏的世界。相反，一个有爱的世界也是一个物质丰裕的世界。如果我们精神健康，在社区中有着相互关怀的支持，那么繁荣就会成为充实而自律的生活中一个很正常的组成部分。个人需求得到了完全满足，这会给人们带来一种自然丰裕的满足感。

但上述这些话的意蕴是很复杂的。表面上看，我们是在无休止地追求金钱和物质消费，实际上是由于生活中缺少关爱，我们在追求某种能够填补生活空虚的东西。在一个功能失调的社会中，金钱已经取代我们精神联系的意识，成为我们文化价值观和相互交往的基础。其结果就是产生了一个物质匮乏、不

平等程度加深、环境系统负担过重及社会解体的世界。只要我们把挣钱作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并构建出各种制度体系，把这一目标置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那么，我们生活中的空虚感就会增强，人类的危机就会加深。这里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应对方法：建造一个社会，使之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把培育关爱放在比金钱更重要的地位。

这种建议听起来可能像是有点理想主义化了。但它确实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之一。科学和宗教知识的假设展现了现实世界物质和精神维度的全部联系，而通过这种正在显现出来的假设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观念意识。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实现这种观念意识上的转变。^①哥白尼革命让我们消除了对自身、对存在的本质的误解，引领我们走进了科学—工业时代。相似地，生态革命建立在精神和物质更平民主义的基础之上，它引领着我们走进一个生态时代，为我们的社会和精神发展提供了几乎无法想象的巨大机遇。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让人们收回权力，此前我们把这些权力交给了由金钱和公司主导的全球化经济。

经济的地方化，意识的全球化

人类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对于个人为了共同的未来所采取的行动，它能够预测可能会产生的后果，并据此相应地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也有能力分辨在进化进程中重复出现的模式，从这些模式观点中提炼精华并加以运用，从而促使我们的进化

^① Fritjof Capra, *The Tao of Physic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6); Gray Zukav, *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 An Overview of the New Physics*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9). Fritjof Capra, *The Turning Point: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Rising Cultur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2), and Harman, *Global Mind Change*, 对社会的含意作了专门的分析。

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晶状体、生物组织、社会组织和思想意识这些自我组织的增长和进化是一个向更为有序的复合体持续不断地前进的过程。^① 在一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结构体中，能够培育出丰富的、多样性的系统就是进化潜力最大的系统。多样化程度越高，进化的潜力就越大——前提是结构保持着一致性。

阿诺尔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他那些划时代的研究中发现了这一模式，他研究的是世界各大文明的沉浮变迁。衰退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有一种走向标准化和一致性的趋势”。这种模式与文明兴起阶段的“走向差异和多样化”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② 一个几乎可视为真理的事实就是，在复杂的系统中，多样性是发展进步的基础，一致性是停滞和衰退的标志。

标准化和一致性似乎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因为巨型全球跨国公司主导着这种经济，它们在一个文化日益同质的世界里进行着大规模的生产和营销。很难想象会有一种文明能比可口可乐和 MTV 联合形成的文明更为标准化和一致化。公司全球化的过程不仅仅是大规模的贫困扩散、环境破坏和社会解体，它们也削弱了我们积极地对社会和文化进行创新的能力，而当前这样的创新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急需。公司全球化正引领着我们走向一个进化的死胡同。

相反，如果经济系统是由植根于地方的、自足的经济制度构成的，那么它会在各个地区创造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会找到一条与自身的内在渴求、历史、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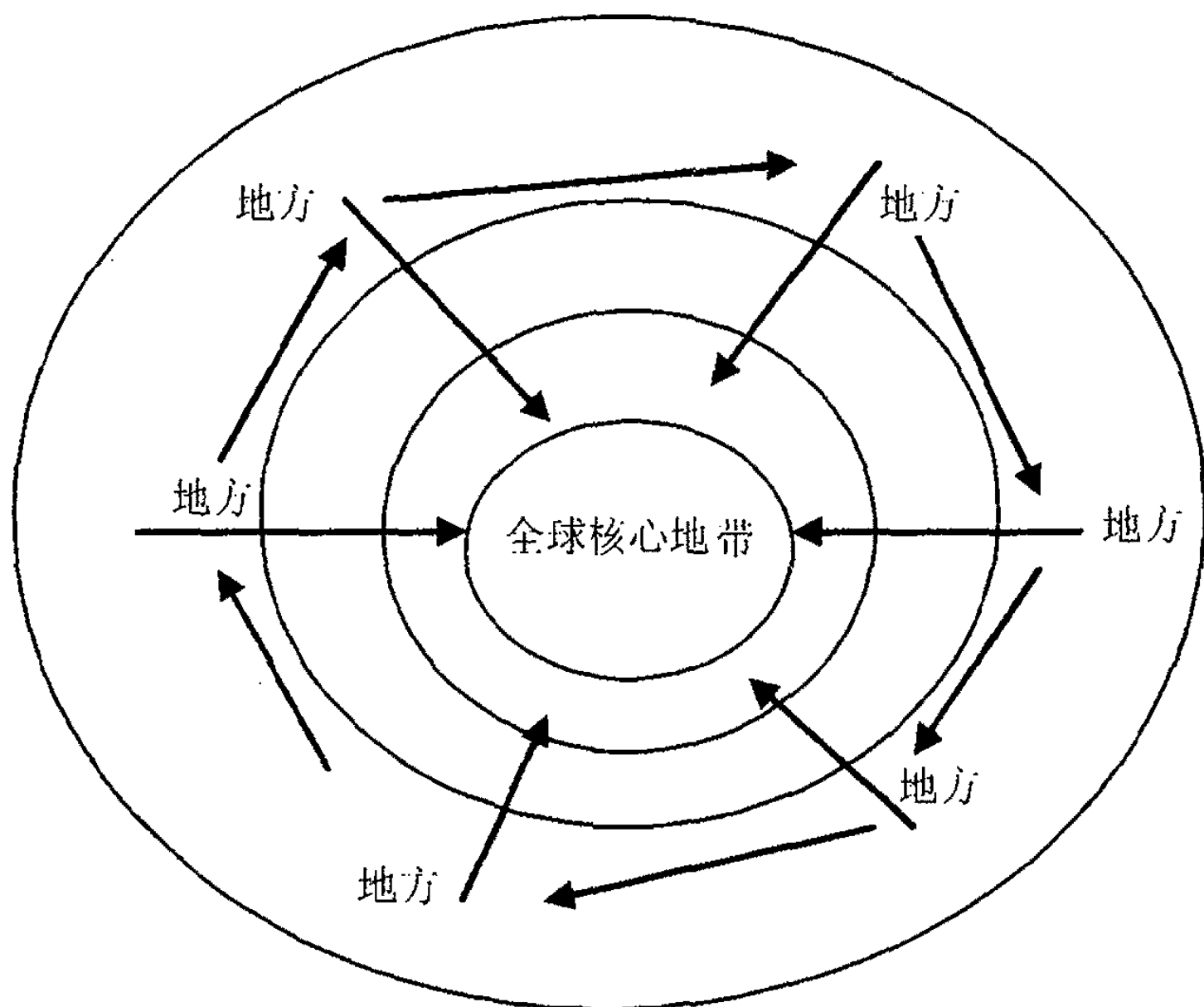
① 这一理论由 George T. Lockland 发展出来，*Grow or Die: The Unifying Principle of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Dell, 1973)。

②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abridgement of vols. 1-6 by D. D. Somerwe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555.

化和生态系统相一致的、通向未来的道路。由地方性经济构成的全球系统能够完成同质性的全球化经济所无法完成的任务——鼓励多样化的强大地方文化的丰富和繁荣，创造一系列丰富整个体系文化所必需的经验 and 知识。

经济全球化使各个地方对独立的全球制度的依赖程度加深，这些全球制度集中了各种权力，控制了各个地方的资源，使人们对地方的忠诚荡然无存。一个地区对外部的依赖性越强，它在自身边界范围内自己找到解决问题方法的能力就越小。尽管经济全球化的支持者通常认为全球化带来的是相互依赖和利益共享，但是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真正出现是人们和各个地区对全球化公司和金融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加深。这种依赖的后果就是，人和各个地区之间为了生存而在自我毁灭性的竞争中相互抗衡，从而把更多的权力转交给核心地带。（见图 18.2）

图 18.2 地方权力的丧失



核心地带的权力是从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来源中产生的：它有能力产生金钱，它拥有各个地方所依赖的生产性财产，它控制着协调各个地方之间关系的制度和机制。这种权力日益集中在全球性金融市场和公司的手中，其中全球性公司已经将自身确定为这个星球的事实上的统治机构。经济的全球化程度越高，地方的依赖性就越强，核心机构所拥有的权力也就越大。

全球化的经济系统与地方是相分离的，它有一种内在的倾向，那就是偏爱规模较大的、全球化的、竞争性的、资源消耗性的、短期的系统，偏爱满足那些有钱人的需求。我们的艰巨任务就是创建一个植根于地方的全球系统，它偏爱的是小规模的地方性的、合作的、资源保护性的、长期的系统，偏爱于满足每个人的需求——这个系统能够在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基础上使所有人都过上美好的生活。它的目标并不是要把所有的社区都与世界隔离开来，而是要建立地方负责任、有义务的地区，这在其中人们应该收回一种权力，这种权力能够使他们为了共同利益而管理经济的权力合法化。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矛盾，那就是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我们创建了一个将公司联合起来的体制，但同时却把人们给分离开来，让他们为了公司的利益而相互竞争。从市场竞争的原意来看，让公司相分离并使它们为了人们的利益而相互竞争的体制，才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让人们与社区相互合作会使所有人都过上美好的生活。

在生态时代，人们不仅是通过不安全的全球竞争而联合在一起，而且通过一种全球意识结合在一起，这种全球意识就是我们共同拥有这个星球，我们的命运是相同的。目前这种意识已经出现了，并且从人类历史角度来看它有三个独特之处：第一，所形成的思想是包括了数百万在权力精英圈子之外生活和工作的普通人参与的大众运动的智慧结晶。第二，这种大众参

与是真正的全球性的，它使来自各个国家、文化和语言传统的人们相聚一堂。第三，这种新意识正在迅速地发展壮大，它有一个日益明显的特征，就是把地方社团融入全球性同盟之中，让思想共享，通过会议和互联网、电话、传真等方式形成一致的立场。

这一进程正在塑造一种日益加深的理解、利益的共享和相互同情的网络，而这些恰恰是全球性人类社区存在的基础。这种网络的强度和活力都在提升，因为它的成员——不像斯彻特斯城居民生活在豪华而富足的隔离世界之中——是植根于真实世界的地方社区之中。他们直接感受着危机扩散所带来的后果。他们的经历是真实的，他们很自然地会倾向于人类利益，而不是公司的利益。

社会运动是生态革命的驱动力，通过参与这一运动，越来越多的市民正投身于重建地方性社区的事业之中，而且他们还动员其他人也参与到类似的工作之中。这种自愿性的进程是在共识和权力分享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其中我们必须为全人类利益而采取协同行动，这一点他们已经认识到了。

生态时代的新型人类社会建基于地方性经济和全球性意识之上，上述这些努力正在为此奠定基础。

指导原则

哥白尼革命的思想形成是通过对物质实体的科学观察而产生的，我们可以把它的根源追溯至一系列著名的物理学学者身上。相反，生态革命的思想形成是人类共同的经历以及对生活和非生活系统进行研究的产物。我们可以在无数的市民运动的文件和宣言中清楚地找到这些思想。他们在有着不同学术原则的学者们的学术论著中寻找理论基础，这些著作分别来自于历史学、社会学、生态学、经济学、生物学、物理学、一般系统

论和生态经济学。这些思想可以加以提炼，作为建构健康的21世纪社会的一系列指导原则。

环境可持续性原则 健康的社会在环境方面应该是可持续性的，这意味着它们的经济必须满足三个条件：^①

1. 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率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再生能力。

2. 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费或无法补救的使用速度不能超过可再生的替代性资源开发和投入使用的速度。

3. 向环境排污的比率不能超过生态系统的自然净化能力。

环境资源或吸纳能力的运用若超过上述比率就可视为是不可持续性的，必须为了给未来一代人提供机会而进行相应的协调。因此环境可持续性的原则说明，与当代人的个人财产权相比，未来一代的集体财产权具有天然的优先权。

经济公平原则 健康的社会能够向它的所有成员包括当代的成员和未来的成员，提供健康的、安全的、富饶的和满足的生活所需的基本条件。给那些做出很大贡献的人提供额外的奖赏是理所应当的。当然前提是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都得到了满足，未来一代人的选择也没有受到影响，而且社会对经济权力的集中化有着严格的控制。

生态和文化多样化原则 健康的社会能够在这个星球上培育出多样化的生态和文化。多样性是进化潜能的基础。培育生态和文化的多样性对于我们积极地参与进化进程是至关重要的。

人民主权原则（也称为辅助性原则） 在一个健康的社会中，主权是掌握在人民手中的。人类经济的目标就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金钱的需求，也不是政府与公司的需求。人

^① Herman Daly, "Toward Some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conomics* 2 (1990): 1-6.

民有权自主地决定怎样利用地球资源，怎样才能遵守上述三个原则的基础上更好地铸造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这种权力是不可剥夺的。人们最好能够在下述情况下运用这种权力：

- 生产性财富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是植根于地方的，这样由承受后果的人来做出重要决定的可能性就很大。

- 统治权力和责任位于最小的、最地方化的系统单元之中，这可以使直接的、参与式的民主实现的机会最大化。

- 更多的核心层次的系统正确界定自身的角色，即为地方性系统实现系统选择的目标提供服务和支持。

内在责任原则 健康的社会让资源分配决策所带来的成本全部由决策者来承担——这是自我调节的经济系统取得高效率的一个必备条件。这一原则适用于个人、企业和政治决策领域。任何团体都无权把自己的消费成本转嫁给其他人。我们的目标就是构造新的经济关系，以鼓励每个地区都利用可持续性的手段来生存发展。全球性的经济系统可以为私人经济收益提供最大的可能范围，而同时却将成本外部化，与此相似，地方化的经济系统中的地方自足性经济鼓励成本的内部化，因为成本外部化的后果承担者和要求成本内部化的权力均集中在同一个地方，甚至是在同一个人身上。

共同遗产原则 健康的社会认识到，地球上的环境资源和人类积累的知识是人类共同的遗产资源，每个人——事实上是每个当代和未来的生物体——都有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它们。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在违背当代及未来一代人更大的利益的情况下去独霸或使用这一共同遗产。事实上，那些拥有环境资源的人有道义上的责任去充当托管人，保护未来一代人的利益，保护那些拥有特殊知识的人的利益，因为他们愿意与其他受益者分享这些知识。

健康的社会之所以能够良性运行，是因为它把上述原则所

规定的权力和责任放在最优先的位置，这其中包括将其放在个人、公司和政府的权力之上。这些原则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公司为中心，因而对于社会失调问题，它们提出了一个与公司自由主义的对策完全相反的替代性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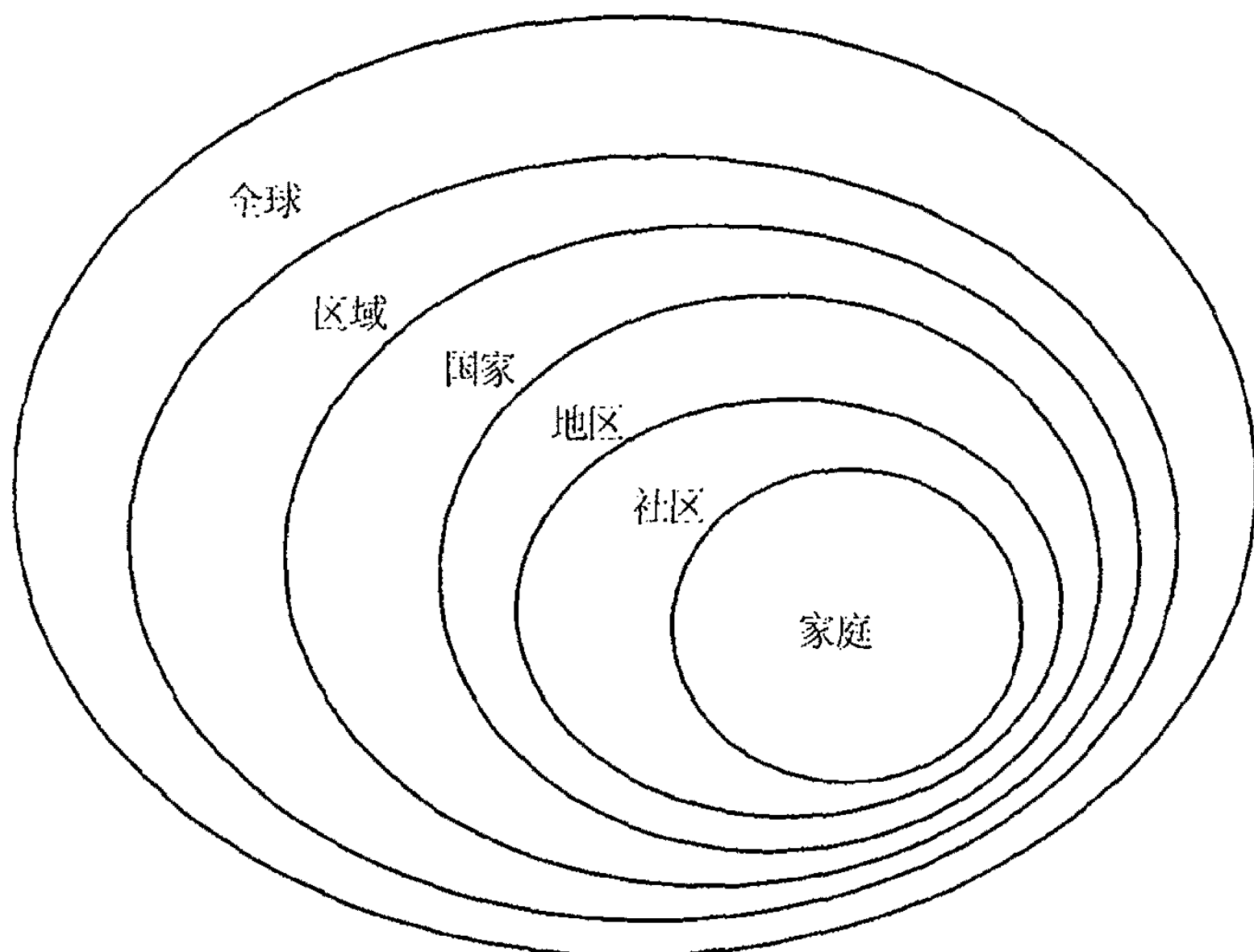
健康的社会在所有事物上都寻求均衡。它们承认政府和对各地区负责任的企业所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也抵制遥远的强大政府和公司对自己的控制。同样，它们寻求的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而同时在各地区之间相互自由地分享信息和技术，从而避免了依赖外部和各个地方被孤立的局面出现。

生态时代较为理想的组织形式可能应该是一个网络型的多层次经济系统，其中家庭是基本的经济单位，从地理区域上看，一级一级地向上，从地方、行政区到国家、大区域和全球这样的—个连续性集合体。（见图 18.3）^① 为了体现内在责任的原则，每个层次都应在其能力范围之内，作为一个完整、自足、自我约束的政治、经济和生态社区而自行运转。从基层的单位开始，向上的每个系统层次都力图实现生态上最优、最可行的自给自足，尤其在满足基本需求方面情况更是如此。

由于各个层次的单位在提供环境服务的贡献方面各有不相同，因此为了弥补这种不平衡，每个单位都在其聚集群中与其他单位进行着有选择性的交换，并使这种交换尽可能地平衡。家庭与家庭之间在它们的社区内进行交换，社区与社区之间在它们所在的地区内进行交换，如此等等。系统单位越小，交换的需求就越大。因此，家庭经济活动中有很大部分是与外部进行交换。尽管许多家庭可以生产一些自己所需的食物，但几乎没有—个家庭是能够完全自给自足的。相对而言，生态经济型

^① 本图是基于 James Robertson 的 *Future Wealth: A New Economics for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Cassell Publishers Limited, 1989) 而制作的。

图 18.3 网状经济



的社区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更加自足自立，依此类推，地区就在更大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

由于必须要尽可能地在地方层次上满足经济需求，这样就必须应用辅助性原则，尽可能地将统治权力和责任交给最小的、最为地方性的单位。这样我们就有可能维持一种市场体系，使体系内的政治权力和市场权力能够在各个层次上都保持着平衡。地方性的公司有一种天然的优势，那就是它的人员和货物运转都较为简单。

贸易减少和地方的自给性增加都意味着消费的选择范围缩小。在北方的气候中，我们吃的是冬天的蔬菜或储藏蔬菜，种植的作物是苹果而不是香蕉。住在森林地区的人们会用木材来做房子，而住在炎热干燥气候中的人们就会用土制的砖瓦材料来做房子。有些商品的价格可能比现在要高。总而言之，与经

济的安全性更大这一前景相比，上述这种牺牲还算是很小的，因为经济安全的提高就确保了社区的安全，使人们能够晚上无忧无虑地出外行走，使环境空气的质量得以提高，使我们的物种得以存续，并形成新的进化潜力。

如果我们把自身看成一个多层次的系统，目前正在进行的重新划分国界的进程可能就要继续下去。正如苏联所发生的和加拿大所争论过的那样，过于庞大、过于复杂的国家如果无法有效地进行治理，它们就会分裂成许多较小的国家。目前美国国内正在进行着旨在扩大地方权力和自治范围的政治运动，这一运动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一种无法治理和过于复杂的局面——即使没有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没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没有关贸总协定，情况也是如此。现在，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把国家控制的权力更多地移交给各州，这其中包括管理商业和贸易的权力。反之，许多相对较小的国家也会发现他们实在是太小了，依靠自己是无法生存的，这样它们就会决定进行某种形式的合并。在不远的将来，当我们回首现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这个垂死的时代里有一种几近疯狂的最后挣扎，其表现形式就是通过地区和全球性的贸易协定来设立更多的经济障碍。

生态革命的原则是希望形成一个全球性的地方经济系统，这个经济系统分配着权利和义务，给人们创造一个生存空间，鼓励培养多样性的生活，对一代人的机会进行限定，使他们无法把自身消费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外部化，把成本转移给其他人。一个地方性的全球系统绝不是将各个地方强行纳入国际竞争作为其生存的条件，它主张的是：让各个地方在满足本地需求方面能够自给自足。它不主张为了私人的利益而垄断知识，它鼓励对知识和信息进行分享。它不提倡培养一种同质性的全球消费文化，它培养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它不用金钱来衡量成

功与否，它鼓励用社会运行是否健康作为衡量成功与否的标准。

为了人类的利益

在生态革命中，阶级和政治权力问题仍然是它关注的焦点，但是在这个时代里更突出的问题是人们反对无赖的经济体系的斗争，因为这一经济体系削弱了我们的人性，危及了我们集体的生存。相比之下，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就要次要一些。这一新体系以包括斯彻特斯城居民在内的所有人的利益为奋斗目标，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社会学习过程来形成这一系统，这个社会学习过程建立在以下四个真理的基础上：

1. 主权只能由人民掌握——这里的人民是指所有的人，指的是真实的人——是那些需要呼吸新鲜空气、需要饮用清洁的水、需要吃有营养的食物、需要谋生手段的人。除非我们自愿地交出这种权力，否则政府和公司都没有权力侵犯这种主权。

2. 公司没有什么天生的或不可剥夺的权利。公司是为了服务公众利益，通过颁发一个公共的执照这一集体行动创造出来的公共团体。我们这些拥有主权的人有着不可剥夺的权利，有权利决定事先设定的公共目标是否实现了；当我们有意愿时，有权决定是否随时通过法律程序来修改或撤消一个公司执照。我们所做的就是作出决策。

3. 问题的根源在于系统本身。单个公司或政治机构内部的逐渐发展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必须转变整个系统的体制性力量。

4. 生态革命只是一种观念的变革，而不是一场炮火的革命。生态革命具有包容性，它邀请所有人参与其中，只要这些人想建立一种使生活更加美好的健康社会。人类的利益不等于

公司的利益，它是所有人的利益。

十九、美好生活

我们的村庄很兴旺……我们繁荣的真正基础是……深切而又持久的社区归属感，这种感觉使我们能够最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源……我们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精心设计而又经久耐用的美丽事物——但我们的“消费性”并不太强。

——艾克纳·伊斯瓦伦^①

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要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巨大的机器。但是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在其中找到人类的存在。我们的思想就会变得更加奇特——我们用这种世界的形象来反观自己，就会把自己也看成是机器……但是世界并不是一台机器……当我们改变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当我们自己不再是机器时，我们就会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玛格丽特 J.·魏特利与迈荣·克莉纳尔-罗根斯^②

如果让整个社会围绕着物质欲求来组织并运转，就会使我们的社会有功能失调之忧，会使我们的生活质量趋于下降。人

^① Eknath Easwaran, *The Compassionate Universe: The Power of the Individual to Heal the Environment* (Tomales, Calif: Nilgiri Press, 1989), 73-74

^② Margaret J. Wheatley and Myron Kellner-Rogers, *A Simpler Way of Life*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1996), 6.

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很显然，我们有能力去恨，去采取暴力行动，去竞争，去贪婪欲求；同时，我们也很明显有能力去爱，去采取温和的行动，去合作，去同情怜悯。健康的社会培育出来的是后者，它会创造大量的上述这些机会，这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很重要。失调性的社会培育出来的是前者，它带来的是稀缺和剥夺。一个健康的社会很容易就可以让人们生活在一种与他人以及与自然处于和谐的状态之中，而在失调性社会中这种状态出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让我们的社会处于一种社会与环境的健康状态，还是处于失调状态要靠我们自己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为人类利益还是为公司利益来组织社会的问题。我们努力想创造一种社会，让它的目标是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提高我们消费的数量，这样我们就向前迈进了一步，使几乎所有的人都同时走向可持续性的和更美好的生活。这一章里，我们将会探讨这种生活出现的可能性。

关爱家庭和社区

尽管竞争的本能是我们的本性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也有很多证据显示，竞争只是交流、关爱和合作下面的一个次主题。所有其他的物种都是依靠社会联系来维持生存的，与此相类似，人类在发展出竞争的同时也发展出了归属感和合作。文化人类学家玛丽·克拉克（Mary Clark）认为：

如果人类在早期没有扩展性的社会关系就不会生存到今天，社会需要这些在双亲和后代关系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用这种社会联系来保护孤苦伶仃的婴儿——这种事情并不是母亲们能够单独完成的。与社会群体建立社会联系

是一种生物性的需要——对成年人和婴儿来说都是如此。^①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像上面所说的那样。无论是对现代社会还是对更传统或部落的社会而言，社会联系都是社会健康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哈佛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在谈到这种社会联系时认为，它是强大的市民社会的特征，是一种“社会资本”。在—项对意大利地方政府的效率的研究中，他向我们展示了这种社会资本的重要性。

在20世纪70年代之初，意大利出现了20个地区性的政府。这些政府的正式机构都是一样的，但它们所植根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背景却有着显著的差别。这些地方“既有处于前工业时代的，也有处于后工业时代的，其中既有虔诚的天主教徒，也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既有古老的封建制度，也有狂热的现代主义”。在一些地方，新的政府机构“效率低下，死气沉沉，而且腐败不堪”。在其他一些地方，这些机构却又富有活力，效率极高，并“建立创新性的日间照料项目和工作培训中心，促进投资 and 经济发展，倡导推行环境标准和家庭诊所”^②。

普特南发现，在那些政府发挥了作用的地方和没有起作用的地方，只有一些指标一直都在这些地方有不同的表现。这些指标就是强大而又积极的市民社会的指标，它们可以通过“投票人数、报纸读者群、合唱团和文学俱乐部会员人数”等来进行测量。测量指标值高的地方就具有普特南所谓的高度发达的

① Mary E. Clark, "The Backward Ones," *PCD Forum Column* no. 51, June 25, 1993.

② 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Affairs," *The American Prospect* 13 (Spring 1993): 2.

“社会资本”。由非市场关系所形成的丰富网络会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任和互惠的氛围。^①

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少注意社会资本对社会健康运行的重要作用，很少考虑经济结构和政策对社会资本的形成或枯竭所产生的冲击。你所在的社区情况怎么样？社区中有你认识的商人在开着小型地方商店吗？还是只有大型购物中心和大型零售连锁店的分店在把所获得的利润转移到其他地方？是否有一个繁荣的农贸市场，在这个市场里你能够认识那些生产你所需食物的人，还是仅仅只有一个超市，它从千里之外把货物运到这里出售？农场是规模很小、个人拥有和家庭经营的，还是由大型的公司企业来控制并由流动的跨国劳动力来耕作的？人们的空闲时间是用来参加小型的棒球协会、光顾社区花园、地方戏院、社区唱诗班、社区中心，还是用来看充满商业色彩的电视？社区中有信用合作社和地方性的银行来支持地方性企业呢，还是只有大型的城市银行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吸收本地的存款并把这些钱贷给国际性的对冲基金？居民们是把这个社区看成自己永久性的家，还是把它看成工作的地点？专业人员是否具有很大的流动性？生产性财产是由地方拥有，还是由遥远的公司所拥有？本地的森林是否是由本地的公司在有选择地、可持续地进行砍伐并提供给本地工业，还是由大型的全球性公司将它们砍伐殆尽，并将这些原木运到遥远的地方去？

要衡量各个地方人们的尊严、自由、责任、繁荣和安全的感觉得，要知道以信任、共享和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都是强有力的衡量指标。

维生者数量过少

大约有 80% 的环境危害是由世界上 20% 的人口所造成的

^①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2.

——也就是由大约 11 亿的过度消费者们造成的。正如艾伦·杜宁 (Alan Durning) 在《多少算够》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些人的生活要靠汽车、肉类主食，以及包装处理过的产品。^① 而与此同时，另有 20% 的人们却生活在绝对贫困之中。但是，杜宁指出了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上目前有将近 60% 的人在以一种相对可持续的方式来满足着自己的绝大部分基本需求。(见表 19.1) 作为这个世界上的维生者阶层的成员，这些人出行靠自行车或公共交通工具；他们吃的是谷物、蔬菜和少许肉食等健康食物；很少吃有包装的食物；他们生成的废物绝大部分是能够进行回收再利用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所认同的富裕型消费不一样，但他们也不会让别人有一种生活艰苦的感觉，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里，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得到很好的满足。

表 19.1 地球上三个社会学上的阶层

过度消费者	维生者	被排斥者
11 亿人口 人均收入 高于 7500 美元 (汽车、肉类和方便食物)	33 亿人口 人均收入 700~7500 美元 (轻松地过日子)	11 亿人口 人均收入 低于 700 美元 (绝对贫困)
出行靠汽车和飞机	出行靠自行车和 公共交通	出行靠双脚或驴子
吃高脂肪、高热量和 肉类为主的食物	吃谷物、蔬菜和少许 肉食	吃一些营养不足的食物

^① Alan Durning, *How Much Is Enough: the consumer society and the future of the earth* (New York: W. W. Norton, 1992). Durning 的三个社会生态学分类为：消费人群、中等收入人群和贫困人群。

(续表)

过度消费者	维生者	被排斥者
11 亿人口 人均收入 高于 7500 美元 (汽车、肉类和方便食物)	33 亿人口 人均收入 700~7500 美元 (轻松地过日子)	11 亿人口 人均收入 低于 700 美元 (绝对贫困)
喝瓶装水和软饮料	喝干净的水, 外加一些茶叶和咖啡	喝受到污染的水
使用丢弃型产品并丢弃大量的废物	使用未包装的商品, 废物可回收再利用	使用当地的生物能量, 产生的废物不多
生活在宽敞、有空调的、独门独院的住宅中	生活在适宜的、自然通风的家中, 是扩大的或多核心的家庭	生活在简陋居所中或露天居住, 经常没有安全保障
拥有象征身份的各式服装	穿着实用的衣服	穿着二手衣服或丢弃的衣物

例如, 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 生活在一个主要靠步行、骑自行车和公共交通来代步的社区里, 与生活在一个公共空间由汽车和高速公路占据着的社区里是有明显区别的。与高动物脂肪的饮食相比, 一种对环境友善的、少肉食、低脂肪, 以天然食物为主的饮食可能更有利于健康, 更能增强精神和物质的活力。一种生活若是远离流行的时尚, 不受购买欲支配, 不买垃圾食品和没用的小玩意, 不花时间和精力去买这些东西, 那它就等于是让我们不再受这些东西的支配, 而正是这些东西让我们远离了家庭、社区和自然的生活。

经济增长和国家发展中有一个持续了 50 多年的悲剧。我们没有去建立一个新社会, 使维生者能过上美好生活, 使被剥夺者能够进入维生者阶层。相反, 我们所走的路是继续鼓励过

度消费者更多地消费，把维生者转变成过度消费者，并迫使维生者阶层中的许多人进入被剥夺阶层。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常常使那些留在维生者阶层中的人们生活更加艰难，因为我们用其他体系代替了他们一度依此为生的生产体系，优先建设公共服务设施——譬如公路和购物中心——这些设施主要是为过度消费者们服务的，没有建设那些为维生者服务的设施——譬如公共运输、自行车道和公共市场等。

从过度消费到可持续性社区

我们一般以为，从过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转向维生者的生活方式要求我们放弃那些让我们的生活舒适和满足的东西。然而，实际上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更吸引人的可能性：我们可以组织自己的生活空间和生产系统，使我们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能够消除我们现在强加在自然环境之上的过度负担。1992年我和法朗兹（我的妻子）把家搬到了纽约城，这使我们有机会看到这种可能性。虽然说纽约也被诸如犯罪、贫困和其他的现代经济生活中不平等的现象所困扰，但是迎接我们的并不是想象中的那种冰冷的、没有人情味的城市。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城市里有多样化的种族邻里关系和由家庭所开的小商店，所有这些都闪现着其他地方很少能看到的人类精神和活力。纽约还远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典型，它在很多方面都偏离了提高生活质量这一目标，但是我们开始用一种自己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来欣赏着纽约的生活。

由于人口居住密度过高——每个街区平均人口为5000人，大多是多个家庭共同居住在一幢住宅楼中——绝大多数居民都可以步行到地铁或商店，纽约的人均能量消耗只有整个美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在40多年的生活中，我和法朗兹第一次没有自己的汽车。我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公寓里，法朗兹上班时乘坐

地铁往返。我们生活中所需的東西 90%都可以在公寓半径 3 个街区的范围内买到：药品、金属器具、电器、书、杂货、衣服、家具等——都可以随意挑选。我办公室所需要的东西，公寓街道对面就有一家环保复印店，街角就有一家软件店，走 5 分钟的路就有两家办公用品店。

同样，附近有大量你可能想到的不同种族、不同价位的饭店，有爵士乐俱乐部、戏院、歌剧院、舞会、艺术画廊、博物馆、免费的公众音乐会和健身俱乐部——这些我们都可以步行或乘地铁到达。公园和植物园网络健全，这使人们在城市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亲近大自然。要是想出城，我们可以乘火车或者在附近的租赁公司租借一辆汽车，我们觉得很自由——不用在交通拥挤时上下班，不用为泊车而发愁，没有买保险的烦恼，也没有汽车修理的烦心事。这样我们每年就可以节省几千美元，我们可以用这些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说写这本书。

我们特别喜欢联合广场（Union Square）的农民市场，它离我们所住的公寓前门仅半条街区的路程。在这个市场里，每周有 4 天的时间，附近的小农场主、奶牛场主、乡村酿酒厂主和厨房面包店老板都来卖他们的货物——非圈养的家禽和鸡蛋，牛奶是从那些没有注射过激素成长剂的奶牛身上挤出来的，有机肥养大的水果和蔬菜，新鲜的肉和鱼都没有吃过添加剂和人工激素。在这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我主要都是从这个市场买东西做饭吃。这些食物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没有经过加工，无化学污染，吃着这些东西，我俩都觉得自己变得更健康，也更有活力，睡得更香，思维也更清晰。我们很喜欢结交农民朋友，很高兴我们购买食物的行为是在支持一种环境上负责任的、地方性的家庭农场。

我们用自己的购物袋子把没有包装过的新鲜食物带回家，

这就意味着我们没有造成什么包装污染。纽约城有对瓶罐、玻璃、塑料和报纸等进行回收再利用。在星期六和星期三的集市上有一个自愿性组织收集有机废物来做堆积肥料。这样，我们交出的填埋垃圾数量就极其有限了。

总体而言，我们所过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健康、更幸福，对环境更负责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着英雄般的善行，而是因为我们生活地区的组织方式使我们可以很容易、很愉快地这样做。这种经历有助于我们看到社区的组织方式对社会和环境关系的质量并进而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力，我们可以做许多事情来使纽约变得更加适宜居住，更加具有可持续性——可以从禁止私家车进入曼哈顿开始——但是在这期间还有许多其他事情要做。

过度消费者对地球造成的负担大部分来自于他们使用的汽车、飞机和丢弃型产品，这些丢弃型产品都进行了不必要的包装，我们所消费的不健康产品都是用破坏地球的方式生产出来的，我们所吃的这些食品都带有有毒的化学残留物。如果我们不再在拥挤的高速公路中往返，不再受噪音的影响，工作很稳定，不再要我们用不着的小玩意和平常很少穿的衣服，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不吃受化学污染的水果蔬菜，不再生产不耐用的商品，不用不必要的包装，不再有令人厌倦的商业旅行，不再设计不节能的房屋，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太多的负担。我们可以通过学会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彼此分歧，这样军备竞赛所带来的30%的全球环境恶化现象就能够消除。^①

每个人的选择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可以减少饮食中肉类的分量。我们可以买一个饮水机，减少瓶装水和软饮料的消费。

^① Michael Renner, "Assessing the Military's War on the Environment," in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1*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139.

我们可以少买一些衣服或买一辆节油型的汽车。我们可以做出无数个这样的积极选择。然而，同时我们也必须重组社会制度，使我们可以更容易、更经济地做出负责任的选择。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样组织人类社区和社会制度，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而与此同时，我们还能使三个主要的系统——城市空间与交通、食物与农业、物质资料——变得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城市空间与交通

在《收回我们的城镇》这本书中，作者戴维·恩格威茨特(David Engwicht)告诉我们，人类发明城市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有一个互动交往的场所。城市存在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在不用远涉他乡的情况下，“使信息、友谊、商品、文化、知识、观点(和)技能的交流变得更加便利”^①。城市曾经一度主要就是人们的交流场所——是诸如商店、学校、居民点和公用建筑的所在地。连接交换场所的道路也是人们相遇并加强邻里关系的地方。

汽车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城市，曾经是人们交流场所的空间都日益被它占据，改作公路两边的车辆停放点。因此，我们许多曾经的集会场所都变成了喧闹、拥挤和污染严重的地方，这使人们相互之间日益疏远，城市生活的质量也就受到了破坏。我们附近的交通流量越密集越快捷，我们的舒适感就越少，与邻居联系并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也就越小。^②

汽车不仅是一种最不节能的运输工具，它也是一种最不节约空间的运输方式。如果说每辆汽车无论是在家里、工作场

^① David Engwicht, *Reclaiming Our Cities and Towns* (Philadelphia: New Society Publishers, 1993, 17.

^② Engwicht, *Reclaiming Our Cities*, 48-51.

所、购物中心、教堂，还是在娱乐场所和学校都需要停车场，再加上它本身开动时所需要的道路空间，那么每家的汽车所占的空间一般就是每个家庭房屋平均所占空间的3倍。^①

人们之所以外迁到郊区，其原因之一就是为逃避汽车占据城市空间所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后果。如果富饶的土地都被用来铺路架桥，那么我们就与大自然越来越远，彼此之间也会日益生疏，我们对汽车的依赖程度就会加深，人均消耗的能量也会急剧上升。这无论对于交通还是对于那些居住在郊区的离异的、单亲家庭的取暖制冷而言，情况都是如此。城市生态学家威廉·李斯（William Rees）和马克·罗斯兰德（Mark Roseland）的结论可信度很高，他们认为，“在人类发明的所有居住发展模式，郊区的蔓延是一种经济上、环境上和社会上代价都最为昂贵的模式”^②。

汽车制造公司把它们的产品视为通向自由的门票，它们在许多汽车广告中宣称，通过汽车人们可以远离城市和郊区，走到未受污染的乡村地区。这很具有讽刺意味，因为汽车本身或许就是罪魁祸首，它使我们的城市不宜居住，把我们的乡村变成向外蔓延的郊区和带状的购物中心，它使我们更加依靠汽车来摆脱这种折磨所带来的痛苦。

在1950年，每个美国人年平均驾车行驶3800公里（合2356英里）。到199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9700公里（合6014英里）。它带来了更大的自由了吗？美国人行驶的这些路程中有一半是花费在交通拥挤的上下班上。在1969年至1990年间，每个美国家庭平均花费在上下班的时间增加了16%。汽

① Engwicht, *Reclaiming Our Cities*, 45.

② William E. Rees and Mark Roseland, "From Urban Sprawl to Sustainable Human Communities," *PCD Forum Column* no. 54, June 25, 1993.

车的第二个主要的作用就是购物。在此期间平均花费在购物路程上的时间增加了 88%。汽车的第三个用途就是用于生意往来、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去看医生和出席教会活动——这一数字增加了 135%。社会和娱乐交往事实上下降了 1%，原因可能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用来交往。据估计，在美国最大的城市区域中，每年由于交通堵塞浪费 10 亿小时至 20 亿小时的时间。在曼谷，每个工人平均每年浪费在交通拥挤上的时间约等于 44 个工作日。^①

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谁会从我们生活质量的下降中获益。仅就销售而言，美国三个最大的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汽车）、埃克森公司（石油）和福特汽车公司（汽车），而美孚公司位列第七。

1992 年，格罗宁根城（Groningen）这个有着 17 万人口的荷兰城市对它的市中心大道进行了管制，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自行车成为主要的交通手段。其结果就是，商业得以发展，房屋出租率上升，已经迁出城市的人们开始回流。那些曾经反对对汽车进行任何限制的当地企业现在已经高呼要对汽车进行更多的限制。^②

各个城市都应该采取这一步骤。为了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为了改善我们的环境卫生，采取多少措施都不为过，这些措施可以重组我们的生活空间，使我们对汽车的依赖程度减少。要完成这些还需要采取其他的措施，其中包括对城市空间

① 数据由 Marcia D. Lowe 提供，“Reinventing Transport,” in Lester 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1994* (New York: W. W. Norton, 1994), 82-84, 来自美国联邦高速公路协会的一项研究。查看更多讨论请参阅 Engwicht, 138-144.

② Nicholas Albery, Matthew Mezey, and Peter Ratcliffe (eds.). *Social Innovations: A Compendium* (London: Institute for Social Innovations), 92-93.

的使用进行规划和控制，从而提高城市密度，使工作场所、居住点和娱乐场所相互毗邻；对停车场所进行限制；加强对汽油的征税力度；为了行人和骑自行车者的安全而对公共交通和设施进行投资。

“等一下”，公司自由主义者说：“这样做会对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每6个工作岗位中就有1个是与汽车行业相联系的。在澳大利亚，这一数字是每10个岗位里有1个。^①如果我们重组城市空间，把汽车行业剔除，那么失业率就会飙升，股票价格就会迅速下降。它所带来的必将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一重要观点可以由另一个问题来提供最好的解答。如果构建一种经济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投资者从有害于社会的投资中获利，而雇员们唯一的发现就是自己也参与了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的过程，那么这样的社会是合理的吗？一个高智商的物种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方法，让人们都拥有自己的生存手段。等一会儿我们再重谈这个话题。

食物与农业

与此相似，我们的食物和农业体系的设计也是为了巨型化工和农产品公司带来利润，它很少顾及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健康。这种体系的特征是化工密集型、机械化的生产；远距离的装运；受控制的合同生产方；工资仅够维生的流动工人；政府提供巨额资金资助大公司。这一体系适合对标准化食物进行大规模的赢利性生产，但是这种赢利的代价是地力的耗竭，化学物质排放带来的水质污染，把长期作为强大乡村社区的支柱的

^① Robyn Williams, foreword to *Reclaiming Our Cities and Towns*, by Engwicht.

小农赶出家园。这一系统提供给消费者的食物都经过了深度加工，进行了不必要的包装，带有化学残留物，营养价值有多高也说不清。尽管这一系统能够使超市里的物品显得琳琅满目，但它却误导了人们的营养要求；对告知消费者食物中是否含有添加剂、合成荷尔蒙和转基因生物和有毒残留物的信息，它们一直持抵制态度；消费者无力选择买那些由地方小农生产的、有机肥养大的、没有经过处理的食物。只要大公司发现某一领域有利可图，那么我们在该领域的选择余地就大大减少。

即使我们打算要进行健康的、负责任的选择，我们也几乎没有方法得知我们打算要买的这条鱼是谁打捞的，是外国大型工厂的拖船用网眼细密的浮网在海上捕获的，还是由本地的渔夫用生态环保的方法捕捞来的？我们无法知道一块肉属于来自哪里的动物，这只动物是在管理良好的天然牧场长大的？还是在一个热带森林刚被砍光的不安全区域长大的？还是用粮食催肥养大的？这些粮食本来是可以用来接济挨饿的人们的。我们无法知道向我们供应牛奶的奶牛是否被注射了人工激素，因为孟山都（Monsanto）公司的施压，政府禁止在商标中告知人们这些信息。

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为人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像改变我们的栖息地和交通系统一样，去改变我们的食物和农业系统。我们的目标是必须充分地利用土地和水资源，使它们能够满足人口膨胀对营养丰富的食物、纤维和生活的需要。做这些时我们必须采取环境可持续的方法。

一个适当的系统最好由数以万计的集中管理型家庭小农场构成，这些小农场生产着品种多样的食物、纤维、牲畜和提供给地方市场的能源产品。耕种过程中应该使用生物动力的农耕方法来保持土壤的肥力，涵养水分，控制虫害。我们应该对食物系统进行重新规划，从而限定、抑制并回收再利用污染物质

——包括再利用人类的废弃物——并且主要依靠可再生的太阳能能源——包括动物能量和沼气——来进行配制、生产、加工、存储和运输。^① 要使这一体系成为现实，我们必须采取各种步骤，其中应该包括实行土地改革，打破大公司对农业的控制，向小农提供足额的信用贷款，创造以农民为中心的研究系统及其分支系统，使之与生物密集型的方法相适应，要求商家在商标中对食物产品成分进行明确标识，停止对农业化工行业的财政和环境资助，通过取消能源和其他运输资助来提高食品运输的费用，建立负有责任的地方性水土管理部门来协调土壤和水资源保护措施。

尽管我们是在走向一个更加地方化的食物和农业系统，饮食要更加健康、要有利于减肥，这要求我们对自己的饮食习惯进行调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牺牲和抛弃某些东西。相反，我们希望出现的是一个更加肥沃的地球，一个更有活力、更安全的人类社区，社区的居民由于能吃上没有受到污染的卫生食品，所以身体更加健康，思想更加丰富。要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的条件仅仅是对相关的系统进行重构，从而使之代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公司的利益。

物质资料

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垃圾目录”（Garbage Index）——就是那些我们丢弃到自然环境中，并且不能自然地回收再利用的东西——减少到几乎为零的程度。生产性活动必须成为一个封闭性的系统并进行组织

^① 对这些概念在印度村庄的应用在 Anil Agarwal and Sunita Narain 讨论中有详细论及，*Towards Green Villages: A Strategy for Environmentally Sound and Participatory Rural Development* (New Delhi: Centre for Science & Environment, 1989).

运作。矿物和其他非生物降解的资源一旦从地下取出来就应该成为社会永恒的资本储备的一部分，应该不停地进行再利用。有机物质可以被自然生态系统吸纳，但是必须保证它们是回到自然生产系统中去了。

个人消费者一般都极力主张对废弃物进行分类和再利用——这种方法很重要，但是这还不够。许多最重要的决策并不是由我们做出的，在个人消费者拿到自己的消费品之前，已经有许多与之相关的垃圾被扔掉了。市场几乎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机会，让我们自己选择用再生纸和无毒的生物降解油墨来印刷制作报纸。我们也无法保证放在路边的成捆报纸是真的被回收再利用了，这些事情的决策权掌握在出版商、报纸生产商、政客和政府官僚们的手中。

假定回收再利用的水平保持在目前的水平，那么一个普通的美国家庭在 20 年的时间里要“消费”大约将近 100 棵树的新闻纸。其实有 60% 至 65% 的这种新闻纸是用来做广告的。^①即使我们没有看广告或对广告不感兴趣，我们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去购买不刊载这些广告的报纸。

世界观察研究所 (The Worldwatch Institute) 认为：“绝大部分物质都是在用了一次后被扔掉——其中包括大约 2/3 的铝、3/4 的钢和纸，以及更多的塑料。”^② 由于提取了上述物质，自然环境因而受到了破坏，大量的垃圾由此产生，我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挣钱，以生产物品替代那些被抛弃的物质，我们成为一种负担沉重的动物，不停地从商店里把商品拿回家，然

① Alan Thein Durning and Ed Ayres, “The Story of a Newspaper;” *World Watch*, November/ December 1994, 30-32.

② Lester R. Brown, Christopher Flavin, and Sandra Postel, *Saving the Planet: How to Shape an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Economy*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65.

后把它们丢进垃圾堆，这么做或许对经济、对公司利益、对行政人员有利，但是这却使我们的生活质量下降。

回收再利用不仅减少了资源开发的环境成本，它也节约了能源。用废品来生产钢铁所需要的能源仅仅是用矿石生产钢铁所需能源的 1/3，对空气污染的程度下降 85%；用再生纸做新闻纸比用原木纸浆生产新闻纸所需的能源下降 25% 至 60%，同时可以减少 74% 的空气污染和 35% 的水污染。再利用会带来更加显著的回报。对玻璃回收再利用生产瓶子时可以减少 1/3 的能源消耗，清洗并再利用瓶子就可以比完全新制造一个瓶子所需的能源减少 90%。^①

德国一直倡导寿命周期产品（life-cycle product planning）计划、责任和思想。政府调控计划鼓励汽车和家用电器制造商们承担拆卸、再利用和回收自己产品的责任。这一措施不仅对环境有利，而且也减少了消费者的负担，让他们不再为物品用完后处置这些东西而大伤脑筋。^② 寿命周期管理可以通过租约管理手段来执行，其中物品的所有权仍然归制造商所有，制造商有责任维修和处置这些物品，这样制造商们在设计产品时就有动力将产品的耐用性和可回收性发展到最高水平。

政府可以估计最终处置某一产品所需的公共成本，并据此向制造商们征收费用，这样就可以鼓励制造商们在设计 and 包装产品时减少废物处置。政府也可以要求用标准的耐用玻璃容器来取代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饮料瓶和其他容器，这些耐用容器经过洗刷和重新贴上商标可以再次利用。^③

① Brown, Flavin, and Postel, *Saving the Planet*, 65.

② Brown, Flavin, and Postel, *Saving the Planet*, 68.

③ Brown, Flavin, and Postel, *Saving the Planet*, 70.

可持续的生计手段

一个精心构建的神话认为，要保证人们都能就业，唯一的方法就是扩大总体消费，从而增加就业岗位，使工作岗位增长的速度快于公司投资于节约劳动力的技术所带来的岗位消失速度。这一神话是经济增长呼吁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我们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替代方法——那就是重新解释现存的问题，把工作重心放在生计上，而不是放在创造新的工作岗位上。

《韦氏新世界词典》把工作（job）一词界定为：“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诸如在一项贸易中或在一项协议中为了报酬而做事；一个人所做的任何事；任务；杂务；职责。”^① 生计（livelihood）被界定为是：“一种生活或支持生活的手段。”^② 工作是金钱的源泉。生计是生活的手段。说到工作，我们想到的是在世界上最大公司的工厂和快餐网点工作的人们。说到生计，我们想到的是那些用对环境负责的方式来满足个人与集体需求的人们和社区——这是从自我管理式的地方系统这个角度得出的结论。

我们可以利用技术的进步使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来选择可持续的美好生活。如果我们不想让那些有幸有工作的人在竞争的祭坛上牺牲自己的家庭和社区生活，而同时也不想让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处于受苦受难的境地，那么就应该作上述选择。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重组这个社会，使人们每周工作 20 到 30 个小时，从而使所有想工作的人都有稳定的、收入可观的工作可做。因此而空闲出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发展社会性经济，

①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2d college ed.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0), s. v. "job".

②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s. v. "livelihood."

用来参与各种活动，去满足此前没有得到满足的需求，去重构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

如果我们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目前许多工作不仅是无法让人满意的，而且是在生产着那些不必要的或者对社会与环境造成重大伤害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实施上述措施就显得很重要了。这些不必要的工作包括汽车制造业、化工业、包装业和石油工业中的许多工作岗位；绝大多数宣传和营销方面的工作岗位；经纪人和金融项目经理人，他们从事的是投机性和其他的投资提成性工作；“跟着救护车跑”的律师；全世界总计 1400 万名军工行业的工人和总计 3000 万名在军队里工作的人。^①

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带来可怕的结局。如果我们不再提供巨额金钱给数以亿计的人们，让他们做一些有损于我们生活质量的工作。相反，我们给这些人的工资与给其他人一样，并让他们留在家做什么事情都不干，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更加美好一些。尽管这样做完全不是什么最优的选择，但是它总比那些完全不合理地管理社会，支薪让人们去干那些使真正的财富和福利纯粹下降的事情。为什么我们不组织社会采取其他有利于社会、对环境也有积极影响的行动呢？譬如，我们可以向孩子和老人提供关怀和照顾服务，开办社区市场和老年人活动中心，教育我们的年轻人，给吸毒者提供辅导，为有心理疾病的人提供适当的照料，维护公园和公用设施，参与社区联防，组织社区的社会和文化事务，登记投票人，打扫环境，在森林里重新植树，支持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政治主张，照料社区花园，组织社区回收再利用行动，对房屋进行式样翻新从而节省能源，等等。同样，我们中的许多人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文娱

^① 武装部队和军工行业工人估算来自 UNDR,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47, 60.

活动、一个人独处和家庭生活上，锻炼身体并发展业余爱好，从而使我们在身体、精神、心理和心灵上都更加健康。

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工作岗位太少了，而是经济结构让我们对支付工资的工作岗位过于依赖了，这一经济结构为那些做坏事的人支付工资，却忽视了许多对人类健康极其重要的活动。值得一提的一个事实就是，直到最近的十几二十年之前，在社会性经济中，绝大多数人——大多数是妇女——仍在为生产性的社会团体做着没有报酬的工作。这些社会团体有着强大的结构体系，与我们自身相比，它们能够为其成员提供更有意义的个人安全保障和满足。

虽然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愿望，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建立可持续性的生计经济，但是通过上述原则和实例我们可以推断出这些方式的一些特征。譬如，在城市中，它们最有可能围绕着地方性的城市村落或邻里进行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地方性需求可以通过可持续性的生产来满足，而这些城市村落和邻里就可以以这种可持续性的生产为中心，把居住、工作、娱乐休闲和商业设施集中在一起。它们的特征是绿色的空间和频繁的人际互动，以及在能源、生物量和物质生产方面追求相当程度上的自给自足。

人类和环境方面的生产性活动将会被合并进地方化的、环闭式的合作生产进程之中，这一进程可以对污水、固体废物，甚至是空气进行回收再利用，利用鱼塘、花园和绿化带不断地再生出它们自己需要的资源。城市农业和水产业，修理和再利用，以及集中性的回收再利用等都将会提供大量的生计机遇，提供有利于可持续性发展的职业。这些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足的，如果以邻里为中心组织这些活动的话，那么它们将有助于恢复家庭和社区间的联系，分散管理权限，调整男女之间在家庭责任方面分担的份额。人员和商品运输的需求将会大大

减少。本地生产的食物都是新鲜的、没有经过包装的，或者装在可回收再利用的瓶子中。

在传统时代和电子时代，我们都可以发现大量的乡村手工业，它们与都市农业并存，并有许多行业在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回收再利用。家庭支持服务如社区日托服务、家庭顾问、学校、家庭健康服务和多目标的社区中心可以发挥完整的邻里功能，让人们可以步行出门去干有用而且有意义的事情。许多地方可以发行他们自己的货币，从而为地方性的交易提供方便，限制财富流出本地。绝大多数人将会将自己的时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用于从事与商品经济有关的活动，一部分用于从事与社会性经济有关的活动。我们将看到多功能的家庭重新出现，这些家庭可以成为家庭和社区生活的中心，这样就大大减少了人们对汽车和其他耗能的交通工具的依赖性。我们可以用树阴而不是用广告牌来装饰道路两旁。我们可以对那些有助于提升需求的产品信息广告加以限制，只有在我们需要时才利用它们。

在迈向真正的高效率社会的过程中，我们有大量的时间用于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娱乐、文化表达、智力和精神开发以及政治参与等。我们可以到别处进行文化交流。我们可以通过电视电话与世界各地的人们保持友谊和协作关系。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外国的菜谱，获得怎样去策划一个各地食物的合作教育培训，或者发起运动来改善公共运输服务。我们可以就市民关于建立新的贸易规则的倡议进行国际性的沟通。我们也可以调台收看俄国、印度和智利等国的新闻报道，看看他们对南非的选举结果有什么反应。

我们确实能够作出选择，去建构一个健康的社会，从而让我们过上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生活。现在是我们收回这种权力并开始完成这一任务的时候了。

二十、变革的日程

一个政治集团如果无法采取有效措施调控其经济生活，那它就不能健康运作。

——哈尔曼·戴利和约翰·科布^①

因此，我与那些力图将国家间的经济纠纷减少到最低程度的人深有同感。观念、知识、艺术、友善、旅游——等等这些都是在本质上应该国际化的东西。但是只要合情合理和方便可行，商品最好还是国内化，最重要的是要让财政根本上国家化。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②

人们有权去建造一个爱意融融的、可持续性的社区，并控制自己的资源、经济和生计手段，这些都是人们最基本的权利。这些权利反过来依靠其本身来选择自己所接受的价值观，决定它们的孩子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决定与谁进行交易。全球化经济不让人们拥有这些权利，它把作出相关抉择的权利交给了全球性公司和金融机构。生态革命中的核心性问题就是，由人们还是由公司来规划人类的未来议程。

生态革命的指导原则是积极支持企业与市场的，但它们也对地方所有的企业非常偏爱，因为地方性企业为本地人提供就

^① 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174.

^② 参见 Daly and Cobb, *For the Common Good*, 209.

业岗位，它们交纳地方税来维持地方的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遵守地方的社会和环境标准，参与社区活动，在市场中与相似的竞争对手进行公平竞争，在市场中没有垄断性的玩家。如果某个全球公司希望有充足的理由说自己能够提供地方性企业所无法提供的东西，那么就应该让当地人来判断这句话的本质含义。如果保护民主制度、人类价值观、经济公平和生计手段就是保守主义者，那么就让我们所有人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保守主义者吧！

本章讨论改变治理手段的各种具体措施，通过这些措施我们可以收回被掠夺去的政治经济领土，把权利归还给人们。我们的目标就是限制那些大型公司的权力和自由，从而恢复民主制度以及人们与社区的权利和自由。这要求我们在简单的改革之外还应该做些什么。

收回我们的政治领地

政治权利属于人民所有，它并不属于人工构造的法律团体。公司宣称要拥有与公民相同的宪法权是一种毫无道德或逻辑基础的法律误解。公司是实施公共政策的手段，因而它应该遵守由公民们制定的法律，而不是自己去制定这些法律。公司诉诸于宪法第一修正案来寻求保护，它们以这个修正案为依据，去游说和进行政治方面的公共活动，这样做对人民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如保罗·豪肯所说的，通过诉诸这一法案，“公司所得到的是控制公共思想和言论的权利，而这种状况恰恰是权利法案力图防止出现的”^①。

我们必须优先考虑采取立法与司法行动来建立法律原则，

^① Paul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A Declaration of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1993), 108.

从而确定公司是一个公共团体，它是为了公共需要而颁发执照的，它们所拥有的特权仅仅只限于执照或法律明确规定的范围。在任何时候通过公众的公民投票或立法行动，这些特权都可以被彻底取消。如果一个公司不断地力图超越执照所规定的特权范围——譬如故意出售有缺陷的商品——或者没有履行法律加给它的义务——譬如不断地违反法律有关废物倾倒的规定——公民有责任也有权力通过他们的政府收回执照，从而解散公司。同样，如果市民们认为某些公共团体不再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话，他们也有权利取消这些公共团体。^①

股东、经理、雇员、消费者和其他人作为个别的公民都拥有自身范围内的各种权力，可以表达自己支持或反对公司的政治主张。他们也有权利用私人的资金，在自身权利范围内组织和资助非营利组织来推进他们支持的事业。公司没有这样的天然权利，它们完全处于人民的权利范围之外。

要想把公司从政治领域里排除出去，第一步就应该取消公司费用的税收豁免。这里的费用主要是指用于游说、公共“教育”、公共慈善事业或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的花费。不管怎样，最终的目标都是防止公开交易的公司从事任何影响政治议程的活动，或者在政策问题与公共利益问题上“教育”公众。此外，法律还应禁止公司的高级职员在他们的公司职责范围之内通过雇员、供应商或消费者进行政治献金或寻求政治支持。

公司开始积极利用非营利组织，它把这些组织视为与公司政治游说相对立的、假想的公民前沿阵地，在公司插手公共教育或进行慈善施舍与公开的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界线，公司就集中关注这些界线划分的宽严程度。即使公司是在从事真正的公共慈善事业，它在这其中运用的技巧也有值得怀疑之处。例

^①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120.

如，当纽约市于1994年秋提出在公共场所彻底禁烟的时候，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就让它资助的该市许多艺术团体知道，它希望这些团体能够反对这个禁令。

一个公开交易的公司将会不可避免地把它慈善捐赠与它的公司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它没有其他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要把股东的利润用于慈善事业。如果公司真的关心它们所在的社区，它们就应该提供良好的、稳定的工作岗位和安全的商品，维持环境卫生，遵纪守法，交纳它们应该交纳的税收。让公司的股东、经理和雇员从自己的公司份额里分配到的工资、薪水，以及公司利润中捐出一部分来，支持慈善性和教育性的事业。

同样，任何非营利组织只要有50%以上的理事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总资产达到5亿美元以上，它就没有资格享受免税的权利。因为我们假定它是某一个公司的外围组织，目标是为了提高公司的利益。当非营利组织有公司理事会时，它要筹集公共资金，要发表公共言论，或对公共团体提供赠与，那么它们也必须证明自己也是一个非营利组织。

让公司不再进行政治参与是回收我们的政治领地的重要一步，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素·贝克(Russell Baker)非常形象地把1994年的美国国会选举视为一场拍卖会，认为像是一场报价战，对对手更多的是进行负面的宣传，而不是相互之间就观点、问题和能力进行竞争。^①这种趋势使美国的选民对民主制度的希望日益破灭，并对政府被大公司利益集团控制感到狂怒。

美国的政治已经退化成为一个合法化的贿赂系统。如果要

^① Russell Baker, "The Big Hog Wallow,"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 1994, A27.

想让民主制度生存下去，就必须采取改革措施把公司和贿赂行为驱出政治领域。要赢得选举，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要花费数百万美元喂饱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通过这些传媒发布关于竞选对手的负面消息。赢得一个选举所需的费用极其昂贵，要想得到足够资助，唯一的来源就是强大的金融利益集团，因此竞选策略必然会将金融利益放在公共利益之上。设置限制条款或投票让在位者离职将会对此作用甚微。为此，我们必须在三个方面进行深入而又彻底的改革运动：

1. 公开选举应该公开资助。应该撤消政治行动委员会，应该禁止公司进行任何形式的政治捐献，或使用公司的资源支持任何候选人，或支持政治活动中的论题。

2. 应限制竞选活动费用的总额。让候选人在设定的费用限度之内尽可能有效地把他们的观点表达出来——这是衡量他们能否负责任地运用公共资金的一个有效方法。

3. 竞选者有权使用公共频道，作为回报，应该让电视和电台给候选人制作采访节目并进行在线辩论。在民主制度中，让公众知道竞选职位的候选人的观点和本领是新闻传媒最基本的职责，它们应该负责任地完成这一使命。

由于公司控制了大众传媒并对教室进行渗透，因而它在日益控制和塑造着文化再生产的基本制度，它们不断地加强消费主义的价值观和公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努力去使主流文化与公司利益结合在一起。为了收回我们被夺去的政治领地，我们必须收回被夺去的文化领地。有三个措施值得认真进行思考：

1. 传媒的反垄断。特别反传媒垄断法规应该规定，只要有初步证据（*prima facie evidence*）^①证明某一个公司拥有不

^① 初步证据指如对方反证驳不倒即证明事实为真实的证据。——译者注。

止一家重要的公共传媒宣传机构，不管它是报纸、电台、电视台还是家庭有线服务，垄断意图就成立。此外，对于拥有传媒宣传机构的公司而言，传媒的运作业务应该是本公司的主要业务。这样可以保证这个宣传机构不会成为提高公司其他利益的手段。不能允许任何人控股一家以上这样的传媒公司。这样可以限制一小部分有权有势的个人和公司控制公共沟通的主要手段的能力，从而提高公众的言论自由权。

2. 广告。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企业的角色就是响应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去创造市场。对广告进行税收减免为公司的广告业务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公共资金，这些广告的目标都是诱使人们去购买那些既不要也不要的商品，形成一个对社会和地球都有害的消费文化。广告不像纯粹的信息发布广告，后者是以产品用途、特性和实用性等这些可验证的事实为基础的，而前者不是为公众利益考虑的，在最低程度上，它的成本不能作为公司费用而从中减去。此外，作为一个污染控制手段，应该用一个公共费用的形式来估计户外或其他的公共场所的广告，让公司将因此得到的收益用于资助公共利益的教育消费上。事实性的商品信息可以通过商品说明书来提供，这包括在线说明书，这些我们都可以通过电脑服务和交互式的电视获得。

3. 学校。学校应该成为无广告区域，公立学校的管理当局应该保持作为一个公共部门的职能，在禁止校内广告的基础之上，禁止在课堂上使用由公司赞助的教学软件。

收回我们的政治领地的进程是与收回我们的经济领地的进程相依相伴的。

收回我们的经济领地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认同一个流行的格言所阐述的真

理：“有金玉者，制订科律。”（He who has the gold rules.）社会主义理论公开号召工人要拥有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亚当·斯密在他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中潜在地假定了工人的所有权，他的市场经济是由小农和手工业者构成的，在这其中，所有者、经理人员和工人一般都是同一个人，是相同的。实际上，旧模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实现他们的理想。早期的社会主义实验者把财产权交给高高在上的国家，使人民无法通过任何形式保证国家能够负责任地运用这些权利。资本主义不断地把财产权转交给大公司和金融机构，而即使是对它的所有者而言，这些公司和机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负责任的。

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结构性变通办法：形成一种市场经济，这种经济，即使不是完全，也主要是由家庭企业、小型的合伙企业、工人控股的公司和邻近的、地方性的公司构成的。马来西亚消费主义的积极行动者彼桑·森格（Bishan Singh）称之为社区企业经济，因为它把商品经济中的市场力量与社会性经济中的社区力量交融在了一起。^① 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加尔·阿尔佩罗维茨表示，美国经济正在进行类似的主体性的结构重组：

……由有市民意识的企业家、具有革新精神的工会和效率较高的地方政府领导着……现在正在进行着工人控股的公司数量已经有近 10000 个，涉及的人数可能有 1200 万人——这一数字比私人部门的行业工会里所有会员的数量还要多。同时还有 30000 多个合伙企业，其中包括

^① Bishan Singh, “A Social Economy: The Emerging Scenario for Change,” in Tina Liamzon (ed.), *Civil Society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Workshop Report* (Rome: Societ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1994), 29-37.

4000 个生产消费商品的合伙企业、13000 个信贷联盟、近 100 个合作银行和 100 多个合作保险公司。此外还有 1200 家乡村公用事业公司和近 5000 家住房供给合伙企业，另外再加上 115 家电信和电报合伙公司。^①

这些所有权变更行为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是通过立足于社区并对社区负责的制度来确定地方对生产资料拥有所有权。^② 这就使得资本变得更有持续性并根植于地方，而这就是稳定和健康的社区生存的基本条件，因而，这样的变革创新在建构健康社会的基石方面就显得极其重要了。然而，由于经济政策和制度支持公司的大型化、全球化和掠夺化，所以这些公司是处于不利境地的。我们要想收回自己的经济领地就必须改革这些政策和制度，让它们支持小型的和对地方负责的公司。这样做的话，我们就需要恢复金融制度和体系的正义性及其原本的功能，把商品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转移给生产者和商品的消费者，取消对大公司的资助，把市场进行地方化，分散资本的所有权，确定公司的责任所在，恢复市场竞争。我们特意使用了改革这一词。如果说这些措施与公司步向大型化和全球化的趋势正好相反的话，那么它就是我们的目的所在了。我们的目标是把不民主的、贪婪的资本主义经济转变成一个民主的、具有较高社会效率的市场经济。

金融交易税 对金融工具如股票、债券、外汇和衍生性手段的买卖征收低额的税，可以对短期的投机性投资和随意性行

① Gar Alperovitz, "Ameristroika Is the Answer," *Washington Post*, December 13, 1992, C1.

② 有关此实验的部分发现和评估见 Jeff Shavelson, *A Third Way: A Sourcebook Innovations in Community-Owned Enterprise*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Alternatives, 1990).

为起到抑制作用，消除获得寄生性金融收益的一个重要来源。

对短期资本收益分等级征收附加税 从短期控制的资产中获得的收益一般而言是一种非劳动性的收益，应恰当地征收比劳动所得收益要高的税率。对短期资本收益征收高于或低于正常所得税的附加税将会使许多投机性行为无利可图，可以稳定金融市场，可以在不挫伤长期生产性投资的前提下延长投资前景。如果有人对一项资产控制的时间不足一周就要出售，就应对他征收资本收益附加税，对本没有征税的部分征收税率高达80%的税，对资产控制时间在一周以上6个月以下的，税率下降到50%，控制时间在6个月以上3年以下的，征收35%的税，资产控制时间在3年以上6年以下的，征收10%的税，控制时间高于6年的不征税。^①

对活期存款要求百分之百的准备金 早在1948年，保守的芝加哥货币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亨利·西蒙（Henry Simmon）就要求活期存款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准备金，以限制银行制造货币的能力，把生产货币的职能交给政府。此后许多经济学家都提出了相似的要求。^② 目前美国对准备金要求平均低于10%。它允许金融系统以几年为期进行调节，这样就会减缓贷款渐增的趋势，有助于恢复货币生产和财富生产之间的联系。

严格管理衍生性手段 许多衍生性金融手段基本上都是高风险的投机手段，它们都通过投资公司的包装和出售而产生报酬，同时也会导致危险的金融动荡。与其他形式的投机一样，我们必须对它们的生产、出售、购买进行严格调控并征收重

^① 见 Richard I. Barnett and John Cavanagh, *Global Dream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4), 416.

^② Herman E. Daly and John B. Cobb Jr., *For the Common Good: 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 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 2d. ed. (Boston: Beacon Press, 1994), 414-35.

税。养老基金和其他的基金若是通过公共信托进行管理的，那么就应该严格禁止它们通过这种类型的金融工具进行交易，不准这些基金对这样做的公司进行投资。所有公开控股的公司若参与进行了衍生性金融手段的交易，就应要求它每个季度提供一份它们的衍生性机构交易活动的完整报告，报告他们潜在地与这些衍生性机构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情况，报告他们的金融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由衍生性金融机构控制着的。

社区银行的优惠待遇 美国的银行系统曾经一度是由单一的或社区的银行组成的，它们收集地方的存款，向地方企业提供贷款，资助进行抵押来扩大地方房屋所有权的范围。由于银行法规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使此前的社区银行被巨大的金融中心银行所吞并，后者引导着地方储蓄进入全球金融体系。如果银行系统是为地方经济服务的，那么就应该通过要求金融中心银行削减其分支机构，并严格执行社区投资法规来恢复社区银行系统，这要求联邦储备保险覆盖所有银行的投资项目的主体部分，让这些银行的投资项目在其服务地域内进行投资，并且它们的所有投资都必须遵守联邦法定标准。大型的全球金融中心银行只有获得私人承保人的储蓄保险之后，才可以用其储户的钱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冒险，保险费按照风险大小来决定。对社区银行应该提供联邦保险，因为社区银行是为社区需要服务的，它遵守的是社区规则。

严格执行反托拉斯法 应该采取严格的立法行动来打破公司权力的集中化。我们应该有一个立法假设，那就是任何形式的并购与合并都会减少竞争性，都是与市场原则和公共利益背道而驰的。力图进行并购与合并的人有责任向心存疑虑的立法者提供反方的证明，证明他们的疑虑是多余的。

工人和社区买断选择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持续性的、根深蒂固的资本能够最好地为人类利益服务。公共政策应该支持

工人和社区买断公司的资产。譬如，在一家大公司关闭一个工厂或进行出售与合并之前，应该让热爱该工厂的工人和社区有权以最优惠的条件买断该厂。在确定这些最优惠条件时，应该考虑工人在公司里进行劳动投资的年限，考虑社区在公共设施方面的集体投资，因为正是这些公共设施才使得公司的地方性运行成为可能。在绝大多数公司里，除了正式的股东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投资者，这种投资应该在法律上得到承认。银行破产法规也应该有类似的规定，在银行破产程序结束之后给予雇员和社区以最优惠的条件，使他们获得该公司的剩余资产的占有权。同样，如果反托拉斯法要求某一个公司停止它的部分部门的运转，那么工人和社区或者两者同时都有最优先的权利去购买这些被剥离的部门。公司养老金管理法规应该规定允许雇员使用养老金来购买具有决定权的公司资产。政府应该对工人和社区的买断进行监控，从而使工人和社区对买下的公司有真正的控制权——与众多的职工持股计划相反，后者的控制权掌握在管理层手中。

税收改革 税收政策中有一个最重要但又最容易违反的原则，那就是税收应该以活动是否导致社会和环境功能失调为考虑因素进行征收。因此我们应该对税法进行修改，减少那些有利于社会的浮动税率，譬如就业（包括雇主对社会保障、健康照料和工人补偿做出的贡献），流失的税款可以通过对那些导致社会和环境功能失调的活动，譬如资源消耗型活动，包装、污染、进口、公司游说和广告等额外征税来补偿。这种税收将会在整个体系内形成洪流，它鼓励人们采取对社会和环境更加负责任的行为，阻止人们使用有害的产品。例如，对煤、石油和汽油和核能源征收的碳排放税将会提高最终使用者的购买价格，鼓励进行存储并转向使用太阳能，如太阳能供热、风力、水力、光电和沼气等。随之而产生的运输成本的上升将会成为

公司与消费者共同的负担，鼓励人们将市场地方化。使汽车行驶增加额外的花费将会鼓励人们增加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投资，让人们把家安置在距离工作场所更近一些的地方。对污染物排放征税将会有助于污染的控制。对原材料进行提取征税将会让人们转向更少污染，更少地采用原材料密集型的设计和生产品模式，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可再生材料。对制造商征收高于他们处理自己的产品包装所需开支的税额，可以让制造商不再进行不必要的包装。征收进口关税将会使经济更加依靠国内自给自足。

年利润支出 我们不对公司的利润进行征税，我们要求公司把每年的利润分配给股东。这些利润可以作为股东的收益，我们以正常边际征税比率对股东征税——这与对互惠基金收益的征税很相似。对公司双重征税的方式——一次对公司征税，一次对股东征税——将会被取消，同时取消的还有对股东征税延期的规定，阻止公司所得税纳入公司决策制定的许多扭曲现象。如果全面执行这种政策的话，那么公司将会没有动力在全球范围内把自己的利润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地区。信贷资金的利息支付将会直接来自利润而不是来自于税收，这样就会阻止贷款的运用，促使人们在更大程度上倾向于财务平衡。许多借贷收购行为将会消失，因为它是依靠利润的税收减免来赢利的。公司的许多特定行为如使用碳燃料、进行资源开采和投资性的金融交易等将会被征收税款。这些税收是很难逃避的。公司的扩张也会变得更难——这是使市场更加具有竞争性的一个步骤——因为一个公司不再仅仅因为管理层决定把它的利润再投资而不将利润分配给股东，就可以实现增长了。如果一个公司希望投资进行规模扩张，它就必须能在金融市场中拿出新的资金。股东理所当然是有权把他们的分红用来再次购买股票的，这与当前美国对互惠基金的收益的征税程序很相像。

公司福利 福利改革最优先考虑的事情应该是把依赖性公司（dependent corporation）从福利名单中除去。政府对公司补贴包括资源损耗补助、补助性的放牧费、出口补贴和关税减免，这些补助都应该系统地识别出来并加以取消，可能有些公司是例外的、不能取消补助的，它们应该是那些需要我们去创建并培育的、地方所有的、以社区为中心的企业。

知识产权 信息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不会损耗的资源，它可以被任何人分享使用。当前的每一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几千年以来无数代人积累的人类共同知识遗产基础之上的，这是人类信息的共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合理目的是为开发研究和创新性贡献提供动力，它不是要对信息垄断进行保护。所有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都应该进行改革，使之能够与这一原则相适应。我们对这种权利应该进行狭义上的界定和解释，授予专有权的时间控制在最短的范围之内，在这个时段内那些进行营利性开发研究的人可以收回他们的成本并取得合理的收益。法律应该禁止对生命形式或基因过程，公共资金资助取得的发现，或者有可能使持有者有效地垄断某种类型的研究或垄断某类产品生产的工序或技术申请专利。与其他任何普通的人类遗产资源一样，当专有者的私人利益与社区利益相冲突时，应该优先考虑社区利益。

因为企业是地方化的，所以我们可以把政府地方化。正如保罗·豪肯所说的，大企业的存在才会需要有大政府去控制它的暴行，平息它带来的混乱。同样，正是大公司的干涉才使得政府处于效率低下的状态。豪肯描述了这种运作机制：

企业承担着生态系统的监护人的角色，但是任务完成得很糟糕；于是政府插足其中，试图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企业努力破坏政府的这种制度化的程序，机敏地规避

着那些写在本子上的规则制度；政府也在为虎作伥支持企业，因而它变成了一团乱麻式的官僚机器，它在掠夺金钱的同时阻碍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谴责政府对“市场的干涉”，开始重提它的困境，如果不能成为全面的控制者的话，企业就努力去成为事实上的监护人，借此它进一步腐化了立法和执法过程。^①

公司的规模越大，它们将自己的成本外部化的能力就越大，同时也就越需要大政府去保护公共利益，去平息由此带来的社会和环境混乱状态。我们要缩小公司的规模，其减小的程度与人性尺度越是接近，我们减小政府规模的能力也就越强。

在收回经济领地的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要解决由于经济权力的分配而带来的极度不平等状态。正如我们目前经验显示的那样，在一个不平等的世界里，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取得几乎是不可能的。极度的不平等使经济势力强大的一方能够侵占较弱一方的经济资源，并使自身的消费超出环境能力，这样通常就剥夺了经济势力较弱一方的基本生存手段，使经济势力强大的一方远离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环境后果。对由此带来的经济不安全，被排斥的穷人们的反应就是生许多孩子——这是他们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他们需要照顾的时候这是他们唯一可以预期得到的资源。当富人们扩大他们的消费而穷人生育了许多孩子的时候，人类给予这个星球的压力就开始增加。

一个社会如果更公平、更具有可持续性，收入能够进行更公平的分配，那么它将会对过度消费进行限制，并减少人们通过大家庭来寻求安全感的动力。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采取以

^① Hawken, *The Ecology of Commerce*, 163.

下措施：

收入有保障 这是保守的和激进的经济学家长久以来一直都在提倡的观点，一个有保障的收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它包括保证每个人都有一份收入，这份收入能够满足他或她的基本需要。孩子所需的收入数额会比成年人低，但是这个收入不能受一个人的其他收入、财产、工作、性别或婚姻状况的影响，它将会取代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现存的福利计划。因为劳动所得收益的增加不会减少有保障的支付，所以为挣钱而工作就几乎没有什么阻力了。当然雇主将不得不提供更高工资才能吸引工人们去从事那些令人不快的、低下的工作。^① 如果有人选择不工作，在一个劳动力剩余的世界里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

上述这个规划耗资巨大，但绝大多数高收入国家都可以承受，它们可以裁减军费、削减公司福利和现有的授权计划，可以对非劳动性的收入、奢侈品消费、污染制造者、资源消耗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不愿接受的活动征收重税。与普遍实行的公共资助的足额健康保障计划，以及高校教育的以能力为基础的公共奖学金相结合，保障性收入将极大地提高由更节制的收入提供的个人经济安全，并为那些希望在社会性经济中从事无报酬工作的人提供更大的空间。在低收入国家，土地改革和其他一些措施可以保证人们平等地得到生存所需的生产性自然资源，这些措施将会取代保障性的收入。

等级式的所得税与消费税 所得税如果过高，使人们的收

^① James Robertson, *Benefits and Taxes: A Radical Strategy*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March 1994), 12-17. 递进所得税，作为受保障收入的一个变量，是由 Daly and Cobb 提出的，*For the Common Good* (1989), 315-323. 这两部著作讨论了这些计划的历史和它们从政治范畴上所得到的支持。

人水平不再能够以一种舒适、满意和负责任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那么就应该取消这种税收。同样，目前对基本食物、住房、个人卫生、教育和娱乐或消遣支出都征收了销售税或增值税，若这些支出是维持美好生活所必需的，那么也应该取消这些税收。然而，对于高于最低保障性收入水平的收入就应该严格征收累进税——对最高收入等级应征收高达90%的税收。继承或信托过程中，财产超过100万美元的要征收至少50%的税，同时对受让一方所得到的财产按照一般的个人所得税率进行征税。家庭农场和家庭企业可以适当地按特例加以考虑。

有些不必要的消费项目会对社会有害或产生环境上的浪费或破坏，对这些消费应该征收可观的奢侈品消费税。个人的慈善捐献，包括给家庭基金会的捐献都应该是完全免税的，这样就会给个人提供巨大的动力去把自己多余的收入提供给一个强大的独立部门，这个部门是与国家和公司权力相抗衡的。这些措施将会使我们在继续做对社会有益的工作的同时，走向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报酬公平 一个高效组织的运行依靠的是所有成员的生产性贡献。一个完全合理的事实就是，谁在组织中负的责任更多，对组织的贡献更大，谁就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但是这个责任和贡献到底是多少呢？在一个组织中，收入最高的劳动者与收入最低的劳动者之间的收入比率保持在多少才是合理的呢？二比一？十比一？一百比一？一千比一？即使我们不把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与工人相比较，收入比高于一千比一的情况在美国公司中也还是比比皆是的。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在经济动力和经济公平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平衡点。公共政策应该能够提供一种机制，使收入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收入比不能超过十五比一。如果一个公司认为它的工人中最

差的人只值1万美元，那么它支付给自己的首席执行官的薪水就不能超过15万美元。如果它把工人的最低收入提高到2万美元，那么首席执行官的收入就可以提高到30万美元。在公司或其他组织中，如果最高层的工作是非常难做的或者是非常乏味的，以至于上述这么多的薪水都不足以吸引优秀人才去担任该职，那么这个工作岗位可能就需要进行重新规划。如果说这个工作要求过高完全是因为这个公司过于庞大，那么这个公司可能就该分拆开来，使它变得更易于管理。对于需要数百万美元的激励才能使其高效地完成工作的人而言，社会很快就会适应在没有这些人的情况良好地运行。

付薪工作的公平分配 我们也应该对付薪工作的机会尽可能地进行公平分配，方法就是采取措施来减少工作周，保证不分性别、种族或其他无关的原因给任何人都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

上述这些措施可以分时期分阶段地实施，根据实践的反应而作出相应的调整。这里提出的观点并不是提供了一个说明性的蓝图，我们只是描述了各种可以引领我们走向更健康的社会的政策措施。不同的方法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各有其适用之处，这些创新之举的管理和投资必须由可能最小的和最为地方化的统治团体来掌握。例如，在土地公平分配的农业主导社会中，所需的最低保障性收入可能是非常之低的，对于那些愿意工作的人来说，他们的工作机会是极其充裕的。像美国这样的社会最需要保障性收入来帮助调节收入的不平等，因为这种社会的生活成本极高，而能够使人们过上体面生活的工作机会又非常稀少。

如果我们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管理经济领地，那么我们就需要与这一目标相一致的计算工具。西斯托·罗沙斯（Sixto Roxas）是一名经济学家，他是菲律宾前任的国际银行董事，

他解释说，传统的国民收入计算方法是无法满足这种需求的，因为传统的方法站在公司而不是社区的立场上来计算经济活动的成本和收益。这两者具有根本性的区别。例如，公司可以用尽可能低的工资雇佣尽可能少的工人，并从这种做法中获利。而社区的利益却在于让它的成员们以尽可能高的工资实现完全就业。公司可以砍光地方的森林或把资源用完，并从中获利，然后就转迁到其他地方去，而留下的社区就成为一片废墟。

罗沙斯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开发一种以社区为基础的统计体系，该体系从经济活动对家庭健康、社区和生态系统带来的后果这一角度来估计经济成本和收益。^①他们也在记录有多少地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价值仍然保留在社区之内，又有多少流出了社区之外。因此，如果当地的森林被砍光了，木材和收益都流到外国了，给社区留下的只是荒山秃岭，这些都被计算成是一种净损失，而不是传统的经济计算方法得出的净收益。我们必须花大力气去开发和运用这种系统，把它们作为经济管理的手段。

全球系统的地方化

几十年以来，跨国公司一直在运用全球制度和国际协定来规避民主程序，强迫国家经济对它们开放，并把对市场、金融、资源和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转移到自己手中。任何要求收回政治、经济领地的议程都必须用一种新体系来取代这种掠夺性体系，这种新体系应该：

- 授权给民众和国家及地方层次的机构，让他们为了

^① Sixto K. Roxas, "Strategies for Community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Liamzon, *Civil Societie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41-47.

自身利益而控制自己的经济资源；

- 使任何地方想要将它的生产或消费成本外部化都非常困难；

- 鼓励地区内的公司开展研究，解决它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良性的市场规则是这些目标实施的强大后盾。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为了使自身的运行为公共利益服务，市场运行的框架中应该有可强制实施的规则，而这些规则保证着市场配置的社会效率较高。生产性的投资被掠夺性的投机驱出，成本内部化的公司被成本外部化的公司击败，市场被中央计划的公司垄断者所控制。因此，让全球性制度支持国家和地方政府努力执行良好的市场规则就变得非常重要了。一般而言，这样的规则都是支持地方性生产商使用当地资源来满足当地的需求，它将会保护地方市场和资源，使它们不被经济掠夺者攫取。同时，如果一国要与其他愿意融合的国家进行国民经济的合并，那么该国的人民应该有权决定合并的具体程度。无论合并到什么程度，单个国家对国际体系的主要义务还是不变的，那就是让自己的进出口与世界其他地方保持大体的平衡。

目前，联合国系统在执行经济、社会和环境事务方面的全球统治职能——组成部分包括联合国秘书处；其专门机构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还有其各种发展援助基金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后者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统治着经济政策领域的事务，但它并不承担自己提出的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后果。联合国由于资金不足，它在经济事务方面并没有什么实权。它的任务就是：当

布雷顿森林三个机构的错误政策带来了社会和环境混乱时，它出面平息事态。

联合国创立者们的意图是想在国际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以及相关领域进行国际合作，这其中包括监督布雷顿森林的三个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依靠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尽管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正式设置上都是联合国的专门机构，但它们比联合国的其他任何专门机构的权力都要大，它们拒绝与联合国合作，不愿接受联合国对它们活动的监督。

把全球的事务在两个竞争性的统治体系之间进行分配并不是长久之计。必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这两者之间选择其一。联合国系统只具有部分的有效性——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资金不足、受到忽视、没有能力去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提出的经济政策——但是它具有全面的命令权，更加开放更加民主，受到主权国家的普遍尊重，对人类、社会和环境非常关注。布雷顿森林体系越是封闭和不民主，它的业务竞争力和实施能力就越大，但它一般都是从一种狭隘的经济视角来看整个世界，在主权国家和民主程序之外运行，而且还鼓励国家之间进行竞争，一直都把金融利益和公司利益摆在人类和地球的利益之上。

有些人可能会争辩说，任何抉择都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利，因为它具有执行并实现这个抉择的能力。但是应该考虑的是，它们所做得最有效率的事情都是破坏性的，他们采取强制性的方法，一直都无视那些成本承担者的利益和意愿，因此它做出选择的效率实质上是很低的。相比而言，联合国的效率虽然较低，但是它的决策过程更开放更民主，它对受政策影响的群体的意愿更加敏感，这使得它最终会形成一种与人类和地球的利益更加一致的议程。由于我们潜在的目标就是要加强民主

制度，把社会和环境目标放在优先于公司利益的位置上，因此较合理的选择就是再次肯定联合国的委任统治权，致力于加强联合国完全自身任务的能力，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职权。

联合国和它的成员国们一道重新确定自己具有经济权力，这样它们就会重新夺取自身经济的控制权，建立必要的调节制度，调整各国的经济，使它们都把本国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除了加强现有联合国机构在国际经济事务的权力和职能之外，我们还可以成立3个新的联合国机构，作为雷顿森林体系3个机构的对应物，相应地取代它们的职能。^①

联合国国际破产法院 (UNIIC) 世界银行使全球的低收入国家陷入了更深的债务奴役之中，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资源被全球的掠夺者所控制。我们建议成立的联合国国际破产法院将可以帮助这些国家摆脱债务负担。一个负债国如果认定自己的偿债义务已经达到顶峰，无力在不损害人民福利的情况下继续支付债务，那么它可以将自己的案情交给法院，自愿申请进入破产程序。法院在对该国进行初步评估之后，将会授权该国暂停一段时间的外债偿付，这段时间的长短要足以使法院完成复审和判决程序。与此同时，该国也不能再从外国借新债。

评估程序可以弄清该国到底欠了多少债。在不危及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能包括提供必需的社会服务这一前提下，能够在多长时间里偿清债务，法院也会审查该国的债务清单，从而认同那些债务不是通过合法订约的方式产生的恶性债务——这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例如世界银行的规划项目由于设计失误或疏忽大意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收益。联合国国际破产法院将会授权该国以国际法律程序为依

^① 基于2001年春的全球化国际论坛发表的公司全球化跨年度研究的有关建议。

据，拒付这些恶性债务，^① 拒付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债务，将会促使它们在贷款的时候要求成员国的担保，从而保证它们所有的出借债款都能收回。这样我们就从反面为取消它们职权的行动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

协商缓减债务计划将会向债务国提供调整后的偿债时间表、债务削减幅度以及剩余债务免除。但它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保证负债国能够继续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能，其中包括提供必要的社会服务。这样的计划就把债权国此前欠债务国的所有潜在债务都考虑在内了。因为此前北方的债权国从负债国国内攫取了大量财富，但它们却没有提供任何适当的补偿。债务减免计划里应该有一个进度表，促使该国摆脱国际债务并在此后进入国际账目收支平衡的运行机制之中。

联合国国际金融组织 (UNIFO) 而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促使各国不再对货币和商品的跨国流动进行调节，并让各国自己承担由此而带来的贸易不平衡、国际负债、剥削和金融市场不稳定等后果。我们建议成立联合国国际金融组织，它将会与联合国各成员国一道去实现并保持国际金融关系的平衡和稳定，使各国和国际金融体系不再因国际债务和负债货币而功能失常，提高国内的生产性投资，扩大生产性资源的国内所有权范围。必要的时候在全球范围内采取上述措施，支持各国和地区为所有人提供一个公平、富饶、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条件。由于既缺乏贷款能力也没有执行能力，所以联合国国际金融组织的职能将会局限于作为国际债务的中央数据库，为问题的加剧摇旗呐喊，并为贸易伙伴提供便利条件，让它们为了改变相互间的贸易不平衡状态而进行的谈判。联合国国际

^① 见 Patricia Adams, *Odious Debts: Loose Lending, Corruption, and the Third World's Environmental Legacy* (London: Earthscan, 1991).

金融组织也会对提出的问题提供建议咨询服务。它还有其他一些功能，其中包括为国际协定的谈判和执行提供便利条件，这些协定将会支持各国政府阻止离岸银行（offshore banks）经营，防止对洗钱的征税庇护和防止逃税。

联合国公司责任组织（UNOCA） 此外，世界贸易组织一直在协调各国和地方政府，禁止它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跨国公司、贸易和金融进行管制。而联合国公司责任组织却支持各国政府设立各种合理的、恰当的调节机关，从而确保跨国公司履行责任，保证本国本地财政的稳定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它将会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为相关国际协定的谈判提供便利；协调各国的行动，打破公司权力集中的趋势（尤其是在银行、大众传媒和农产品加工业方面）；阻止不公平的竞争行为；为各公司设立一个违反规则和重复犯罪行为的记录档案，使自然人在本国受到子公司的伤害之后可以对设在另一国的母公司提出诉讼，取消对公司的补助，禁止公司试图去影响政治进程的行为。有些国际协定是以牺牲人民权利为代价来保护公司利益的，联合国公司责任组织将会为撤消这些协定提供便利条件：与其他国家保持平衡互利的贸易关系；为企业建立规则和标准——其中包括跨国公司——让它们在自己的职能范围内开展活动；^① 禁止对基因材料、生命形式和程序，以及固有的知识申请专利；在合理的条件下，从其他国家进口有用的信息和技术。

专门机构 与贸易有关的劳动、卫生、食品和环境标准分别由联合国具有相关职权和专长的机构来掌管，譬如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粮食和农业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计划署。

^① 见 Tim Lang and Colin Hines, *The New Protectionism: Protecting the Future against Free Trade* (New York: New Press, 1993), 127, 可以找到其中关于保护主义的正面回应的有关讨论。

以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为例，该组织的职能就是领导开发环境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引起人们对环境负担跨国转移行为的关注，在环境资源和有毒废料的交易过程中，这些负担通过环境排放和贸易量的不平衡等方式从一国转移至另一国。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可以适当地加强它的职权和技术性能力，从而对适当的统计和会计方法的开发和利用进行协调。我们签署有关的国际协定，建立争端解决机制，解决环境标准、监测以及地区和国家环境成本内部化等方面的争端。环境计划署可以为这些协定的谈判提供便利条件。环境监测的职能应该尽可能地分散化，每个地方、地区、国家和区域都应该有自己的独立监测能力和记录。对于环境成本跨境外部化方面的争论，如果双边直接的谈判无法解决争端，那么就应该通过恰当的司法机构来裁判，其中包括国际法院。

在执行自己的国际经济职能时，联合国如果想要保持高效率与可信性，那么它远离公司的影响、保持自身的相对自由就显得非常重要了——这个问题我们在第 21 章阐述。

决定人类未来的决策都是由那些数量虽少但权力巨大的公司精英们做出的。他们规避并腐化着民主制度，不考虑给其他人带来的后果，并推进狭隘的特殊利益的议程。本章所概述的改革都是为一个目标服务的：让承担了政治、经济决策成本的绝大多数人能够重新掌握民主决策的权力与责任。在第六部分，我们将会回顾 1995 年到 2000 年间全球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来看看它们会告诉我们这些改革的前景如何，改革的具体实施途径又是怎样的。

由于公司全球化的机构牢牢地控制着全球的经济资源，并加深了民主制度的腐败程度，因此它们的暴行变得更加明目张胆了。这就使我们看到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例如：人类明确的价值取向是生活还是金钱？决定我们大家未来的是人民还是公

司？在公司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崩溃变得回天乏力之前，人类的政府制度之中是否已经拥有足够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意愿来进行必要的改革，从而恢复我们制度的民主责任感？在公司世界里，虽然公司暴行在日益增多，但希望还是存在的。因为这些暴行越明显越傲慢，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和政治觉醒的时刻就会越早到来。

第六部分 公司统治到市民社会

二十一、挣钱，更加贫困

没有人会说，“让我们拥有一个能摧毁一切的经济体系吧，让它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系统都毁掉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政治活动家、史密斯豪肯公司的创立人 保罗·豪肯^①
(Paul Hawken)

新的游资不会在任何地方扎根，不会建设社区。它留下来的是有毒废料、可怜的工人和无法生存下去的本地社区。

——政治活动家、美体连锁公司的创立人 安妮塔·罗迪克^②

^① 见 Sarahvan Gelder 对 Paul Hawken 和 David Korten 作的专访，“Corporate Futures,”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Summer 1999, 40.

^② Anita Roddick, *Business as Unusual: The Triumph of Anita Roddick* (London: Thorsons, 2000), 7.

第三个千年迎面走来。“’99 西雅图运动”是当前为生活和民主进行斗争呐喊而成为令人瞩目的全球运动的一个象征。精英们过去都是聚集在一个安静的、隐居的优雅之处制定公司全球经济的进程计划，现在他们却不得不在警察路障和公众抗议者的人墙后见面。界线已经分明，许多专业活动家的组织已经觉醒。

前面各章节记述了 1995 年之前的公司全球化进程和由此带来的后果，这一破坏性的发展趋势继续引领着我们走向更加糟糕的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加目光短浅，更加不稳定了。公司的压力也在增加，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的股价上扬。在美国，政治程序的腐败已经变得让人们更加无法忍受，人们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要求进行彻底的结构变革。

来自亚洲、拉丁美洲、东西欧、非洲到北美洲的报告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性。文化被视为贸易障碍，因而被分解得支离破碎，公地出售给出价最高的买家，社会和环境标准被撤消。贫困人口的安全网正逐步消失，资金被用来提高依赖性全球公司的福利。小农场、商店和工厂继续被全球性公司和受资助的进口商品所取代。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或政府实施的公共政策都以公司和其他富人们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这些公共政策带来的后果就是污染、外债、环境退化和不平等的程度继续加深。

任何东西好像都可以拿来拍卖——从水资源、空气、信息、本土的知识、监狱、种子和基因密码到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学校——任何人都可以享受的公共服务正在变成私人性的服务：只有那些能够将共同的遗产资源转变成私人财产的人才有权力享受这种服务。正如生态经济学家哈尔曼·戴利所说的那样，人类似乎已经决定去抑制商业营销的最终倒台。

这就是市民抗议运动背后的现实情况。下面是《公司统治全球》第一版出版以来所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

网络赌博

货币生产与价值创造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更加微弱。目前世界外汇交易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在 1.5 万亿美元到 2 万亿美元之间。其中只有大约 2% 的份额是真正的商品与服务交易。2000 年 1 月，在市场进行调整并使高科技股大幅贬值之前，从 1995 年开始公开上市的 170 家互联网公司合共仅有收入 80 亿美元，但它们控制的股票市值总和为 6000 亿美元。^①

2000 年 4 月 3 日，《商业周刊》在它的封面报道《华尔街的超级机器》中说到，人们再也不相信电视里有关金融市场的报道是真实客观的了。“譬如，绝大多数分析员不再是信息的发布者，他们都成了某种股票的宣传员。”^② 评论员对各种股票大加推崇并夸大其词——建议购买的次数与建议出售的次数之比是 72 : 1。至少在 2000 年下半年市场进行调整之前，资产投资——即在估计公司的潜在价值基础上对该公司的股票进行长期投资——是不被提倡的。短线投资（momentum Investing）——在股票出现短期上扬的时候买进股票然后很快地卖出——是被人们推崇的。10 年之前，一种纳斯达克股票的股民平均的持有时间是两年。到 2000 年平均时间是 5 个月。1999 年，华尔街在广告上的花费是 12 亿美元——是 5 年前的 3 倍。^③

① Alan T. Saracevic, "Investors Ponder if Tech Stocks can Continue to Pull the Market," *The San Francisco Examiner*, January 3, 2000, B-1.

② Marcia Vickers and Gary Weiss, "The Wall Street Hype Machine," *Business Week*, April 3, 2000, 168.

③ Vickers and Weiss, "Wall Street's Hype Machine," 113-127.

从1990年到1999年间，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市场价值从31.4万亿美元上升到40.5万亿美元，上涨129%（以1998年美元的价格计算）。^①同一时期全球股票市场的总资本的市场价值从9.4万亿美元上升到27.5万亿美元，上升了293%。^②金融资产的价值是真正财富的象征，它上涨的速度远远快于真正的产出物价值的上升速度，这反映了在债务的刺激下股票市场已经失真扭曲。从1995年3月到2000年3月间，美国的透支率——从经纪人那里借钱用来购买股票——增长了463%：从602亿美元上升到2785亿美元。^③从1995年到2000年第一季度，美国金融部门的债务上升了81%，达到7.7万亿美元。那些纯粹做货币生意的机构用金钱为有钱人挣更多的钱，这些机构的负债比其他机构包括政府、家庭和非金融机构等都要多。^④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13章所描述的，银行系统仅仅通过发行贷款就可以挣得利润。这里描绘的系统中，银行把钱在人们之间相互借贷从而形成一个日益增大的债务金字塔，这个债务金字塔使他们掌握的金融资产升值，用这些金融资产就可以去买卖土地和公司，去支持大型合并和收购。199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最大的5家投资银行——在其他公司中控股的

① David Malin Roodman, *Vital Signs 2000* (Washington, D. C.: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0), 75.

② World Bank, *2000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64, www.worldbank.org/date/wdi2000.

③ 自 The Financial Markets Center. <http://www.fmcenter.org>.

④ *Flow of Funds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June 9, 2000), 58.

银行——以 27:1 的比率举债经营。^①

建立在债台之上、无调节的全球金融体系是极度不稳定的。我们可以从 1997 年至 1998 年间亚洲、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的金融体系崩溃中认清这种不稳定性。典型的情况是，这些国家通过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本国，刺激了本国经济的增长，股票价值迅速上升的泡沫开始出现。这些资金没有多少是用来扩大生产能力的。相反，它只是刺激了股票和不动产价格的上扬，通过浮夸（Hot Air）产生更多的财富。

由于投机性投资比进行真正的投资更加有利可图，因此，工业和农业不动产的所有者开始把现金从他们的企业中转移到金融市场中，而不是用这些现金来维护或改善现存的生产设施。新的“投资”流入速度越快，真正的生产能力被剥夺的速度就越快。国内生产量和出口量在下降，而外国制造的奢侈品的进口量——用借来的外汇来支付——却在增加。这就很像一个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收入或资产，他却通过接收并透支邮寄来的全部信用卡过着一种短暂的豪华生活。

当每个经济“奇迹”绝望地变成对外国债权人承担过多的经济责任时，老奸巨猾的投机者就会把他们的投资撤走，国内通货的价值就会贬值，经济系统就会崩溃。这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会插手干涉，它运用公众担保的贷款去保偿私人国际银行那些无法收回的贷款。在亚洲受到冲击的国家里，人们的失业率上升了一倍。而在拉丁美洲，失业率创下了 15 年以来的新高。^②

^① Joseph Kahn, "More Scrutiny Is Sought for Firms That Run or Lend to Hedge Fund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9, 1999, *The New York Times* 网上存档资料。

^② UNRISD, *Visible Hands: Taking Responsibility for Social Development* (Geneva: UNRISD, 2000), 10.

1998年9月，美国的一家对冲基金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崩溃，公众可以从中对带来不稳定性的金融风险投资的秘密世界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杠杆收购的比率是每1美元贷款25美元，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进行了一场风险巨大的豪赌。当这些投机行为失败的时候，就会对美国和世界金融市场带来威胁，由此就会促使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插手其中，安排一次秘密的紧急财政援助。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4000个对冲基金，据说它们中间有些杠杆收购的比率高达100:1。一个没有管制的全球金融市场可以产生出什么都不代表的货币，从而资助进行高风险的金融投机——它希望在这些投机行为失利后，政府会插手其中进行并购——这本身就是在诱导金融危机的爆发。

出售的民主制度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政府调节器在限制上述恶行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现在它们是在助纣为虐。敏感政治中心（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所编辑的政治捐款资料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在1990年到2000年的总统选举周期中，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总计捐献了8.11亿美元给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都比其他所有行业的捐献要多得多。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期间，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就捐献了2.49亿美元。^①

联邦选举委员会预测：在2000年的大选中，竞选联邦职位的选举人总计要花费30亿美元，比4年前增加了8亿美元。2000年共和党与民主党大会的主要特征就是富裕的候选人都

^① 数据为 Center for Response Politics 的报告，www.opensecrets.org。

有一批寻求政治特权的公司背后资助，这就使对选举资助制度进行严厉改革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猖獗的政治腐败大部分都是合法的，它把公共利益放在拍卖所里，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变成一种摆设。财富的分配越不平等，大财阀的利益就越能够在政治进程中得到反映，法规制度就越会偏向于支持有钱人。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对大财阀们来说，两党的候选人——阿尔·戈尔或乔治·布什——谁取胜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他们两人都出身于耶鲁大学，是白人男性，都是出身于政治精英家庭的保守主义的——公司的——全球主义者，都受大财阀的控制。

由《国家》杂志和华盛顿的智囊库之一政策研究学会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对于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很关心的许多问题，这两大政党的候选人都很少提及或者根本就没有涉及，这些问题包括贫富差距问题（91%的人关心），穷人没有医疗保险问题（74%的人关心）。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这两个候选人所采取的立场都与绝大多数选民的立场完全相反。譬如，两个候选人都承诺当选后会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但大多数调查应答者（83%）都倾向于保护工人、环境和人类权利，即使这样做会减缓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在所不惜。两人都呼吁要增加国防经费。可是选民中压倒多数的人（63%）都认为要减少国防支出，增加教育、社会保障和偿付国债等方面的支出。当第三党的候选人，包括绿党候选人拉夫·纳德呼吁要在这些问题上采取行动时，他们的声音就被公司控制的传媒切断，并从公司资助的电视辩论中销声匿迹。

在这次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为肮脏的选举中，布什入主白宫。佛罗里达州一直对支持谁当选都拿不定主意，但该州的州长是布什的兄弟，他也是对布什选举活动进行监督的副主席，许多证据都证明，该州有许多严重不合选举法规的做法，这其

中就包括故意剥夺数千名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当时正在对由于投票机故障而被剔除的合法选票重新计票，5个右翼党派最高法院法官插手其中，要求停止计票，而这些投票机大都是位于支持戈尔的低收入选民的居住区，这样选举违规方面的争议才得以平息——绝大多数独立的法律学者都将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斥之为明目张胆的偏袒行为，认为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

更多人关心的是，怎样在一个有瑕疵的系统里保持公众的信任。他们不关心游戏的监督，不关心公司传媒权威压制着各种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可以引起人们对程序公平的怀疑，传媒同时还将那些可怜的失败者排挤出去——建议这些失败者接受这个结果并继续过自己的日子。因此，那些仅看公司传媒传播的信息的人就会对这些严重的违规行为或它在系统层面上的本质认识不足。即使如此，《华盛顿邮报》——ABC广播公司在布什入主白宫的前一周联合开展了一项新闻民意测验，该调查发现有40%的被调查者还是信息很灵通，他们知道布什入主白宫并不是合法选举而来的。

由于1995年制定了《游说公开法》，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查出各种公司和利益团体到底花费了多少金钱进行专业性的游说，从而对美国联邦政府施加影响。1998年报告的游说花费总额是14.2亿美元，比1997年上升了13%。1997年9月30日在册的游说人员有14946名，到1999年6月15日就已经增长至20512名。在1998年美国国会的议员平均每人可以分摊到至少38名注册游说员，以及270万美元的游说费用。^①

对于许多大公司来说，选举献金已经成为他们回报最为优

^① “Influence, Inc.: The Bottom Line in Washington Lobbying.” 1999 Edition, Washington, D. C.: The 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www.opensecrets.org.

厚的一项投资。譬如，葛兰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药品公司由于捐献了 120 万美元的选举献金，结果它得到善卫得（Zantac）这种药品为期 19 个月的专利延长期，据估计约值 10 亿美元，它的净回报率是 83333%。木材工业提供了 800 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这使它们获得了总计 4.58 亿美元的伐木公路补贴——回报率为 5725%。广播产业仅仅捐献了 500 万美元就得到了价值高达 700 亿美元的免费数字电视经营许可证，投资回报率为 1400000%。^①

与公开的游说相关的政治策略也在强化。工业联合会和公关公司开展了专业的策划运动，力图模糊人们心目中的问题，对可能会限制公司的成本外部化能力的改革加以阻止。你可以关心与食品安全、汽车安全、燃料、基因工程、环境保护、互联网隐私、枪支控制、医疗卫生改革、青少年吸烟、水资源的净化、最低工资标准、电视暴力和回收再利用——你可以说出的任何问题——相关的公共利益事业。但如果你的建议会使公司利益受损，那么各个公司就会联合起来在一次选举中提供数以百万的美元捐献，从而让你的建议石沉大海。它们可以雇请“专家”来支持它们的主张，可以通过发表成组的文章和“新闻”报道来玷污你，切断你的公共或基金会资金，对你的学问提出质疑，提出进行矫正所需的成本费用问题，把你塑造成追求个人特殊利益的、贪婪的投机者，从而使你销声匿迹。你的对手一般都会把自己塑造成底层市民团体的代表，但是他们的资助却是来自于公司，他们留下来的地址可能就是某家公司的公关公司。积极行动者们把这些人称之为“阿斯特罗式的”

^① Dun Van Natta Jr., “Campaign Fund-Raising Is at Record Pace,”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3, 1999, *The New York Times* 网上存档资料。

(Astroturf)^① 游说员。^②

各大公司也投资做冠冕堂皇的广告，承认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和环境责任。壳牌公司在1999年10月份的《国家地理》上做的广告就是一个很具有讽刺意味的例子。这个广告的特色是原始热带雨林的全彩色画面，并吹嘘说壳牌公司承诺与原居民同在。

我们壳牌公司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做生意时重视自然环境会带来回报。如果我们要开发世界上敏感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我们都会广泛地与各种地方和全球的利益团体协商。我们的目标就是保持各个地方的生态多样性。我们也在力图鼓励这些团体监督我们的进步，从而让我们能够回顾并改善我们所走的道路。

壳牌公司应该知道冠冕堂皇的广告并不能抹去人们对由于反对壳牌公司毁坏自己的家园，尼日利亚奥哥尼（Ogoni）的多个领导人被绞死的记忆。人们唯一感到好奇的是，如果公司这些用于粉饰自己的资金用来清洁生产操作过程，用来提高受影响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那么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① 阿斯特罗系商标名称，指用绿色尼龙等材料制成用来铺设运动场等的人造草皮。

② 查阅相关文献见 Sharon Beder, *Global Spin: The Corporate Assault on Environmentalism* (Dartington, U. K.: Green Books, Ltd., 1997); John Stauber and Sheldon Rampton, *Toxic Sludge Is Good for You! Lies, 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 (Monroe, ME: Common Courage Press, 1995); Jed Greer and Kenny Bruno, *Greenwash: The Reality Behind Corporate Environmentalism* (New York: The Apex Press, 1996); and *PR Watch Quarterly* Published by the Center for Media & Democracy in Madison Wisconsin, <http://www.prwatch.org>.

1999年1月，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多佛市召开的全球经济论坛上向公司领导人建议，联合国和全球最大的公司联合起来共同致力于巩固人权、提高劳动标准并保护环境。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观点，“把市场力量和普遍理想化的官方联合起来。让我们在私人企业的创新力量与处于不利境地的人以及未来一代人的需求之间，选择一条调和之道”。

许多公司急于在联合国的旗帜下掩盖自身的社会和环境罪恶，因此它们很快就同意了联合国的这个建议。市民社会团体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因为它们希望看到，在让全球性公司对其错误行为负责任的运动中，联合国执掌领导权。这些团体指出，联合国与那些道德上受到质疑的公司结成伙伴关系，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破坏联合国的声誉，而不是改善公司的行为。^①

为了使缺少资金的联合国征募到有大量资源的团体的援助，安南提出了这个动议。但他似乎并没有完全理解一个事实，那就是公司并不是慈善组织，它们的利益与寻求人权、劳动和环境保护者的利益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在联合国全球协议的首批签署国中，安南建议中的主要参与者是诸如耐克公司、壳牌公司和澳力拓公司等之类的公司，而这些公司都被公众视为是公司贪欲、践踏人权和毁坏环境的国际代表。其他一些恶名昭著的公司参与者还包括诺华公司与安万特公司（该公司是迫使人们接受未经适当的检验或未贴标识的转基因食品的主要领导者）、贝尔公司、巴斯夫公司和杜邦公司（臭氧减少的罪魁祸首）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许多企业联合会也参

^① 本言论据自 UN Global Compact 网站 www.unglobalcompact.org 和 TRAC-Transnational Resource & Action Center, *Tangled Up In Blue: Corporate Partnerships at the United Nations* (San Francisco: TRAC, 2000). 并可参阅 TRAC website at www.corpwatch.org.

与其中，这包括国际商会和世界企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名声源自于它们都竭尽全力地努力，想让联合国废除企业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国际标准的规定。

有兴趣参与联合国全球协议的公司只需要向联合国递交一份声明，表明它们支持联合国全球协议的观点，以及协议规定的九个人权、就业和环境标准方面的原则就行了。协议的成员公司每年一次向联合国递交一份报告，描述它们在上述这些领域内的“最佳表现”，并将报告放在联合国全球协议的网站上。联合国没有规定什么条款来甄别申请人，对成员公司的实施情况也没有什么监督机制。事实上，没有什么人相信公司会遵守协议规定的原则。国际商会秘书长玛利亚·卡塔薇（Maria Livianos Cattui）对此进行了清楚的描述，她说对协议的建议“企业会对任何外部的企业行为评估建议不屑一顾，无论这些评估是来自特殊利益团体还是来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全球协议是对利益进行分享的一种共同承诺，而不是一个必须遵守的规定。它不是政府将规定性制度强加给企业的一个工具”^①。

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对于那些对和平、安全和社会的福利很重要的、民主决策的法律，必须用警察和法院来保证强制执行。公司强烈支持对其他人实施这些法律，但是它们强烈反对让它们遵守某种标准的要求，哪怕这些要求非常之低。它认为这是在对私人事务进行令人无法忍受的干涉。令人悲哀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就这么轻易地冒着联合国声誉和合法性受损的风险，接受并默许了这个谎言。

挨个地收买各位政客和各个国家，来换取规章和义务的豁免权是一件既费时又费钱的事情。各个公司已经明白，利用国际协定能够更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同时还可以规避国家和地

^① 引自 TRAC, *Tangled Up in Blue*, 5.

方各级政府。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该组织宣称自己的职能是建立并加强各种贸易法规，以防止贸易战的爆发并保护穷国的利益。

正如它的实践活动所显示的那样，世界贸易组织的真正职能是阻止各国和地方政府提出新的法规，削减现有的贸易管理、公司和金融等方面的制度法规，因为这些新法规与全球性公司和金融家们的利益相左。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就告诉过日本，说它对美国生产的“波本”牌（Bourbon）威士忌酒所征的税率太高了。加拿大被告知，它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产业而对美国杂志征收重税。印度也被告知，它再也不能向自己的国民提供那些便宜的药品了，因为这对通过有商标的药品赚钱的外国药品公司而言是不公平的。美国禁止进口使用对海豚有害的方法捕捞来的金枪鱼，它也被告知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必须进行修改。

欧洲得知，它不能向加勒比地区小农生产的香蕉提供进口优先权。它们也得知除非有充分的科学依据证明，否则它们不能拒绝进口用成长荷尔蒙或基因转换产品养大的牛肉。担忧这些东西可能给人类带来危害并不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世界贸易组织还把决定欧洲或其他地区的转基因食品是否需要贴出标识的权力留给它自己。对于民主选举的政府为了保护国民而制定并实施的法规，在每一个案例中，世界贸易组织都力图加以推翻。对世界贸易组织来说，为了保护公司利益，人权和民主制度都是应该取消的贸易障碍。

1999年的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它提出了许多供考虑的建议。这些建议若实施，都将会对政府的行为作出更加严格的限制。政府的这些做法包括把对本地企业的考虑优先于对外国投资者（包括在在银行、传媒和其他服务部门）的关照；通过保护当地小农免遭国外的掠夺性竞争

来维护国家的粮食安全；不让外国公司征用森林和水资源；或者对国际资金的投机性投资进行管理控制。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要求为诸如学校、医疗健康和市政水资源等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扫清道路。西雅图会议上的这些建议以失败而告终，但此后公司全球主义者们立即又重新组织起来，力图通过今后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和其他国际论坛把这些建议付诸实施。

美国的公司全球主义者们除了在这次西雅图会议上失利之外，在此前就已经两次被市民社会的反击所震惊。1997年，克林顿总统要求通过正常的国会程序来修改快速审批权，但这个请求被迫搁置。这个快速审批权允许行政机构进行贸易协定谈判，并在国会以完全不加以修改的情况下通过。另一个挫折发生在1998年12月，当时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宣布终止多边投资协定的谈判。这个协定的规定原本想从根本上清除相关政府法规的限制，使那些投机性资金或外国拥有的国内资产可以自由地在国际范围内流动。这个协定原本还进一步要求政府，由于采用了新的环境、卫生或安全法规，要对外国投资者可能会受到影响的预期收益损失进行赔偿；规定各国政府在采购或其他形式的公共资助方面不能给本地公司优先权。忧虑的市民社会团体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众抗议运动，使谈判被迫中止。

美国的公司全球主义者加强了他们的游说攻势，力图重新控制政治议程。他们很快就在反对劳工、环境和其他公共利益团体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2000年5月11日，美国参议院批准通过了非洲/加勒比贸易法案。随后在又通过了一个法案，确定了与中国建立永久性贸易伙伴关系，然后在2000年7月通过了一个越南贸易法案。所有这些法案都被吹捧为是在帮助穷国。将贸易关系正常化，是为美国的出口提供外国市

场。在克林顿总统签署与中国的协定成为法律的当天,《华尔街日报》提到在对华贸易协定的背后,公司组织全力游说的真正原因:保证美国公司能够安全地把更多的产品运到中国,而同时可以保证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①当然,这也是非洲/加勒比贸易法案以及越南贸易法案的真实意图之所在。

最近有一位为公司出版物执笔的作者问我,公司领导人怎样做才能保证本公司不受“特殊利益集团”日益增多的反击。这个问题的结构本身就显示了公司组织的眼光短浅。首先,它把公司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等同,把那些为生活和民主而行动的人视为特殊利益集团,并把他们排除在外。其次,它认为问题是出在反对者身上,而不是出在反对者们力图补救的各种社会与环境失误的身上。

你可以反复听到公司在吹嘘它对人民和环境的承诺,发现它通过工业联合会、选举献金、专业性的游说员和公关公司如希尔诺顿公司、博雅公关公司、宣伟公司或凯旋公司等花费大量资金,致力于取消社会和环境法规,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从政府部门获得补助,挫败市民领导的公共利益运动,并且为它的恶行披上绿色的友好的伪装。^②

一个公司的领导人如果真的关心人类和地球的福利,那么他的第一个责任就是承认市场如果是为更大的公共利益服务,那么就必须通过一个公开的民主的程序制定强制性的法规。在这个民主程序中,不仅是有权人,而且所有有利害关系的人都

① Ian Urbina, “The Corporate PNTR Lobby: How Big Business Is Paying Millions to Gain Billions in China,” *Multinational Monitor*, 2000年5月, 7—11 记录了美国公司竭力推动一项美国劳工联盟极力反对的中国贸易议案,且当时美国公众对该议案的支持率仅为18%。

② Center for Media&Democracy 网站可提供参考, www.pr-watch.org. 该网站除了提供自己的高素质内容还提供其他网站的链接。

参与其中。也应该有许多边界——不是墙壁而是减速装置（speed bump）——在那些遵守地方法规的人与不遵守地方法规的人进行竞争时保护前者。任何公司如果在积极地挫败市民团体制定强制性公司责任法规的努力，如果贿赂政客——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或者以不公开和不公平的民主程序为代价来寻求特殊的政治帮助，那么它都不能合法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市民。

一个负责任的公司领导人的第二个责任就是，承认决定市场法规的权力应该保持在真正的人而不是公司的手中——即使公司确信自己的行动是为了社会的最大利益。公司不是选举产生的机关，在代表其他人的利益方面它们没有什么特殊的专长。由于公司拥有巨大的权力和资源，所以它们参与政治将不可避免地会使民主程序扭曲失真。对一个公司而言，唯一负责的政治参与就是制定法规，把自己排除在政治程序之外，恢复民主程序的正义性。此外，一个负有社会责任的公司还应该遵守法律，在政治领域之外生存。

作为单个的市民，公司的管理者如果想在他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为创建一个真正公正的、可持续发展的和富有同情心的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那又将另当别论了。他们拥有经验和专业知识，这使他们在市民运动中成为受大家欢迎的搭档。市民社会的目标就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而建立强制性的市场法规——而不是仅仅为那些“云端守卫者”。

斯彻特斯城的生活

楚格尔特斯人在地下矿区努力地工作，得到的工资却是不变甚至是下降的，与此同时，金融泡沫继续使斯彻特斯城居民的财富在不断地攀升，使他们进入更加美好的天堂。到1998年，世界上最富的3个亿万富翁的总财富比所有最不发达的国

家及其6亿人口所产生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还要多。^①在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口——将近总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在工资低于2美元的世界里。大约有12亿人口每天所挣的钱不足1美元。^②1990—1998年间，50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处于负增长的境地——它通常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结构调整过程中实施公司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后果。

1973年至1998年间，美国的生产能力提高了33%。^③但处于工资排序中间位置的工人的工资——中位工资（the Median Wage）——按美元不变价计算却下降了。^④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一般的家庭都工作更长的时间，让其他的家庭成员作为劳动力去工作，并陷于更加严重的债务之中。1999年，美国家庭的总债务达到6.5万亿美元，是每年可支配收入的98%。^⑤

实际上，美国生产利润的所有好处都落到最不需要这些利润的人手中，通常是到了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手中，这些人目前占据着大约90%的公司股权，88.5%的债券和89.3%的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②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 Attacking Pove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

③ Chuck Collins and Felice Yeskel, *Economic Apartheid in America: A Primer on Economic Inequality & Insecurity*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0), 56.

④ 中等收入指中等阶层工人的收入。一半的工人在此收入之上，一半则在之下。这显示出工人典型的处境，平均工资水平在上层收入剧增的影响下而显著向上偏差，其实工人并没从中获得好处。

⑤ “Is the U. S. Building a Debt Bomb?” *Business Week*, November 1, 1999, 40-42; and Wells Capital Management, *National and Global Trends*, October 2000.

股票。^① 1999年，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年薪平均达到1240万美元，是一般工人收入的475倍——在1995年是141倍。^② 1998年，所有美国工人中有29%的人的工资是在贫困线附近，对于一个标准工作周而言，工人的每小时工资是太低了，它无法让一个四口之家生活在贫困线之上。^③ 从1995年到1998年间，收入10万美元以上家庭的平均净财产上升了22%，达到170万美元。收入在2.5万美元至10万美元之间家庭的平均净财产下降了20%，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欠下了更多的债务。^④

这种生产收益的病态分配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像。“云端守卫者”害怕失业率下降会使工资需求上升，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由国内顶级的银行家所操纵——通过利率上升的方法插手其间，促使经济热的冷却。与此同时，公司也着手进行规模缩减，把工作转移到低收入国家，从国外引进临时工。这些临时工必须接受雇主们所提供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否则就得打道回府。

尽管一直在讨论债务减免问题，但是南方国家的负债却从1994年的2.1万亿美元上升到1998年的2.5万亿美元（按1998年美元计算）。^⑤ 1996年，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支付的外债比它新得到的长期贷款还要多25亿美元，非洲花费在

① Collins and Yeskel, *Economic Apartheid in America*, 58-59.

② “Executive Pay,” *Business Week*, April 17, 2000, 100-11.

③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Paycheck Economics: Wage and Income Trends-Up the Down Escalator.” www.epinet.org.

④ Rich Miller, “All Get Richer-Except the Poor,” *Business Week*, January 31, 2000, 47.

⑤ Sarah Porter, “Developing-Country Debt Increases,” *Vital Signs 2000* (Washington, D. C.: WorldWatch Institute, 2000), 72.

债务支付上的费用是医疗卫生费用的4倍。^①

公司合并和收购继续在取消竞争、强化核心地区的权力。1994年，全球合并和收购的总价值达到5603亿美元。到1998年这一数字达到2.5万亿美元，1999年达到3.4万亿美元。^②反对恶意收购的戒律一旦被取消，欧洲就掀起了一场合并狂潮。欧洲合并和收购的价值在1998年达到9880亿美元，到1999年就上升了66%，达到1.5万亿美元，在2000年估计可以达到2万亿美元。^③

除了被大力宣扬的反对微软公司的反托拉斯案例之外，巨型公司政治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完全没有消除美国政治机构对经济权力集中的关注。1998年，两个最大公司洛克菲勒财团与埃克森美孚公司重组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并实体，对此政客们都保持着沉默。格拉斯—斯第格尔法（Glass-Steagall）于1934年通过，其目的就是减少银行破产的风险，为此该法案明确规定，不允许银行从事保险事务。当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保险公司对外宣称它们打算合并成一体，并组成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时，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进行了引人注目的两党合作，它们废除了格拉斯—斯第格尔法，从而为这次联姻扫清了道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德意志银行购

①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n Globalization,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Citizen's Agenda*, draft report prepared by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 C., 2000.

② Gretchen Morgenson, "Cautionary Note on Mergers: Bigger Does Not Mean Better,"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8, 1998, C-1 & C-23; and Michael Renner, "Corporate Mergers Skyrocket," in Lester R. Brown, Michael Renner, and Brian Halwell, *Vital Signs 2000: The Environmental Trends That Are Shaping Our Fu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142-143.

③ Stanley Reed and Carol Matlack, "The Big Grab: Deal Mania May Be Even Hotter in Europe This Year".

买了银行家信托公司，从而组成了一个比新成立的花旗银行还要大的金融机构。2000年1月10日，政客们也用类似的沉默对待美国在线公司，当天该公司宣布将斥资185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公司，从而刷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合并的记录。^①

在奥威尔的（Orwellian）^② 模棱两可的庄重言词风格中，每次我们都被告知，联合最终会提高效率、增强竞争性并有利于消费者。^③ 正如已经证实的那样，唯一可以确定的赢家就是接受委任的交易者和合并公司的高层管理者。他们一般都利用这个机会以传统的奖金形式以及股份作为对自己的回报。在许多情况下，股东和消费者最终都是输家。^④

从传统的金融指标来看——尽管是极其不稳定的事件——公司全球化的经济仍然在制造着史无前例的金融财富。然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个建立在幻觉和金融泡沫之上的、虚假的繁荣，它是以令人越来越难以接受的成本为代价的。

① “Welcome to the 21st Century: With one stunning stroke, AOL and Time Warner create a colossus and redefine the future,” *Business Week*, January 24, 2000 (cover story).

②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1950），是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主要作品有反面乌托邦政治讽刺小说《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小说中描述了受严酷统治而失去人性的社会，语言多一语双关。——译者注。

③ Bryan Gruley, “Why Laissez Faire Is the Washington Line On Telecon Mergers: Even as the Big Get Bigger, Regulators Hope Deals will Boost Competition,”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0 1999, A-1.

④ Gretchen Morgenson, “Cautionary Note on Mergers,” C-1 & c-23.

环境成本

在 20 世纪末，有许多有关去物质化经济（dematerialized economy）的讨论。当网络股飞速上涨的时候，权威们将之称为是新“信息经济”（information economy）的奇迹。在这种经济中，财富的生产完全依靠纯粹的信息来进行，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受经济周期和环境限制约束的经济现象。有一个说法是对的，那就是许多网络公司的百万富翁在积累财富时依靠的的确是股票泡沫，没有对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运用这些财富所形成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又有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这种生活方式会导致消费规模过于庞大，用耗油量大的 SUVs、具有身份象征意义的府第、山里的度假别墅、私人喷气式飞机、到遥远的异国度假、享受处于食物链顶端的动植物——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要另当别论了。

什么也不需要就能挣钱的说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银行每贷一次款就都在干着这种事情。然而，每当人们花钱的时候，他们都希望能够得到真正价值的回报。一个几乎不能称之为秘密的事实就是，这种经济实际上也会产生污染，因为信息技术依靠的是复杂的硬件，而硬件就需要由大量的有毒化学物品来制造。硅谷（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克拉拉县）就有 29 处有毒的超级基金（superfund）厂址——比美国其他任何县都要多——80%的废料来自于电子元件制造业。

无论是否有互联网，在对地球气候、森林、珊瑚礁和渔业、土壤以及淡水的影响方面，这个“新”经济与旧经济非常相似。全球由于暴风雨、洪水和其他严重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有一部分要归因于人类行为所导致的全球变暖。20 世纪 90 年代，全球自然灾害的损失达到 4300 亿美元（以 1998 年

美元计算),是80年代这些自然紊乱所造成损失的5倍多。^①即使是在信息时代,每个生活在高收入国家里的人年平均消费都要达45吨~85吨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土壤侵蚀、采矿废料和其他辅助性的材料。工业经济每创造100美元收入大约需要300千克的自然资源。^②

世界自然基金会曾经编纂过地球生态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该指数显示:从1970年到1995年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地球的森林和水资源这些生态财富的健康状况就下降了30%。当这一指数为零时,细菌和蟑螂可能依然存活如旧,但已经没有人去惊叹我们在银行账户上的巨额财富了。

2000年9月公布了一项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世界银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研究得出的结论,这项研究评估了与五种生态系统(粮食和纤维生产、水资源总量、空气质量、生态多样性和碳贮藏量)服务相关的五种生态系统类型(农业、海岸、森林、淡水和草原)。研究发现,在这25种生态/服务的结合类型中有16种类型有衰退的趋势。仅有一种——森林生态类型下的粮食和纤维生产——表现出积极的发展趋势,这主要归功于以损害物种多样性为代价来扩大工业用森林的独家收益(monocropping)。^③所有这些下降都是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在生物失去栖息地之后,对生物多样性第二个最大的威胁就是生物物种的入侵,现在它威胁着全球

① Seth Dunn, "Weather Damages Drop," *Vital Signs 2000* (Washington, D. C.: World Watch Institute, 2000), 76.

②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Global Trends," <http://www.wri.org/index.html>.

③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World Bank, and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orld Resources 2000-2001: People and Ecosystems, The Fraying Web of Life* (Washington, D. 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0).

20%的濒危脊椎动物的生存。这是贸易扩张引入了外来物种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这些外来的人侵物种在进入本地生态系统之后，没有什么天敌可以克制它们。^①

在1995年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相关的知识，知道了人类为自己毫无节制对土地和水进行化学和放射性污染所付出的代价。然而是在1996年，当西奥·科尔伯恩（Theo Colborn）和他的研究小组出版了《我们被窃取的未来》之后，对人类环境中散布着7万种合成化学物质意味着什么，我们才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②数千种这样的化学物品与荷尔蒙对人类和其他生物产生的影响都很相似，它们导致了青蛙、鱼和鸟类产卵量的减少、难以繁殖、畸形率上升，导致人类孩子智力和行为发育都受到损害。

核时代新近被发现的危险是贫铀的使用。贫铀是核武器和能源工业的废料，被用作军用武器。在战争中若要使用正在游动着的铀，我们可以通过撞击将铀点燃，然后与氧气相结合形成一个由铀尘埃构成的云层。这对那些吸入或摄取了这些尘埃的人具有长期的高致毒性，会导致人残疾和（或）死亡。海湾战争期间，在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大约有300吨~800吨的贫铀在燃烧，这使许多地区被致命的有毒物质污染，放射物辐射的半衰期是40亿年~50亿年——相当于目前地球的生命。贫铀被怀疑是导致海湾战争综合症的罪魁祸首。虽然军方一直都否认这两者之间有联系，但美国在海湾地区69.7万名军人中有大约9万人患上了这种综合症。北约军队在科索沃地区也使

①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Service, "Global Trends," <http://www.wri.org/index.html>.

② Theo Colborn, Dianne Dumanoski, and John Peterson Myers, *Our Stolen Future* (New York: Dutton, 1996). 又见发表在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Summer 1998 上的相关讨论。

用过类似的武器，这不仅给北约军队带来巨大的危险，那些返家的难民也将世代代为此付出代价。^① 这些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揭示，如果我们狭隘地对一项技术进行即时性的利用，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人们对长期后果的麻木不仁。

从1995年以来，有两个新产生的污染威胁开始引起公众的关注：电磁辐射和转基因生物。健康权威人士已经提醒我们，近些时候，气喘、睡眠紊乱、高血压、耳鸣、记忆力下降和流感、类似流感的疾病正在急剧增加。在美国，这种增加始于1996年11月。就在同一时期，数码蜂窝电话也开始进入美国的许多城市。此后，在一些大城市中，脉冲辐射频率和微波辐射水平提高了10万倍。1996年的《电信法》对普通的无线业务进行了规范，它禁止国家和各级政府为了保护环境而对传输设施进行管制。^② 与此同时，无线通讯装置和相关的辐射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加。

转基因生物的快速和大规模的商品化及发散也是1995年之后的事情。传统的栽培繁殖是在同一种或相近的作物之间进行杂交，与自然过程较为相似。与此相反，基因工程植物一般是转基因的，这意味着它跨越了大自然精心设立的物种障碍而

① Jonathon Carr-Brown and Martin Meissonnier, "Tests Show Gulf War Victims Have Uranium Poisoning," *The Sunday Times: World*, September 3, 2000; Jonathon Carr-Brown, "One Man's Gulf War Threatens to Go Nuclear," *The Sunday Times: New Review*, September 10, 2000; Former U. S. Attorney General Ramsey Clark, "An International Appeal to Ban the Use of Depleted Uranium Weapons," www.ia-center.org/depleted/appeal.htm; and J. J. Richardson, "Depleted Uranium: The Invisible Threat," *Mother Jones Wire*, June 23, 1999, www.motherjones.com/total_coverage/kosovo/reality_check/du.html.

② Arthur Firstenberg, "Radio Waves: Invisible Danger," *Earth Island Journal*, Winter 2000-2001, 25.

改变着基因物质，并把它们融入完全不同的物种的细胞之中，这种移植有时候甚至跨越了细菌、植物和动物的分界线。细菌基因可以植入玉米的细胞内，或者鱼类的基因可以植入番茄的细胞内。核废料和化工废料尽管本身具有危害性，但至少它们不能自身再生产。但是转基因生物却可以进行自我繁殖。它们也可以变异，可以与其他物种相互作用——一旦它们被释放到环境当中，我们就不可能再去收回它们，或者把它们隔离起来。^①

在迅速抢占市场主导地位的压力之下，生物技术公司匆匆忙忙地就把转基因生物推向市场，而对试验、政府监控以及对转基因生物可能给人类健康与环境产生的潜在影响，都极少考虑。到1999年，已经有1亿英亩的土地在种植转基因农作物，这些农田主要分布在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② 面对来自市民团体日益强烈的公众抗议，这些用俄国式的轮盘赌博从地球的生命系统中赢利的生物技术公司日益警惕起来。为此，7个主要的生物技术公司共同组成了一个生物技术信息政务会，它们花费5000万美元开展了一项公关运动，使公众相信他们的产品既是有益的，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危害。^③

由于新技术领域的不断扩展，现在人类已经具有神灵般的力量去控制物质、生命和电磁波谱的基本结构。资产达数十亿美元的公司一直坚持认为，在有人能提供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产品对人类有害之前，他们都应有权利利用这些新技术将产品

① 查阅全面、权威的讨论见 Mae-Wan Ho, *Genetic Engineering: Dream or Nightmare?* (Bath, U. K.: Gateway Books, 1998).

② Anthony DePalma with Simon Romero, "Crop Genetics On the Line In Brazil," *The New York Times*, May 16, 2000,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archives.

③ David Barboza, "Industry Moves to Defend Biotechnolog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4, 2000, C-6.

商品化，并扩大生产。但是，这些技术对我们的身体和地球生命系统意味着什么，我们仍然知之甚少。我们现在就像一个有一包火柴的小孩站在一个开了口的汽油罐前面一样，我们只知道，划一下火柴就会产生一个美丽的火焰。在当前可以利用并获利这一判断的基础上，公司改变了化学物质、电磁波和地球的基因环境——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改变是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对我们来说，让公司控制着这种改变的决定权已经日益成为一件很愚蠢的事。

社会成本

人类与大自然的健康和安全是繁荣与否的真正的衡量指标。令我们欣慰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些低收入国家特定的社会指标已经有了可喜的提高，这些指标包括预期寿命、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安全饮用水。然而全世界还有大约 9000 万儿童没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大约有 1 亿儿童在街头生活或工作。20 世纪 90 年代期间，大约有 30 万儿童是童子军，有 600 万儿童在军事冲突中伤亡。^① 2000 年，国际难民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估计已上升至 5700 万人。^② 在过去的 30 年间，加拿大和英国的离婚率上升了 500%，未婚妇女生育率上升了 600%。^③

一份上交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报告显示，“从 1989 年以来，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各国在人类发展方面出现了巨大的倒

①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0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② Lester R. Brown, Michael Renner, and Brian Halwell, *Vital Signs 2000: The Environmental Trends That Are Shaping Our Future* (New York: WW. Norton, 2000), 102.

③ June 21, 2000, ILO press release on the ILO World Labour Report 2000.

退，其贫困程度是工业化国家在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①。在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已经下降到不足 60 岁。大约 75% 的俄罗斯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或贫困线附近，同时有 50%~80% 的俄罗斯学龄儿童有某种身体或心理上的残疾。^②

截至 1999 年年底，全球大约有 3400 万人感染 HIV 病毒，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有 2300 万人，这使得该地区 20 世纪 70 年代在预期寿命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付诸东流。^③ 医疗卫生服务系统由于资金短缺，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应对这种局面。

日本公司现在已经放弃了自己的终身雇佣传统，它们与美国同行一起把利润放在比民众更优先考虑的位置。日本历史上的失业率几乎为零，但到 2000 年 4 月，由于公司裁员，日本的失业率已经上升至 4.9%。^④ 由于工人压力增强和工作时间延长，工人在工作期间猝死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根据日本警卫厅的报告，在 1997 年至 1998 年之间，与工作有关的自杀人数从 4786 人上升至 7935 人，增幅为 62%。^⑤ 失业率的上升也伴随着自杀率的上升。

尽管经济统计数据 displays 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美国经济在蒸

① Ewa Ruminska-Zimny, "Human Poverty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Regional Overview for HDR 1997," www.undp.org/hdro/oc22a.htm.

② Stephen F. Cohen, "American Journalism and Russia's Tragedy," *The Nation*, October 2, 2000, 23.

③ Lester Brown, "Challenges of the New Century," in Lester Brown, et al., *State of the World 2000* (New York: W. W. Norton, 2000), 5.

④ Stephanie Strom, "Japanese Unemployment at Record High Ahead of Election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0.

⑤ Darius Mehri, "Death by Overwork: Corporate Pressure on Employees Takes a Fatal Toll in Japan," *Multinational Monitor*, June 2000, 26-28.

蒸蒸日上，令人弹冠相庆，但是美国也有一些令人不安的社会发展趋势。一项主要由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完成的研究显示，从1970年到1996年间，婴儿死亡率、65岁以上人口的预期寿命、65岁以上人口的贫困率和中学辍学率等指标都出现了极大的积极性发展。同时研究也发现，青年人自杀、暴力犯罪、儿童贫困、不平等和虐待儿童等指标随着工资的下降和医疗保健范围的缩小也出现惊人的增长。^①

截至1999年年底，大约有630万美国人处于某种形式的司法监控之下——缓刑、监禁或坐牢或是假释。这个数字等于美国成年人口的3.1%，与首次有资料记载的1980年的180万人相比，这一数字上升了250%。^② 处于司法监控下的人中有200万人被监禁，这使美国——自由的乐土——成为可能除了俄罗斯之外全世界各国中监禁率最高的国家。55%以上的被监禁者是非裔美国人，许多人所犯的都是较轻微的、非暴力的吸毒罪。^③ 我们这个深陷于麻烦之中的社会似乎已经选择了用监禁作为解决社会病的基本方法。

尽管现在人们都很关注美国的司法公平问题，但一个突出的事实是，虽然公司犯罪使绝大多数的街头犯罪相形见绌，但目前还是没有公司犯罪方面的官方统计数据。仅在2000年6

① Marc Miringoff and Marque-Luisa Miringoff, *The Social Health of the Nation: How America Is Really Doing* (New York: Oxford Press, 1999), 150-151. 虽然美国暴力犯罪中的恶性事件在1991—1998年间下降了25%，但据美国联邦调查局数据显示，这比起1970年仍高了109%，*Uniform Crime Reports*, from www.fbi.gov/ucr/, and Miringoff and Miringoff, 203.

②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from www.ojp.usdoj.gov/bjs/correct.htm; and Miringoff and Miringoff, *The Social Health of the Nation*, 204.

③ Jerome G. Miller, "The American Gulag,"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2000, 12-17.

月5日一天里,《纽约时报》就报道了下述犯罪:

• “昨天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高层被控诈骗,因为他们把数千万美元作为养老计划的超额费用据为己有,而这些养老计划是承保人为它的工人和经纪人投保的。”^①

• “在一份上交给曼哈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控告中,检察官起诉了21个人,原因是他们组建了一个股市(DMN, 资本投资)诈骗公司。”^②

• “三位前CUC国际公司[现在的山登公司(Cendant Corporation)]董事就联邦对他们的有罪控诉进行辩护,权威人士把这个案件称之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会计诈欺案,该案作案持续了至少12年,投资者的190亿美元财产被挥霍殆尽。”^③

如果把有危害的、有缺陷的和有误导性标识的商品,危险的工作条件和有毒物质的释放等所带来的疾病、身体伤害和死亡都计算在内的话,公司有组织犯罪所带来的人类和金融成本就变得令人瞠目结舌了。公司也可以通过为犯罪提供便利而赢利。例如,大金融业公司为毒品交易、偷税和其他犯罪洗钱提供便利,为大烟草公司提供了香烟走私的便利。^④ 在街头,即

^① David Cay Johnston and Joseph B. Treaster, “New York Life Sued over Fees on its Pension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00, 8.

^② John Sullivan with Alex Bereson, “Brokers Charged with Crime Figures in Complex Fraud,”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00, A-1 & C-27.

^③ Flyd Norris and Diana B. Henriques, “3 Admit Guilt in Falsifying CUC’s book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15, 2000, C-1, C-8.

^④ Ken Silverstein, “Trillion-Dollar Hideaway,” *Mother Jones*, November/December 2000, 38-45.

使只犯了轻罪也要受到严厉的强制性处罚。与此不一样，应该对公司犯罪负责的个人很少会因此而受到个人罚款或是被监禁。

公司不仅通过自身犯罪或为犯罪提供便利而从中获利，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街头犯罪进行惩罚而获利。从事监狱业务的公司，如美国矫正公司（Correction Corporation）、瓦肯禾（Wackenhut）矫正公司、苏达斯胡（Sodexo SA）公司都在积极提倡全球范围内的监狱私有化。^①杰西潘尼（J. C. Penney）公司、维多利亚保安（Victoria's Secret）公司、IBM公司、玩具反斗城连锁公司（Toys 'R' us）和环球航空公司（TWA）等，都通过雇佣犯人作为工人而使自己的利润大增。这些犯罪据称每小时只挣11美分，而且没有福利待遇。^②2000年7月实施的一项新法规规定，肯塔基州监狱开始向犯人每天收取高达50美元的食宿费，其他各州也想仿效这种做法。^③对轻微的吸毒罪处以重刑，强烈的种族歧视，由赢利性公司来经管监狱，把罪犯以极低的价格售卖给各大公司，收取监狱食宿费等等，这些结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人身依附性的劳动场所，一个如同奴隶般的社会条件。

所有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外科医生的故事来加以总结说明：一个医生刚做完缝合手术，他对病人的家属说道：“我有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手术非常成功，坏消息

① Steppen Nathan, "The Prison Industry Goes Global,"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2000, 34-35; and Henri E. Cauvin, "Wackenhut set to Build New prison in south African",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 2000, *The New York Times* on the web, archives.

② Josh Levin, "The History of Prison Labor,"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2000, 15.

③ Francis X. Clines, "Rooms Available in Gated Community: \$20 a day,"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0, 2000, A-14.

是病人死了。

20世纪90年代的好消息是经济增长强劲、股市飞涨，公司权威们将之欢呼为是一个现代经济奇迹。坏消息是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建立在金融泡沫幻觉基础上的、虚假的繁荣。强劲的经济增长使少数人的银行账户数字猛增，但它正在以加速的方式扼杀社会和地球的生命——绝大多数公司掌权者对此仍矢口否认。

幸运的是，20世纪90年代的后半期也有一些真正的好消息。人类灵魂中出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迹象——人们对公司全球化的现实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通过全球范围内反对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全球性公司统治机构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我们可以对此有一个很好的认识。这些运动过去一直在、现在也还在寻求用一种新的政治制度来表达自己的意志，研究怎样进行观念的革新。新一代正在掌握运动的领导权，他们都是富有创新精神的、进步的青年社会活动家，都致力于创造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世界。有人把这个运动称为争取生活民主的全球运动。这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之光。

二十二、生活民主运动

我们决定留下来——去工作，去抗争，直到公正如洪水般、正义如激流般滚滚而来。

——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我们，这个世界的主人，应该动员各国市民社会的力量，形成一个有广泛共识的议程，把我们的大量社会运动

联合起来，为实现公正的、可持续的和人人参与的人类社会而努力奋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设计了自己的措施和议程，重新解释人类进步的本质和含义，对那些难以满足我们需求的制度进行改革。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
非政府组织论坛《人类的地球宣言》

1999年11月在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争取生活民主的全球运动向全世界宣布它的诞生。这一运动的深层根源至少可以追溯至1773年12月16日。当时，英勇的爱国者占领了停泊在波士顿港的一艘帆船，并将船上运载的茶叶倒入海中。通过这个行动，表达了他们反对强大的东印度公司不征得人们同意就征税以及贸易垄断的行为。现在我们把他们誉为波士顿茶党，这一大胆的非暴力市民反抗行动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爆发。独立战争把北美13个殖民地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美利坚合众国由此诞生。

生活民主运动的其他历史渊源还有劳工运动，以及为保护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权力不受公司践踏而进行的长期斗争。其中包括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这一运动终结了英国对印度长达几个世纪的统治。因为从1600年开始，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开始在印度国土上建立贸易基地。

生活民主的全球运动以国家民主运动为基础，这些国家民主运动曾经在推翻菲律宾马科斯政权，在瓦解苏联帝国，在废除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等方面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民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者运动都为生活民主运动在今天美国的出现扫清了道路。所有这些先驱性运动的组织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分散化的、民主的，都希望通过

非暴力的手段寻求新的公平。

反抗形式的改变

许多人都希望让经济不公平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现在他们认识到，这个愿望的实现与公司统治的终结是密不可分的。这个愿望也导致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的诞生，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这些力量一直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意于结束公司经济权力的集中趋势。相反，它把这种经济权力公有化，并将其作为国家统治的一个工具，实际上把实利主义和金融价值观放在生活价值观之上。

与此相反，正如在抗议运动中反映出来的那样，生活民主运动主要的主张不是将公司公有化，而是排除或取消它。从它的构思和具体实施看，这一运动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的。它之所以是国际化的部分原因是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受到攻击的公司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规模和运作都是全球性的——部分是偶然的——近期以来电话、传真和互联网通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这使得高度分散的、全球性的自我组织的大众运动有了产生的可能性。

“西雅图99”运动只是巨大冰山的一角。下面列举的是向这一方向迈进的、大量重要的游行示威行动的一小部分事例。

- 1993年7月13日，几百名印度农民聚集在加洛北部嘉吉公司的一家育种厂门口，他们徒手拆除了已经部分完工的房屋，要求把嘉吉公司赶出印度。

- 1994年1月，这天是北美自由贸易组织正式成立的日子，墨西哥的齐亚帕斯地区4000名印第安人发动武装起义，反对公司全球化。墨西哥政治分析家伊斯特瓦

(Gustavo Esteva) 将这次起义称之为“21世纪的首次革命”，因为它重新定义了公众斗争这个词的含义。齐亚帕斯人没有号召其他墨西哥人拿起武器反抗这个国家，而是加入了一个广泛的社会运动之中，力图从外国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殖民控制下把地方的空间解放出来。

- 1995年7月，1万名巴布亚新几内亚人举行抗议，反对世界银行强加给他们国家的结构调整计划，因为这个计划会加剧跨国公司对他们的土地和资源的开发利用。

- 1995年12月15日，15000多名环境保护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以及第三世界团结组织成员、反种族歧视主义者和妇女团体在马德里欧洲首脑每两年一次的峰会门前举行示威活动，反对公司统治。

- 1996年4月份的绝大部分时间里，13000名泰国农民在曼谷的首相府前，反对外国公司接管他们的土地，并用来建水坝和做种植园。

- 从1998年2月23日到25日，来自各大洲的民众运动的代表在日内瓦相聚，成立了名为“人民反对‘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全球行动”(PGA)这样一个结构松散的全球联盟，用来协调各国和国际性的抗议运动。PGA组织承诺进行非暴力的市民反抗、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和用地方性的民众组织取代全球性公司的统治。它是一个纯粹的联络性组织，没有固定成员，也没有合法的身份。

- 1998年5月，PGA组织发起组织了它的首次行动，这次行动的时间与5月8日至9日的伦敦八国外长和财长会议时间一致，与5月15日至17日在英国伯明翰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时间相一致，与5月18日至20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二次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时间相一致。

4月28日在德里、5月2日在海得拉巴，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运动由此开始，他们号召人们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在整个5月份里，有超过26个国家举行了反对“自由贸易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行动日活动，其中包括5月20日在巴西举行的有5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PGA这次运动的高潮出现在5月16日，当天从德国三个地区共有1万多人加入自行车和拖拉机车队，在日内瓦集合。就在同一天，6万名示威者在英国伯明翰八国峰会门前组成一道人墙，要求完全免除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在日内瓦的抗议运动面对着防暴警察的镇压持续了整整一周。

·1998年6月3日晚上，英国的保护主义者破坏了7个转基因农作物的实验田。加上这7个地方，英国已知的“去污染”（decontaminations）基因田的总数已达到19个。行动的目标不是想把公司创办的转基因食品公有化，而是想禁止这些食品进入欧洲。

·1998年11月28日，“千万卡纳达（Karnataka）州农民联合会”的成员把孟山都公司在印度的一家转基因棉花工厂的实验作物连根拔除并烧毁。孟山都公司在卡纳达州和安得拉邦的另外三家试验基地也遭到了相似的命运。1万多名印度人在写有“滚出印度”的明信片上签名，并将明信片寄给了孟山都公司的总部。

·1999年6月18日，一场名为“反对资本的狂欢节”（Carnival Against Capital）的全球行动日运动与在德国科隆召开的八国峰会同时举行。这次运动的中心是金融中心、金融业地区和主要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伦敦的大规模游行使伦敦国际期货与期权交易所的交易被迫暂时中断，这一整天，伦敦的金融区就像是一个战场一样。汽车被点着在燃烧，一幢楼房受损。在尼日利亚的港口城市哈

科特 (Harcourt), 1 万多人冒着军队镇压的危险赶到壳牌石油公司大门口去听奥文斯·维瓦 (Owens Wiwa) 的演讲。维瓦是肯·萨罗·维瓦 (Ken Karo-Wiwa) 的兄弟, 而肯·萨罗·维瓦就是多奈民众争取生存运动的前任领导人, 他由于在早些时期领导了反对壳牌公司占用多奈人土地的运动而被尼日利亚军政府绞死。在明斯克、蒙得维的亚 (Montevideo)^①、多伦多、洛杉矶、马德里、布拉格、苏黎世、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纽约和其他一些城市也都举行了街头游行。绝大多数游行都把矛头直接指向跨国资本的机构。

·在西雅图运动爆发的前一周, 抗议者占据了日内瓦世界贸易组织总部, 他们打开条幅, 用世界贸易组织的传真机向全世界发出公报。在新德里, 300 名当地人占据了当地的世界银行办公楼, 在房屋上贴满海报、标语和涂满牛粪。

在这同一天, 5 万名示威者走上西雅图街头, 码头装卸工人工会的 9000 名成员——他们的工作主要依靠国际贸易——团结起来, 临时关闭了美国西海岸的所有码头。除了在美国其他城市同时举行的示威之外, 大约还有 75000 人在法国参加了相同的抗议活动。在英国、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荷兰、德国、瑞士和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还有数以千计的人走上了街头。

在西雅图及其他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市民抗议活动使参加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 77 国集团南方国家代表倍感鼓舞。77 国集团由世界上最穷的 120 个国家组成, 美国政府一直在进行着强

^① 蒙得维的亚系乌拉圭的首都。——译者注。

权式的努力，想使它的公司议程在世界贸易组织会议上通过，而南方国家的代表则极力反对这个议程的通过。这种反对意见，再加上示威者堵住会议门口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使得世界贸易组织在新提案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这向成千上万的人发出了授权的信息，使公司组织受到很大的震动。公司权力组织似乎已经无法再无往而不利了。

让欢乐从地下交易中走出来

西雅图会议之后，权力精英们到处都要规避民主制度，通过做交易来推进公司的议程，他们被迫在数以千计的抗议者的包围下，在警察设置路障的环境下见面。

2000年4月16日，大约15000人走上华盛顿特区的街头，呼吁解散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取消第三世界国家的债务。尽管大批的警察挫败了示威者们中断会议的意图，但这次示威所取得的真正成果还是很辉煌的。为了保证会议正常举行并阻止示威者，警察把这个城市的大部分街道都封锁起来，这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许多美国政府机关整整关闭了一天。这样，整个城市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边是由警察把持着的空空荡荡的大街，另一边的大街是彩旗飘舞，示威者们的喇叭声飞扬。“民主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使我们在充满活力的民主与没有生气的警察国家之间产生一种强烈的视觉对比，这将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发言人努力想把示威者描述成被宠坏的特权孩子。他们认为，示威者忽略、否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项目给世界上的穷人带来的好处。然而，忽略了事实并把持着特权的是那些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说话的人，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多少年以来全球的数百万穷人一直都在走上街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

界银行的项目和政策给他们的生活和生计方式带来的破坏。总部设在英国的世界发展运动（The UK-based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组织记载了 50 个独立的都市动乱事件，这些事件发生在 1999 年 12 月至 2000 年 9 月之间，都是为了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在低收入国家推行的政策。参与这些抗议活动的人有 100 多万，他们分布在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洪都拉斯、肯尼亚、马拉维、尼日利亚、巴拉圭、南非和赞比亚等国家。^① 最后华盛顿特区的抗议者们赢得了这场交锋的胜利，当时 77 国集团正在古巴进行首脑会议，该集团的一位发言人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支持抗议者们的示威活动以及他们的事业。

就在同一个月，墨西哥的奶制品农场主发表了他们对公司全球化的声明，所使用的方式是把腐臭的牛奶倾倒在墨西哥城的大街上。按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定，外国受到政府补贴的奶粉可以进入墨西哥市场。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规定，因为这些奶粉的进口使墨西哥国内的牛奶价格下降到生产成本以下，并可能使这些农场被逐出市场。^②

在华盛顿特区的抗议活动之后不久，2000 年 6 月 2 日至 6 日在加拿大温莎召开美洲国家组织会议的代表们也遇到了数以千计的抗议者。2000 年 6 月 11 日至 15 日在加拿大召开世界石油大会的代表们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2000 年 7 月 21 日，八国集团（七国集团加上俄罗斯）的首脑们在日本偏远而又戒备森严的冲绳岛美军卡德纳（Kadena）空军基地举行了会晤，大约有 2.7 万抗议者包围了基地，呼吁美国撤离在日本的军事

① *States of Unrest: Resistance to IMF Policies in Poor Countries* (London: World Development Movement, 2000).

② Dan Fineren, "Mexico farmers protest cheap Imports from El Norte,"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8, 2000, C-4.

基地。^①

2000年5月，全印度大约有2000万人参加了反对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国家大罢工，国会两院都被迫暂时休会。

2000年6月30日，法国农民同盟（French Peasant Confederation）的创立人和发言人若泽·博韦（Jose Bove）与他的十位同事一起在法国米洛市（Millau，人口2万）接受审讯，因为他们被指控拆除了一家麦当劳餐厅。来自法国和世界各地的5万名支持者云集米洛市，态度鲜明的国际积极行动者作为专家目击证人出庭作证，他们把这次审讯变成了一次对公司全球化的审判。^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理事会议于2000年9月26日至28日在布拉格召开。第一天会议正常召开，但是当代表们准备回到饭店时，他们发现道路已经被成排的警察和抗议者们堵住。第二天就没有几个代表露面了。官员们声称他们已经提前议完了事项，所以把第三天也就是最后一天的会议日程取消了。2001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宣布它的2001年秋季会议将在卡塔尔召开。卡塔尔是一个弱小的、偏远的中东君主国家，它以镇压人权和严格禁止市民持异议而著称。

这场运动的全球性质并没有什么错误，不同国籍的人民相互之间团结意识的提高也没有什么错。这些人共同反对一个系统，就是这个系统把我们与邻里之间你死我活的竞争作为个体生存下去的条件。这使我们想起电影《角斗士》（*Gladiator*）。在这部电影中，罗马帝国的俘虏被送到角斗场，在那里他们的选择只有杀死别人或被别人杀死——直到最后，角斗士们才发

① Calvin Sims, "Thousands Ring Okinawa base in Demonstration Against U. 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00, A-8.

② Alun Griffiths, "Anti-Globalization forces Rally in France,"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2000, 7.

现只有联合起来反抗这个帝国，他们才有可能都生存下去。

面对着这种挑战权威的行动，公司组织以历史上专权主义者常用的方式对大众的反抗作出回应。它出动警察对抗议者进行残忍镇压；运用传媒傀儡把抗议者们描述成是一时头脑发热，是信息闭塞的、是反社会的、是孤立主义的，他们扔石头使合法的民主程序一片混乱，他们不值得尊重，不值得去倾听他们在说什么。由此推断他们应该遭到军警们的殴打、发射毒气和枪杀，从而为正派的人们维护了和平和秩序。

除了一小部分轻微不端行为和破坏公物之外，绝大部分抗议者都是非暴力的，是信息灵通的。他们之所以走上街头，是因为腐败的政治系统和傀儡式的传媒让他们无路可走，别无选择。此外，每一位街头示威者的身后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在心中同情他们。对于每次出现的示威活动，它的后面都有成百的集会、研究会和研究团体。通过这些团体，人民相互就有关问题进行交流，并动员人们为改变现状而斗争。对每个公司控制的传媒而言，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就等于是没有把握示威活动的真实内涵。数以百计的独立新闻报道、杂志、电子邮件传递服务、视听传输网站和微型无线电发射机正在传播着事实的本来面貌。

最后，公司组织的假资讯（disinformation）运动和警察的残忍镇压只会反过来加强这场运动。在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方面，公司传媒进一步破坏了自己的声誉。电视镜头记载了大队警察穿着达斯维德服（Darth Vader），殴打、发射催泪瓦斯和射杀那些用非暴力方式来行使言论权和集会权的人们，这会使人们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压迫性的警察国家里。这种印象激起了公愤，加强了人们反抗的意志，使新的参与者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对于那些可以接受警察暴力这一结局的人来说，这些具有尤其重要的教育意义。

对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白人参与者来说，被警察殴打和施射毒气，在冲突中被捕，被带上手铐扔进监狱，不准会见辩护律师，不提供诸如食物、水、药品和洗浴设施等等。这些经历使他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美国的有色人种与“公正的”制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因此，司法和监狱改革很快就成了这场运动的核心议程，这并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情。与它相伴的要求还有承诺在种族分裂之间架上桥梁，形成一个真正具有包容性的运动，使这一运动致力于消除任何形式的压迫，为每一个人都赢得公平和民主。

站出来，重新界定问题

那些正在关注西雅图的人们可以发现，美国正在出现一个复杂的政治转变的迹象。“’99 西雅图运动”通过对一系列现存问题的关心，把不同种族、宗教、年龄、经济阶层、性别取向和国籍的人联系在一起。他们中间有宗教人士、工会成员、年轻人、环境保护主义者、同性恋者、土著人、和平与人权主义者、小农业主、有机食物倡导者、小企业主、独立传媒的代表，以及其他各种人。青少年与白发苍苍的老人、百万富翁与无家可归者都站在一起游行示威。

每个人都逐渐意识到，不管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他们都处在公司统治政权的威胁之下。他们共同争论的不是贸易本身的问题，而是与贸易规则使用的有关问题，因为这些规则以人类和地球为代价强化了公司的权力和权利。在不协调的表面背后，存在着一种对民主和生活的一致信念，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共识：他们只能参与到共同的事业之中，并构建出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真正民主的世界，否则，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人服务的世界里。这是社会力量开始伟大结合的重要一步，这些社会力量分别以认同和单个问题的政治制度为基

础，力图塑造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政治制度。它反映了一种意识上的深化，这种意识不仅通过努力扩大联盟来表达自己，而且可以通过扩大每个参与选民的前途表达自己的意愿。

一般认为，在“'99 西雅图运动”中，有 4 个主要的团体在其中发挥着领导作用：宗教人士、工会成员、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年轻人。宗教人士参与的“欢乐节日 2000”(Jubilee 2000) 运动主要关注债务豁免问题，表达了许多基督教会有一种意识在日益增强，那就是基督教教义要集中关注社会和经济的公平。这是对基督教信仰最初建立之根基的再次肯定，它为基督教各派别和团体成员的日益增长提供了动力，它从主流基督教神学家们如托马斯·贝利 (Thomas Berry)、马尔库斯·伯格 (Marcus Borg)、瓦特·荣克 (Walter Wink)、马歇尔·福克斯 (Matthew Fox) 等人那里吸取思想精华。

工会表达了促成国际劳工团结的愿望。工会认为，在一个有着高失业率的无国界的世界里，如果不能保证每个劳动者都有一份工作和工资，那么所有人的工作和工资都会受到威胁。劳工和环境保护主义者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他们相互之间结成了联盟。工会成员们开始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健康的环境，他们的工作也就无从谈起。环境保护主义者也认识到，如果人们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以及劳动权的话，那么，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必将使环境遭到破坏。双方都认为两者的结合增强了他们反对公司弊端的力量。

最为鼓舞人心的是青年人，他们直接领导了在西雅图开展的各种行动，他们用身体排成长队使世界贸易组织的会议被迫停止。世界上的青年们认为，偷走了他们未来的系统一直在操纵自己、欺骗自己，为它的利益而服务。对于这种状况他们感到厌倦了，他们开始意识到必须进行深入的改革，认识到这些改革的实现要依靠他们这些青年人来领导。他们花费数月时间

来相互培养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意识 and 权力下放、以意见一致为基础、自我组织的原则与方法，他们所寻求的激进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和议程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得到重塑。他们中间有大学生，这些大学生领导了反对血汗工厂的运动，他们反对公司在他们校园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学生们也被动员起来，反对商业电视进入他们的课堂。

在更大范围内的联合运动中，每一个成分都在重新界定自己，并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与其他人团结起来。所以我们说，进行彻底变革的现实性、可行性更强了，也更紧迫性了。

减少损失

进行彻底变革的建构动力并不仅仅表现在街道上。自1995年以来，这一运动也通过各种方式介入了权力领域。正如第21章所述的，该运动的成员成功地阻止了克林顿总统对一项权力的行使，使他无法根据《快速审批法》扩大贸易谈判权，从而迫使白热化的多边投资协议谈判中止。与此同时，他们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际陆地矿藏和生物多样性协定的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内，克林顿政府力图降低有机食物的商标标准，但这种努力被美国的市民团体挫败。

在整个美国，市民社会团体都在与地方政府一道进行创新，从而限制公司的权利，收回那些罪恶累累的公司的执照。^① 虽然绝大多数这类行动都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但他们只是一个开端，他们在公共教育和意识提升方面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烟草公司一般都用误导性广告出售有害商品。早期对这些

^① Paul Cienfuegos, "Sprouting wings: A New Movement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Takes Flight," *Business Ethics*, July/August 2000, 10-11.

公司的诉讼都要求它们对所造成的健康后果负起责任，但这些诉讼一度都只具有象征性——而且也都是失败的——直到1998年，烟草工业才同意支付2460亿美元给各州政府，作为对吸烟所带来的健康损害的一种赔偿。2000年7月14日，迈阿密-戴德县的一家法院判决了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损害赔偿金，命令烟草公司向佛罗里达州的50万烟民支付1448亿美元的处罚金。^①

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欧洲的市民团体把转基因有机物质（GMOs）所造成的健康和环境危害作为一个主要问题提出来之前——一直都在美国和欧洲悄悄地说服农民们使用转基因种子。随后欧洲出台了一系列禁令，禁止进口转基因的种子和农产品，这在美国的食品和粮食领域产生了冲击波。大量的公司包括麦当劳（McDonald）公司、菲多利（FritoLay）公司和盖勃（Gerber）公司很快就做出反应，同意销毁或减少它们的转基因食品。

2000年7月，一个美国市民团体的联合会宣布了一项重要计划，目标直指其他的著名食品公司，首次指向的是金宝汤料（Campbell Soup）公司，他们敦促这些公司在进行足够的试验检测之前不要再使用转基因食品。^② 鉴于市场对他们产品的抵制，美国农民开始减少自己的玉米、大豆和棉花的种植面积，改而播种转基因的种子。因此，这种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势头。^③

① Rick Bragg, "Jurors in Florida Give Record Award in Tobacco Case," *The New York Times*, A-1 & A-10; and Barry Meir, "Industry crosses Troubling lin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00, A-10.

② Andrew Pollack, "Food Companies Urged to End Use of Biotechnology product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0, 2000, C-6.

③ David Barboza, "Farmers Are Scaling Back Genetically Altered Crops,"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1, 2000, A-6.

也许我们认为上述胜利只是片面的、暂时性的，但是他们至少向我们证明，即使公司全球化的力量掌握着巨大的金融、传媒和游说资源，但一旦人们不再想继续下去的时候，它们也没有说一不二的力量。每一个胜利都有助于减少损失，有助于增强公众的风险意识，彰显普通人掌握着真理和决定权。而且如果公共利益是在人民这一边的话，那么结果会完全不同。

培育替代者

世界上有许多人完全不相信政府和公司会把人类从它们的暴行中解救出来，因此他们正在进行着无数的、鲜为人知的积极创举。在史蒂文·洛克菲勒（Steven Rockefeller）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的支持下，全世界数以千计的人们参与起草了一份地球宪章，该宪章详细表达了一个观点，那就是这个世界应该被尽可能多的人分享。它必将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共识建构过程。^①

全球行动计划组织已经在 15 个国家创立了可持续生活团体，涉及了 5 万户家庭和 12.5 万人口，这些人都使他们的家庭和消费模式变得与环境更加融洽了。数百万人提出：要在个人生活中厉行节俭，这样他们可以减少自己对金融机构的依赖性。如果说自愿性的节俭正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美国发展最为迅猛的运动的话，那么社会责任性的资金投入也毫不逊色。仅 1999 年一年就有 2.16 万亿美元的投资基金——相当于美国所有专业管理的投资资金的 13%——受到包括股东意见在内的社会监控，并且（或者）是被引导进行了社区投资。与

^① Jan Robers, "The Earth Charter,"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Winter 2001, 41. 更多资料请见 www.earthcharterusa.org.

1997年的水平相比出现了高达82%的涨幅。^①

美国绿党开始成为一股国家政治力量，消费主义者拉尔夫·纳德利用它的旗号参与了2000年度的总统大选。在波特兰、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波士顿、奥克兰和纽约等地的拉尔夫·纳德的超级支持者集结了为数1万到1.5万的热情支持者，这是2000年大选周期中最大的一个政治集会。纳德的竞选纲领焦点认为：在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这两大政党都从不同角度代表了公司的利益。他参加总统大选并且向公众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替代性的选择方法，事实上对生活民主运动在美国的政治议程进行了界定。

2000年的美国大选到处充斥着腐败现象，其中包括故意地、有组织地剥夺数以千计的佛罗里达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促使众多美国人强烈要求宽容限制，并以一个全国性的前民主运动的形式重新点燃了民权运动之火。人们开始呼吁对美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的结构性改革，从而保护人们的选举权，使政治远离腐败，取消对第三党派的限制障碍。建议推行的改革包括更新选举技术、建立统一的选举标准、同一天进行选举登记、取消选举社团、选举资助完全透明化、人口比例代表制、选票实行即开制、让合格的第三党派自由参与公共电视节目和政治辩论，严厉打击当选代表与公司联系的利益规则或相关的投资。

一件令人受到鼓舞的事就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大选揭示了美国选民们的一种什么样心态。尽管人们的选举意识已经麻木，尽管选举的结果极不光彩，但是选民们还是倾向于支持两个主要党派候选人中更具有社会进步性的候选人戈尔。布什发

^① 来自 Social Investment Forum 报告所公布数据，[www. social-invest. org/](http://www.social-invest.org/).

动各种竞选运动，通过花言巧语掩饰了他的低劣政绩记录，从而赢得了大量选民的支持。绿党候选人拉尔夫·纳德由于政见与公司利益相悖而受到公司的传媒卑鄙攻击，但是他和其他第三党派候选人的表现都很优秀。

最高法院的5位法官插手命令停止计算选票，并将总统职位交给了布什，之后布什才将他那完全不可告人的意图表现出来。他提名右翼极端分子担任内阁中大量关键性的职位；他强力通过一项立法议程，对富人的税收进行减免、进行太空军事化、提高给予公司的福利、开放公用土地给私人公司利用、把社会保障交由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掌握、用标准化的测试来管理教育。倘若布什政府采取的措施与大多数选民的同情心理明显相悖的话，那么潜在的反冲力量将会为那些寻找一个真正具有同情心的、民主政治替代物的人提供一个极好的动员机会。

当政治和经济精英们争着赢得这个腐化的系统的宠爱时，生活和工作于权力领域之外的市民们正在承受着人类所面临的最为艰难的处境，那就是证明在个人生活、社区和国家层面确实存在着一个成功的替代物。

环境公平主义团体领导了重建城乡区域的倡议，希望这些城乡区域能够与大自然保持平衡状态，保证不同种族和文化社区的人都能够平等地得到服务和相关的资源。^① 市民们正在使退化了的土地变得生机勃勃。他们重建地方经济，使用生物方法来处理污水和其他废料，寻找监狱的替代物，在他们的社区之内以及国家之间承担着和平使者的角色，挽救家庭农场，开发并提高节能技术以遏制全球变暖。我们可以从《YES! 积极

^① Tracy Rysavy, "Mothers for Eco-Justice,"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summer 1998, 25.

未来杂志》中得到有关上述这些创举以及怎样实施的大量信息。^①

加拿大（加拿大人委员会）、智利和菲律宾的国内主要运动组织已经动员了数以千计的团体，这些团体代表了数百万人，它们都致力于一个事业，那就是向公众详细说明并推进实施一个国家未来的设想，就是建立民主的、以生活为中心的社会。这些都是真正的基层运动，它们的目标是重新解释社会，自下而上地改造国家的政治制度。^②

全美国都在开展创造性行动寻求阻止公司控制和统治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全国大约有 3000 家社区发展团体支持着地方公司的发展。在美国和加拿大，有 1000 多家家庭农场与本地居民签约，为他们提供新鲜的产品。^③ 巨型独立企业联盟是众多的地方公司的创举之一，它为独立的地方公司提供了一个互助式的系统，教育当地的社区成员，让他们知道在地方化的独立公司基础上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地方经济的好处。

上述这些以及其他相关的创举都是生活民主运动在积极行动的反映，它证明了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地方民主治理制度。在这种治理方式中有一种信念体系，它能为所有人创建一个健康的、生态效应良好的社区。对于动员抗议者采取行动的文化意

① The YES! website, www.yesmagazine.org, is a rich source of stories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② 在 *The Post-Corporate World: Life After Capitalism* 中有更深入浅出讨论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and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1999), 238-241, 而且提供有关于各国公民对民主、本地社区及经济恢复的意愿的文献。其中一章还提出了如何参与的指引。菲律宾政府及其管治理念详述参见 Nicanor Perlas, *Shaping Globalization: Civil Society, Cultural Power and Threefolding*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Center for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2000).

③ Ted Howard, "Ownership Matters,"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spring 1999, 24-27.

识而言，上述这些运动也是文化意识觉醒的一种表现。

一种文明

如果说经济是理解旧式政治制度的关键的话，那么文化就是理解新式政治制度的关键之所在。价值研究专家保罗·瑞（Paul Ray）与女权主义作家安德生·雪莉（Anderson Sherry）在他们合著的新书《文化创新者》（*The Cultural Creatives*）中广泛利用各种调查资料，描述了美国所出现的日益加深的文化觉醒，这种觉醒的表现形式就是美国成年人在三个文化群体中的分配出现了动态的平衡。^①

1. 现代主义者 现代主义者（The Modernists）有9300万人（占美国成年人的48%），它是美国最大的文化群体。他们认为，商业化的城市工业社会是他们生活的正确选择。他们关心物质进步，希望他们的孩子在物质生活上过得比他们更好。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他们推崇对金钱和繁荣的追逐。在追求物质成功的过程中，他们倾向于支出大于收入，对理想主义和价值观较先进的人采取讽刺的态度。对他们而言，负责任地生活着就是指照顾好自己和家庭。他们是美国最有权力的公司和政治机构的领导者，也是公司全球化的主要捍卫者。

现代主义者把自己看成理性、技术进步、繁荣和个人自由的捍卫者。他们反对传统主义者、新生代和宗教神秘

^① Paul H. Ray and Sherry Ruth Anderson, *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0); 访谈 Paul Ray and Sherry Anderson by Sarah Ruth van Gelder, "A New Culture Emerges,"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Winter 2001, 15-20.

主义者，因为这些人阻碍了物质进步，或者是对物质进步提出了疑问。他们把全球性公司和金融市场视为强有力的财富生产机器，因为它们把地球上本来闲置着的资源转变成了有用的产品，从而为所有人带来了最大的收益。如果这些机构偶尔带来了一些伤害，那么这些伤害就是为了实现更大的共同利益和进步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现代主义者的数量相对比较稳定。

2. 传统主义者 传统主义者 (The Traditionals) 反对现代主义者的实利主义价值观，号召人们回归到较为传统的价值观和性别角色中去。他们信仰社区、家庭、助人为乐、自愿行动、创造和维护人们之间的互爱关系，并努力建立一个以传统价值观为基础的社会。他们倾向于宗教保守主义，寻求建立稳定的关系，这些常常是通过他们的宗教团体来实现的。他们有一个走向正统派基督教以及宗教、种族和人种替罪羊的发展倾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大约有50%的美国成年人是传统主义者，此后已经下降到25%左右（4800万美国成年人），现在无论从绝对数字还是从相对的百分比来看，传统主义者都在减少。

3. 文化创新者 文化创新者 (The Cultural Creatives)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占美国成年人口的比重不足5%。现在已经有26%（5000万）的美国成年人是文化创新者，而且他们的人数和所占比重都在上升。他们与现代主义者一样欢迎变革，但是他们排斥物质享受主义、反对公司传媒的玩世不恭以及消费者/公司文化中的贪婪与个人主义。他们与传统主义者一样关心人际关系、支持自愿行动和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思想，但是他们反对传统主义者的生存主义、性别歧视、排他主义和相信人类一定能够统治大自然的思想倾向。文化创新者中的60%是女性。

文化创新者在总体对人类的未来持积极态度，他们超越了现代主义和传统主义，期待着为所有人创造一个包容的、肯定生活的社会。他们处在当代社会和环境运动的最前沿。事实上，一个文化创新者通常参与多达四至六个不同的团体，为社会和环境的变化而努力。他们在发动生活民主运动的活动和创新过程中扮演着领导的角色，他们是西雅图抗议活动的核心力量。

一系列国际性的调查显示，瑞（Ray）和安德生（Anderson）发现的美国文化的变迁是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科层制——包括各国政府、企业和宗教——丧失信心这一趋势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他们对个人内心相应意识的信心日益增长。与这种发展趋势相伴随的是人们对经济利益的兴趣下降，对做有意义的工作和生活目标感的渴望增强。^①

文化创新者的领导人一般来自于其中的一个亚团体，这些亚团体的成员能够把自己对外部的家庭、社区、环境和国际主义的承诺与对内部的精神发展的关注结合起来。他们与所谓的整体文化（Integral Culture）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意味着他们从内外两个方面热爱着生活。这些“核心的”文化创新者大约占美国人口中的12%。他们的社会意识植根于生活根本团结的内在精神意识之中。在建构一个新的生态和精神世界观

① Ronald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总结性报告见 Duane Elgin and Coleen LeDrew, "Global Paradigm Report: Tracking the Shift Underway,"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winter 1997, 21; and Duane Elgin with Coleen LeDrew, *Global Consciousness Change: Indicators of an Emerging Paradigm* (San Anselmo, Calif.: Millennium Project, 1997). 有关 Elgin 的更多著作见: [www. awakeningeath. org](http://www.awakeningeath.org).

方面，在形成一个关注社会的新文学以及创建人类课题的新议程方面，他们都处在最前沿的地置。

瑞和安德生所描述的文化团体已开始关注公司全球化力量和全球市民社会力量之间斗争的文化基础。现代主义者是公司全球化的建构者和热情的领导者，他们把所谓的政治中心放在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在争取这些人的选票。文化创新者是生活民主运动和美国绿党背后的驱动力量。

许多传统主义者对公司全球化和生活民主运动都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和文化创新者一样，它反对公司全球化与现代主义者的那种实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价值观，他们憎恨对小城镇和农村社区的居民进行剥削。但是对于文化创新者热情推崇的许多自由主义的社会和环境价值观，他们也拒绝接受。作为坚定的爱国者，他们对与公司全球化相伴而至的国家主权的丧失深表震惊。与此同时，他们对于美国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全球计划深感自豪。他们也倾向于相信，是神让人类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开发地球的。在神的眼中，经济上的成功是个人正义的一个标志。

从文化意识走向政治行动

教育家帕克·帕尔默（Parker Palmer）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行动议程的草图，它描述了怎样从一种看似软性的文化觉醒走向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制度性变革。未经证明的假设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通过各种方法塑造了目前的各种观念和行。人们对这些方法越来越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这种清醒的认识就是这一行动议程付诸实施的开始。这与从文化轨迹中觉醒相当相似。一旦梦幻破灭，个人就会经历一个日益增强的痛苦过程，因为他们觉察到的价值观日益得到证明，日益变得真实起来，而这些价值观与扎根于旧式文化价值观之中的家庭、工作

和社区的现实状况日益脱节。

用帕尔默的话来说就是，个人最终决定“再也不愿生活在这种分裂状态之中了”。他或她会发现，在一种不真实的文化中努力遵守真实的文化来生活将产生一种孤独的感觉，要想摆脱这种感觉，唯一的方法就是与有类似感受的人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适当的社团。这些社团很小很孤单，但是当个人与社团被认同的范围扩大时，最终这些社团会合并在一起，并形成更大的联盟。渐渐地，真正的文化空间开始产生并逐渐扩大。随着联盟的扩大，他们就逐渐获得权力，可以改变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行动逻辑和回报系统。^①

瑞与安德生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他们把美国文化创新者人数的动态增长追溯至民权运动。他们提到，在民权运动开展之前，黑人和白人都倾向于接受当时流行的文化准则，把当时种族之间的关系视为是一种天生的自然秩序。民权运动唤起各种族人民的意识，他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文化准则只不过是一种为某种利益服务的信仰体系，它与自然秩序毫不相干。在认识到种族关系方面未经证实的信仰体系与自然秩序之间的差异之后，人们就很容易地看到，相似的文化准则是怎样界定男女之间、人与环境之间、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人民与公司之间以及人民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

每当一个长期的文化梦幻破灭时，个人都能够更自由、更清醒地过着一种与社区、地球生活相一致的生活。随后，在新文化意识周围形成的联盟就会在他们界定的故事和有关社会的观点中变得更加平民化，逐渐地，他们开始应对更多的重大挑战。此前用新方法提出社会和环境需求的一般性尝试开始大规

^① Parker Palmer, "Integral Life, Integral Teacher,"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Winter 1998/1999, 44-47.

模地出现。逐渐地，一个真正市民社会的公共文化与制度的创造方法就产生了。

20 世纪后半叶的人类政治史，很大程度上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争夺国家权力的历史。两者一个强调社会而较少考虑个人；另一个强调个人而较少考虑社会。两者都不加批判地将文化现代主义的实利主义价值观吸收进去，并且用他们各自的经济成果作为衡量他们工作成败的标准。在经济成果这个领域，资本主义很容易地、也是理所当然地取得了胜利，共产主义则遭受了挫折。由于以前的竞争对手不再强劲，所以资本主义就开始对生活、公平和民主发起了进攻。

日益显现出来的 21 世纪的斗争主要是集中在文化方面，而不是意识形态和阶级方面。生活民主运动是资本主义的新对手，它并不是通过少数人的总体消费水平来衡量进步，而是通过所有人的生活质量状况来进行衡量。它追求的目标不是夺取国家权力，而是减少国家权力，并使国家权力民主化。它寻求的不是消除市场，而是恢复市场。它的驱动力不是对金钱的狂热追求，而是对生活的热爱。它的力量来源是一种新文化意识的觉醒。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市民社会。

二十三、市民社会

当我们重新意识到生活本身的神圣性时，我们觉得在这一刻能够活着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在土壤、空气和水中，在我们其他物种的兄弟姐妹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之中……已经有太多的苦难，地球也在被攻击着，人民已经憎恨和厌倦这种相互之间的争夺。他们开始准备重新结合

在一起，促成一种共享式生活的出现。

——乔安娜·梅西“伟大的转折”发表于
《YES! 积极未来杂志》^①

当积极行动者重新构建一个重要的文化内涵时，他们就像是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他们揭露了文化系统的本来面目——它只是一种信仰体系，不是天生的自然秩序，不是现实……现实力量把它视为是神授的，是完全合法的。然而此前从来没有对现实力量表示过怀疑的人们现在也提出了疑问。

——保罗·瑞与雪莉·安德生《文化创新者》^②

我进行了好几个月的准备和期待，并排好了在“'99 西雅图运动”中许多集会和讨论会中发言的日程安排，但我最终没有能够亲身经历这个“世纪大抗议”活动，这是我平生最大的遗憾。由于不断地流鼻血，我无法坐飞机，所以我只能坐在3000 英里之外从电视上了解这一事件的发展。

尽管电视拍摄的图像集中关注的是暴力行为，但隔着一个大洲我都能感觉到聚集在西雅图的人们们的生活精神。他们以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式挑战了世界贸易组织对生活 and 民主的攻击行为。“'99 西雅图运动”之后几周，我的朋友们告诉我，跟这么多的共同致力于生活和民主的人在一起是什么感觉。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重复着一句话：“这让我感到自己真实的存在”

① Sarah Ruth van Gelder 与 Jonna Macy 的访谈，“The Great Turning,”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Spring 2000, 37.

② Paul H. Ray and Sherry Ruth Anderson, *The Cultural Creatives: How 50 Million People Are Changing the World* (New York: Harmony Books, 2000), 122.

(It made me feel so alive.)。西雅图抗议者们关心的不是别的——他们体验到一种深深的价值感以及其他的相似感觉，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个人的生活力量与数以千计的其他人的生活力量结合在一起时，这种感觉就产生了。我们一起描述着人类奇异的多样性，一起在关爱和尊重中采取行动建立一个为所有人享有的世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觉醒时刻，它触动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思维神经。

意识觉醒

在“'99 西雅图运动”之前几个月，由我担任委员会主席的“积极未来广播网”（The Positive Futures Network）在华盛顿的港口城市汤森举行了一个会议。美国各地不同社会运动的 40 名领导人相聚了 3 天，共同思考和分享“可能的国家”（The State of the Possible）的面貌。现在已经是建立联系并找到共同目标的时候了。在集会结束之际，我们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我们是否有可能有一种明确的观点——一种组织原则，从而使我们这些不同的运动能够聚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比分散行动的总和更大的变革力量。正如《YES! 积极未来杂志》的执行编辑沙拉·冯·格尔德所说的，一致的观点就是“我们正在努力使社会从以爱金钱为中心转向以爱生活为中心”。对我来说，这个简单而又有力的观点概括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事业。^①

一年之后，积极未来广播网与另一个运动组织的领导人又共同组织了一次相似的会议。会议把“'99 西雅图运动”与 20 世纪其他重大社会运动的教训联系起来，思考这场运动的意

^① 更完整的报告请见 Sarah Ruth van Gelder, “The Love of Life,”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1999, 60-61.

义。跟以前一样，我们力图相互间建立起联系并找到共同语言，从而帮助我们不同的兴趣和信念合并成一个整体性的运动。早些时候，这个组织从较为抽象地对运动、制度和社会改造的讨论转向一种更具有个人交流性的讨论，这在各个方面都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启发。贝利维·鲁克斯（Belvie rooks）是非裔美国作家和教育工作者，他让我们认识到，有色人种在美国有着明显不同的种族经历，这会使他们产生一种与白人领导的运动有着完全不同的优先考虑的意识。她说：“我在非裔美国人社区与他们进行了对话，绝大多数热烈的对话焦点并不是怎么去拯救地球的，而是怎么去拯救我们的孩子。”^①

后来，西雅图内城区一个名叫罗伯特·杰夫瑞（Robert Jeffrey）的牧师告诉我们，他是多么的厌倦于为那些被枪杀的孩子举行葬礼，他甚至连愤怒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对自己每天必定经过的底层世界深感绝望，我的愤怒即源于此。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你亲身感觉到那些聪明的人正绝望地依靠吸毒而生，你大多数中学同学都已经离世或在坐牢。在这个世界里，你能够在大街上看到脸上伤痕累累的孩子出没，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打仗。在这个世界里，银行的制度规定可以将为你的孩子提供毒品的公司犯罪人的钱洗掉，同时拒绝向那些植根于社区的企业贷款，而这些企业能够创造出人们极度渴求的工作岗位。^②

组织中有色人种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诉说着种族主义社会

① Carol Estes, "White on Black,"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2000, 59-60.

② Robert Jeffrey, "Black on White,"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Fall 2000, 61.

给他们带来的痛苦，这些经历使我们形成了一个交流圈。这些述说出来的痛苦故事产生的原因是，我们给予对方的无谓的不公平的折磨与这个世界本来应该有的样子之间毫无关联。由于分担了这些痛苦，所以我们相互之间的信任和理解更深了一层——产生了一种生活与社区具有意义的感觉——它深化了我们的共同信念，希望一起为创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社会而努力。

上述经历只是意识觉醒和深化的一个部分，这种意识是这一日益高涨的运动的基础。对于作家、佛教学者乔安娜·梅西（Joanna Macy）所谓的“伟大转折”（Great Turning）而言，行动的每一步都会建构并关注社会力量在这个转折中的流动。乔安娜·梅西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伟大转折：第一个是反抗，包括诸如为减缓破坏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抗议活动等。第二个就是创立一个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第三个就是精神觉醒。正如梅西所解释的：

对于伟大转折而言，仅仅有新的团结、新的生产和分配方法还是不够的。它们如果不植根于深深的明确价值观之中——我们是谁、我们想干什么和我们怎样相互之间以及与地球的生命体之间保持联系，那么它们必将走向萎缩和死亡。这就等于是我们要我们进行意识转换，而实际上这种转换正在迅速进行。这就是伟大转折的第三个方面，它在本质上是一个精神解放运动，觉醒的主题和价值观都是既很古老又很年轻的，它可以融入古老的智慧之河中。^①

伴随这种觉醒而至的是我们对所有人的热爱都在深化，以

^① 访问 Joanna Mary, 34-37.

及创立一个培育和欢呼热爱生活的社会的可能性在日益加大。

生活的指导原则

生活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到了生活所具有的惊人能力，是学着去喜欢生活塑造我们的相互关系与制度的方式。我们可能会因此发现自己长期以来一直加以否认的潜能。下面列举的是一些生活的指导原则，它们都是由新一代的生物学家如侯美婉（Mae-Wan Ho）、伊丽莎白·沙托斯（Elisabet Sahtouris）、珍妮·班耶斯（Janine Benyus）、多利恩·萨根（Dorion Sagan）和利纳·马哥利斯（Lynne Margulis）等等这些人理解并加以详细描述，这些人都摆脱了传统科学中的机械主义、简约论模式的影响，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观察和理解生活。^① 他们告诉我们的原则有：

生活是自组织的和合作的 生活的组织机制是权力高度下放的，自我组织的权力可以下放到单个细胞的层次——同时每个健康的生命实体、每个细胞和有机体都在依靠作为其福利来源的更大实体，不断地调整和平衡自己的需要。许多对维持我们身体机能很重要的决定都是由细胞层面的程序做出的，这说明每个细胞在整体中都具有它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功能作用。生物社区的调整过程具有更加彻底的自组织性，因为它的大脑或中枢神经系统没有功能替代物。此外，这些新生代的生物学家们发现，这些社区中成功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大、最强和最为残暴的竞争者。相反，它们是那些以有利于整体生活的方式来满足自身需求的物种，例如蜜蜂就是通过给花授粉而换来自己的食物的。生活主要是一个合作性的事业。

^① 见 David C. Korten, *The Post-Corporate World: Life After Capitalism*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and West Hartford: Kumarian Press, 1999), 第4~6章中对此的进一步讨论。

生活受设定的、可渗透的界线的约束 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生活必须对外与环境进行交换。然而为了保持其内部的一致性，生活又必须对这种交换预先进行设定。因而生活就依赖于可渗透的、设定的界线。如果细胞壁破了，那么细胞里的物质和能量立即就与周围环境中的物质和能量融合在一起，细胞就会死亡。如果没有皮肤或其他的保护性表面，多细胞生物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海洋、山脉和气候带界定着生物社区或生态系统，它阻止着物种的入侵。就是连地球生物圈也是依靠地球的引力场来确保温度和臭氧层的固定不变，而臭氧层却在控制着地球与更大的宇宙天体之间的辐射交换，从而维持地球生物生存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生活是地方化的，与当地相适应 每个生活社区都会与其所在的特殊地区最复杂的枝节相适应，反过来它也会改变物理地貌，其方法有开垦和占有土地；获取、储存和出让水资源；以及形成一个小气候。生活因而就创造出与它的变化和转换相适应的各种条件，其中的转换就是把地球上更多的惰性物质转变成可供创新活动使用的生活物质。

生活是丰裕的、节俭的和共享的 生物社区在能源获取和再利用方面效率极高，它是对“俭则不匮”（Waste not, want not.）这句格言的生动阐释。在细胞、有机体和物种之间，能量和物质以最低的损耗率不断地进行着循环利用和再利用，因为一个生物体的废物就是另一个生物体的能源。节俭和共享是生活富足的秘密之所在，这种富足是它能够以极高的效率获取、使用、储存和共享可利用物质的能力，也是它的一种产物。

生活是多样化的，创造性的 一元主义文化没有给生活留下存在的空间，但同时它也不是与其他生活相隔离的。各种物种和生物有着纷繁复杂的生活形式，当一种生活面临危机时，

生态社区中就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它可以提供建设性的信息，使生活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去适应，去学习，去创新，去分享别人的知识，从而获得新的潜能。

上述这些原则可能是所有健康的生命系统都必须遵守的基本组织原则——其中包括健康的人类经济和社会系统。它们指出，产生一个真正民主化的、自组织的社会是可能的，这种社会由立足于本地的强大社区组成，而这些社区则是有可渗透和确定的边界的。每个社区都与不同的、富有活力的地方生态系统相适应，从而形成生活的富足，它们都与邻居在信息、技术和资源等方面进行着创造性的、合作性的交换，从而确保每个个体都有一个适当的、满意的谋生方式。这样的观念并不是什么激进的或奇特的想法。我们可以把社会看成是一个结合体，参与结合的是参与式民主、肯定生活的道德文化，以及由负责的、管理良好、规模适度、由地方拥有的企业组成的市场经济。

毕竟我们都是生命体。因此很正常，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原则指导了所有生命系统的健康运行，它也应该是设计健康的人类社会的组织时必须遵循的相关原则。

市民化的社会

市民社会这个术语现在已经与全球民主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的现代意义是在东欧支持民主运动过程中开始使用的。在绝大多数的使用中，市民社会都是非赢利、非政府部门的同义词。然而，最初它有一个更加宽泛的含义。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551-479）使用“政治社会/社区”（Politika Koinonia）这个术语来表达一种市民社会或市民化社会的思想。在这种社会中，自由和平等的市民对个体和整体的需求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扮演他们

的市民角色。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术语后来被翻译成拉丁语“societas civilis”或叫市民社会。

生活民主运动的目标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社会/社区”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若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生活民主运动这个词，那么它的更高目标就是创造一个由自由平等的、有市民意识的并且由市民组成的、极其民主的全球市民社会。在这种意义上，这个术语对于我们这里是有用的。

如果我们打算要把目前明显不文明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转变成为一个全球市民社会，那么我们必须对它们之间的区别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图 23.1 以尼坎南·玻拉思（Nicanor Perlas）的重要观点和他的著作《塑造全球化：市民社会、文化权力与三者的叠加》（*Shaping Globalization: Civil Society, Cultural Power and Threefolding*）为基础，详细描述了这两者之间的差异。^①

在市民社会中，文化领域是最主要的公共生活领域，它是自由的、有文化意识的人民积极参与社区生活的产物。人民的这些个人认同以对整体生活的精神单位的深层理解为基础，这样的文化是真正地肯定生活的。它的价值观、象征体系和信仰都是市民社会成员创建和规范政治（统治）、经济制度的基础。

真实文化中肯定生活的价值观很自然地就会导致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出现，这种民主政治制度建立的基础就是确信，在政治演说和决策过程中要让人民公开、平等和积极地参与进去。它们也很自然地导致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的诞生，地方性企业作为这种市场经济的组成成分，为所有人提供了一个丰裕的、令人满意的生活，将每个人生存都要依靠的生产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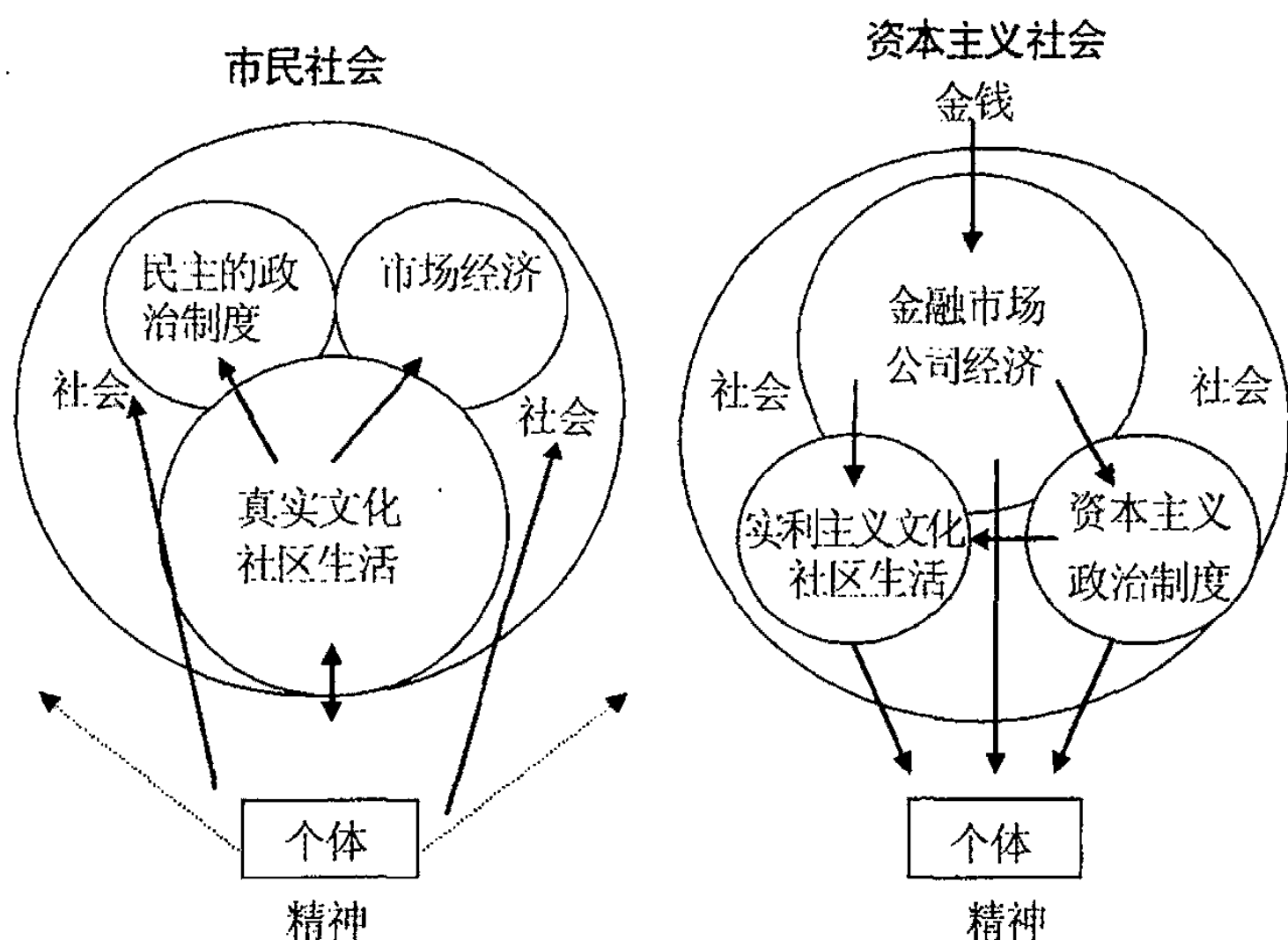
^① Nicanor Perlas, *Shaping Globalization: Civil Society, Cultural Power and Three folding*.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CADI, 2000).

的所有权分配给所有人。这就使社会有可能让所有的健康的生活系统能够完全进行自我组织，主要是进行合作；为每个个体提供最大限度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为了整体的生活而将自己的创造潜力开发并表达出来。市民社会的力量和价值观从生活精神层面喷涌而出，经过人民到达文化层面，最后到达制度层面。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是主导性的部门。在这个社会中，权力和价值观从金钱流向经济制度，后者反过来又塑造了政府制度和文化，把社会规则、价值观和象征体系与金融利益结合在一起。资本主义统治社会的关键在于，它有能力维持一种实利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拒斥精神并不断地强化着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就是：人类贪婪、实施竞争和暴力的能力比它进行共享、合作和关爱的能力要强。资本主义的软肋就是它依赖于一种不真实的、未经证明的文化，这种文化与绝大多数人对人类真实状况的认识背道而驰。人们的意识觉醒将使这种不真实的文化无法维持下去。

图 23.1 市民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市民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生活民主运动同时在许多不同的方面适当地活动着，这包括抗议、教育、政策宣传、政治动员和重建社会、地方经济和生态系统的实践创新等。在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创新实践中，人们很容易就会忘记一个更深层的现实，那就是这一运动是从文化觉醒中诞生的，它最为迫切的工作主要应该是文化性的。因此，它的大多数有效的政治策略很可能都是一种手段，用来推进文化觉醒，并对文化觉醒中释放出来的社会能量进行巩固和加强。^①

文化策略

在越南战争期间，我在佛罗里达的伊格林（Eglin）空军基地的特殊空战学院中做了18个月的教员。根据官方的说法，要想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美国军队就必须赢得越南人民的人心和他们的思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军方对赴越南的美国空军人员进行了训练，其中包括一支部队如何去把传单包装好并从飞机后部扔出去，让传单准确地落地。这些传单向越南人讲述了美国人是多么的关心他们，并在努力寻求给他们带去自由和民主。但是美国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比传单更能说明问题。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失去了人心和思想——和战争——败在了由争取自身自由的人民组成的农民军队手中。

若按传统计算方法来计算，当前在公司全球化力量与各种争取生活民主的运动之间开展的斗争也是一个实力不对等的对抗。公司全球化一方所拥有的是金钱和枪炮。它们运用粗暴的强权来对付觉醒了的大众，但这已经被证明几乎都是不战自败的。全球资本主义机构运用他们的金钱、公共传媒和军警力量

^① 参见 Ellen Schwartz and Suzanne Stoddard, *Taking Back Our Lives in the Age of Corporate Dominance*, 这是一本讲述如何通过愉快又细致的生活来颠覆全球公司体系的好书。

对争取生活和民主的斗争进行镇压，它镇压得越厉害，这些权力所依赖的幻觉破灭的速度就越快，并会因此加快大众的觉醒，导致自身的灭亡。

打破孤立状态

正如前一章所提到的，目前已经有 5000 万美国人——文化创新者——所持有的价值观是生活民主运动的基础。文化创新者已经成为该国第二大的文化群体，它的成员仍在不断地增加。由于传媒对他们视而不见，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大党派都不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对他们自身和大众而言，他们很大程度上还是隐形的。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觉得很孤独，与主流社会不合拍，政治上没有权力。但是这种状况可以很快地得到改变。

“'99 西雅图运动”组织抗议世界贸易的人们对消除这种孤立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推进了一个议程，围绕着这种觉醒意识建立起一个联盟。对此做出贡献的还有其他的抗议、集会和讨论会、独立传媒开展的计划和出版物，以及像绿党这样的独立政治运动。^①

神话的破产

资本主义是在一种文化神话的基础上确立它的合法性的。把这个神话揭露出来，它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了。因此让神话破产就成为一个虽然简单但是却很有力的文化策略。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说出那个与每个人心中的智慧产生共鸣的真理——这种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特殊的专长或口才去述说，或

^① YES! A Journal of Positive Futures 的一项主要使命是帮助破除孤立。在其 2000 年秋刊中提出文化觉醒和其意义所在，见 www.yesmagazine.org。

为它辩护。下面列举的就是其中的一些真理：

- 生活比金钱更有价值。
- 生活是真正财富的源泉。
- 通过破坏生活来挣钱是一种社会病态。
- 民主显而易见是公司统治的替代者。
- 市场经济很明显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的接替者。
- 真正的繁荣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充裕而满足的谋生手段。
- 绝大多数人在本性上都是合作的和富于同情心的。
- 只有自然人才拥有自然权利。
- 对那些将会塑造他们生活的决定，所有人都有权参与决策。
- 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不可分割。
- 人类制度仅拥有我们向其让度的那部分权力。
- 法律由人制定，也可以由人来改变。

通过这些我们共同拥护的真理，我们找到了对方并相互结合在一起，建构起适合的社区，收回我们的文化领地。

文化干扰

做广告的人力图运用他们的标识和商标来建立积极的联系，鼓励我们把它们作为自己的意义和身份的象征。例如，耐克公司就希望当你穿着耐克的 Swoosh 鞋时，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在空中毫不费力地飞翔，并到达胜利的终点。公司传媒希望我们能够把资本主义这个词与民主、市场、自由以及所有人物质财富的繁盛联系在一起。

文化干扰 (Culture Jamming) 或广告破产是一种讽刺标识、商标和广告语的艺术, 它使人们获得新的意识, 使做广告的人自食其果。^① 譬如, 文化干扰者可能会把耐克公司的 Swoosh 鞋与印度尼西亚血汗工厂工人的形象联系在一起。有个广告是两个万宝路牛仔坐在马背, 他们就会在这个广告上加一个标题, “鲍勃, 我得把一个肺脏摘除了”。或者他们传播着一幅画, 画上画的是壳牌公司的绞架上吊着一具尸体, 这会使人回想起反对壳牌公司在尼日利亚进行钻探开采的肯·萨罗·维瓦。

加拿大记者纳奥米·科兰 (Naomi Klein) 在她写的《没有标识》(No Logo) 一书中提到, 对于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公司而言, 最主要的财富还是它的标识。例如, 耐克公司就没有自己的工厂, 它把自己所有鞋类和衣服的生产都转包了出去。1997年, 耐克公司耗资 50 万美元做广告来巩固它的商标。任何使该公司的标识贬值的事物都会危及公司的基石, 因为标识是它的主要财富。学生成功地领导了反血汗工厂的运动, 他们反对耐克公司、盖普公司、迪斯尼公司和其他依靠商标为生的公司, 正如这场运动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靠品牌为生的策略具有极大的脆弱性。^②

权利话语

决定在公众演讲中采用哪种语言是另一种有效的文化策略。公司全球主义者严重地误导了这一运动。例如, 公司全球

① 有关“文化干扰”这一概念请参见 Kalle Lasn and the Adbusters Media Foundation in Vancouver, B. C., publishers of *Adbusters* magazine, www.adbusters.org. See Kalle Lasn, *Culture Jam: The Uncooling of America* (Eagle Book: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② Naomi Klein, *No Logo* (New York: Picador, 1999).

主义者把自己描述成贸易自由主义者，借此他们立即要求公众积极地与贸易和自由结合起来——这暗示他们的对手是消极的反贸易主义者，是反自由主义的极端主义者。同时，通过把焦点放在贸易上，他们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真正的问题即公司统治问题上引开，把它引向贸易问题。而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贸易问题并不能成其为一个问题。抗议者们反击说，他们支持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这两者之间是有显著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对于他们的行动来说意义不大。

这一运动还有一个战术上的失误，那就是忽略了全球化这个词。对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意味着随着传播物质繁荣的资源和技术共享程度日益扩大，人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在日益加深。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对这种流行的想法进行了总结。

全球化的反对者可能会认为全球化是一件新出现的蠢事，但实际上它既不是新出现的，从总体上看也不是件蠢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包括旅游、贸易、迁移和知识扩散在内的互动过程的一种强化，而这种互动过程几千年以来一直都在塑造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进步。对全球化持极端反对意见的人是固执的分离主义者和无情的自给自足主义者。^①

当公司全球化的支持者说全球化是有利的，是不可避免的时候，绝大多数人都会点头同意，并说“那是当然了”。当反对者说他们是反对全球的时候，他们就像是那些边缘化的仇外者向像森这样的人狂吼，而像森这样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全球化的到来是以民主、人民和地球为代价的全球公司统治的代名词。随之而来的缺少沟通将会使公司的高级幕僚们（Spin

^① Amartya Sen, "Global Doubts," *Bridges Between Trad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July-August 2000, 3.

Doctor) 的一些梦想成真。

事实上，绝大多数生活民主运动的成员对人民通过旅游、贸易、迁移和知识扩散等方式使互动日益增加的现象表示欢迎。实际上，这一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具有争议的、最为国际化的运动，它的基础是深厚的、持久的国际友谊和联盟，以及对整个地球和人类社区的责任感。许多人现在明确地表示他们反对公司的全球化。这个运动的下一步就是提出定立一个名称，这个名称要能够表达出一个积极的观点：就是要创造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世界。^①

由于迷恋于无限繁华的物质天堂这一承诺，人类已经很长时间忽略了两种急切需要之间的不平衡性，这两种需要是，作为一个生命体，我们需要在有限的地球上生存下去；另一个就是为我们的未来制定规划的金融机构的需要。全球性公司出现的目标是为君主建立一个殖民帝国，所以它并不适合去完成创建一个公平的、可持续的和富有同情心的市民社会的任务，而市民社会能够培育出满足伙伴关系和对整个生活的尊重。公司全球主义者和他们所服务的公司帝国可能正处在技术革新的最前沿，但是从社会和环境角度来看，他们都是以往时代的帝国殖民统治、精英特权和国家许可式劫掠的遗留物。

生活和民主正在解释着生态革命和市民运动的价值观，而促成生态革命成为现实的正是市民运动。追求短期的经济价值与人类、民众的健康生存活动是不相容的，就像民主与公司统治互不相容一样。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迷恋金钱的、由公司统治着的世界，转化成一个热爱生活的、由人民统治着的世界。

^① 如在序中所述，这种行为最终会为自身命名。我在此选择“生活民主”这个在印度行动中的称谓。

联合起来反对这种转化的体制性力量非常强大，以致我们可能会意识不到支持生活的变革（life-affirming）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我们周围展现出来。人们认为，民权运动、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同性恋运动在仅仅 40 年时间里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大量有关人类与环境关系的共同观念和价值观，虽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这些运动都在取代全球资本主义者的物质主导文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们都促成了这种物质主导文化转变成市民社会那种根植于精神的合作文化。

经验显示，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以前强大的社会变革的潜在推动力就一直在悄无声息地形成，直到有一天它猛烈地爆发出来，使似乎不可能实现的数百万人的梦想变成一个新的社会现实。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情况：例如，苏联的突然崩溃；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突然被废除，纳尔逊·曼德拉通过和平选举当选为总统。直到 1988 年还没有一个人会想到 1991 年苏联要和平解体；德国会重新统一，柏林墙会被推倒；此前的“邪恶帝国”的领导人会邀请美国一起商讨怎样去拆卸它的核武器库。南非所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情在 3 年前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共同作用，相似的力量现在也正在创造着一个市民化的全球社会。

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发现自己现在面临着一个选择：我们要么向前走一步达到理解的新境界，并为整体的生活而发挥作用——有意识地重新发现人类社会——要么就会有种族灭绝的危险。我们有知识、有技术、有必要的条件去重新考虑并有意识地重建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使它们作为一个集体的创造性活动而为所有人赢得和平、公平和繁荣。这种迫切需要和机遇的强大联合向我们提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为迫切的创新挑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机遇，让我们有机会

去创造出—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而这种市民社会正是数千年以来哲学家、宗教预言家和其他数百万人梦寐以求的。

人类与其制度之间的伟大战争——在生活文化和金钱文化之间发生——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战争的结果也是无法事先预知的。但是，我们在—一个伟大的故事———一个创新的故事中——看到希望和鼓舞人心的东西，这种创新会把精神上的洞察与科学知识结合在一起，从而赋予我们的存在和面临的挑战以更深层的含义和目标。

结语：本时代的一个故事

如果人类的意识领域不进行一次全球性的变革，那么事情就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世界所面临的大灾难，不管是生态方面的、社会方面的、人口方面的，还是文明整体上的崩溃，都将是不可避免的。

——瓦茨拉夫·哈维尔

我很好奇的是，在认识到我们都是诸如城市、生态区域、各大洲和地球这类生命体里一个活着的细胞之后，我们还会不会更优雅地进行着生产。我们能够减少一些压力，变得更健康一些，更完整一些吗？我们是否只是把我们的工作视为帮助这些有机体实现它们存在的完整性？

——蒙大拿州密苏拉市市长 丹尼尔·克密斯^①

日益增长的社会危机具有深层的精神根源。经济生活与精神意义、认同的分离使生活仅成为一件商品，随时准备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相比而言，市民社会依赖的基础是真实的意义

^① Daniel Kemmis "20 Questions," *Utne Reader*, January-February 1995, 79.

和目标。托马斯·贝利在《地球之梦》一书中建议，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依靠于发现一个新的故事，从中我们可以为自己的存在和面临的挑战提供一种意义感和目标感。托马斯·贝利和许多其他人，包括布朗·斯威莫、乔安娜·梅西、侯美婉、伊丽莎白·沙托斯、林·麦吉利斯、马歇尔·福克斯以及杜安·埃尔金等人，开始从其他众多的源泉中吸取营养，这些源泉包括天文物理学、量子物理学、新生物学和世界上许多宗教传统中的知识，用这些吸取来的知识描绘出这样一个故事大纲。这是一个当代版本的创造宇宙的故事，它揭示了我们面前的选择具有史诗般的重大意义。

生活的发现之旅

故事早在 150 亿年以前就开始了，当时一个巨大的爆炸把微小的能源颗粒散布到广阔的空间中，这些颗粒就是创造所需的原材料，于是在巨大的轰鸣声中一个新的宇宙诞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颗粒自行结合形成原子，这些原子旋转形成巨大的云状物，它们结合形成各个星系中无数的恒星，而这些恒星生生灭灭，又重组形成新的恒星、恒星系和行星。数十亿恒星的诞生和灭亡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些能量把简单的原子转化成更加复杂的原子，把原子结合成更复杂的分子。它们每前进一步都为整体的成长和进化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分辨力和能力上每一阶段都比前一阶段有所超越。一个极大的智能开始了一项宏伟的探索，想通过发现和认识自身的前途来了解自己。

在这种探索进行了 110 多亿年之后，在一颗行星上出现了巨大的突破，这颗行星围绕着一个外层星系（outer galaxy）的无数恒星中的一个运转，就是在这个行星出现了生命。这些生命非常微小，它们是简单的单细胞细菌。尽管它们看起来不

重要，但它们包含了巨大的创造潜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创造出生命知识的“构建模块”（building block），为此后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他们发现了发酵、光合作用和呼吸等这些对所有复杂生物都很重要的技术。它们学着通过细胞壁来交换有机物质，在一个宏大的事业中分享它们的发现，这样就产生了这个地球上第一个全球沟通系统。它们转换并稳定着整个星球大气层的化学成分。当生命学习的成果成倍增加之后，这个星球上的生命细胞的种类、体积和潜能都开始迅速增长。

在某个时候，单个的细胞发现，它们相互聚集在一起并组成具有更多种类和潜能的多细胞生命体是有好处的。渐渐地，这个超乎平常的事业把地球上更多的“惰性物质”（inert matter）转变成一个植物和动物的壮观的生命网络，这个生命网络的变革和选择的能力越来越强。在小生境上可以发现新的生物，借助于小生境，这些新的生物立即就能够维持自身的生存，并对生命整体的生存做出贡献。那些不能发现或建立一个提供服务的小生境的生物将会消失。经过不断的尝试、相互联系和建构，生命的进化网络最后发展成为一张逼真的交织着令人惊讶的多样性、美丽、意识和进行明智选择能力的织锦。

然后在 2600 万年之前，这与我们人类的 150 万年的生存历史已经很近了，产生了一种生物，它能够利用自己的思想意识；有能力怀着敬畏感受到创造之美和神秘之处；有能力进行清晰的表达、沟通和共享知识；有能力为了自身的目标而改变物质世界；有能力参与并有意改变自己的未来。他们把自己称之为“人类”，他们是生命精灵最为大胆的尝试。

这每一个人类生物都是由大约 30 万亿到 70 万亿自我调节和自我繁殖的单个活细胞组成。每个人的干重量（dry

weight) 中有一半多都是单个的微生物，这些微生物需要对它的食物进行新陈代谢，从而产生存活所必需的维生素。所有这些微小的实体共同形成一个优美平衡的结合体，从而创造出这些不平凡的单个的人。这是一个通过合作而产生的巨大成就。

在宇宙万物的设计规划中人类具有很快的学习能力。在人类的前 250 万年的历史中，他们拥有了语言能力，学会怎样用火，发明并使用了复杂的工具，开始进行艺术的表达，学会了种植粮食作物，学会用书面方式进行联系，建立了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团体，在植物学、动物学、天文学和航空学领域发展出系统性的知识体系。随着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和组织的能力日益增强，更加重要的技术进步开始以加速度的形式出现了——每前进一步都会提高他们操纵和控制物质世界的各个方面的能力。

文化危机

然而在前进的道路上有些事物却步入了歧途，因为人类所运用的强大技术和制度对生活，最终是对他们自身开始具有越来越大的破坏作用。事实上，仅仅在 100 年的时间里——在 1900 年到 2000 年间——他们破坏了许多花费数十亿的时间才积累起来的生命资本 (life capital)。

有些人把这种悲剧出现的原因归咎于人类基因上的缺陷，认为这种基因缺陷必然会使人类走向盲目追求贪欲和暴力。然而最早期的人类文明都是爱好和平的、有合作意识的，甚至即使是在它们最具有破坏力的时期，绝大多数人都还是慷慨大方和关心他人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文化方面，它是人类所谓的科学革命所产生的实利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从许多方面看，随后出现的科学革命以及工业与技术时代

都是人类历史上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它们使很大一部分的人类摆脱了受剥削、迷信、恐惧和农民的短命，使农村生活出现了早期的消亡，使人们摆脱了沉重的宗教教条的束缚。他们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技术成就——其中包括发明了各种工具，让人类摆脱体力劳动和被剥削的状态，消除了人类互相联系的地理障碍，为迅速增长的人口供应充足的食物。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类的健康水平，延长了他们的生命。他们创造了全球治理和合作的制度机构。他们也把民主和人权作为人类共同的理想。

然而，他们也建立了一种信仰体系，这一体系认为物质是唯一的存在，认为最好是把宇宙视为从它一产生就开始运作的计时装置，随着弹簧的张力逐渐用完，这个计时装置就会日趋破落。他们进一步认为，生命仅仅是物质复杂性的偶然产物，意识是虚无的。

这些信念成为现代主义文化体系的基础，这种现代主义鼓励人们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让人们认为个人不用为社会和大自然的福祉而担负责任。

人类拒绝承担对社会和大自然的责任，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者崇拜的是一个叫做市场的“神”。他们相信市场有一只无形的手，它能够神奇地把贪婪和无情的行为转变成人类的收益。资本主义最为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存在一种消费主义文化。资本主义通过在大众传媒中灌输各种信息而培育出这种消费主义文化。这些信息就是，对这件或那件做广告的商品进行消费会有助于让空虚而又孤独的生活充满意义和爱。人类的创造力开始日益转向创建一个叫做“公司”的强大制度上，而公司通过所谓的经济增长过程致力于让消费无限制地增加。增长已经变得非常具有吸引力，以致许多人都没有发现这些公司已经控制了他们的生活，正在破坏地球

的生命维持系统，破坏社会的结构，危及数十亿人的生命安全。

觉醒

随着 2000 年的来临，文化出现转变的迹象日益明显。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就好像从深深的梦幻中惊醒一样，意识到美丽、快乐和生活的意义。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对消费主义产生怀疑。数以十万计的人走上街头，要求恢复民主制度，结束公司的统治，并要求尊重所有人类和其他生命的需要。

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不是精神而是物质是虚幻之物，还有一些人对这一结论的含义进行了思考。他们认为，意识智力是所有其他事物表现自己的基础。有一些人开始重新考虑人类是否有可能有新的迹象，具有生活的创造能力，从而创造出一种合作的和从根本上进行自我组织的生活。有些考虑到人类目标这个问题的人开始认为，人类并不是创造之旅的终点，而只是创造力不断展现的一个工具。

那些站在文化转变最前沿的人——有些人称他们为文化创新者——深深地感到与主流社会的不相容，他们努力去矫正严重的制度病态现象，但有时候他们受到其他一些人的猛烈攻击，后者相信文化创新者是在错误地反对进步和繁荣。因此这个史诗般的文化斗争不仅不时地在对人类的未来，而且在对生活革命过程的深层含义进行着思考。

这个故事是有关我们自己的故事。选择也是我们自己作出的选择。我们人类与其他物种很不一样，我们一直在从事着促进智力、社会和技术革命进程的工作，希望使我们这个物种的能力更加强大。宇宙中最为伟大最为神秘的奇迹之一就是，当每个人类发展阶段走到尽头的时候，它都能够留下方法和警

醒，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不让我们以不确定的步伐走向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现在就处在迈出这一步的关口上。

科学的范式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意识，它把我们的生活精力集中于完成掌握物质世界的秘密这一任务之上，集中于加强技术能力之上。这些能力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让我们创造出一个努力推进社会、智力和精神发展的社会。我们已经把这些能力滥用于许多可怕的方面，并且不得不去证明我们已经能很成熟、很明智地运用这些权力。然而，同一技术也让我们有能力把身体渴求和剥削从这个世界上清除出去；可以使所有人能够有更大的自由，从而把更多的生活精力投入到更加有意义的活动中去，而不是投入在为个人日常生存而努力的活动中，可以使我们与自然之间保持平衡协调状态。

在这个正在逝去的时代里，人类的成功和失败都可以回溯至我们对自身形象及宇宙形象的曲解之上。哥白尼革命使科学与宗教分离开来，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掌握物质世界的秘密之上，这就开启了走向极端技术成果的道路。但是我们却与承载生活和意识的深层次精神越来越疏远了，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是否坚持一种承认人类精神和物质方面是相结合的关系的共同进化的观念，这样就可以把自己重整成为完整的人、完整的社区和社会。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历史上最为深刻、最激动人心的改革——这是要求我们激发出自身所有的创造潜力的挑战，而相互关爱和对多样性的容忍就是我们希望创建的健康社会的重要基础。我们正在从事着一个共同的事业，这个事业要求我们每个人都做出创造性的贡献，这样我们每个人就要做好准备，准备在任何特定时刻既可以做无畏的领袖，也可以做卑微的追随者——甚至在同一时刻要同时担当两种角色。我们所参与的创造性行动是没有行动蓝图的，因此我们必须记

住，在这种进程日益推进的过程中，我们要用批判的眼光和开放的思想去注意每个人身上出现的美德，去注意每种思想中作为精髓的真理成分，在这一进程中我们都还是初入门者，还需要好好学习。

译 后 记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第一版于 1995 年出版发行。在它的第二版问世之前，仅 5 年多的时间里它已经被翻译成 13 国文字，发售近 10 万册。读者对该书一直贬褒不一，或好评如潮，或恶语相向，双方各走极端，相互争议，蔚为大观。正如本书作者所说的，自本书出版以来，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成为生活民主运动的一部“圣经”。和平主义者、环保主义者、第三世界发展事业工作者、市民运动倡导者等都从中汲取了营养，获得了理论上的支持。中译本翻译的是本书 2001 年的第二版。

作者戴维·科顿早年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先后在美国联邦政府机关和非政府组织从事第三世界贫困与开发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他在发展社会学、发展经济学以及组织理论与贫困问题等方面造诣深厚，硕果累累。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无限制地消耗资源，已经造成了全球的危机，它表现在经济上各国之间与国内日益贫富分化，富国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对穷国进行控制，并将自身发展的不利后果转嫁给后者；政治上民主多元主义力量下降，市民社会解体，极权主义力量与公司控制政府的力量上升；思想意识上掠夺主义、自由主义的源观、市民观和发展观一直在为跨国公司的发展思维提供理论辩护，并带来全

人类的灾难。作者提出的应对方法是提倡生活民主运动，通过壮大市民社会的力量，来对抗公司这一经济实体的暴行，对抗助纣为虐的大政府。具体的观点、行动方略，本书作者在导论部分与全书最后一章进行了详细阐述。

在长期的求学生涯与本书翻译的过程中，众多师友提供了大量有形与无形的帮助。首先要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郑杭生教授，他的言传身教将使学生受益终身。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博导江立华教授。多年以来，他和夫人王钊老师一直在指导我的学业、关心着我的生活，其中感激之情难表万一。这次同样是他给我提供了这次翻译的机会，并在初稿出来后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与校对。多年相交的老友李贇、李潇、肖翠云等人给我提供了精神上的动力。而师兄师姐兔平清、刘仲翔、汪雁与同窗姚伟、刘中一、马永清、潘鸿雁等人的建议和无形的帮助都使我受益匪浅。

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我深知其中的艰辛与智慧。

写这个译后记的时候，新婚妻子邱彦辉正伏在书桌上校对译文的初稿。作为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教师，她的专业知识对我极有助益。

由于翻译时间很短，更由于译者的英语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之处，交稿之际，心中实在惶恐。文责当然是要自负的，但我还是希望译文能“信”、求“达”，“雅”则是今后的努力方向。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译 者

2004年12月8日展
于中国人民大学品园

这是一本“必读”书——它无情地控诉了一个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它并不是出自于一个激进的理想主义左翼分子之手，而是出自具有充分证据的权威人士审慎思考的结果。它让我既感到沮丧万分又觉得希望犹存。或许，我们可以为创造一个更公正的经济秩序而行动起来！

Archbishop Desmond M. Tutu
(图图大主教)，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哪怕是对那些最忙碌的公司经理来说，这本书都应该排在那些必读书目的前列。

《金融时报》

(The Financial Times, 伦敦)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一面世，就令世人为之震惊，并成为一本畅销书。这个新版本扩充并完善了科顿教授睿智的分析，向人们展示了跨国公司是如何支配人民及其政府的，展示了当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时后果将会如何地悲惨。作者还向人们指明了通向一个更为公正、繁荣和可持续的未来社会的可行路径。这本书必将冲击你的头脑、振奋你的心灵并激发你的公民精神。

Ralph Nader

如果你只能读一本关于如何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众多挑战的书，那么应该找的就是这本书……科顿教授在书中全面深刻地批评了全球经济的专制统治，同时也提供了经过充分论证的有益选择来催生能够带来改变的议程。

John Cavanagh
政策研究学会会员
《全球梦》
(Global Dreams)
一书的作者之一

如果你在公司工作，或者你知道某人在公司工作，这本书全值各你们一读。科顿教授对未来20年的商业进程作了界定，并且他这么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发自肺腑的。

Peter Block

《服务》(Stewardship)和
《有权力的经理人》

(The Empowered Manager)的作者

对于那些想要窥探全球经济幕后的秘密、想要找出如何拯救我们自己并对全球危机作出回应的女性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

Bella Abzug

妇女环境与发展组织主席之一

《当公司统治世界》一书绝对是新的世界经济的必不可少的向导。它是一本富于学术性、大胆无畏并最终能带给人希望的书。它为经济改革的进程提供了一个蓝图，而这对于主权国家和某些地区的经济复苏以及处理与自然界的正确关系而言，都是必需的。

《复兴》(Resurgence)杂志

倘若每个心里默认消费主义是通向幸福的必由之路——并且认为无限制的发展是通向全球繁荣的基本道路——的公司领导人，都能够带着开放的头脑来读《当公司统治世界》这本书，这个世界必将有机会变成我们大家的乐园。

《多伦多环球邮报》

(Toronto Globe and Mail)

责任编辑 / 崔肇钰
倪腊松
黄洁华

装帧设计 /
CWX (卢小雅+何筠)
责任技编 / 黎碧霞

ISBN 7-218-05035-2



ISBN 7-218-05035-2

F·742 定价：28.00元